

蘇聯銀行 國有之史 的發展

М. С. АТЛАС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БАНКОВ
В
СССР

亞特拉斯著
彭健華譯

大東書局印行

一九四九年三月再版 書號 6011 (2001—4000)

蘇聯銀行國有之史的發展

(原名：蘇聯銀行國有化)

定價一四二〇〇元

外埠另加郵運包紮費

原 著 者 亞 特 拉 斯

譯 者 彭 健 華

出 版 者 大 東 書 局

印 刷 者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 行 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分局

蘇聯銀行國有化之史的發展

序

銀行國有化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首要行動之一。這一行動具有鉅大的歷史意義。銀行國有化與其最重要的社會主義經濟措施相並行，蘇維埃政權即掌握了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的司令臺，剝奪了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中心，摧毀了他的主要財政基礎。

銀行國有化在俄國整個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奠定了建立蘇聯新的社會主義信用制度的原則。蘇維埃的信用制度，在我們社會主義的建造中曾起過鉅大的作用，並成爲共產主義社會建造的重要槓桿。自然，蘇聯銀行國有化的歷史，呈現出很多的趣味。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燦爛的執行銀行國有化的典型經驗，自不僅引起蘇維埃的經濟學者和歷史家的注意。對於現在正實行着偉大的社會經濟改造（包括銀行國有化和信用制度的根本再造）的新民主主義國家，蘇聯銀行國有化之精密的啓示，更獲得實際的意義。但直到現在還沒有一本關於蘇聯銀行國有化的專門著作問世。在蘇聯的貨幣流通，信用和財政史方面所已發表的著述，祇是與蘇維埃政權其他財政政策問題相併論，研究到關於銀行國有化的問題（例如：里孚鏗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和進行時期的財政和信用』，一九三九年出版；考茲洛夫的：『蘇維

埃的貨幣』，一九三九年出版；賈欽珂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第一階段的蘇維埃財政』，一九四七年出版；古撒考夫的：『俄國貨幣流通概論』，一九四六年出版；亞特拉斯的：『蘇聯貨幣流通史概論』，一九四〇年出版。所以關於蘇聯銀行國有化的歷史問題，在蘇維埃的經濟著作中還不曾獲得發揮。

本書主要是根據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莫斯科州文獻，蘇聯財政部總文獻及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的定期刊物的材料編成的。這些材料，一部份已是讀者於上面引述的各書中所熟悉的，一部份則是第一次纔發表的。

著者。

蘇聯銀行國有之史的發展目次

亞特拉斯著
彭健華譯

序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夜資本主義俄國的信用制度

第一節 俄國的財政資本與銀行、信用制度的構成及其特性

一、股份商業銀行

二、俄國國家銀行

三、短期信用的次流機關

四、抵押信用銀行

五、信用合作社

六、俄國農村中的高利貸信用

第二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的信用制度

第三節 二月革命後俄國的信用制度

第二章 布爾什維克黨經濟綱領中銀行國有化的要求

第三章	蘇維埃政權掌握信用制度的第一步革命的措施	七九
第一節	國家銀行的掌握與銀行官吏怠工的克服	八〇
第二節	工人對私人銀行的監督	九一
第四章	關於蘇聯銀行國有化的法令及其意義	九九
第五章	關於銀行國有化法令的實際執行	一一一
第一節	商業銀行國有化實行的第一個時期：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月	一一一
第二節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九一八年春）銀行國有化與歸併的實行	一二二
第三節	銀行國有化與歸併的完成	一三四
第六章	蘇維埃共和國人民銀行的創立、信用與清算組織	一四一
第一節	社會主義銀行的構成及其實行措施的列寧計劃	一四一
一、	銀行工作集中化的原則	一四四
二、	人民銀行網的擴大	一四五
三、	企業活期帳戶貨幣支付的監督與消費需要支付的限制	一四六

四、人民銀行私人存款的吸收	一四九
五、人民銀行中清算業務的組織及企業和機關的貨幣於銀行中的集結	一五一
第二節 共和國人民銀行經濟信用的組織	一五六
第三節 一九一八年國營企業的財政供應與蘇維埃共和國人民銀行的作用	一六六
第四節 蘇維埃俄羅斯人民銀行的組織結構	一七八
第七章 抵押信用銀行的取消	一八五
第八章 國家對信用合作社的輔助，莫斯科合作銀行的國有化	一九七
第九章 蘇維埃國家對銀行事業壟斷的完成	二一三
第十章 結論	二二三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夜資本主義俄國的信用制度

第一節 俄國的財政資本與銀行，信用制度的構成及其特性

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準備和進行時期，布爾什維克黨在銀行方面的政策，係建基於對帝國主義，特別是俄國帝國主義條件下信用制度的作用，以及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時期銀行的作用之深刻的科學的分析。這種分析在列寧的著作中已有周詳充分的記載。

蘇維埃政權對信用制度各「環」的政策和特質，祇有根據俄國財政資本體系中銀行作用的描述和銀行各種特點的闡明纔能表示出來。所以我們說明俄國銀行國有化的歷史，便要從其信用制度的簡單敘述開始。

二十世紀初，俄國即已進入壟斷的資本主義階段。列寧曾經確定「俄國帝國主義是一種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和國家的制度中，農奴制度的殘餘和對外國資本的依屬性，使俄國在經濟和技術方面，沒有可能趕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列寧曾經指出，假使將俄國資本主義時代與前資本主義時代比較，便承認發展是非常迅速的。假使將此已有的發展與現代一般技術和文化水準下可能的發展相比較，便承認俄國資本主義此已有的發展，事實上是緩慢的。而且他不能不是緩慢的，因為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困處於

如此衆多的與資本主義不相一致，阻撓其發展，無限度的惡化生產者地位的國家設施之中的」。（見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發展」）

俄國政治的和經濟的落後，曾將西歐的財政資本引進到國內。斯大林於列寧主義問題中寫道：「沙皇的俄國會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最偉大的後備軍……他曾經允許了外國資本的自由投入，而將俄國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如燃料與五金掌握在手中」。俄國會以獲得賤價勞動和原料的結果而得的高度利益及投資銀行和有價證券的高額利息，吸引了英國，法國，德國及其他國家的投資。在沙皇政府的自身，爲要進行戰爭，爲要供應貴族階級的揮霍，爲要鎮壓革命，經常的需要舉行外債，使用種種方法鼓勵了外國資本對國家自然財富的掠奪和俄國工人的剝削。因此，「俄國資本主義，以及沙皇自身，對西歐資本主義的依屬性，乃是俄國政治經濟落後的直接結果」。

雖說經濟和政治一般的落後，而俄國工業的集中化和壟斷化，卻達到了很高的階段。

斯大林指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俄國工業的集中，已達非常高的水準，而引述過這樣的統計：「在擁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的工人數量，要佔俄國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五四，同時，在像美國那樣發展的國家，在同類企業中的工人數量，則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三三」。在一九一三年，俄國已經有了八十二個辛迪卡聯合。其中有這樣最大的壟斷聯合，如「金屬產品」辛迪卡，曾經掌握了鐵軌銷售總數的十分之九；「煤產」辛迪卡則控制了煤產總數的百分之七五。

一、股份商業銀行

股 份 商 業 銀 行

	各類商業銀行固定資本 在全部商業銀行固定資本 總數中所佔百分比		1914年一月 銀 行 數 (單位)
	1900年	1914年	
資本在 1000 萬盧布以內的銀行	43.7	10.8	24
資本從 1000 萬到 2000 萬盧布的銀行	32.9	22.5	11
資本從 2000 萬到 3000 萬盧布的銀行	23.4	14.6	5
資本在 3000 萬盧布以上的銀行	—	52.1	7

伴着工業壟斷的發展，便發生了銀行的集中和銀行壟斷的形成。從二十世紀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股份商業銀行的集中過程，下列的指數足以說明。

銀行集中的過程，曾與俄國銀行同工業的結合相伴而行，從而，透過資金供給的途徑，亦即銀行發行企業證券的活動，「結合」便取得了優勢。「財政的改組」，曾是俄國流行的結合形式之一，即當一九〇〇——一九〇二年經濟危機之後，爲了自己固定資本的恢復而需要資金的許多工業之財政的改善。企業的損失因銀行的幫助而彌補了，此後經過股票發行的方法，他的固定資本便增加了。照例，發行的股票的一部份，銀行自己便保留了。譬如，在一九〇八年尼考伯爾·馬里烏包爾冶金公司的改組，彼得堡國際銀行曾發行了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股票，保證百分之七的紅利，而自己卻保留了公司股票之百分之六五。在一九〇七年基士德穆礦山工廠財政的改組時，西伯利亞銀行曾取得股票發行權，而自己則保留了該工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票。俄國壟斷的工業資本與銀行的結合，促進了工業之更進一步的集中和壟斷。隨着企業之「財政的改組」，個別的資本家照例即變爲股東的形式了。是的，捷米道夫的日尼涅·塔希爾和盧涅夫冶金企業，曾由俄羅斯對外貿易銀行的幫助，改組爲具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資本的股份公司。一九一三年西伯利亞銀行曾將兩個大的軍事

工業改組爲機械工廠股份公司：彼得堡的「布爾康」工廠和莫斯科的「包斯達富士克」工廠。

大銀行已是俄國工業辛迪卡的參加者。列寧分析過去俄羅斯亞細亞銀行的職員亞哈德的材料，（根據這些材料，在一九一三年彼得堡銀行運用的資本的百分之四十，投資到各種不同的辛迪卡），他認定，「銀行與工業資本的結合，在資本主義壟斷的形成上，俄國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①。許多工業的和交通的壟斷企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票，都落到銀行的手裏。譬如，「腦伯爾兄弟」燃料辛迪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股票即屬於三個大銀行所有（亞藻夫·道恩銀行，彼得堡國際銀行和俄羅斯亞細亞銀行）。「喀甫喀斯和莫爾庫里」有勢力的河航汽船公司，差不多全部落在兩個銀行（彼得堡國際銀行和沃爾日·喀木銀行）的手裏，這兩個銀行握有公司股票之百分之九五。亞穆爾汽船和貿易公司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股票則屬於西伯利亞和亞藻夫·道恩兩銀行。

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結合，在俄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不僅祇是在購買工業股票，或銀行參予新股票發行和推銷的方式中發生，並且重要的還是透過長期信用和有價證券抵押貸款等信用業務而發生。顯示銀行與工業之有計劃的和不變的財政聯繫的業務，在商業銀行的對照表中所佔的鉅大比重，即是俄國的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激劇結合的證明。與這種業務有關的是：無保證有價證券抵押貸款，無記名票據貸款和大部份委託代理清算。銀行與各種不同的企業以及其他銀行的清算，係根據委託清算辦理。例如，銀行對工業的長期投資，竟佔了對照表委託代理科目的百分之八十。

是的，根據一九一四年一月股份商業銀行的混合對照表，「委託代理」佔了一、二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盧布，其中祇一筆有保證的和無保證的有價證券抵押貸款即達六六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銀行曾於「委託代理」科目中，隱蔽了對工業的財政支持，第一，因為俄國法律曾經禁止商業銀行長期投資；第二，因為長期的財政供應作了銀行對照表現金呆滯的證明，和可能是從銀行提去存款的原因。在戰前，證明關於銀行長期而有系統的向工業投資的轉賬業務，在商業銀行的對照表中佔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同時，隨着在銀行手中工業股票數量的增加和工業壟斷之長期的資金供應的增長，便加強了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之人的結合。最大的商業銀行的指導者，同時即是工業和交通獨佔的股東和指導人。是的，最大的商業銀行——俄羅斯亞細亞銀行的董事長布基洛夫，同時即是二十五家企業和聯合的指導人。他是俄國煤油公司 (Russian General Oil Corporation) 的總經理，是波婁達英特公司的指導人，是布基洛夫工廠公司的董事長，是莫斯科·喀贊鐵路公司及許多其他公司的總經理。彼得堡國際銀行的理事長魏士涅格拉德斯基，是叟爾莫夫和考洛門造船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俄羅斯金屬工業公司的董事，是「埃穆伯·喀斯比」股份公司的董事等等。

大的股份商業銀行已與沙皇俄國的國家機關有了牢固的個人聯繫。列寧在其帝國主義札記中指出，「俄國的財政部長任命銀行的總裁(常常是官吏)，而要經過「信用事務局」授予銀行一百萬的補助金等等」^①。列寧從亞哈德書中所作的關於最有勢力的股份銀行——俄羅斯亞細亞銀行董事的成分的擇要，是非常典型

①統計字係取自一九一四年財政部年報所發表的股份商業銀行混合對照表。

②列寧：帝國主義札記，一九三九年版，九二頁。

的。該銀行的董事會係由下列份子組成：「一個是過去俄國的官僚（銀行的總裁和行長）^①，一個是過去俄國的郡長，一個是過去法國的外交家，一個是過去法國的律師」^②。

對於外國財政資本的依附已是俄國大商業銀行的特質。

在俄國的信用制度上，完全充分的說明了俄國的沙皇主義，以及俄國的資本主義，對西歐資本之依屬的作用。俄國信用制度與外國資本之特別密切的聯繫，是二十世紀初向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過渡時建立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外國資本在俄國商業銀行的固定資本中所參加的股份已有激劇的增大，下列的圖表足以說明^③。

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七年，這一期間，俄國商業銀行的固定資本增加了三·六倍，而當時外國資本的股份，在此短暫的期間，則差不多增長了一倍。

俄國商業銀行中的指導作用，已屬於法國、英國和德國的財團了。

根據一九一七年一月的狀況，有下列六個西歐國家的財政資本參加了俄國股份商業銀行的固定資本^④。

①據推測是布基洛夫，他過去最初任財政部長室主任，後任國家農民土地銀行總管。
 ②列寧著：帝國主義札記九五頁。
 ③一九一七年一月外國資本參加俄國銀行固定資本的統計字，係取自奧爾在俄國的外國資本一書，一九二二年版，八頁。
 ④見奧爾著在俄國的外國資本二九三頁。

	1900年		1917年	
	固定資本總數(萬盧布)	外國資本佔全部資本百分比	固定資本總數(萬盧布)	外國資本佔全部資本百分比
商業銀行的固定資本...	188.4	—	679.7	—
其中的外國資本.....	11.4	6.0	237.2	34.9

	1917年1月	
	俄國商業銀行固 定資本中外國資 本參加的比較數 (單位百萬盧布)	對外國資本參加 總數的百分比
1. 法國資本	113.3	47.6
2. 德國資本	84.7	35.7
3. 英國資本	25.7	10.9
4. 比國資本	2.5	1.1
5. 荷蘭資本	9.5	4.1
6. 奧國資本	1.5	0.6
總 數	237.2	100

利潤，我們的（即德國的——著者註）銀行對這個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債務者（即俄國——著者註）的愛護是很顯然的」。

外國的財政資本，曾利用下列的方式，達到其控制沙皇俄國商業銀行系統的目的：以獲得聯合銀行股權證書的方法，使銀行歸併和小銀行從屬於大銀行；經由有利害關係的財政集團的幫助，將發行的股票向國外市場上推銷的方法，使銀行的資本恢復和增加；以票據再交換的形式，在外國銀行非常有利的條件上，給予

由上表證明，法國和德國財政資本的股份，適佔俄國股份商業銀行外國資本參加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銀行曾經加強了俄國資本主義經濟對外國資本的依屬性。在俄國銀行的幫助之下，給了外國資本從俄國工人階級獲取鉅大利潤的廣大可能；銀行幫助實現了在外商集團影響範圍內的企業的集中，這些企業經過銀行以必需的貨幣手段被保證了，最後，銀行更於自己招牌的背後掩蓋起工業中外國資本的參加。在俄國銀行中的投資，給了外國資本家很高的收益；俄國的銀行，收取了比西方較高的貸款利息，參加了政府公債和有保證的鐵路股票的發行和推銷等有益的業務，經營了企業創設和工業聯合股票的投機。關於這件事，列寧曾引述一位德國經濟學家的議論：「假如注意到，俄國股票所得到的高額的銀行

⑤見列寧全集二十二卷九三頁。

俄國銀行信用的委託。所有這些業務，都在沙皇政府的財政支持下實現了。

外國的財政資本，曾經積極的參加了俄國銀行的集中和銀行資本的集聚過程。是的，一九〇九年，俄羅斯北方銀行與中俄銀行，即依照法國銀行的倡議，實行合併了。列寧指出合併的動機是如此：法國的銀行（巴黎和荷蘭銀行及格涅拉爾公司）與中俄銀行有「利害關係」，看到中俄銀行的業務不振而倡導「合併」，想予以「挽救」和期望用「聯合方法」（兩個銀行合併爲一——俄羅斯亞細亞銀行），「創立一個相當大的「俄國」機構，俄國政府勢必在一切情況下，支持這個由合併方法而組成的銀行」^④。當合併時曾經補充發行了二四、三三一的股票，其中二〇、三〇四股是在國外銷去的，而在俄國推銷的祇有四、〇三〇股。如此創立的俄羅斯亞細亞銀行，便成了法國財政資本在俄國最強有力的堡壘了。

一九〇八年三個俄國銀行——莫斯科國際銀行，南俄銀行和奧爾洛夫商業銀行，實行合併爲聯合銀行。法國的 *Banque de l'Union Parisienne* 會是這次合併的積極參加者，並且獲得了聯合銀行百分之三五以上的股票。沙皇政府曾經促進俄國銀行對外國資本依屬性的加強。是的，當銀行因外國資本的協助而合併時，沙皇政府曾給予銀行一大筆補助金。列寧在其帝國主義札記中引證亞哈德的材料談到，信用事務司授予彼得堡銀行的補助金達八〇〇〇〇——一〇〇〇〇〇萬盧布，柏林和巴黎大銀行的行長即曾將這種補助金視作自己利益的保證^⑤。

外國資本之主要的支撐點即是這些俄國的商业銀行，這些商業銀行因銀行資本的集中和集聚過程的結果，而取得了俄國信用制度的領導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七家最大的俄國商業銀行中，約百分之五十的

④見列寧著：帝國主義札記一九三九年版九四頁。

⑤見列寧著：帝國主義札記九二——九五頁。

固定資本是屬於外國的財政集團的。外國資本在這些銀行中有決定的表決權，並能將自己的影響擴展到其餘的商業銀行和與銀行結合的壟斷的工業資本上去。列寧曾經指出，俄國的壟斷的銀行，本質上即是外國銀行，首先是巴黎的銀行（最著名的有三個：巴黎聯合；巴黎和荷蘭銀行；格涅拉爾公司）和柏林的銀行（特別是德國銀行和交換所）的『女兒公司』。接着強調的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有些大的俄國銀行亦有國外的『女兒』行。譬如在一九一三年，西伯利亞銀行即曾獲得了設在巴黎的“Banque pour le Credit and le Commerce”（信用商業銀行）全部的股票發行，並派去了自己的職員作副理^①。

股份商業銀行曾是革命前的俄國信用制度的中心環。他是俄國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中樞神經。商業銀行是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最重要的司令台。他在自己的手中集聚了鉅量的貨幣財富，對於全國資本主義經濟顯示了重大的影響，而成爲財政資本的主要堡壘。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的狀況說，商業銀行的混合對照表在這一時期曾達到非常大的數字，從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的一、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高到六、二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商業銀行固有的資本佔八三六、五〇〇、〇〇〇盧布，存款佔二、五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代理清算資產爲一、四五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②。於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信用投資曾達四、四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票據交換佔一、五四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亦即百分之三六，委託代理清算佔一、二六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亦即百分之二八，短期貸

^①見列寧全集十九卷一一二頁。^②據商業銀行對照表的負債上『代理清算科目，有政府的存款（鐵路款和在俄國銀行國外部的存款），銀行與其有聯系的大工業和商業的『留交款』；從外國銀行獲得的信用，從外國的銀行家爲履行他們在俄國的委託以及與其他俄國信用機關相互清算所得款。

款和有價證券抵押臨時貸款佔九九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亦即百分之二二，其他佔六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亦即百分之一四^⑥。

商業銀行除存放款業務之外，還經營了有價證券的業務：大銀行在投機市場和交易所中會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握得了許多企業和壟斷機構股權證書的控制額。所以，對俄國貨幣市場的指導作用是屬於股份商業銀行的。

股份商業銀行根本上適應了大資本主義企業和聯合的需要。有勢力的商業銀行已於財政資本體系中與工業的壟斷結合了。

商業銀行與商業資本亦同樣有密切的聯繫，而且自己也經營過商業的業務，雖說沙皇政府在形式上曾經禁止這種銀行。經過一切最重要的糧食港口（彼得堡、奧得賽、赫爾松、尼古拉埃夫、溫達瓦、里巴瓦和腦沃露西斯克），糧食出口的一半以上被集中在商業銀行的手中。糖的出口約百分之九十是經過銀行的。銀行曾積極的參加了煤、棉和牲畜的貿易。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國共有四十七個商業銀行，七百四十四個銀行的分行^⑦。後者祇在省和較大的縣城設立了。一切大的商業銀行都集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省營銀行祇有較少的資本和業務。是的，一九一四

⑥在「其他信用」中包括：無記名票據貸款，短期貸款，貨物和貨單押貸，票據押貸。數字係取自一九一四年財政部年報中所發表的股份商業銀行的混合對照表。⑦除已指出的四十七個股份商業銀行外，還定有三個小銀行，即所謂交易所銀行：兩個在里格，一個在里巴夫。這種銀行的固資本係由交易所委員會派款充任，故名爲「交易所的」銀行。將交易所銀行計算在內，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俄國共有五十家商業銀行，但在所公佈的股份商業銀行的混合對照表中祇包括四十七家。

年一月省營銀行存款的數額，祇佔所有商業銀行存款總數的百分之九。銀行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集中，保證了沙皇俄國偏面的工業安排，而同樣便利了外國財政資本對大銀行的監督。

股份商業銀行，主要是彼得堡的銀行，業務的擴展和銀行的集中，致使省營銀行，遭受犧牲。下面所引的統計表即表示出，省營銀行在俄國股份商業銀行體系中，祇起了細微的作用。

從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這一期間，省營銀行（除波斯·蒲里巴爾特省外）的負債，竟從二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降到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亦即減少了百分之四一，同時彼得堡的銀行的負債，則從五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到三、三〇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亦即增加了五·六倍。彼得堡的銀行的負債，在股份銀行的負債總數中所佔的比重，自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已從百分之五十銳利的增大到百分之七十了。特別是七個大的彼得堡銀行，所有俄國股份商業銀行的資本，存款和信用投資的一半以上，即落在這七個大銀行之手。俄國商業銀行集中的高度水準，即證明了關於銀行機關走向社會化的準備。

二、俄國國家銀行

革命前的俄國，發行中央銀行券的銀行是國家銀行。一八九七年進行貨幣改革時，曾將銀行券的發行權授予國家銀行。俄國的發行權是沒有彈性的，而適合了外國財政資本的利益。無黃金準備的信用券的發行，

	股份銀行的負債 (固有資本， 存款和代理) (單位百萬)	
	1900年 1月1日	1914年 1月1日
1. 彼得堡的銀行	582	3,309
2. 莫斯科的銀行	209	742
3. 波斯·蒲里巴爾特省的銀行	151	455
4. 其他省營銀行	214	125

祇准國家銀行在硬性的極限——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範圍以內。所有超過此種極限以上的銀行券的發行，便應該有國家銀行百分之百的黃金儲備作保證。銀行券金準備保證之高的百分比，即是俄國外債償付能力的保證，致使沙皇政府，為維持黃金貯備，而有舉行新的公債的需要。同時他曾經限制國家銀行經過私人銀行，以銀行券供給工商資本主義企業的可能。因此便促進了俄國貸款利息高水準的保持，加強了經濟上對外國資本的需要。根據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國家銀行的對照表，信用券即有百分之九二的黃金保證；流通的信用券為一、六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國家銀行的黃金，存在國外的尚不計算在內，即有一、五二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俄國國家銀行的特徵，是他對沙皇政府之完全的依屬性，雖說祇是形式的。這種依屬性表現在國家銀行成為供給國庫軍事支出和支持地主土地所有（王家和貴族階級的支柱）支出的財政工具的廣泛利用上^⑤。國家銀行對政府的依屬性同樣表現在他的管理制度上。對銀行事業之最高的指導權，屬於由沙皇任命管理銀行的財政部長。在銀行的委員會中有財政部和國家監察局的代表。

國家銀行庫存現金的檢查，是國家監察局的責任。地方國庫（省縣）的金庫與國家銀行的金庫是結合在一起的，國家銀行即是財政部的出納。

俄國的國家銀行，在其信用的活動上，從二十世紀初已顯然是「銀行之銀行」了。當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以前，國家銀行的這種作用更顯著的加強了。是的，假如根據一九〇〇年國家銀行的對照表，其對信用機

^⑤ 國家銀行於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俄土戰爭時曾供給國庫的財政，因一八六〇年破產的國庫銀行，自己蒙受了很大的損失，曾經授予國家貴族土地銀行以補助金，國家公債推銷得不好自己則保留了債券的一部份等等。

關的放款，曾佔銀行交換放款業務總數的百分之二三，則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國家銀行一、〇七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放款總數中，有四八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亦即差不多全部放款的半數，是放給信用機關的。國家銀行不僅在股份商業銀行方面，實現了自己「銀行之銀行」的作用，在所有俄國信用制度其他的環方面也實現了這種作用。除了普通大多數的發行銀行直接對資本主義經濟，主要是商業的短期信用貸款外，俄國的國家銀行曾依照長期信用的途徑，亦與資本主義工業有了經常的聯繫。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國家銀行曾以工廠不動產抵押，放給大工業壟斷很多的貸款。從而，他便與五金聯合，特別與金屬工業有了密切的財政聯繫。

准許對工業資本家所謂「超法規的」貸款和一八九四年法規所決定的「具有確實保證」的署名票據抵押信用貸款，國家銀行曾支持了工業的企業創設，促進了俄國資本主義之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各級的俄國的國家銀行曾給予廣大土地所有主以信用的支持。

在國家銀行中曾經接受顯貴的俄國封建主以領地作保證的署名票據的抵押信用。銀行對商業的投資，特別經過糧食採購和出口之財政供給的途徑而增展了。是的，據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的對照表，商品抵押放款總數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糧食放款約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除糧食貿易外，國家銀行還參加了對於食糖，製成品和木材的商業放款，因為所有這些商品都是輸出的對象。

在二十世紀，作為全國信用制度之出納的國家銀行的作用增大了：商業銀行和其他的信用機關都在國家銀行保有自己的現金準備。他那種銀行制度清算中心的作用，亦同樣加強了。一九一四年國家銀行的四十五個業務局和大的分行已設有交換所。交換所經過商業銀行和其他銀行在國家銀行的活期賬戶，辦理了他們相

互負債的清償。但是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較，俄國銀行間非現金的清算，發展得還很微弱；交換所還不會在所有城市中設立，即在已設立的處所亦未掌握了全部的信用機關。非現金清算之微弱的發展，加強了供給信用制度其他環以現金的機關——發行鈔票的國家銀行的意義。

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國家銀行的銀行網，係由在大工業中心所設立的十個業務局，一二一個固定的和六個臨時的分行所組成。此外，地方的（縣）國庫曾執行了簡單的銀行業務（票據兌換，有價證券業務，匯兌等），這種地方國庫，於一九一四年已有七九一所。國家銀行曾設有自己的大倉庫和穀倉。設立在距離銀行分行遙遠地方的穀倉，自己即曾舉辦穀物抵押放款。

銀行所設貨倉（穀倉），在中央發行銀行下設立的愈多，愈是銀行業務形式落後的證明。

國庫在銀行中所保存的貨幣，即是國家銀行的主要財富。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國庫存款計有九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以儲存和活期賬戶形式的私人存款，則祇有二七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國家銀行全部信用投資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係借重於國庫存款來彌補的。

國家銀行的信用投資，於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曾達一、〇七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約當商業銀行在這一期間信用投資的四分之一。在交換放款業務的總數中，票據交換佔百分之六二，有價證券抵押貸款佔百分之二八，貨物抵押信用佔百分之五。

因此，與西歐中央發行銀行相比較，俄國國家銀行對政府之完全的，雖說是形式的依屬性，對地主土地所有之信用貸款，對大的資本主義工業之長期的信用放款，及在業務上像自設倉庫和穀倉的經營，這種復古主義的存在，即是俄國國家銀行的特點。

三、短期信用的次流機關

除股份商業銀行和國家銀行之外，在俄國經營工商資本主義企業短期信用的還有：相互信用社，城市社會銀行和銀行家事務所。這些信用機關即是大的商業銀行的前哨，及其信用政策的先驅。

相互信用社適應了中小工商業階級的需要。一九一四年一月相互信用社計有一一〇八所。據與股份商業銀行業務規模相較，相互信用社的業務很小。是的，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的存款計五九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信用投資則為七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比起商業銀行來要少六倍。這種信用機關，其所以命名為『相互』者，是因為他們祇授予社員以信用，照章不吸收其他個人的存款，也不授予信用。每個社員取得了股份，便要對該社業務負有所入股份十倍比率的責任。照章每個社員可以獲得不超過他入社金十倍數目範圍以外的信用，而相互信用社最大股東的上層，卻獲得了他們股份十倍數目以上的信用，事實上將整個相互信用社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因為股份商業銀行制度在各省發展得非常微弱，相互信用社在這裏便起了非常顯著的作用。大多數的相互信用社會被聯合為以相互信用的中央銀行為首的代理聯合了。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城市社會銀行在俄國計約三百家。城市社會銀行的信用投資量，要比相互信用社交換放款業務少三倍半。據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的對照表，城市社會銀行的信用投資為二〇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短期放款約佔城市社會銀行信用投資的百分之七十；城市不動產抵押長期放款則佔百分之三十以上。城市社會銀行的顧主範圍，亦有如相互信用社同樣的例證。因為城市社會銀行係受市參議會的

管轄，而且在重要的程度上是捐獻創立的，地方上工商業資產階級和大的房產所有主的城市主宰者，實質上即是這種銀行之全權的主人。

私人銀行事務所在俄國的信用制度中，並不會起有何種顯著的作用。隨着股份商業銀行發展的程度，各個較大的銀行家事務所曾與股份銀行相結合，或者自己即改組為新的銀行了。是的，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四年，曾經有五個銀行家事務所改為股份銀行的事件（容克銀行家事務所和公司改為莫斯科工業銀行，梁布諾斯基銀行家事務所改為莫斯科銀行，沃溫堡銀行家事務所改為彼得堡工商銀行等等）。大多數銀行家事務所都因無力與股份銀行相競爭，而倒閉或創立經紀事務所：就一切可能的投機和買賣契約接受商業的委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銀行家事務所的交換放款業務，總共為一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據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的對照表），亦即差不多比城市社會銀行的交換放款業務少兩倍；存款為八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混合對照表的總數為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①。

相互信用社，城市社會銀行和銀行家事務所，是資本主義俄國短期信用制度之次流的一環。他們會依賴着成為國家財政資本統治之調節中心的大的股份銀行。

四、抵押信用銀行

資本主義俄國的抵押信用制度，係由下列的信用機關所構成：國家貴族土地銀行，國家農民土地抵押銀行，十個股份土地銀行和三十六個城市的和郡的信用組合。就業務範圍說，農民土地銀行和貴族土地銀行，

要佔抵押信用制度中的主要地位。是的，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土地抵押貸款總數中，貴族和農民銀行佔了百分之六一·五，其他銀行佔百分之三八·五^①。

國家貴族銀行和農民銀行是沙皇政府土地政策之重要的先驅。沙皇政府曾經企圖用一切方法保留大量土地於統治階級——貴族地主的手中。沙皇政府經過貴族和農民主地銀行，特別循着普魯士的道路，在俄國的農村經濟中努力的引導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在普魯士式的道路下，「農奴制的地主經濟緩慢的轉變為資產階級貴族的經濟，在極少數「大農」的出現下，將農民判處了十年最痛苦的剝削和奴役」^②。

列寧曾經強調的指出，地主的廣大土地私有即是俄國農奴的主要來源^③。一八八五年所成立的國家貴族土地銀行，就是爲了要經過對於貴族非常有益的條件下授予貴族土地抵押信用的途徑，而用以支持地主的土地所有的。農奴制擁護者的政府曾經透過國家銀行，給予貴族銀行很多財政的幫助。國家銀行於貴族銀行設立的第一年，即爲他彌補了業務上的全部損失。

到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顯然的加強了地主經濟之破產的過程，雖說他受着貴族銀行的支持。「髒髻的英國式地主」已經斬伐了貴族的櫻桃園。沙皇政府曾經企圖用享受信用的新的特惠，來支持地主的土地佔有。在一八九七年政府會將貴族銀行抵押貸款的利息，從百分之四·五減低到百分之四；決定列入資本負債的緩付金數目提高到放款比率的百分之十二，逐漸的將貸款期限從四十八年延長到六十六年半。當然，這種特惠並未能阻滯土地從貴族向農村資產階級的過渡，但是，貴族銀行卻阻撓了資本主義在俄

①統計字係取自一九一七年財政工業和貿易雜誌四六期附錄中所發表的抵押銀行的對照表。 ②列寧全集十一卷三四八——三四九頁。 ③列寧全集十二卷二八六——二八九頁。

國農村中的滲透，從而成爲沙皇俄國之最反動的信用機關，幫助保存了貴族的中世紀的特權和鄉村中地主的壓迫。

沙皇政府沒有可能使過去屬於地主的土地仍舊完全保持在他們的手中，便期望保證貴族於有利的條件下出賣土地了。一八八三年所成立的國家農民土地抵押銀行，就是爲了這種便利。他授予富農以信用貸款，俾便按高價從地主手中購買土地，而同樣保證了土地向農村資產階級的過渡。徵收高額借貸利息和幫助增高土地價格的農民銀行，絕少是爲幫助勞動農民而設立的。

當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後，進行斯托勒賓的改良時，農民銀行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改良的任務是：第一，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地主土地佔有相結合，第二，取償於農民羣衆的破產，而建立「堅強的農民階級」——富農階級，這個富農階級即是農村中資產階級地主制度之必需的支柱。在這種關係上，農民銀行會獲得不依自身資本的限度而購買土地的權利，並決定供給富農和富裕的農民以特惠的信用，這種富農和富裕農民，爲要移住在自己分有地（譯者註——「分有地」係俄國斯托勒賓士改前，土地史上一種土地使用形式，參看俄國土地史或經濟史。）和田莊上，得從銀行手中或經過銀行去購買土地^①。

銀行竭力的培植了富農經濟。在一九〇七——一九一一年這一期間，經過農民銀行所購買的土地計六、一二六、二〇〇俄頃，其中百分之六一·八是由移住在自己分有地和田莊上的，亦即般富富裕的農民所購買的。從一九〇七——一九一一年，在土地的購買上，銀行所供給的信用總數達九七二、〇〇〇、〇〇〇盧

①當經過銀行從私有者手中購買土地時，銀行給予的貸款：普通的購買爲土地估價百分之九十的比率，對分有地的購買爲估價的百分之九五，而對田莊的購買則爲獲得土地的價值的百分之百。

布。

在這個期間，被土地風潮所驚懼的貴族，已經開始急切的要出賣土地，假使沒有農民銀行出來予以幫助，便要遭受損失。農民銀行伴着土地購買信用貸款和經紀人事務的普通業務，並曾激劇的加緊了自己出錢購買土地。

銀行曾在對地主非常有益的條件上，以超出當時土地的市場價格以上的高價，從地主手中購買土地，而從貧苦的農民購買土地，則按着非常低的價格；而後再將土地賣給鄉村的富農。

農民銀行所給予地主的幫助是如此偉大，有如下列的數字所證明：從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這一期間，銀行祇購得九四五、二〇〇俄頃土地，而從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一〇年七月一日，銀行則購買了四、八二九、九〇〇俄頃土地，其中百分之八十四是從貴族手裏買來的。同時，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銀行從農民購買一俄頃土地支付六四盧布地價，而從貴族購買則要支付一二一盧布的地價。

列寧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後這一時期農民銀行的業務有如此的說明：「你想，那樣的金河，（譯者註——「金河」係列寧原語，意即大量金子，如河流一樣。）現在正在通過地主，官吏、法官、商人，由「農民」銀行大批的分散給被驚恐了的地主！」

農民銀行的活動曾經加速了農民羣衆的破產和喪失土地。銀行曾竭力的抬高土地價格，剝奪了能力微弱

①統計字係取自農民土地抵押銀行土地買賣事務概觀，一四及五九頁，一九一一年版。②統計字係取自巴都林斯基著沙皇政府的土地政策與農民土地抵押銀行，一九二五年版，一〇〇頁。③列寧全集十一卷四一四頁。

的農民購買土地的可能，提高了地租，加強了土地的投機。當斯托勒賓改良的進行時期，在農民中間曾爲銀行另定一個名稱爲『銀行鎖鍊』，便不爲無因了。

從一九一二年起，農民銀行買賣土地的業務便開始縮減：因暫時的反動而安心的貴族，已很少再出賣自己的土地。在一九二一——一九一三年，農民銀行主要的購買了爲地主和富農掠奪而破產的巴士開人之廉價拍賣的土地。伴着貴族土地出賣的縮減，地主向貴族銀行的借款，與一九〇五——一九〇八年相較，亦同時迅速的增大了。一九一三年貴族銀行的放款，比一九〇五——一九〇八年土地風潮時期，差不多要多兩倍。俄國股份土地銀行曾經供給了土地和建築（包括城市的建築）的抵押貸款。地主，農業資產階級和城市的房產所有者，曾是股份土地銀行之特殊的債務者。股份土地銀行經營了大的土地投機的業務，經過假名義購買土地（特別是城市的土地），再以高價將他出賣。

城市和郡縣信用協會是由城市和地方自治所創立。他祇供給了城市不動產抵押貸款。具有城市土地和建築資產的工商業資本家和房產所有者是他的顧客。城市社會銀行亦同樣經營了城市不動產抵押放款。

抵押銀行有發行不動產質押證券和債券流通之權，而用這種質押證券和債券對願主放款。貴族銀行的不動產質押證券是由政府擔保，致予以在國外兌換的可能，在那裏他們有較高的兌換。債券是由城市和郡縣信用協會發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在流通中所發行的抵押銀行的不動產抵押證券，總數有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國家的抵押銀行（貴族銀行和農民銀行）要佔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上。

債務者農村土地抵押債務，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計三、七二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國家貴族銀行佔九五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國家農民銀行佔一、三四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股份土地銀行佔一、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城市土地和建築的抵押債務，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計一、七四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城市和郡縣信用協會佔一、三〇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股份土地銀行和城市社會銀行佔四四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在抵押銀行中被抵押的土地約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俄頃，亦即全部俄國耕地的一半以上。

五、信用合作社

農民的富裕階層要獲得農業信用，亦即擴大農業生產的信用，主要的是經過信用合作社。

俄國的信用合作社係由兩種組合所組成：即信用組合及儲蓄貸款組合。儲蓄貸款組合係各個社員的會費（股金）構成自己的固定資本，信用組合的固定資本係由寄存款和利潤提成而構成。信用組合祇是適應農民的需要，而儲蓄貸款組合則適應了農民、鄉村家庭工業者和部份的城市手工業者的需要。

斯托勒賓改良後，信用合作社因鄉村富裕的農民階層的鞏固，於大戰前已有迅速的增長。在信用合作社降生後，經過了四十年，於一九〇五年在俄國計有一千六百二十九個信用組合和儲蓄貸款組合，而到一九一

●不動產抵押證券發行和貸款的統計數字，係取自中央統計局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七年統計選集，一九二二年版，七卷二冊一〇三——一一〇頁。

四年一月一日止這種組合的數目已增大到一四、六五二個了。因此，信用合作社在鄉村中已滿佈了分枝的機關。

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一般的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特別不可避免的要獲得資產階級的內容。信用合作社，在革命前的俄國，如同在其他國家一樣，係被鄉村中富裕的富農階層所利用，極少適應能力薄弱的農民的經濟需要。一九二二——一九一三年，在信用組合中富裕的富農階層約佔百分之六十，而在儲蓄貸款組合中所佔的比率還要高。因此，享受信用的並非組合的全體社員：一九一三年在儲蓄貸款組合中有百分之八四。三的社員享受了貸款，而在信用組合中享受了貸款的社員則為百分之六七。八。加入了組合的極少數的富裕經濟，恰好不規則的屬於不使用貸款而卻取得信用者之列。信用的限度亦同樣是根據社員的財富狀況而搖擺不定的。在對於購買土地、牲畜、農業用具和肥料，對於繳納地租和建築費用的信用的同時，信用合作社還供給了爲了出賣而購買的貸款。因此，信用合作社曾被富農及爲了他商業的活動而利用。除了信用合作社之外，組合也同樣經營了銷售和供給的業務：賣貨給自己的社員和爲他們購辦種子、原料和農業工具。這樣便給了儲蓄貸款組合和信用組合發展投機的可能。

信用合作社放款業務的規模較小。據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的對照表，合作社的信用投資總共五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要少於股份商業銀行在這一時期信用投資的百分之一五。短期放款（十個月以內）佔全

●一九一三年信用合作社所放出的貸款：購買牲畜的佔全部放款的百分之二一。六，繳納地租的佔百分之一九。三，購買土地的佔百分之六。八，建築佔百分之一一。二，購置農村經濟用具的佔百分之三。四，僱用工人的佔百分之三，爲出賣而購買的佔百分之六。六，購買種子的佔百分之五。五，爲其他目的佔百分之二二。六。

部信用投資的百分之五五，長期放款（五年以內）佔百分之四五。

莫斯科人民（合作）銀行，和對別種的合作社一樣，曾供給了信用合作社的需要，合作社及其聯合社即是該銀行股票的執有人。莫斯科銀行曾供給了各種合作社的短期信用。莫斯科銀行的指導，曾以敵視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政黨——社會革命黨和門什維克的代表為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個銀行的業務是不甚重要的。是的，一九一三年全年，莫斯科銀行放出的貸款為五三、六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七年莫斯科銀行在俄國共有十四個分行和兩個國外的代辦所（倫敦和紐約）。除莫斯科銀行外，授予信用合作社信用的，還有國家銀行小本信用業務局和股份商業聯合銀行。

信用合作社會鞏固了富農經濟，加速了農民的分化過程，他同樣促進了資本主義在俄國農村經濟中的發展。列寧批評俄國的民粹派企圖培植信用合作社以「施惠」農民的馬尼洛夫方案，曾強調的指出，民粹派一切的「改進」——「廉價的信用，技術的改善，銀行等等——祇是爲了加強和發展資產階級而已」^①。列寧曾經指出，民粹派想用對信用合作社「組織的改善」使中農和能力薄弱的農民從富農高利貸者的手掌中逃脫，而不剷除發生富農統治農民的原因，這種烏托邦的和無結果的企圖已是完全的破產。「用改善信用金庫「規章」的方法，來同富農、高利貸者、寄生蟲、掠奪者作鬭爭，還有比這更滑稽的嗎」^②？

六、俄國鄉村中的高利貸信用

因土地狹小，高額地租，向地主繳付贖金和其他許多數目的貨幣貢物，而深感苦痛的俄國農民勞動者的

① 列寧全集一卷一四三頁。 ② 列寧全集二卷一一〇頁。

廣大階層，差不多就沒有在信用合作社中，尤其在農民銀行或股份土地銀行中，獲得信用的可能。農民會從高利貸者獲得信用，而要償付他掠奪式的利息。在歉收之年，高利貸利息會提高到一百和一百以上。高利貸者的主要人物，是富農、「骯髒的英國式地主」、以及地主。他們以貨幣的形式以及以實物的形式（種子、麵包、牲畜飼料）貸給農民。農民爲了借貸常常是用勞役與富農和地主去清結。

高利貸在俄國的鄉村中是非常普遍的。封建制度的殘餘制度是繁殖高利貸信用和質借之最好的土壤。在十九世紀末葉，列寧曾經寫道：「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之最低級的和最壞的形式之過分的傳播，乃是壓榨俄國農村的世紀制度殘餘的自然結果。少數富裕的農民在能力微弱的於他們些許的分有地上度着半飢餓生活的農民羣衆中間，勢必要變成對負債和冬季借債放款而奴役貧農的最壞的剝削者」。

高利貸者是俄國資產階級地主土地關係中一切變革的敵人，曾是農村中地主和農奴所有者反動階級的支柱。列寧曾強調的指出，在俄國農村經濟中阻撓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農奴制度的殘餘，已趨於使農民依屬於貨幣所有者——高利貸者的奴役形式。列寧寫道：「愈是偏僻的鄉村，距離新的資本主義制度、鐵路、大工廠、大資本主義農業的影響愈遠，則地方上的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壟斷便愈是有力的，附近的農民對他們的從屬便愈是有力的，而這種從屬便愈加要採取野蠻的形式」。

因此，無例外的，俄國革命前信用制度的各環，都是適應了城市和鄉村的資產階級，以及地主的需要。信用制度的各環，都曾幫助俄國的和外國的資本家，俄國的農奴所有者貴族，經由剝削俄國的無產階級和勞

動農民的途徑，攫取了鉅額的收入。他們即是外國的財政資本在俄國的支點。股份商業銀行即是俄國信用制度的中心環。

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曾適應了城市中小資產階級的需要。

抵押信用制度保證了對農村資產階級之財政的援助和憑藉國家政權而存在的地主。

信用合作社制度促進了富農經濟的鞏固，加速了俄國農村分化的過程。

掠奪式的高利貸信用，在信用上感受貧困的俄國勞動農民的部份中被保留了。

在俄國的信用制度上，已十分完滿的說明了俄國帝國主義的特性：他的軍事的封建的性質和國家經濟對西歐帝國主義的依屬性。大的商業銀行都是外國財政資本的女兒體系，並曾幫助外國的財政資本以利潤和借貸利息的形式，從俄國攫取了國民收入的鉅大部份。抵押銀行促進了俄國農村經濟在保留農奴制度主要殘餘（地主的大土地佔有）下資本主義的發展。

俄國的信用制度，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矛盾的銳化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商業銀行與中央國家銀行共同促成了大生產的發展，從而，並促成了實現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發展。這些銀行曾使壟斷和財政資本形成的資本集中和集聚之有力的槓杆。大銀行即是一條重要的運河，外國資本即沿着這條運河流入了俄國。他們更促進了對俄國無產階級之雙重的壓迫：引致對無產階級剝削達到最高階段的「本國的」和外國的財政資本的壓迫。

俄國的信用制度，不僅促進了城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階級矛盾的銳化，並且還促進了鄉村資本家與農民羣衆間階級矛盾的銳化，因為抵押銀行和資產階級的信用合作社，主要的是國家貴族銀行和農民銀行，

在俄國鄉村中曾支持了農奴制度殘餘的保存，即是說支持了引致廣大農民羣衆飢饉增長的最重的封建壓迫的保存。

俄國的信用制度曾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最高的司令台。大銀行集中化的機關的存在，是俄國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走向新的社會經濟機構——社會主義條件的前提之一，因為俄國的商业銀行，包括國家銀行，曾創立了「社會範圍的一般簿記和生產資金之分配的形式」（馬克斯語）。

布爾什維克黨，接受列寧關於資本主義俄國信用制度的作用和特性之天才的指示，曾於十月革命後，分別的處理了信用制度的各環。信用制度的中心環——股份商業銀行被國有化了。第二種環——抵押銀行，因為在蘇維埃經濟條件下不需要，則被取消了。第三種環——信用合作社，則接受了蘇維埃國家廣泛的支持，並賦予他對勞動農民供給信用援助的任務。

第二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的信用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的銀行曾是濫設企業和投機事業的主要根源。他曾經加強軍事的經濟的崩潰，尤其是增加了人民的痛苦。致使國內勞動者與統治階級間的矛盾更進一步的銳化。第一次大戰時銀行之反動的和有害的作用，已使全體人民瞭然他的國有化的必然性。同時，銀行的集中和大銀行與工業的壟斷之更進一步的結合，提高了銀行乃經濟的最高司令台之一的意義，便利了他們的社會化的可能。

俄國參加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引起了國家巨大的財政困難。迅速增長的軍事支出，曾借紙幣發行，公債和租稅來彌補。俄國的沙皇政府，從戰爭開始的第一天即將印刷機當作彌補非常支出，而取償於勞動者的工具，在廣大的利用了。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法案廢止了銀行券對黃金的兌換，並擴大了信用券無黃金準備的發行權，從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到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這個期間，沙皇政府曾增大國家銀行的發行權為六、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到二月革命時期，銀行已有信用券無黃金準備的發行權為數在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此外，經過根據「國外存金」的清理，包括由英國對俄國所放信用的一部份，黃金準備之虛構的增加，國家銀行的發行權便被很技巧的擴大了。

俄國的中央國家銀行，從戰爭開始到二月革命，在流通中所發行的信用券，數在八、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流通中信用券的數量，從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迄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已從一、六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加到九、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事實上實際現金準備為一、四七六、〇〇〇、

〇〇〇盧布，虛構的『外國存金』準備爲二、一四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餘信用券的數目是以國庫短期負債的交換制度發出的。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在國家銀行中所交換的短期債券爲七、八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①。

除了以國庫短期負債的交換形式和由英國所供信用作抵之紙幣的發行外，國家銀行並經過以國庫長期公債和短期負債證券對商業銀行、資本家和企業之信用給與的方法，供給了戰爭。國家有價證券的抵押放款，據國家銀行的對照表，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爲一二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則爲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國家銀行同樣還供給了接受軍事訂單的資本主義企業貨物抵押信用^②。最後，在戰爭期間，國家銀行爲了填補支出對地方國庫的超額，曾對國庫撥付過十分巨大的數目。是的，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國庫從國家銀行的臨時借債計九二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一七年初，國庫的財政供給和與軍事有聯繫的信用，差不多佔了國家銀行對照表的百分之八五。

股份商業銀行參加對戰爭之財政的供給係表現在：第一是國家有價證券的購買和推銷上，第二是國庫國家公債和短期負債證券的抵押信用上，第三是對軍事設施和爲戰爭工作的企業各種形式的信用上（貨物抵

^①這裏以及下面所引證的說明在這一期間國家銀行業務的統計字，都是取自當時在財政部週刊——財政、工業和貿易通報上所發表的國家銀行每月的和每週的對照表。
^②在國家銀行一九一四年的報告中說，『國家銀行在與戰爭的聯繫上，曾經給予糖廠以砂糖抵押放款，並曾規定石炭、炭焦和鐵礦的抵押放款』（國家銀行一九一四年報告書，一九一五年版十五頁）。一九一五年國家銀行曾將石炭抵押放款的利息從八減低到六。五，並規定了爲軍隊和爲對戰爭工作的企業的需要批發石炭貨單抵押放款。一九一六年國家銀行對農業部爲軍隊採購糧食、糖、鹽的特別全權代表放了爲數一八七、五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國庫五分利的債券保證抵押信用。

押信用，無記名票據貸款等）。然而商業銀行，即如下面所要指出的，他自己卻廣泛的利用了國家銀行的支持，並且在重要的程度上，經過通貨膨脹，將軍事財政供給的重荷結果，最後便轉嫁在勞動者的身上了。

在戰爭期間，沙皇政府，及後來的臨時資產階級政府，發行了內國短期公債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商業銀行幫助推銷了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沙皇政府的公債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臨時政府的公債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些公債的一部份係由銀行所購買，一部份則是在資本主義企業和個人中間推銷的。屬於銀行的國家有價證券和有價證券抵押所供給的信用的比率，在戰爭期間已有顯著的增大，從下列的圖表中已明白的顯示出來：

自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迄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這一期間，銀行金櫃所保有的由政府保證的有價證券（國家公債券和由政府保證的鐵路債券）和政府有價證券的抵押信用，已從三七一、二〇〇、〇〇〇盧布增長到二、三六九、四〇〇、〇〇〇盧

業 務 名 稱	據一月一日對照表數字 (百萬單位)		
	1914年	1916年	1917年
1. 屬於銀行的有價證券總數.....	327.0	658.8	981.0
其中由政府保證的.....	179.3	479.7	697.0
2. 有價證券抵押放款			
A. 有價證券抵押短期放款.....	56.1	53.9	226.7
其中由政府保證的有價證券抵押放款.....	72.8	23.6	48.0
B. 有價證券抵押活期放款.....	941.9	965.3	1230.2
其中由政府保證的數.....	139.8	157.8	269.4
C. 由有價證券擔保的委託代理.....	665.6	1282.9	2142.3
其中由政府保證的數.....	24.3	579.8	1355.0
有價證券抵押放款總數.....	1663.6	2293.1	3559.0
其中在政府保證下的數.....	191.9	760.9	1672.4
固有的有價證券和有價證券抵押信用總數.....	1990.6	2951.9	4530.2
其中由政府保證的有價證券和由政府保證的證券抵押信用.....	371.2	1240.6	2369.4

布，亦即增加了六倍多^①。此外，從一九一五年初，商業銀行已經在交換國庫的短期債務。由銀行以國庫債券交換形式所放的信用的數量，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在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上。因此，由股份銀行用購買國家有價證券和有價證券抵押信用的方法，對國庫財政供給的總數，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約計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假如再將其他的對為戰爭而工作的企業所放的信用和無法計算的為軍隊設施的信用加以計算，則由商業銀行對帝國主義戰爭的財政供給的數額，便會顯著的增高了。

一九一六年六月，彼得堡國際商業銀行的董事長威士涅格拉德斯基在第三次商業銀行代表大會上聲稱：「可以不誇大的說，起碼每個銀行對照表的四分之三是被直接間接的對防衛而工作的企業信用和國家基金所佔去了」^②。

戰爭之財政供應曾給予銀行家數百萬的利潤。列寧寫道：「銀行家集團要長期留滯在戰場上，他們會將全世界握在手中」^③。為參與政府國庫公債的推銷，付予了銀行很高的回扣：在第一次公債推銷時付予了百分之三的回扣，其餘的幾次則付予了百分之二的回扣。因此，「每次新的公債都給了財政貴族以新的掠奪國家的好機會」^④。

^① 銀行參加內國公債推銷的數字，是由股份商業銀行委員會副主席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在他向股份商業銀行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所揭出的。——股份銀行代表大會業務概觀，一九一八年，八七頁。 ^② 統計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的數字係根據一九一四年財政部

年報中所公佈的股份銀行混合對照表，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及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的數字，係根據中央統計局統計選集中所蒐集的股份銀行混合對照表所組成的。一九二二年版七卷。 ^③ 在股份銀行的對照表上「由政府保證的有價證券」科目中指示出：第

一，國家公債券，第二，由政府保證的鐵路證券和貴族土地銀行證券。 ^④ 股份銀行代表大會業務概觀，一九一八年，五六頁。

^⑤ 列寧全集二十卷一五六頁。 ^⑥ 馬克斯著述選二卷，一九四〇年，一五八頁。

除獲得國家公債優厚利潤之外，商業銀行並經過國家銀行享受了沙皇政府財政的支持。

在戰爭一開始，恐慌即引起了存款從信用機關的外流。股份商業銀行的存款，從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的二、〇一二、六〇〇、〇〇〇盧布，至同年九月一日即縮減到一、九〇二、六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則縮減到一、八七三、二〇〇、〇〇〇盧布。同時沙皇政府因為戰爭的關係，在俄國一部份重要的地區宣佈票據緩予付現令，其結果便阻止了銀行信用的增長。銀行體驗到財政的困難便向國家銀行求援了。商業銀行對國家銀行的負債，以票據再交換的形式，從一九一四年上半年的二三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到下半年曾增高到四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從一九一五年起存款向銀行的流注便開始了，而銀行並不實際的積累，結果流通中貨幣的數量增加了。股份商業銀行的存款迅速的增加，有如下表所示④：

因商業銀行存款的增長，國家銀行以票據再交換的形式已將自己公債的數量有些縮減。反之商業銀行對國家銀行公債券和國庫短期債務抵押負債則增加了。

一九一四年末，國家銀行除了以票據再交換形式的普通信用之外，更對商業銀行開放了有價證券抵押的「特種活期帳戶」。商業銀行已將自己抵押於國家銀行，並被充作推銷國家公債券的銀行，而根據他們履行的程度償清了負債。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間，這種信用會搖擺於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之間。

	股份銀行的位	對1915年一
	存款(單位)	月一日%
	百萬盧布)	
1915年一月一日	1873.0	—
1916年一月一日	3931.1	209
1917年一月一日	6747.5	360

④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和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材料，係取自當年財政部年報中所發表的混合對照表，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材料，係自中央統計局統計選集中所刊佈的混合對照表。

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之間。

因此，爲了戰爭的需要，從私人銀行方面對政府之財政的幫助，其相併而行的是：第一，銀行家因高額回扣比率的鉅大收入，第二，由政府經過國家銀行借重印鈔機對銀行之廣泛的支持。

然而，財政寡頭鉅額利潤的主要部份，是於戰爭時期，借重於濫設企業，以及借重於銀行以主要必需品和被指定爲對戰爭必需品的投機所獲得的。

在戰爭期間，企業的創設曾達鉅大的數量，有如下表所示①：

被軍事利益容易獲得所眩惑的財政資本，便打進了任何投機的事業和由股份企業所實行的股票的發行。

從二十世紀初，在俄國所發生的資本主義經濟之壟斷化的過程和銀行壟斷資本與工業資本之結合的過程，在戰爭期間已激劇的加強了。

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祇一種石炭工業，銀行即保證了四個大股份公司股票的發行①：謝遼茲涅夫公司（亞藻夫·道恩銀行），巴考夫·賀魯斯塔爾無煙煤塊公司（彼得堡私人商業銀行和俄羅斯亞細亞銀行），庫茲涅石炭公司（國際商業銀行），「格魯色夫無煙煤」公司（彼得堡商業銀行）。銀行並曾創立了很大的股份公司，如具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資本的頓河水電公司，是一九一六年末

	創設的企業 (單位個)	創設企業的 資本(單位 百萬盧布)
從1914年八月至1915年八月	250	208
從1915年八月至1916年八月	477	546
從1916年八月至1917年七月	826	1056

①統計表係根據臨時政府經濟委員會會議的速記報告的材料所編成，該報告三號二五頁，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②在戰爭期間，正式的股份交易所停閉了，股票的發行和有價證券的交易，係經過私人交易集會，以及委託銀行來實現的。

由西伯利亞銀行創立的。

大銀行收買了工業股權證書的控制額。是的，聯合銀行於一九一六年收買了烏拉爾阿拉巴葉夫工廠股票的大多數；彼得堡國際銀行亦於同年收買了別婁列工廠的股票；俄羅斯亞細亞銀行則收買了考爾邱根工廠等等。

經過有利害關係的銀行，以另一企業對此一企業的股票之有組織的購買，資本之進一步的集中，對於軍事時期企業的創設是典型的。是的，包格斯洛夫礦山工廠公司由銀行的幫助，購得了喀馬洛夫鐵礦產源公司大多數的股票；「芬尼克斯」公司由銀行的幫助則收買了彼得堡車輛生產工廠股權證書的控制額等等。

俄國銀行與工業資本主義壟斷的結合，在戰爭期間亦發生過許多同樣由工業資本家購買銀行股票的方式的事件。例如，在戰時投機而致富的雅洛諾斯基糖廠，於一九一六年差不多收買了大俄羅斯工商銀行的全部股權證書。紡織業資本家孚德洛夫收買了莫斯科工業銀行股權證書的控制額，一九一七年將他的固定資本從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加到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工業資本家集團在最大的糧食商號所有者，百貨公司鉅大數量股票持有人斯塔海耶夫的指導下，收買了聯合銀行和沃爾日喀穆銀行股票的大部份。

當戰爭期間，銀行竭力的增加自己固有的股份資本的數額。是的，在一九一六年商業銀行的固定資本便增加了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從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的五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到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增加到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股份商業銀行資本的增大，主要係借重於銀行壟斷者：增加自己固定資本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

亞漢夫·道恩銀行，於一九一六年增加自己的固定資本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於一九一七年增加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彼得堡國際銀行及其他。這些銀行對於俄國的信用制度和工業的影響，在戰爭期間愈益加強了。

據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狀況，在八大銀行中會集中了俄國商業銀行固定資本總數的百分之五六。這八個銀行的銀行網，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係由五九九個分行和代辦所所構成，而當時整個俄國的商業銀行網則包括了八九七個分行和代辦所。當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此八大銀行對照表的數字為八、五七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當時全部商業銀行混合對照表的總數則為一三、〇五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因此，據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狀況，八大銀行在五十九個（譯者註——前面說共四十九個銀行，此處所說五十九個，想係將一九一七年新設十個加在一起。）銀行中，佔去了全部銀行資本的半數以上和銀行混合對照表總數的百分之六六^⑥。在戰爭期間，下列的銀行在俄國商業銀行體系中曾起過領導的作用（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材料^⑦）：

在某些場合，商業銀行的固定資本，即在戰前，因有外國的，主要是法國的財政資本的幫助即已經擴大了。即如上面所已說過的，據一九

銀行名稱	固定資本 (單位百萬盧布)	外國資本分數		對照表 (單位百萬盧布)	分行和 代辦所數 (單位所)
		百萬盧布	百分比		
1. 俄羅斯亞細亞銀行	55	43.5	79	1679.5	116
2. 彼得堡國際商業銀行	60	24.0	40	1317.3	62
3. 亞漢夫道恩銀行	60	22.0	37	1288.4	70
4. 俄羅斯對外貿易銀行	60	24.0	40	1406.8	74
5. 俄羅斯工商銀行	35	15.0	43	1154.2	36
6. 西伯利亞貿易銀行	30	8.0	27	828.7	76
7. 聯合銀行	40	20.0	50	653.9	103
8. 彼得堡私人銀行	40	23.2	58	246.7	2
總數	380	179.7	47	8577.5	559

一七年狀況，外國資本所佔分數計有二三七、二〇〇、〇〇〇盧布，亦即俄國商業銀行固定資本總數的百分之三四、九^⑥，其中同盟國（法國和英國）的分數佔了俄國銀行固定資本中外國投資總數的百分之五八、五。

如果將洛金的計算，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在俄國股份商業銀行固定資本中，外國資本參加的數字為一八五、五〇〇、〇〇〇盧布^⑦，拿來與我們所引證過的奧爾的材料，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為二三七、二〇〇、〇〇〇盧布，兩相對照，便表明在大戰前六個月中間，以及兩年半的戰爭期間，外國財政資本參加的數字，增加了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上。

外國資本在八大壟斷銀行中的投資，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曾佔這些銀行固定資本總數的百分之四七^⑧。即是說，如同戰前一樣，幾個商業銀行繼續保留了外國資本的主要「避難所」，銀行資本集中和集聚過程的結果，這些銀行即作了俄國信用制度的領導者。

俄國的大股份銀行，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已是最積極的使國家淪陷於飢餓和崩潰的力量之一。他們曾作了一切——糧食、工業品和黃金的投機；為使價格增漲，他們曾使大量囤積的商品停止流通和予以壟斷，銳化了商品的飢荒和羣衆的貧困。在形式上，俄國的銀行並未決定自己出資買賣商品，但是銀行卻用商品抵

⑥數字係取自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銀行一覽，股份銀行代表大會委員會出版，一九一八年。⑦統計表係根據一九一八年出版的一

九一七年俄國的銀行一覽所編成；外國資本參加的數字係取自奧爾著：在俄國的外國資本一書，一九二二年，二九三——二九六頁。⑧數字係取自奧爾在俄國的外國資本一書二九三頁，一九二二年。⑨洛寧著：外國財政資本與俄國的銀行，一九二六年版，八四頁。⑩在俄國八大銀行固定資本中外國投資總數中，法國資本佔五四%，德國佔三〇%，英國佔一〇%。

押放款（他們已是事實上商品的處理者），以及用商品信託業務之普遍的發展，而佈好了法網。常常祇是在形式上是委託的業務，而實質上，銀行即是商品的所有者。在戰爭期間，銀行還發展了促進他們投機奸謀的兩種信用形式：訂金貸款和給與軍事訂單承包商的保證貸與。

訂金貸款業務不外如下：銀行從批發商收取商品價值百分之二十的預訂金，而將所要的商品即記入自己的帳上並將其儲存在自己的倉庫裏。批發商按照採購量，部份的取得此商品。如此便給與銀行以制止脫貨求現和高擡物價的可能。銀行將保證書給與批發承包商，而後者則將於軍事訂單下應付與工廠承包商的貨幣訂金付與銀行。

此外，銀行還經營了所謂「存款證書」業務，此種存款證書授與承包商，便可作為現金抵押，以代替為抵押所需要的國家有價證券。銀行授與承包商的「存款證書」，在數目上恆超過他們在銀行存款的數目很大，實質上，即是在商品業務上，付與了訂金信用。

在戰爭期間，銀行的商品和貨單抵押信用，從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的三七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到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增加到七七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商品委託業務增加到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從而，在銀行的對照表上，僅祇反映出了銀行實際參加貿易業務的一小部份：銀行曾用與他有聯繫的企業的名義，經營了商品上的業務，曾將貿易業務隱蔽在對照表的其他科目之中，或完全不將他表示在對照表上（例如保證書的貸與）。

銀行用種種方法擡高了日用品必需品的價格。在戰爭開始時，當時因輸出縮減，糧價下跌，銀行便極端減少了食糧抵押信用，以阻止食糧向工業中心輸入。經過了半年，當大城市中的存糧涸竭和糧價暴漲時，銀行

才重新開放了食糧抵押信用。銀行更會制止他脫貨求現，更進一步的促進了糧價的上漲。

銀行會積極的參加了穀物和麵粉庫的籌設，在這上面獲得鉅額的利潤，而於一九一六年會對同盟國從事食糧的籌措。大部份批發商會經過銀行而運進肉、糖和棉花等。物價上漲研究所（係由丘布洛夫公司所創立）指出，一九一五年十個月中間在莫斯科市場上賣出的二七九、二六〇頭牲畜中，祇西伯利亞銀行一家即脫售了五五、九六一頭。西伯利亞銀行會賣出了從撒瓦河流域運來的牲畜總數的百分之三七，甜菜糖區域運來的牲畜的百分之三〇。所有莫斯科市場最大的肉品店，都是與西伯利亞銀行有聯繫的。即使沙皇政府之官僚的和無能的糧食機構的官吏們也不能夠不承認，在銀行的手中囤積了大量的必需品，以及銀行之掠奪式的投機，即是嚴重的商品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沙皇政府所召集的糧食部全權代表特別會議，在他們的報告中照例的引證着，銀行正是投機事業的主要槓杆。哈爾考夫縣的全權代表，在他的報告中寫道：遠在一九一六年初，縣中即有大量砂糖儲備，但是卻賣給國際銀行和亞藻夫。道恩銀行了。結果市場上砂糖絕跡和糖價飛漲。其他縣的全權代表，在糧食、食糖和肉類等方面亦同樣如此強調的指出。

伴着對自衛和人民最必需品的投機，銀行並經過自己的代理人從事黃金的收購，而再轉賣與同盟國的銀行家。帝國主義戰爭在為銀行的利益而進行，但是這並未終止了他們進行陰謀，陰謀顯然給軍事行動帶來了禍害，但是這樣卻給予銀行家鉅大的收益。

沙皇政府絲毫不會企圖反對銀行的投機活動，因為這個政府的大官吏們都是與銀行有聯繫的。下面指

①現代物價高漲研究所的著作，四分冊，一三二——一三四頁，一九一六年。②糧食部特別會議新聞二十一號，四〇頁，一九一六年三月。

出，在戰爭期間，商業壟斷銀行與沙皇俄國的國家機關之人物的結合。財政部的許多官吏，特別是信用事務司的指導官員，都是掌握最大的股份銀行行政樞紐的人物。是的，一九一五年信用事務司司長達偉道夫即擔任了一個最有勢力的商業銀行——俄羅斯對外貿易銀行董事會主席的職務。一九一六年國家銀行的總管坤紳曾是俄羅斯工商銀行董事會的主席等等。自然，管理銀行活動的信用事務司和財政部本身，即是與這種情形有着血緣的利害關係，他們曾逃避社會輿論，掩飾銀行之肆無忌憚的掠奪式的投機和將他置於不受處罰的地位。是的，我們研究了，爲軍隊而徵用屬於銀行或其代理人的商品之部份的和非常可憐的企圖，但是，他們，當然並不能停止投機。財政部之下信用事務司所進行的對某些銀行的調查，完全是無結果的。調查的材料直遷延到十月革命，而銀行卻在這樣的計謀之下將他燬滅了：他們說，調查結果的公佈會「有損對他們的信仰和破壞信用的基礎」^④。

銀行在完全不受約束的條件下，便如此厚顏無恥，公開的破壞規章和自己出資收購商品了。是的，俄羅斯對外貿易銀行，當大戰以前即廣泛的向糖廠付了訂金和起了轉賣商的作用，他從砂糖廠購進砂糖，再將他轉賣給精製砂糖工廠，一九一六年在基耶夫的交易所曾購進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食糖。收購是經過交易所的經紀人辦理的，在地方報紙上不帶任何攻擊的刊載了經紀人受銀行委託在購買貨物。政府對於

④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當時在官方的報紙上披露了一個建議舉行銀行檢查的新聞報導，與銀行有聯繫的報紙即曾對這種提議加以攻擊。財政新聞（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四〇五號）曾寫道：「證券的銀行事業家之無惡意的意志和不受凌辱的自尊心，銀行機關的本性和強烈的同情心，卻在類似檢查的答覆上受到極端反動的威脅。後者在強迫銀行收縮和縮小自己的事業，廢棄全部有益的和必需的業務」。在「有益的業務」之下，可恥的掩飾了銀行掠奪式的商品和壟斷企業的投機。

這類事實已是瞭如指掌。

的確，在股份銀行第三次代表會上，關於銀行獨立經商業務問題，曾被否決了。大會參加者說明的理由是，商業行爲祇有『招致存款者的不安』，『在銀行的任務上完全不參加與自己顧客的競爭』。

這個決議所引起的是，經商業務的限制完全不會約束銀行的投機活動，據當時對銀行之形式上的規定，以財閥們爲首的對飢餓的商業投機，便會增大人民的騷亂。銀行爲獲取高額的鉅額利益，曾經對沙皇政府爲有利於戰爭而實行經濟調節的可憐企圖，竭力的怠工和加以破壞。

戰時投機的熱中並曾傳播到俄國其他的信用機關：傳播到信用合作社，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譬如，信用合作社在戰爭期間即經營過軍用糧秣、長靴、手套等的籌辦。爲了利益的追逐，大多數的合作管理處都變成了轉賣商；他們曾向地主和富農去購買糧食，在爲國家籌辦糧食的名義下並付予訂金。

在戰爭期間，短期信用的銀行業務已有顯著的增大，如下表所示。

①關於股份商業銀行第二次代表大會工作報告，一九一六年，三〇頁。②統計表係根據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六年財政部年報中所刊佈的這些銀行混合對照表的材料編成的。③委託代理清算信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包括一、二六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包括三、〇〇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④在這個數目中，國庫短期債券交換佔六、八六七、〇〇〇盧布。

	存款		交換放款業務		對照表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1914年	1917年	1914年	1917年	1914年	1917年
股份商業銀行	2542	6747	4426②	8494②	6233	13051
國家銀行	277	1535	1072	7764③	3040	12641
相互信用社	595	963	738	841	942	1393
總數	3414	9145	6236	17099	10215	27085

戰爭期間，銀行業務的增長並不即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代表。銀行業務是因紙幣的通貨膨脹，軍費供應，參加企業創設和商品投機的結果而發展的。銀行資產名義上的數字增大了，而這些資產的實際價值，卻因盧布價值喪失的結果而縮小了。

戰爭期間，在股份商業銀行的信用投資中，經由委託代理清算所進行的信用的比重，從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的百分之二八，到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增加到百分之三五·六。於此便證明了關於銀行對資本主義經濟短期投資的增長。銀行數量和銀行網亦同樣伴着銀行業務而增加了。國家銀行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計有十一個業務局，一百三十三個固定的分行，五個臨時的分行和四十二個穀倉下附設的代辦所（為購買種子的信用貸款）。股份商業銀行的數量從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的四十七家，到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已增加到五十九家。股份商業銀行的銀行網在同一個時期，則從七四四個分行增加到八七七個分行。

抵押銀行的業務與短期的銀行業務不同，帝國主義大戰期間，他沒有顯著的發展。貴族銀行曾不得已而縮小了放款的規模，因為由於貴族們鉅額的滯付款，致使其財政狀況非常困難，而當時沙皇政府也不能給予很多的財政援助。農民銀行自己出錢購買土地，在戰爭期間是被禁止的，致使他的信用業務趨於縮減。結果國家銀行和股份抵押銀行的農村土地抵押信用，便從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迄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共增加二〇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從三、七二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三、九二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因此，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在俄國的信用制度中便發生了如下的過程：

一、經過銀行參加企業創設和企業短期借債向長期借債的鉅大進步，銀行的壟斷資本與工業資本之更進

一步的結合。

二、銀行與國家機關的結合加強。

三、銀行變成爲引起戰時經濟崩潰的深淵的有力因素；他曾是掠奪式的商品投機和濫設企業的首腦。

四、銀行的流動性銳利的削弱了。銀行財源的重要部份，是經過購買國家公債和國家公債券抵押信用之軍費供應的投資，及以國庫短期負債交換形式的投資。很多的資產都被銀行凍結在長期的工業貸款和財政供給上了。

銀行的票據箱中多是過期的票據，是資本家根據官方的緩期償付理由——票據緩期償付令，而不曾償付的票據。因此便破壞了信用的紀律和削弱了銀行的流動性。

企業股票的投機交易，有價證券的投機，高擡物價，利用戰爭獲取利益，與任何的國家檢查和調節的企圖作鬭爭，這一切都是說明沙皇俄國的銀行的軍事「行動」。

銀行制度即是帝國主義戰爭進行中使無產階級愈益貧困和資本主義矛盾愈益銳化的積極因素，這些矛盾曾促進了俄國勞動羣衆堅強的革命高潮。

第三節 二月革命後俄國的信用制度

臨時政府不僅不會終止因戰爭和掠奪式的投機所引起的經濟的窮困，並且還銳利的加強了經濟的崩潰。資本家隱藏起貨物，以擡高價格，而臨時政府的部長們則用「決議和委員會」作了裝飾。工廠主收藏起原料，不將製成品拿出，使企業陷於停頓。商品的投機和企業的停頓，不僅是法外獲利的方法，而且是資本家反對滋長着的革命鬭爭的武器。

經濟的崩潰，會伴着繼續反人民的帝國主義戰爭的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循着沙皇制度所走過的道路，廣泛的利用了一種最壞的強制公債——通貨膨脹。軍事要求之財政的供應，隨着日益上漲的掠奪式的價格，便要借重於那日益增長的國家負債「保證」作抵押之無止境的發行了。這種罪惡的政策，對於軍事的投機家和人民的掠奪者即是在降落甘霖，他完全破壞了國家的貨幣流通，激劇的加強了通貨膨脹的趨勢。

在臨時政府掌握政權的八個月中間，在流通中所發行的紙幣數在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並將無黃金準備的信用券發行權，從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到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據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十月革命前夜）國家銀行的對照表^①，在流通中的信用券計一八、九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同年三月一日則為九、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臨時政府執政之初）。流通中發行的信用券，黃金的保證祇有百分之五·五。信用券其餘的數目是以短期債券交換和由同盟國所開放的信用下國庫負債發行的，亦即事實上是絲毫沒有保證的。

①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國家銀行的對照表，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日的四八三期「財政日報」上發表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國庫對國家銀行以短期債券交換形式的借債爲一五、五〇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在同年三月一日則爲七、八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此外，國家銀行會供給臨時政府，在糧食、糖、肉和煤的購買上很多的信用。國家銀行在國庫商品業務中的信用投資，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爲三〇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則爲一、二七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了，當時這些信用在國家銀行的對照表上首先是被提出的。由國家銀行以對商業銀行和資本主義企業長期公債券和國庫短期債券抵押信用形式，對國庫財政之間接的供應，已經顯著的增加了。國家銀行的國家有價證券抵押信用，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爲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到十月二十三日則達一、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戰時財政之直接的供應和與戰爭有關的信用，於十月革命前佔了國家銀行對照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國家銀行的對照表計二四、二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在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時期，銀行與政府人員之人事的聯繫，比大銀行與沙皇政府之個人的聯繫還要牢固。列寧揭露銀行與臨時政府的聯繫，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在真理報上寫道：

「過去的外交部長和現在的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的主席包克洛夫斯基，已出任俄羅斯對外貿易銀行的理事。過去部長會議的主席考考夫捷夫伯爵亦同樣出任了銀行委員會的委員；現在的部長庫琪考夫，捷列諾珂，考腦瓦洛夫又參與了多少銀行呢（行長、股東、實際的主人）？列寧的結論是：

「現在的部長即是將來的銀行家，現在的銀行家即是將來的部長」^②。此外，要補充的是，一九一七年七月包克洛夫斯基曾被選爲西伯利亞銀行的董事長。

②見列寧全集二十卷，一五六頁。

臨時政府已是大銀行手中的活菩薩，而完全保全了他們的鉅額利益。臨時政府的租稅政策及銀行在其執行中的作用，即是臨時政府完全從屬於最有勢力的銀行集團的明證。臨時政府在革命民衆的壓迫之下，曾作了眩惑民衆的措施，並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刊佈了兩種租稅法：關於追加資本家於一九一七年所獲利潤臨時所得稅的法規（三年分付）和關於所得稅率的提高。然而這兩種法案祇是紙上的虛文而已。股份銀行委員會曾有一封嚴峻的信致臨時政府，要求將一九一七年臨時利得稅的徵收移到一九一八年。而委員會則反而以此相恐嚇說：商業銀行要嚴格的縮減國庫短期債券的交換，將不再推銷臨時政府所發行的『自由公債』^①。『社會主義』的部長們並不會延緩履行自己主人的意識，便將臨時稅的徵收延緩到一九一八年，並且還採納了財政部長關於減少所得稅的方案。爲了這種情義，股份銀行便幫助推銷了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自由公債』券，而又給了銀行家將新的鉅款裝進自己無底錢袋的可能。

股份商業銀行參加『自由公債』的推銷，對於臨時政府是特別重要的，因爲俄國的勞動者並不想購買爲供給可憎的帝國主義戰爭所預行的公債券。公債計發行了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主要在銀行和資本家中間推銷的祇有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自由公債』的失敗，顯然的證明了臨時政府之經濟的無能和政治的不予衆望。

① 股份銀行委員會曾經要挾，『臨時稅會引起信用機關的清算上存款數目的減少，並斷定他必然的會將自己的積極業務範圍激劇縮小，如在國庫短期債券的交換方面，以及在國家公債自己所認的推銷方面』。委員會曾向臨時政府提議，將法案的執行從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延到一九一八年一月，而仍照一九一七年的決算繳付。假如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被臨時政府所接受，銀行界便準備考慮關於接受新政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自由公債』的提議』（商業銀行代表大會委員會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致臨時政府財政部長的信的擇要，載莫斯科文獻）。

臨時政府曾犧牲國家銀行而廣泛的支持了商業銀行。國家銀行以票據再交換形式給予商業銀行的信用：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計三二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計四〇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計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國家銀行以有價證券抵押「特種活期帳戶」形式授予商業銀行的信用，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曾搖擺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限度內。因此，商業銀行對國家銀行負債的總數，在臨時政府管理的最後兩個月到三個月中，並不少於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一七年，商業銀行對臨時政府所放信用計有：購糧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購煤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購糖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有些大銀行是在這種條件下放款的，即購買業務之財政供給的重荷被轉嫁在國家銀行的身上，從而便加強了通貨膨脹。是的，對於購糧的信用，是由商業銀行根據以債券作抵在國家銀行獲取信用的權利，而以短期債券百分之五的交換形式放出的。購糖和購煤貸款，曾是以票據交換形式貸放的，國家銀行接受票據要超過普通再交換率以上。商業銀行經過國家銀行從臨時政府方面所得到的許多財政的援助，對於若干商業銀行會是從可能破產中的一種拯救，因為從一九一七年的下半年起，銀行的財政狀況已愈加緊迫了。是的，大俄羅斯工商銀行沈陷於各種投機的業務，曾於破產的威脅之下向臨時政府的財政部長涅克拉薩夫請求信用，以便「防止破產」。銀行在為投機所預行的商品囤積中和創設企業中，財產的凍結增大了。銀行存款的提取更加重了這種情形。從一九一七年的三月至四月，盧布貶值的趨勢即已開始銳利的追過銀行存款的增長，而從八月至九月存款即減少了。根據股份商業銀行，相互信用

④數字係取自一九一七年該月份財政，工業和貿易通報中所公佈的國家銀行對照表。

社和城市社會銀行的混合對照表，活期帳戶和存款數，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爲九、八四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則爲九、一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⑤。銀行存款的提取，主要是與逼近革命和臨時政府破產的威脅下資本向國外逃避相聯繫的。同時因銀行流動性的惡劣，銀行家從投機，創設企業和參加公債推銷等的法外利潤則增大了。

二月革命後，短期信用制度的銀行業務，包括資本主義企業和私人存款，在進一步的和迅速的增長，而企業和私人的存款開始同樣增加了，到後來則減少了。據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私人信用機關（股份商業銀行，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的混合對照表爲一七、九七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⑥，而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則爲一四、九四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國家銀行，商業銀行，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之對照表的數字，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爲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即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國庫短期債券交換即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上）。銀行對照表的膨脹曾是通貨激劇膨脹、軍費供應和投機的企業濫設之結果。後者主要表現在股份商業銀行對照表的增大上。

臨時政府掌握政權的八個月，曾是企業創設和投機的全盛時期，大的壟斷銀行在這個時期會起了中心的作用。在一九一七年，創立新公司股票發行的數字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亦即約當一九一

^⑤ 所示信用機關的混合對照表，曾刊佈在一九一七年四六期財政、工業和貿易通報的附錄中。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的混合對照表則是一九一八年四期國民經濟雜誌中所發表的。

^⑥ 其中五十九個股份商業銀行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的混合對照表佔一五、四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商業銀行委員會資料，見莫斯科文獻）。

三年的六倍半而有餘。企業創設的趨勢迅速的增長了。當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六月間，即組織了具有資本一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五十二個公司，而在九月間則組織了具有資本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三個公司^⑦。舊的股份公司經過股票的增發，同樣增加了自己的資本。當臨時政府政權的最後時期，在投機的企業活動的狂焰中，明顯的顯示出俄國資本主義的苦悶。大銀行在大多數的場合會作了股票發行和一切可能的投機陰謀的首領。即使財政部的官方雜誌亦不得不承認：『最近所看到的強化的股份企業公司，在最大的程度上是由銀行所支持的，因此，後者改變了自己的傳統，公開的將他所處理的資本對工業的需要放款了^⑧。很顯然的，在『傳統』二字之下便可進一步的了解到，俄國的銀行要將自己參加工業股票的投機隱蔽在各種傀儡名義之下的企圖。

銀行會同樣繼續的增加了自己股份的資本：彼得堡國際銀行於一九一七年增加自己的資本計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莫斯科工業銀行計增加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此外，財政資本於一九一七年曾創立了十個新的銀行，具有固定資本總數七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每個銀行的固定資本是從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到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十個銀行中祇有四個具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固定資本^⑨。這些銀行並不是中小銀行資本的獨立機關。他們實質上曾是幾個壟斷銀行的分行或爲了財政供應的公司，財政資本有組織的各種集團。譬如，一九一七年三月開業的金屬工業銀行，是根據林斯克金屬工業公司和俄羅斯金屬工業公司的發起，在俄羅斯亞細亞銀行和國際銀行的參加下而創設的；於一九一七年七月開始

^⑦見蘇聯內戰史一九三五年版，一卷二二一頁。
^⑧見財政，工業和貿易通報，一九一七年十二期五五四頁。
^⑨見一九一七年
的俄國銀行一覽，一九一八年，股份銀行委員會出版。

營業的俄羅斯貿易運輸銀行，是由聯合銀行於大財政投機家斯塔海葉夫的資本幫助下所組織的。

俄國銀行的股票曾被法國和英國的銀行家很熱心的買去了，雖說在戰爭期間，俄國銀行的股票在國外並沒有交易市場。是的，法國的銀行家集團，購買了差不多於一九一七年發行的莫斯科私人銀行股票的半數。於一九一七年所組織的金屬工業銀行和國庫銀行股票的大部份，是由英國的「資本主義聯合」所買去的。在臨時政府當權時期，俄國商業銀行與美國資本已開始接觸。美俄特別委員會是一九一七年五月組織的，這個委員會規定了自己的任務，「要鞏固俄國資本與美國資本之經濟的聯繫」。在這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股份銀行的代表聲稱，銀行界很高興與美國資本接近。根據商業銀行大會委員會的資料來判斷，俄國的銀行會從美國的銀行圖謀過信用的委託^⑥。

因此，俄國的商業銀行曾經擬定了一個由外國資本，特別是由雄厚的美國財政資本奴役國家的鉅大計劃。

一九一七年初，美國的銀行 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的分行便在彼得堡開業了。

美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曾經企圖用金元的助力，絞殺鼓勵西方革命運動的俄國革命，奴役俄國的工人和農民。斯大林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在所撰「美國的十億」一文中曾經指出，「當俄國革命爲了防禦而用全力於自己的征伐的時候，而帝國主義則在竭力的破壞他，——美國資本供給十億給克倫斯基，米留考夫，捷列切爾聯合，以便完全鎮壓俄國的革命，摧毀在西方發長着的革命運動」^⑦。

以銀行爲首的掠奪式的商品投機，在臨時政府之下，愈加成了脫韁之馬了。爲在人民饑餓上獲取鉅額利

⑥見莫斯科文獻。⑦斯大林全集三卷二三四——二三五頁。

益，銀行界對於臨時政府實行糧食、食糖和燃料的壟斷，曾予以怠工和破壞，雖說這種壟斷是「反動的官僚，沒有職工集會，不經過表決，沒有資本家約束所引導的」^①！銀行界曾向臨時政府恭順的部長強迫要求提高糧食和糖的定價，從而價格便被提高了。最大的資本家之一里雅布諾斯基，擔任莫斯科銀行的行長，公開的提出反對棉花價格的標準，因為莫斯科銀行會竭力的在棉花投機上獲利。

以同經濟崩潰鬪爭為目的，對於銀行社會監督的一切企圖，都被臨時政府廢棄了，臨時政府曾經宣佈，「進行壓迫和監督私人信用機關活動的社會組織計劃，顯然是不合法的，並不適於實行，而應予以廢止」^②。

銀行界同樣自私的保存了隱蔽人民視線的財政資本掠劫業務的商業秘密。銀行的顯貴們了解得非常清楚，商業的祕密即是「掠奪人民和對生產怠工的資本之最奧妙的所在」^③。一九一七年六月賦稅部的評議會曾作了一個這樣的決議，即在所得稅徵收時，為了明瞭納稅人收入，要利用信用機關的情報。銀行界對他的決議馬上提出了抗議^④。臨時政府曾卑躬屈膝的執行了財政寡頭的要求。商業的祕密使神聖不可侵犯的被保

① 列寧全集二十一卷一六九頁。 ② 一九一七年七月，股份銀行委員會對企圖建立對某些銀行業務檢查的社會組織，提出抗議。臨時政府的內政部長對這個抗議的答復是，給了部的全權代表一個指令，在指令中指出，「這類的社會組織計劃，即禁止發行和業務檢查，並沒有自己法律的根據，祇會在人民中間惹起恐慌，破壞對各銀行的信仰，洞察到銀行的內部組織，從而會促進國家貨幣經濟的解體，而且沒有再比此是更有力的動搖國家的貨幣經濟的了……這些號召，以及與此相似的對私人信用機關活動的壓迫和監督，顯然是不合法的，並不適於執行而應予以廢除」。——莫斯科文獻。 ③ 列寧全集二十一卷一七一頁。 ④ 股份銀行委員會在致財政部長的信中聲明，如果銀行業務的祕密完全公開，便可能發生外國銀行中俄國資本提取的危險，而外國銀行便會趨於縮小一般積極業務的範圍，特別會縮小對本國工業的信用和財政支持；同樣的，預行的辦法可能引起紙幣向不怕火的倉庫中移轉和將他保存在家中，而又與健全的金幣流通的基本原則相矛盾。因此，所有這些高貴價值的移動，不祇是觸犯到某一個銀行的利益，並且還可能有影響到大多數的企業，同時還影響到國內整個的信用關係網。——莫斯科文獻，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三日銀行委員會致財政部長函。

留了。

七月事變之後，資本家、地主和富農之違法的怠工加強了。資本家曾企圖用饑餓露骨的手，來統殺着殖着的革命。銀行界曾是工業資本家怠工的組織者。在自己的保險箱裏存着成千成萬價值的煤炭、五金、煤油等企業股票的大銀行，曾經領導了煤炭、煤油、五金、機車等生產的破壞。他們曾經演劇式的拒絕了與他們有聯繫的工業的信用。後者迫於信用缺乏，都停止了生產，而都將工人棄諸街頭。譬如，亞藻夫道恩銀行同大部份股票屬於該銀行的許多煤礦企業，就這樣表演過。怠工並不會給資本家帶來損失，因為，生產縮減百分之五〇，他們便將物價提高了百分之百。在九月末，銀行界會拒絕了臨時政府採購業務的信用，尤其打破了國家對糧食、煤炭的壟斷。在財政部的會議上，股份銀行委員會的代表，對這種的拒絕會加以辯護道：「不停止的政權危機，國家政治狀況的不安定性，造成銀行之困難的財政狀況。存款不增加，而在某些場合，甚至在減少。銀行界可以每秒鐘都從存戶那裏期待着存款的請求，如何在銀行的庫裏會掌握很多財富」^①。銀行界將政府對採購糧食的信用剝奪，將貨物藏起，加強饑餓和崩潰。對財閥們恭順的臨時政府，絲毫不會阻止過銀行對主要必需品之掠奪式的投機，也未曾作過反對破壞商品生產的鬭爭。

資本家的怠工會與資本加緊的向國外移植相併而行。掠奪的主幹——大銀行會祕密的將鉅額的貨幣移轉國外，爲了運送到外國銀行，曾大事購買黃金和外幣。

商業銀行會是反革命的參謀部。他們會給予考爾尼洛夫夫之反革命的進攻和一切可能的反革命的陰謀以財政的支持，這些陰謀會置定自己的目標，要澈底的擊潰蘇維埃，統殺革命，創立資本家和地主之無限制的強

① 見全俄工廠作坊公司聯合新聞一九一七年十月五日第四期。

固的政權。

十月革命後，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二）的彼得堡蘇維埃消息報上，發表了亞列克謝葉夫將軍於考爾尼洛夫反革命的進攻破滅後寫給過去臨時政府的部長米留考夫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亞列克謝葉夫會向國際銀行的行長威士涅格拉得斯基和俄羅斯亞細亞銀行的董事長布基洛夫提出為幫助潰敗的考爾尼洛夫派關於三〇〇、〇〇〇盧布借款的請求，根據將軍的證明，他們在觀念的共同性和反革命陰謀的準備上與考爾尼洛夫派是有聯繫的。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銀行委員會的會議上，曾經宣佈過與考爾尼洛夫有聯繫的喀薩克軍隊聯合委員會，為銀行界對這個聯合捐獻一〇〇、〇〇〇盧布的謝意^①。

銀行家會與外國的資本家談判，以國家完全受外國資本的奴役為代價，在他們爭取反革命勝利的鬭爭中予俄國的地主和資本家以援助。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六次大會上說道：

「擺在俄國面前的有兩條路：

或者是，停止戰爭，斬斷與帝國主義一切財政的聯繫，革命繼續向前推進，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基礎，開始工人革命的新紀元；

或者是另一條路，繼續戰爭，在前線上繼續進攻，服從同盟國資本和民主立憲黨的一切命令，——那時便是對同盟國資本之完全的依屬（在達富利宮中確曾聽到，美國要借給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要供給錢「恢復」經濟）和反革命的勝利。

第三條路是沒有的」^②。

① 銀行委員會會議雜誌——莫斯科文獻。

② 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一七五——一七六頁。

在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之下，銀行，首先是大的商業銀行，即是非法的濫設企業和掠奪式的商品投機的首腦。

銀行加強了饑餓和經濟的混亂，這種饑餓與混亂已使國家走近了破產的變局。

銀行曾是資本家犯罪的怠工的組織者。

銀行曾鼓勵了和支持了反革命的陰謀。

銀行在克倫斯基政府的聯合中，爲要撲滅革命，曾企圖使俄國受外國資本的奴役。

銀行曾經掠劫式的吸盡了人民的財富，以極端的惡化國家財政狀況的代價，增殖了銀行家的鉅富。

銀行之敵視人民的，罪惡的和反革命的活動，緊迫的引導着銀行從資產階級手中迅速離去的必然，引向銀行國有化的必然。

臨時政府，由個人關係與大銀行密切聯繫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政府，沒有能力實現銀行的國有化。祇有布爾什維克黨以其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途徑之政綱要求的性質，才提出了銀行的國有化。

第二章 布爾什維克黨經濟綱領中銀行國有化的要求

銀行國有化是布爾什維克黨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和進行時期，最重要的政綱要求之一。布爾什維克黨這一政綱要求，是由革命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深刻的科學的製定的，列寧和斯大林適應帝國主義時代，創造的發展了馬克思和昂格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銀行國有化的必然性之天才的指示。

在前世紀的中葉，即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歷史上第一次實現銀行國有化的七十年以前，科學的社會主義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即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一個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措施，提出了銀行國有化的要求。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產黨宣言中指出，『經過據有國家資本和特殊壟斷的國民銀行，使信用集中在國家手中』，乃是革命後無產階級的主要措施之一^①。

在同一期間的共產主義原則的著述中，昂格斯會強調的指出，無產階級統治確立之後，必須『經過據有國家資本的國民銀行，用貨幣使信用制度和商業集中在國家手中。封閉一切私人銀行和銀行家事務所』^②。最後，馬克思和昂格斯在德國共產黨的要求中寫道：『當德國宣佈為統一的不可分裂的共和國之後，國家銀行即要出而代替一切私人銀行，國家銀行的紙幣具有法定的價值。

這樣一來，便可在全體人民利益上，進行一切信用事業的調節，從而剷除大貨幣持有者的統治』^③。

① 馬克思昂格斯全集五卷五〇二頁。

② 同書四七五頁。

③ 同書五六頁。

馬克思和昂格斯對革命完成後銀行國有化的意義，曾與那些無產階級的最主要措施，如土地所有權的沒收和收歸國有，一切反革命亡命者和叛亂者財產的沒收，交通和電訊的國有化，國營工廠數量的增加，高度的累進所得稅，一切人同等的勞動義務等，給了一個同等的評價^①。根據上述的引文即證明，馬克思和昂格斯並非簡單的預示了銀行國有化，亦即銀行要轉渡到國家手中，並且還預示了使國有化了的銀行，聯合而為一個中央國家銀行，從而，更預想到，銀行事業在國家手中的集中。科學社會主義之偉大的創立者曾經指出，在信用制度範圍內這些措施的總和，不外兩個任務：第一，要粉碎大貨幣資本（「大的貨幣所有者」）的統治，第二，要創立由無產階級國家，用一切信用事業在全體人民利益上進行調節的可能。

銀行國有化的要求，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首要措施，馬克思和昂格斯遠在資本論第三卷完成以前（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亦即資本主義的信用和銀行理論由馬克思完成以前，即已經提出了。信用制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之深刻的科學的分析，使馬克思在理論上奠定無產階級革命後銀行國有化的必然性，而給了關於銀行對資本主義社會改造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意義一個天才的科學的預斷。馬克思曾指出，銀行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起有鉅大的作用。他們在實現着借貸資本的運轉：使暫時閑散的資本集中在自己手中，再用以滿足資本主義企業對於資本的需要，擴大了資本積累的界限，亦即剝削他人勞動的界限。銀行在動員和轉變資產階級社會一切階級之閑散的貨幣資金為借貸資本。銀行創立了支付的工具，而在作着資本主義經濟之支付的周轉。銀行促進了資本的積聚和集中。銀行在自己手中集中的資本主義社會鉅大的貨幣財富有多大，由無產階級革命所實現的銀行國有化，其破壞資產階級之財政的威力亦便有多大。

但是，這種任務並未道盡銀行國有化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馬克思分析信用和銀行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曾強調的指出了資本主義信用制度之雙重的性質。一方面，信用和銀行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之強有力的因素的作用而出現；另一方面，則在促進資本之積聚和集中的過程，加速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及其社會化，從而信用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懷抱中，促進了對於走向新的生產方法——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之物質前提的創造。

凡是具有進步的機器技術和大量工人的大資本主義企業，以及進步的和完備的信用制度，都屬於這種在資本主義懷抱中所長成的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

馬克思指出，『銀行制度，就其組織的形式和集中化方面來說：乃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般的與其相適合的，一種最藝術和最完全的製成品……。無疑的，銀行事業創立了社會範圍的一般簿記和生產資金的分配形式，但是，也祇是一種形式』^①。銀行，在集中着和分配着資本主義社會的貨幣財富，在作着資本主義經濟之支付的周轉，而創立了社會的簿記和生產資金的分配形式。但是，就其內容來說，這種一般的簿記和分配，是私人資本主義的，從屬於資本家的利益，而用來爭取利潤的。馬克思和昂格斯固守了這樣的立場：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在的形式，他本身並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社會之剝削的本質，而使那些想祇用一種信用制度變革的方法，實行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的各種小資產階級的方案，遭受了毀滅性的批評。馬克思寫道：『就社會主義的意義來說，關於信用和銀行事業之奇特力量的幻想，是從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信用事業乃是他的的一種形式之完全的無知而來的……祇有像普魯東那種聳人聽聞的作家，

①馬克思：資本論三卷五三六頁，一九三八年版。

——普魯東自己曾希望保存商品生產，而要消滅貨幣，——纔適合於創造畸異的，義務的實現小資產階級觀點熱望的無代價信用 (Credit gratuit) 的空想」^⑤。

馬克思認為，爲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創造，信用制度的利用，祇有在資本家政權的毀滅和無產階級掌握了經濟司令臺的條件下，纔是可能的。所以，馬克思批評了小資產階級經過信用改良，以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案，同時指出，信用制度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建立將具有很大的意義，但是須在無產階級革命實現和對剝削者剝削的條件之下。

馬克思寫道：「最後，不容任何置疑，信用制度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集體勞動生產方式過渡時期的有力槓杆，——然而也祇是與生產方式本身其他偉大的有機變動的聯繫中的因素之一」^⑥。所以，科學的共產主義的創始者認為，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間，信用和銀行的利用是必要的，而卻須將這種利用置於對生產方式本身其他偉大的有機的變革上，亦即置於由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生產手段社會化的直接依屬上。因此，銀行國有化，在無產階級革命實現後，比在破壞資本之貨幣勢力時，要獲得更廣泛的意義。銀行國有化給予無產階級國家利用資本主義社會懷抱中創立的信用制度，亦即社會的簿記和生產資金的分配形式的可能，並對這種形式補充以社會主義的內容，而使他變爲共產主義建造的最重要槓杆之一。

當這個問題第一次在理論上被完成之後，經過了二十年，馬克思和昂格斯分析巴黎公社的錯誤，曾明白的指出，銀行國有化對於革命的完全勝利的意義。顯然的，沒有明顯的社會經濟措施的政綱，而在重要的程度上受了普魯東小資產階級理論感染的巴黎公社，曾經鑄成許多很大的和對於他是命定的錯誤；這種錯誤特

別表現在巴黎公社並未掌握發行銀行券的法蘭西銀行。普魯東的庸俗觀念是：剩餘價值之資本主義的屬性，並不是建築在雇傭勞動的剝削上，而是建築在貨幣以借貸資本形式的轉讓上，致使普魯東趨於信仰信用之「奇蹟的」力量。普魯東認為，不必用廢除生產手段之資本主義私有的方法，而用對資本利息之取消和無代價信用之規定的方法，來消滅對無產階級之資本主義的剝削是可能的。確乎，這種對信用之「奇蹟」作用的信仰，已從巴黎公社社員中普魯東的繼承者，在法蘭西銀行之神聖不可侵犯性的要求中，找到了實際上的表現。

被任命為銀行全權代表的普魯東主義者柏雷，向公社聲明：「必須根據其一切特許和特權尊重銀行，俾使他以其無可非難的信用和以其『Le Peuple』銀行券而保持超然的地位」^⑤。

從握取政權後的第一天起，公社即感受到嚴重的貨幣窘困。為了革命的自衛，他應該保持自己的國民近衛軍，他應該援救人民，人民在被普魯士人包圍巴黎漫長的日子之後，已到了貧困的極限。

在法蘭西銀行的庫裏會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的現鈔和有價證券^⑥。這些資產足夠第一個時期公社的活動而有餘，假如要考慮到，在公社自己存在的七十二天中祇總共支出了四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但是公社的社員們，將銀行棄置在資產階級的管理中，甚至不曾企圖用強力的方法，保證自己在銀行中獲得金錢以應革命的需要。公社社員們對銀行的關係，係處於依賴者的地位，依賴者對於像銀行這種獨立的私人企業，沒有表示任何要求的權利。法蘭西銀行的指導者，因恐懼公社社員們要攫取銀行，在公社籌備

⑤ 檔案和資料中的巴黎公社，一九二五年版一六五頁。
⑥ 數字係取自檔案和資料中的巴黎公社一書中所引證的法蘭西銀行長代理人德·布萊克的口供，見該書一六〇頁。

的第一天即撥付給公社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確實的，公社社員們不採取強硬的手段攫取銀行，而銀行行長的代理人，凡爾賽台爾反革命政府的走狗德·布萊克，卻嘲弄的對付了公社關於貨幣幫助的請求。他會同意祇在巴黎市活期賬戶的數目限度以內——由市政收入和在城市需要上的稅收所積累的九、四〇〇、〇〇〇佛郎的限度以內，撥款給公社。公社為感謝銀行的這種「恩惠」，曾經准許銀行為保護貴族和資產階級的財產而有自己的武裝自衛隊。

馬克思在其法蘭西的內戰的原稿中，引述過從法國的一個報紙上摘錄的關於公社與銀行的協定的引文：

「柏雷先生（公社代表）與法蘭西銀行締結了協定，根據此一協定的條件，公社承認銀行之私人企業的性质，或者用由該企業職員所組成的國民近衛軍大隊的組織，或者，必要的話，用歸併於公社指揮的其他自衛大隊，來負責保護銀行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在銀行方面，應以屬於巴黎市及其在銀行寄存的數目，由柏雷簽署，供給公社，而在假如這個數目用盡的情形下，銀行便應允許公社以城市財產權讓與銀行為保證的透支」。

資產階級和貴族之貨幣的財源無觸犯的保留在銀行裏，公社甚至並不企圖攫取發行銀行，俾便掌握貨幣發行的機關，而勢必主要的在革命的保衛上去履行節約了。公社的國民近衛軍會感受到給養的不足和非常惡劣的被服供應，而公社則沒有錢，用以相當改善軍隊的生活狀況。

銀行之「神聖不可侵犯性」，在公社的社會經濟措施的實行上，還有很多有害的表現。譬如，因為公社的資金拮据，不得不保存了巴黎人所憎惡的對巴黎進口的貨物稅（入市關稅），這種入市關稅增高了生活品

的價格。在反革命包圍巴黎的條件下，當時生產品輸入巴黎已非常困難和價格已經暴漲，而這種關稅的保存，愈加成爲小資產階級方面對公社不滿的主要原因之一了。許多小有產者，他們過去曾經參加公社社員的行列作過鬪爭，而在五月中間，對公社的大流血，卻冷漠的視之了。

最後，公社資金之極端的窘困，在巴黎城區居民中間的宣傳工作，組織的極端薄弱上也已顯示出來。從公社支出的四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中，對於省級的宣傳工作，公社祇能總共分配給三千佛郎^①。

巴黎與法國其他地方，主要的是與農民的隔離，曾是公社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對於自衛所必需的開支上，在與飢餓作鬪爭的措施的支出上之硬性的節約，在擴大宣傳上經費的支絀——這便是公社在法蘭西銀行面前「虔敬」的第一個結果。

法蘭西銀行被反革命廣泛的利用，則是這個錯誤的第二個結果。法蘭西銀行曾經有計劃的和無拒絕的供給了從凡爾賽準備向公社進攻的臺爾的流亡資產階級政府。關於這點，臺爾在其致法蘭西銀行行長盧朗的信中的哀號足以證明，信中寫道：「我們窮得像寺院裏的耗子一樣。我們已經搜盡了所有的錢袋，但祇湊集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我們必須再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請寫信給你們的分行，便中予以催促，請借之款再借款給我們，不如此便一切都毀滅了」^②。

^①的確，公社沒有錢取得公社政府機關報「*Journal Officiel de République*」的全部財產。每份報紙賣五個蘇，而當時被台爾所收買的和充滿了「巴黎強盜」（凡爾賽反革命者對公社社員的稱呼）醜惡新聞的小報則祇賣一——三個蘇，所以便被搶購一空。國民近衛軍中央委員會的庫存，照例沒有存過一〇——二〇個以上的佛郎，中央委員會勢不得不取消對近衛士官的妻子和寡婦們的救濟（見布爾金巴黎公社史，一九二六年版，一〇一——一〇七頁）。^②台爾的信爲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四日所發，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家雜誌四期，一九三三年出版一九頁引證。

法蘭西銀行，處在公社的地區，實行對凡爾賽反革命之財政的供給，並不比他處在凡爾賽所作的更壞。在公社時期，凡爾賽的資產階級曾從法蘭西銀行獲得二五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公社則總共祇獲得了一六、五〇〇、〇〇〇佛郎，而其中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是在革命的巴黎的最後的幾天纔得到的，當時敵人已經獲得許多的勝利，尤其是逼使公社更堅持了自己對銀行的要求。除了現鈔以外，德·布萊克爲了銀行券的印刷，已將所有的銅版都運送到凡爾賽去了。

公社的指導者很明白，銀行與凡爾賽有聯繫，但是他們則受了致銀行行長代理人的信件所限制，他們在銀行中曾提議禁止與凡爾賽的一切關係。尤有進者，銀行已是凡爾賽反革命的參謀部。是的，公社的委員巴斯卡爾·格魯茜致函財政委員會的指導者茹爾德寫道：「可以斷言，銀行是內部反動派之真正的總參謀部和龐集巴黎的無數的凡爾賽間諜的集合場所」^⑥。然而法蘭西銀行之反革命的活動並不會改變公社對他的關係。由臺爾從銀行中所獲得的很多的金錢，便給了凡爾賽反革命在十一——十五天之內，美滿的完成了，用賄賂來欺騙、滿足和收買軍隊，及他們向巴黎進發的可能。在反革命的國民會議的第一次會議上，當時在巴黎的人行道上，公社社員的血猶未乾，革命的劊子手臺爾聲明：「法蘭西銀行值得我們十分感謝」，自不謂無因了。

公社不會掌握法國的發行銀行，無觸犯的保留了資本之財政的基礎，而同時則剝奪了自己爲保衛革命所必需的貨幣資源。這在某種程度上便預定了巴黎公社的命運。昂格斯分析公社失敗的原因，曾經指出，「當然，最困難的是對於那種虔敬的了解，公社會因這種虔敬便在法蘭西銀行的門前很恭順的止步了。這同樣是

⑥根據格來古亞爾十九世紀法國史書中的引證，一九〇〇年版三五三頁。

大的政治錯誤。如將銀行握在公社的手中，那便具有比上萬的保證人還大的意義」。

巴黎公社的經驗已明白的指示出，爲要粉碎剝削階級（資產階級與貴族）之貨幣的權威，消滅反革命財政供應的基本源泉和供給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銀行國有化的意義是偉大的。

所以，馬克思和昂格斯已經重視到銀行國有化對於粉碎資產階級政權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鉅大意義。馬克思和昂格斯這種立場，曾被列寧和斯大林根據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新的經濟和政治條件的估計，以及後來更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實際的基礎上，予以天才的發展。列寧關於銀行國有化對於社會主義建造的意義的指示，與列寧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信用和銀行之馬克思理論的探討，有着不可割裂的聯繫。列寧曾用他關於帝國主義時代銀行新作用的見解，豐富了這一理論。在古典的著作，「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中，他指出，帝國主義之最重要的特徵即是壟斷的統治：在資本主義工業中壟斷的集中和形成與銀行壟斷的集中和形成在相輔而行。列寧發見了，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濟中，大銀行壟斷的作用，與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銀行的作用，本質上是不同的。銀行已由信用上的媒介成爲與工業壟斷具有固定的和密切的信用聯繫的強有力的壟斷者。銀行將工業的一切財政業務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收購他們的股票，創設新的股份公司，將老的個人的資本主義企業改變爲股份公司，從而獲得鉅大的企業收益。列寧指出，縱使在活期賬戶之簡單業務的幫助之下，銀行亦會將這種業務引到鉅大的範圍，而得到正確認識資本家業務狀況的可能，從而來監督他們，並用信用的擴大和限制，對他們的活動顯示直接的影響，最後，

① 馬克思著作選集二卷，一九四〇年，三六五頁。

來決定他們的命運，剝奪其資本或給予大量增加資本的可能。

列寧分析了帝國主義時代大銀行各種的活動，作出如下的結論：

「依着銀行事業發展及其於少數企業中集中的程度，銀行已從樸素的媒介作用，發育成爲差不多支配全體資本家和小所有主的一切貨幣資本，以及在某一國家和所有國家大部份的生產手段和原料資源之最有力的壟斷者」^①。

壟斷的銀行資本在與壟斷的工業資本相結合。經過銀行使國家的一切經濟生活從屬於自己的財政資本便形成了。因此，帝國主義時代，銀行即是現代經濟生活的中心，整個國民經濟之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神經中樞」^②。

被列寧所發展的，馬克思關於信用制度乃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的改造爲共產主義社會之有力的槓杆作用的提綱，與帝國主義時代關於銀行之新的作用的見解，有着不可割裂的聯繫。遠在勝利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列寧在他許多的著作中，即已指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利用銀行的必需性。列寧認爲，對生產和分配之嚴密的全民的計算和監督的組織，是共產主義構成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列寧在「布爾什維克是否要保持國家的政權」一文中寫道：「無產階級革命之最主要的困難，是在全民範圍內最正確的和最忠實的計算和監督的實行……」^③。列寧認爲，組織這種計算和監督，要靠被最大的資本主義所實行過的攫取，列寧會將大銀行與工業的壟斷，電訊、合作社同列於這些被攫取的數目之列^④。在資本主義懷抱中所創立的，大量貨幣資金所通過的銀行機關，辦理計算登記工作的金庫機關，列寧認爲，爲

① 列寧全集十九卷九三頁。

② 列寧全集二卷一六四頁。

③ 同書二五九頁。

④ 同書二六〇頁。

使他變爲「整個國家的簿記，整個國家的生產和產品分配的計算」，要作成更廣泛的，更包容一切的和更全民的^①。

列寧認爲，「沒有大銀行，社會主義便不會實現。」

大銀行是這樣一種「國家機關」，這種機關爲了社會主義的實現，對於我們是需要的，我們準備從資本主義接收這種機關……^②。爲要利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現成的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應將他國有化。列寧寫道：「他必須擺脫對資本家的從屬，必須斬斷和切去資本家對他影響的聯繫，他必須從屬於無產階級的蘇維埃……」^③。

銀行國有化是實行社會主義的第一列的和必須的步驟之一。列寧曾將他列於實行社會主義的第一列的過渡措施的政綱之中，因此，他對銀行國有化，從未作爲孤立的經濟措施提出，而是與資本主義經濟其他決定的司令臺的攫取和工人對生產監督的組織之不可割裂的聯繫上提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寫的黨綱修訂的研究一文中，列寧指出，「我們將有恃無恐的實行社會主義……我們的道路是經過蘇維埃共和國，經過銀行和辛迪卡的國有化，工人監督，同等的勞動義務，土地國有化，地主財產的沒收等等」^④。

列寧曾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銀行是資本主義經濟最重要的司令臺之一。所以，大銀行的國有化，與工業壟斷的國有化相併行，便摧毀大資本統治的基礎。銀行的國有化便是給予勝利的無產階級對資本家監督以有力的武器。實行了銀行國有化，無產階級便獲得爲共產主義的建造，而利用現成的對國家經濟生活之計算和監督的機關的可能。

① 均見同書二六〇頁。 ② 同書三一二頁。

列寧曾將無產階級專政所實行的銀行國有化，與資本主義時期各個獨立的銀行合併爲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銀行，有機的聯繫起來。列寧強調的指出，祇有具有普遍的分行網的集中的國家銀行，纔能够成爲社會主義國家手中對生產和分配之監督的武器。列寧寫道：「在每個鄉村每個工廠設有分行的統一的最大的國家銀行，已十有九成是社會主義的機關了」^①。

斯大林根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之豐富的經驗，更天才的發展了和豐富了列寧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後銀行國有化的意義，及銀行對於共產主義社會構成的作用的一切指示。據斯大林的意見，銀行是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中樞神經，是他的靈魂。所以，將銀行從資產階級的手中剝去，銀行的國有化，便對資本予以嚴重的打擊。同時，銀行的國有化即將有力的財政預備金轉渡到勝利之無產階級手中，而得爲共產主義社會的建立，予以利用。是的，談到蘇維埃國家工業化的政策，沒有這種政策便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和保持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獨立性，斯大林曾強調銀行國有化對於重工業中資金迅速蒐集和流轉的意義^②。斯大林天才的探討了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的發展途徑，蘇維埃國家銀行「變爲生產計算和生產物分配之整個國家機關的途徑……」^③。斯大林指出，「爲了這種需要，首先要將……一切短期信用業務集中於國家銀行……將非現金的清算，組織於社會化的部門」^④。他更強調的指出，「信用事業之合理化的組織，貨幣準備之正確的策劃，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⑤。

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對於銀行國有化和信用事業集中於國家手中，是以無產階級專政最首要的

① 同書二六〇頁。 ② 斯大林：在斯大林選區選人的選舉會上的演說，一九四六年莫斯科國家書店版一七頁。 ③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十版，四〇三頁。 ④ 同上。 ⑤ 同書四〇三頁。

措施之一來提出的。無產階級將實行銀行國有化，列為自己的主要任務，用以毀滅大資本的統治，攫取在資本主義懷抱中所創立的對於生產和分配的計算與監督的銀行機關。無產階級是要在攫取其他最重要的生產手段之不可割裂的聯繫中，來實行銀行國有化。

列寧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即已在理論上奠定了銀行國有化的必然性，並且指出，其意義不祇是為資產階級政權的粉碎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建造，並且還為了在與俄國的經濟崩潰作鬪爭。在俄國這些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銀行國有化，與辛迪卡的國有化相並列，曾是為使國家從感受破產威脅的經濟崩潰中獲得拯救的最重要的措施。

列寧所提出的關於下面這一立場，在我們目前，特別是重要的和現實的：即在帝國主義時代，因銀行的特殊作用，不僅在無產階級的專政下，並且在一切革命的民主國家，實行銀行國有化都是必需的，假如「國家的政權不祇是在口頭上是革命的（亦即不以延緩和惰性怕去爭取），不祇是在口頭上是民主的（亦即實際的為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為富有者集團的利益）……」。在帝國主義國家，強有力的銀行壟斷即是財政寡頭政治對國家一切經濟的統治武器。財閥們經過銀行，用創設企業，用參加許多企業的方式，用有價證券的投機，用欺騙的陰謀，獲取鉅額的利潤。大的財政資本由銀行的協助在蠶食着中小銀行和企業。財政大王由銀行的協助將向一切社團所課稅收交給了壟斷者。列寧根據帝國主義時代銀行作用的分析，作出這樣的結論：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民主國家沒有銀行國有化和將他們歸併為一個國家銀行，便不能實行任何對國家經濟生活之重大的調節。

●列寧全集二卷一六六頁。

列寧曾指出，銀行國有化的反對者，或許會引證美國和德國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美國和德國沒有銀行國有化，曾經進行了「經濟生活的調節」。列寧對銀行國有化的反對者之可能的反駁答復是這樣的：這兩個帝國主義國家「調節經濟的生活」，是為給工人創造軍事的苦役，而為銀行家和資本家創造樂園。「他們的調節在於，將工人拖到飢餓線上，而使資本家保持住（反動的官僚主義的祕密）戰前那樣高的利潤」^②。列寧說明，銀行國有化對國家經濟生活所要作的革命的民主的調節，是與為壟斷者集團之反革命的官僚主義的「調節」相對立的。

同時，列寧曾於銀行國有化與包括私人資本在內的私人財富的沒收之間，劃出了顯明的境界。

資產階級無恥的文巧們，曾將銀行國有化與私有財產的沒收，視為同義語，用以恫嚇中小資本家和農民。列寧揭破了他們的祕密，並指出，銀行國有化的本身絲毫沒有改變被集中在銀行中的貨幣存款、票據、股票和其他有價證券之私有的關係。銀行國有化絕對不從任何一個與信用組織有聯繫的有產者奪去一個銅板。列寧寫道：「在存摺上還存有十五個盧布的人，在銀行國有化後，他仍是十五個盧布的所有者，而以股票、債券、票據、貨單和與此類似的名目持有一千五百萬者，在銀行國有化後，依然保持他的一千五百萬」^③。

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真正的民主政府，沒有銀行國有化，便不能認真的作反對榨取人民一切血汗的大壟斷資產階級的鬭爭。沒有銀行國有化，民主政府便不能在全民利益上推行國家經濟的發展。

另一方面，銀行國有化乃是為人民真正利益服務的一種措施，這一措施祇有革命的民主政府，纔能予以實

現。

於此便很瞭然，爲什麼爲財閥利益而服務的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要拒絕銀行國有化了。

因此，銀行國有化是社會主義革命之最首要的措施之一，這一由馬克思和昂格斯所提出，而經由列寧適應帝國主義時代所完成的理論的立場，便被列入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綱要求的原則之中了。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提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提綱，這一提綱曾給了黨爲爭取從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而鬪爭的天才的計劃。卽如聯共黨史簡明教程所指出的，在四月提綱中列寧所提出的，在經濟範圍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方法，不外是：『在地主土地的沒收下，一切土地國有化，將所有銀行歸併爲一個國民銀行，並由工人代表蘇維埃對他實行監督，實行對社會生產和生產品分配的監督』^①。

銀行的歸併和對銀行的監督，不是孤立的提出的，而是與土地國有化和對生產與分配的監督，這些經濟措施之不可割裂的聯繫中提出的。

銀行的歸併和工人代表蘇維埃對統一的人民銀行的監督制度，列寧所提出的這一要求，已被布爾什維克黨第七次全俄代表會議（四月的）所通過。

代表會議的決議中指出，『對於將由他們聯合爲統一的中央銀行的一切銀行，同樣對於保險企業和最大的資本家辛迪卡，實行國家監督制度，本質上是實際的走向社會主義必需的成熟的一步』^②。代表會議會強調的指出，這些措施，在經濟上已完全成熟了，在技術上無條件的是可行的，不僅已獲得工人的支持，並且

^① 聯共黨簡史一七七頁。

^② 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的議案和決議中的蘇共黨，一冊，五版二四三頁。

還獲得行將從這些改造中即刻獲勝的壓倒多數的農民的支持。

銀行歸併爲一個人民銀行及由蘇維埃對其監督制度，列寧曾是作爲實行銀行國有化之先決的和過渡的方法而提出的。

列寧在其一九一七年七月所寫的小冊子，「俄國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任務」中，曾指出，「布爾什維克要即刻預備工人代表蘇維埃，銀行職員代表蘇維埃等等，俾便開始實際上可能的和完全可行的步驟，開始實行將一切銀行歸併爲一個人民銀行，然後實行工人代表蘇維埃對銀行和辛迪卡的監督，從而實現其國有化，亦即轉渡爲全民所有」^①。

列寧同時指出，在俄國這些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銀行國有化或對其不遲疑的監督，首先表示是與軍事上和經濟的崩潰作鬪爭的最重要的措施。

列寧一面宣傳了銀行的歸併和蘇維埃對銀行的監督，是實行國有化的過渡措施，這一要求，同時並揭穿了銀行之敵視人民的活動及其在戰爭期間之反動的和罪惡的作用。在「信賴性的傳染病」，「社會主義的實施抑盜用公款的暴露」？「資本家先生們的利潤如何隱匿」等文，及於一九一七年五月至六月所寫的許多其他論文中，列寧揭穿了銀行家和大工廠主對軍事設施和國家公債等之非法的利潤。列寧曾經號召工人和銀行、工廠、商店的職員，搜集關於這種掠劫的陰謀，亦即估價和利潤的證件材料，即使是部份的和可能正確的^②。列寧揭破了臨時政府的部長們關於對資本家之相當高的課稅，要求刊印銀行保證書，及其他關於軍事設施及對此軍事設施估價的文件之欺騙性的聲明。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一四三頁。 ② 同書四二七頁。

列寧在「四月提綱」中所提出而於布爾什維克黨四月代表會議所通過的，銀行歸併和蘇維埃對統一銀行的監督的要求，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六次大會上，曾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大會通過了關於銀行即刻國有化之必需性的決議。

到黨的第六次大會開幕時，國內的情況已有根本的改變：和平的革命時代已經終結，雙重政權已經結束。一切政權都已落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手中，而蘇維埃及其門什維克的社會革命黨的領導，已成了臨時政府的點綴品。布爾什維克黨便改變了自己的戰略：他已入於地下工作，準備實行武裝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了。

一九一七年七八月間所舉行的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六次大會認定，俄國經濟的破產已經來臨：「如生產勞動範圍之完全的涸竭和生產的解體，交通網之全面的混亂和瓦解，臨近最後破產的國家財政狀況，以及完全達到了饑餓程度的糧食危機，燃料和一般生產手段之絕對的不足，累增的失業者 and 巨大數目的羣衆貧困等等」的結果。國家已陷於最後的經濟瓦解和毀滅的深淵。無產階級革命已是與經濟破產的威脅，饑荒，羣衆貧困作鬭爭的唯一方法。

在斯大林直接領導下工作的第六次大會，將布爾什維克黨的目標放在武裝暴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上了。第六次大會曾給予革命的叛徒——否認社會主義在俄國勝利可能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布哈林派，以毀滅性的反擊。

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六次大會，通過了根據列寧和斯大林學說所建立的，關於在單獨一個國家，社會主義

● 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的議決案和決議中的蘇共黨，一冊，五版二六二頁。

勝利的可能性的經濟綱領。

第六次大會所通過的布爾什維克經濟綱領的基本要點是：地主土地的沒收和國內一切土地國有化，銀行國有化，大工業國有化，對生產和分配之工人的監督。因而，銀行國有化係建樹在與其他政治的和經濟的要求之有機的聯繫之中，建樹在與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鬪爭的任務的聯繫之中。他是與布爾什維克最重要的綱領要求——對生產和生產品分配一切範圍的工人監督的要求，具有不可割裂的聯繫的。

工人監督是以防止大資本家對全體人民有害的活動為目的，而實行的工人階級對資本家的監督。工人監督應該是在全國利益上，而不是在財閥集團的利益上，促進工業、銀行、交通工作的改造。工人監督應該是教育工人階級如何管理經濟。

列寧和斯大林曾堅持進行了殘酷的鬪爭，反對企圖在臨時資產階級政府下，用國家的監督代替工人的監督的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

當時國家的監督，表示是有益於財政寡頭政治和農奴所有者和有害於人民的監督。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寫道：如果所提的口號，不是工人的監督，而是國家的監督，……那便是接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飾詞，實質上接受純粹民主立憲黨的公式，因為民主立憲黨絲毫沒有反對過工人參加國家的監督。考爾尼洛夫派的社會革命黨懂得很清楚，這種參加是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的最好方法，是在政治的意義上對格沃茲捷耶夫、尼基金、普魯考包維祺、謝列捷爾及所有這類黨徒完成精製的收買的最好方法」^①。

在俄國，工人監督的口號與為工人階級的政權而鬪爭的口號，有着不可割裂的聯繫。

十月革命的前夜，在經濟的崩潰，掠劫式的投機和在大資本家方面之惡毒的生產怠工的條件下，工人監督的口號更獲得了鉅大的意義，而成爲與破產的威脅作鬪爭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布爾什維克黨提出工人監督的口號，在與經濟的崩潰和解體作鬪爭上，動員了無產階級的羣衆。

斯大林在其第六次黨的大會上的報告中，對於爲什麼在俄國與經濟崩潰的鬪爭，必須歸結到工人監督的組織這一問題，給了一個深刻的理論的根據。斯大林指出，工人監督的要求，亦即與破產的威脅作鬪爭的方法的要求，是與俄國經濟崩潰的鉅大程度，與工人用以使革命深入的自由之存在，與工人之高度的組織性和無產階級蘇維埃這類組織的存在相聯繫的。斯大林說：「關於經濟範圍的干涉問題，乃是一切國家在戰爭條件下必需的問題。在德國，這一問題同樣曾被付諸實行，而並沒有羣衆直接的和積極的參加。在我們俄國便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俄國，崩潰已到了更嚴重的程度。另一方面，像我們所有的這種自由，是在戰爭條件下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此便須將鉅大的工人組織性加以估計：譬如，我們在彼得堡有組織的五金工人要佔百分之六六。最後，在無產階級過去和現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這樣廣大的組織。顯然的，最大限度的利用了自由和組織性的工人，假如不是對自己造成政治的自殺，便不能拒絕在社會主義的改造上對國家經濟生活的積極干涉」。

布爾什維克黨以顯明的例證，指出資本家對饑荒的投機，俄國的財政寡頭政治方面之非法的濫設企業和非法的竊用公款，而在勞動羣衆中間普遍的宣傳了工人監督的必需性。列寧曾經說明，資本家的戰時利潤，是取償於對人民，首先是對工人階級之間所未聞的掠奪而實現的；工人的監督便會揭示出資本家的鉅額利

潤，便會剷除了這種利潤。此所以在大的財政資本面前卑躬屈膝的臨時政府，要反對對資產階級之實際的監督了。

列寧於第六次大會後，在其一九一七年九月所寫的「破產的威脅及如何同他作鬭爭」一文中，指出了對資本家實際監督的方法：

- 一、一切銀行合併爲一和對其業務之國家的監督，或銀行國有化；
- 二、辛迪卡亦即最大的資本家壟斷聯合國有化；
- 三、廢除商業祕密；
- 四、強制的資本家組合化；
- 五、人民聯合加入消費社^⑤。

列寧強調的指出，不將這些最主要的監督方法行諸實際，則由工人和農民對資本家和地主之何種重要的民主監督的實現是不可能的。

列寧寫道：「要監督和調節糧食的配給或一般生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而不監督，不調節銀行的業務，那便是蠢物。這正好像是，在找機會獵取「小錢」，而對百萬盧布則閉目不視」^⑥。

大銀行曾以掠奪人民的主要槓杆和資本家非法怠工的主要組織者的身份出現。在黨綱修訂的資料中，列寧寫道：「……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崩潰和從各方面所引起的對最主要生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之國家的和社會的監督的要求，在鼓勵着黨要求實行銀行和辛迪卡（托拉斯）等國有化」^⑦。

⑤ 列寧全集二卷，一六三——一六四頁。

⑥ 同書一六四頁。

⑦ 列寧全集二十卷二九六頁。

列寧認為，銀行國有化，是同饑餓，經濟崩潰，財政破產，在戰爭期間沙皇和臨時政府使國家所淪陷的這些結果，作鬭爭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銀行國有化給予了剷除掠奪式的投機和大資本家方面怠工的可能。因為銀行國有化，國家……『便首先獲得了開始檢查一切主要貨幣業務的可能性，使他們沒有隱匿，從而來監督他們，然後再來調節經濟生活……』^①。但是這種與崩潰作鬭爭的現實的措施之實現，在反動的臨時政府之下是不可能的。雖說銀行國有化的本身還並非表示資產階級在銀行所集有的資本的沒收，但是銀行國有化卻不會給予資本家，再來用各種陰謀經過銀行獲得非法的投機利潤的可能，而卻成爲對資產階級實際的和普遍的監督的方法。促進全民監督之實現，銀行國有化已是向社會主義邁進了一步，因有這一步……『除非對羣衆之聞所未聞的壓迫，便已經是不能再後退走向資本主義了』^②。所以擁護大財政資本利益的克倫斯基政府要作反對銀行國有化要求的鬭爭了。臨時政府的部長們便用假定在銀行被國有化的場合，經濟的完全瓦解，平衡的破產和貯存在銀行中的積蓄的喪失，來恫嚇人民了^③。

列寧發展了關於銀行國有化的意義問題，指出，銀行國有化對於國家自衛能力的鞏固，亦同樣是必要的。列寧曾強調的指出，銀行國有化……『即使根據國家「自衛」的觀點，亦即根據軍事的觀點……亦是一個鉅大的加號，他會在鉅大的程度上提高國家的「軍事力量」』^④。

雖說在維持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臨時政府對俄國軍事力量的提高，應該是有利害關係的，而他卻

① 同書二一卷一六六頁。 ② 同書一八八頁。 ③ 是的，臨時政府的內政部長遼恩捷夫指示解釋社會監督組織的必要性說道，關於銀行國有化的全部意義是要促進國家動搖的貨幣經濟的解體和在民間散播恐懼。——見莫斯科州文獻。 ④ 列寧全集二一卷一六六頁。

對布爾什維克黨關於銀行國有化的提議憤然的破壞了。克倫斯基及其部長們很少對國家的真正利益發生過興趣。與大銀行密切勾結的臨時政府，實際上祇關心了關於在戰時非法掠取的銀行家之稀有的高度利潤的保持。

列寧研究了，銀行國有化的意義，不祇是爲了工人階級，並且還是爲了全體人民，特別是爲了廣大的農民羣衆這一非常重要的問題。銀行的壟斷祇對工業壟斷和大農業資本主義企業供給信用，而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則被剝奪了享用銀行信用的可能。銀行國有化便使信用爲農民和小有產者得以接近。列寧寫道：「因銀行國有化，對於全體人民的利益，特別不是對於工人（因爲工人與銀行少有聯繫），而是對於農民羣衆和小工業家的利益，是很大的……因爲對於小經濟主，對於農民，獲得信用的簡便和容易便特別增大了」^①。列寧強調的指出，全國都從銀行國有化而獲得節省，在勞動之鉅大的節約上，在由大銀行巨頭以企業利潤形式和因參加國家公債推銷，而從政府得來的非法回扣等鉅額貨幣資金的節約上而獲得節省。

因此，列寧發展了和創造的豐富了馬克思和昂格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銀行國有化的必需性的提綱，而給了關於銀行國有化的意義問題以全面的理論的光輝。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成爲資本主義中心的銀行的國有化，便根本上破壞了資本統治的基礎。列寧闡發了關於作爲全體人民利益的民主措施的銀行國有化的意義問題。列寧指出了，銀行國有化，對於與一九一七年俄國所存在的經濟崩潰的鬭爭上，對於國家自衛能力的鞏固上的重大意義。列寧詳盡的發展了馬克思關於銀行國有化，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建造的意義的指示。除銀行國有化的必然性問題之外，列寧更在理論上探討了下列的論題：一、關於壟斷的銀行國有化之

經濟的可能性和簡便性，二、關於銀行壟斷與工業壟斷同時國有化的必要性。

列寧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和帝國主義時代，銀行事業的高度集中出發，證明了銀行國有化這種措施之經濟的可能性和簡便性。列寧解釋道：銀行國有化之經濟的可能性……『正是由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他已經發展到了票據、股票、債券等等。那裏祇留下了簿記的統一……』^①。列寧強調的指出，在現代銀行事業的水準下，爲使各大銀行聯合爲一個國家銀行，沒有絲毫技術的困難，假如行長和高級職員不表示反抗的話，這種聯合在幾個星期便可完成。接着，列寧即作出了銀行國有化要在與大工業國有化之不可割裂的聯繫中實現的必然性的結論。列寧寫道：『銀行和最大的工商業部門已經密切的結合了』。『一方面，這即是說，不能夠祇將銀行國有化，而不向商業和工業辛迪卡之國家的壟斷（糖、煤炭、鐵、石油等）的創立邁進，不將這些辛迪卡國有化。另一方面，即是說，經濟生活的調節，如果要嚴格的來實行，便需要銀行和辛迪卡同時國有化』^②。因此，壟斷的銀行資本與壟斷的工業資本結合的程度如何，銀行國有化便應如何與工商業壟斷同樣轉渡於國家手中相併而行。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統治的破除和國家經濟監督與調節的建立的任務，僅祇是一種銀行國有化是不能解決的。必須銀行和工業壟斷同時國有化。

銀行國有化的要求是一個戰鬥的口號，布爾什維克黨在這個口號的周圍，團結了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羣衆。列寧說過，宣傳社會主義，即是在人民中間宣傳，如土地、銀行、辛迪卡等國有化那些對全體人民發生關係的措施。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銀行國有化已經成了一個在勞動羣衆中間流行的口號。在這種條件下，布爾什維克黨首先在從經濟的瓦解和毀滅拯救國家上所提出的具體要求，是勞動者所親切的和

^① 同書一六五頁。 ^② 同書一六八頁。

瞭解的。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布爾什維克黨已將銀行國有化的要求，與辛迪卡國有化和廢除商業秘密的要求，有機的聯繫起來了。辛迪卡，是俄國大工業資本壟斷的最流行的形式。列寧寫道：在俄國，糖、煤、石油及其他大辛迪卡，在技術和文化上實行國有化的條件已經齊備，因為他們是在整個國家範圍所組織的，並非由個別的資本家而是由上千的職員和技師所領導的鉅大聯合。這些辛迪卡大王在厚顏無恥的掠奪人民和對生產怠工。列寧曾強調的指出，辛迪卡的國有化……『對於革命的民主國家可能是一蹴而就而當然的，特別是當他處於嚴重危機的時候，當需要節省人民的勞動和增加生產的時候……』。臨時政府並不想損害財閥們的獨裁及其掠奪利潤，故其反對辛迪卡國有化並不亞於反對銀行國有化。

列寧將商業秘密的廢除，稱為實行一切監督的鎖鑰，因為商業秘密隱蔽了財政的欺詐和大資本的鉅額利潤。

列寧寫道：為資本家服務的克倫斯基政府，封閉了真理報，主要的因為真理報曾固執的堅持廢除商業秘密的主張。

在帝國主義下，那裏的工業壟斷經濟，是社會性的經濟，而商業秘密即是掩飾投機和掠奪的偽裝的武器。『假如在小商品經濟中，亦即在小農和手工業者中間，商業的祕密是必須的，因為在那裏生產的本身不是社會化的、散在的、瑣碎的，那末在大資本主義經濟中，保存這種祕密，便是保存少數人的特權和利潤而反對全體人民了』。

廢除商業秘密的要求，在戰爭和經濟崩潰的條件下，獲得了特殊的意義，當時商業的祕密，曾為大資本家作了『掠劫陰謀』的掩護。商業秘密的廢除，在某種場合，首先表示是掠奪、欺詐、投機的暴露，空談無濟於事，而要實際上監察資本家之非法的軍事收入，為了對其課稅的目的，而易於正確的計算資產階級的收入。

在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一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上，列寧指出，布爾什維克黨，賦予商業秘密的廢除這個與經濟崩潰作鬭爭的措施，以非常重大的意義^⑤。

銀行國有化在與辛迪卡國有化和商業秘密廢除的配合中，已為工人和農民對資本家地主之民主的監督制度，創立了一切必需的條件。這種監督對於難以逃避的破產和毀滅威脅着的俄國已有實際的必要。克倫斯基政府已是俄國和英法『資本家的俘虜』，他最懼怕這種監督。祇有革命的工人階級才能實現對資本家監督，使國家從破產中得救，毀滅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權。

十月革命前夜，在布爾什維克經濟綱領中，銀行國有化的要求，與財政範圍內進行擺脫財政危機的其他最重要措施，是密切聯繫的。布爾什維克黨曾提議禁止紙幣的繼續發行和穩定盧布，特別是為了根據法律來約束一切資本家經過銀行用支票支付，實行對資產階級的高度累進稅，並根據對資本家收入之嚴格的監察予以實行，對於俄國人民曾是極重負擔的內國和外國公債，一律宣告無效。

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經濟綱領中，伴着銀行國有化，並曾重視了實行將銀行歸併為一個國家銀行，使銀行事業集中在國家手中。首先為要作到對資本家欺詐陰謀之可能的和實際的監督，銀行的聯合和銀行事業的集

⑤ 同書二十卷四八二頁。

中是必要的，因為那種欺詐的陰謀，他們是經過銀行來實現的。

銀行事業的國有化及其在工農國家手中的集中，是對於整個社會生產和分配有計劃的調節之最重要的條件。黨的第六次大會曾經提到：

「爲了生產和分配有計劃的調節這一目的，經濟範圍的干涉是必要的，而銀行事業的國有化和集中，許多辛迪卡化的企業（如石油、石炭、食糖、五金，以及交通）的國有化，亦同樣是必要的」^①。集中化的國家銀行，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便是國家對生產和分配的計算與監督的工具了。

因此，銀行國有化，乃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和進行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的經濟綱領的不可分裂的構成部份。

①「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的議案和決議中的聯共黨」，一卷，五版二六二頁。

第三章 蘇維埃政權握取信用制度的第一步革命措施

蘇維埃政權的初期，是對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破壞時期，是對剝削者剝削和握取國民經濟司令臺的時期。在幾個月中間（從一九一七年末至一九一八年中），蘇維埃政權國有了土地，創立了工人監督，國有了銀行、商船、對外貿易和大工業。經濟司令臺由工人階級的握取，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建設，創立了必需的前提，根據新的社會主義法則，奠定了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

因此，自無產階級專政確立的第一天起，列寧斯大林的黨便順序的着手實現其在十月革命前所完成的經濟綱領了。關於銀行國有化，關於計劃的準備及其實行，蘇維埃政權很快的就着手了。對於銀行國有化，如同對工業國有化一樣，曾先行了過渡的措施——工人對銀行的監督。

國家信用制度的握取，自不能祇局限於銀行國有化的一種行動。必須保證整個信用制度的完全改造。俄國的信用制度係由具有不同使命的幾種環所組成，銀行的掌握則貫通了連續措施之整個系統的實施。這些措施的總和，保證了一個最重要的經濟司令臺——銀行及銀行事業的國家壟斷，向蘇維埃政權手中的過渡。

握取國家信用制度的主要階段，廣義的說來不外：一、國家銀行的掌握；二、對私人銀行工人監督的確立；三、私人銀行的國有化及將其與國家銀行的合併；四、因土地國有化的結果，抵押信用銀行的取消；五、國家對信用合作社的支持。

銀行國有化曾是與蘇維埃政權其他最重要的經濟措施，與土地國有化，大工業國有化，對外貿易壟斷的確立，人民經濟最高蘇維埃的創設等經濟措施的有機聯繫中實施的。

銀行國有化的實行，是在資產階級及其忠僕對這些措施的狂暴反抗的條件下進行的。蘇維埃政權勢必須逐步的克服企圖破壞乃至阻撓銀行國有化的資產階級及其忠僕們的怠工和反政府的行爲。

第一節 國家銀行的掌握與銀行官吏怠工的克服

蘇維埃政權從國家銀行的攫取開始，將布爾什維克黨精心製就的掌握國家信用制度的政綱，行諸實際。國家銀行是國家發行的中心，國庫的出納和非常重要的國家信用設施，他執行了『銀行之銀行』的作用。巴黎公社因對國家銀行的攫取表示猶豫不決，曾顯示了雙重的錯誤：剝奪了革命所必需的金錢，而將資金供應的基本源泉仍保留在資產階級和地主手中。此外，國家銀行的掌握，對於私人銀行工人監督的確立，則是一個必需的條件。

國家銀行的官吏、資本家和地主的忠實奴僕，曾宣佈了對蘇維埃政權的怠工，並拒絕從銀行中撥款給蘇維埃。當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中之後，資產階級在反蘇維埃政權鬭爭中的主要設施，便寄託在反革命的陰謀、怠工、反政府的破壞行爲之上了。官吏的怠工會波及到國家經濟行政的最重要的各環：糧食、財政、交通、農業、貿易、工業各部及銀行等。過去臨時政府的殘餘部份，即是指揮怠工者的反革命的地下參謀部。覆滅了的臨時政府對國家銀行抱了很大的期望，期望從國家銀行提款資助陰謀活動和支付對怠工官吏們的給養。他並且已經從銀行得到過幾億盧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過去的臨時政府仍保有自由的一部份人的祕

密會議上，曾批准從國家銀行撥付四二、九三二、〇〇〇盧布。在議事錄中，形式上，這筆款是預計用在「燃料購買」、「糧食存貯」、「交通部的開支」上的，而事實上，卻彌補了與蘇維埃政權作鬪爭的開支；如反革命的陰謀、怠工等。當然，這裏所引的數字，遠未包羅盡國家銀行高級官員們為資助反革命所撥付的全部款項。過去的臨時政府每次的祕密會議，都是從關於國家銀行的事件的情報開始，不是無因的^①。在十一月二十八（十五）日的會議上，當時一切疑慮都已消逝了，國家銀行已轉渡到蘇維埃政權的掌握，執行內閣總理責任的樸婁考包維祺，曾作了一個重要的聲明道：「在與國家銀行業務的聯繫上，臨時政府之經濟行政的活動已被停止」^②。這個聲明顯然的證明，國家銀行被蘇維埃政權的攫取，對於反革命會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到十月革命時，國家銀行存有黃金一、二九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庫存的信用券（紙幣）有一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據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對照表）。此外，國家銀行還可發行大量的

① 確實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七）以後，當時國家銀行已經轉渡到蘇維埃政權手裏，原先無恥的臨時政府的部長們曾徒勞無益的企圖對這一事實視若無睹，還繼續的命令銀行官員們撥付對資助反革命的陰謀和怠工所必需的金錢。是的，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三）的祕密會議上，曾向國家銀行的官員提議，「要在工商部燃料特別評議會的柴薪業務上撥付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從交通部一九一七年節餘項下撥付四三二、〇〇〇盧布」。在同一大會上曾委派原先的財政部長與北京政府談判關於從國家銀行柏林分行撥付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便在中國為土耳其斯坦購買糧食的問題。最後，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十四）的會議上，（當時國家銀行的官員們已不去銀行辦公而宣佈罷工。）曾決定將國家在國家銀行的帳戶存款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悉數轉撥到哈爾考夫，以應頓河流域的需要，其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撥給「臨時政府駐頓河流域的全權代表奧爾洛夫」（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九（六）——二十九日（十六）這一期間臨時政府的會議記錄——紅色文獻雜誌一九二四年六期二〇三——二一〇頁）足够證明，並未如在記錄中所公開指明的，將錢用在正當的目的上。^②見紅色文獻一九二四年，六期二一三頁。

紙幣。假如蘇維埃政權不掌握了國家銀行，所有這些便作了資助反革命的源泉。

與顛覆巴黎公社的臺爾資產階級政府不同，臺爾為資助反革命，曾於很短的期間從法蘭西銀行提去了鉅額的金錢，而曾被覆滅了的克倫斯基政府的部長們，則祇暫時的利用了國家的發行中心，以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很快的就剝奪了他們這種可能性。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⑤，國家銀行便被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武裝部隊，在門紐斯基的領導下接收了。十一月二十日的早晨，當時財政人民委員的代表門紐斯基便對國家銀行的總管禱包夫宣佈了彼得堡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命令中指示，在為啓封銀行金庫，軍隊調來以前，銀行不得關門。同時門紐斯基會要求銀行的總管撥付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預支，以應人民委員會急切的開支。銀行總管拒絕撥付，並背着門紐斯基派遣了一個銀行的職員，攜帶着對蘇維埃政權代表抗議的請願書到彼得堡的市議會^⑥。到晚上五點鐘，國家銀行便被士兵和海員的武裝部隊包圍了，以門紐斯基為首的代表團亦便進了銀行的大廈。代表團即召集銀行職員會議，在會議上宣讀了由門紐斯基簽署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下列的通告：

「銀行職員先生們、工人和士兵同志們！人民委員會派我們到這裏來，召集你們大家，並向你們宣佈：人民的敵人反對新的工農政權，在進行着殘忍的和罪惡的鬭爭。他們在竭力的破壞人民政權的一切決定，一

⑤ 以下所指日期，均按新曆。

⑥ 彼得堡市議會當時是組織反革命的中心之一，因為議會中大多數屬於右派社會革命黨，門什維

克和民主立憲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彼得堡市議會被人民委員會命令解散。禱佈禱包夫派了一個職員到彼得堡議會去的，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八）的門什維克報紙新生活一七五號。在十一月二十日（七）的報紙上有一段消息，銀行代表於十一月十三日（一）又到彼得堡議會商談如何由他們提出請蘇維埃政府現鈔給他們的要求。因此，反革命的彼得堡市議會和過去臨時政府的殘餘曾經領導了國家銀行官吏們的怠工。

切改革，企圖剝奪他的貨幣資源。國家銀行的行長和委員會憑藉老的行員，膽敢不撥付國家的款以應人民的需要。財政豪門和特權官僚集團，宣言他們自己即是整個國庫的私有者，並完全本着一己的意思去處理他。饑餓在危脅着前線。城市中麵包在發生恐慌。政府爲了拯救國家，應該採取非常的和緊急的措施。但是國家銀行的當軸集團卻不將人民的錢，撥付給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所指派的政府。職員們、工人們、士兵們！我們代表人民委員會向你們宣佈：凡是在言行上阻撓蘇維埃政權爲人民的需要利用人民的錢的人，他便是深重的國家的罪人，並將用自己革命法律的鐵拳的全部重力擊破他的頭顱。……行長先生！國家銀行委員會委員先生們！總出納先生！工農政府命令你們迅速執行授與你們的命令，並預付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應人民的急需」⑤。

國家銀行的官吏曾以缺乏付款的形式基礎爲口實，拒絕付款給蘇維埃政權。總管襁包夫聲稱，祇有在這種場合他可以付款，即假如人民委員會從國庫局取得關於從他的帳戶撥到人民委員會的帳戶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命令。

雖說在當天並未取到款，但是主要的卻作到了，資產階級的奴僕已停止是國家銀行之全權的主人了。革命委員會部隊的武裝士兵和海員便保留住了銀行倉庫和金庫中人民的資產。在這種措施之後，祇不多幾天，便完全掌握了國家的貨幣中心，亦即獲得了所有金庫的鎖匙，罷免原先銀行領導人的職務，開始自主的處理現金財源和發行機關了。十一月二十一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根據門紐斯基關於國家銀行官吏怠工的報告，通過了由斯大林和得捷爾任斯基所起草的決議案，在決議案中決定向人民委員會建議，爲要將國家銀行

⑤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反革命者的怠工迅速肅清，要採取最嚴厲的措施。同時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並號召『所有其餘的職員，爲人民忠實服務，在保證國家工作事務上，用必要的貨幣現金全力的協助蘇維埃政權』^①。十一月二十四日，人民委員會將國家銀行總管薩包夫免職，委派了駐國家銀行的政府代表，並授權該代表，在臨時特殊措施名義下，從國庫局活期帳戶撥付人民委員會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數目的短期預付金，轉到人民委員會的活期帳戶上^②。

銀行的低級職員（會計員、出納員）對蘇維埃政權的號召發出了歡呼。高級和中級職員於政府駐銀行代表委派之後，即宣佈罷工，離開銀行，並將金庫、保險箱和檔案庫的鎖匙取去。蘇維埃政權駐國家銀行的代表，根據列寧的指令，首先致力掌握金庫，俾便獲得現金而支付工人的工資。在罷工宣佈後經過了三天，所有國家銀行的鎖匙，便都到了銀行代表的手裏，而十一月三十日爲供應革命需要，便於人民委員會所決定的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預付金數中，獲得了第一批紙幣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列席國家銀行代表會議的人民委員會的代表，銀行低級職員和幾個紅色自衛隊員十六人，從銀行的庫裏取了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送到人民委員會交給列寧。住在國家銀行大廈的若干高級官員，曾竭力的阻撓提款：在貨幣結算時製造假警報，教唆出納員反抗等。經過了三四天，第一個蘇維埃國庫便在列寧辦公室鄰近的一個房間裏，在部隊的保護之下而出現了。人民委員會所決定的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數中的其餘部份，便根據人民委員會和代表會議的訓令，由國家銀行直接撥付了。

^①第二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記錄，一九一八年四四頁。^②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由列寧簽署的人民委員會的法令，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三），在臨時工農政府報上公佈。

莫斯科國家銀行業務局的接收，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由莫斯科革命軍事委員會執行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派遣到銀行的蘇維埃政府代表的命令，亦於同一天到達。莫斯科業務局的官員對這一措施的回答便是宣佈罷工，十一月二十日即不去辦公了。十一月二十一日業務局的總管被捕，在他那裏搜出了銀行倉庫和金庫的鎖匙。官吏的罷工加重了莫斯科鈔票的恐慌。彼得堡業務局的支援直至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晚上才到，所以二十和二十一兩天，銀行都關了門，未作任何支付。雖有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而官吏們並未去辦公。反革命的莫斯科市議會曾組織了和在物質上援助了莫斯科的銀行業務局官吏的怠工。莫斯科市議會曾於十一月中從國家銀行獲得了『作燃料和糧食貯備』的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些錢便被用作資助反革命的陰謀和怠工了^③。銀行大廈中的高級官員拒絕執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撥款給兵代表蘇維埃的主席團和撥付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貸款給州議會委員會，以應城市的需要^④。十一月二十四日晨，以革命軍事委員會代表，兩個區議會委員會和莫斯科城區司令組成的，列席國家銀行代表會議的代表團，從

③ 紅色文獻雜誌，一九二八年，二十八卷三六——九四頁莫斯科市議會會議記錄稿。
④ 關於為應城市經濟需要從國家銀行撥付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給州議會委員會的命令，是莫斯科革命軍事委員會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夜晚的會議中決定的。當時曾拍電列寧請求批准銀行代表的任命和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撥付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命令。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列寧簽署了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罷免莫斯科業務局總管和任命銀行代表的法令（見莫斯科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記錄，載紅色文獻雜誌一九三五年七一（四）卷，九〇——九四頁）。人民委員會決定貸付區議會委員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貸款形式是這樣的：以莫斯科市自治有保證的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公債項作抵，按指定公債推銷，而自正式公佈法律效力之日起至遲不得過兩個月，此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須歸還銀行。（見十月革命法令，黨出版局出版，一九三三年一卷二五——二六頁）所有在此決定公佈以前對州議會所貸付各款，均列入此指定貸款數內。

銀行的保險箱裏取出了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將收據放在保險箱裏，並將編就的記錄亦放在一起，在記錄中曾載明，銀行拒絕執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並指明，「爲了急需發軍餉，發付工人、職員和民警的工資」，提取了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①。這筆款是由莫斯科蘇維埃在各工業團體之間分配的。在那幾天中間，從國家銀行中提取鈔票，都是由銀行代表祇根據莫斯科蘇維埃的檢查證辦理的。在消息報上發表了莫斯科革命軍事委員會對莫斯科城區勞動者的通告，其中談到：銀行官吏的怠工已威脅到「城市生活的完全停頓」，致使革命委員會爲要發放工人的工資，要自主的從銀行提款了。在通告中同樣指明，「莫斯科蘇維埃要管理資金，以及金準備的完全不可侵犯性和嚴格的保證」。因此，國家銀行莫斯科業務局的掌握，與彼得堡國家銀行的攫取是同時實現的。

在掌握了國家銀行之後，列寧即刻要求遵守對貨幣資金支付的嚴格監督。沒有精密檢查過的支付證明書，一個銅板都不能從庫裏付出。人民委員會發佈了一個由列寧、斯大林、門紐斯基簽署的，關於從銀行提款監督條例的特殊法令。因國家銀行官吏的怠工，人民委員會曾經決定（一種暫時的和特殊的措施，從法令簽署那天算起，爲期不過三天），「辦理國家銀行彼得堡業務局金庫的支付，須對照例具備下列情形者：一、由國庫和社會機關填具和提出有力證明文件者，二、由工商企業填具和提出有力證明文件者，爲發放人工工資需要的款項，在所有銀行業務恢復之前，在業務局的帳簿上，並不登記這種支付，而在周轉庫裏用證明書代替着相當數量的紙幣。證明文件的真實性與法律的效力，應是在每個個別的情形下檢查的和由工廠作坊委員會及其他社會機關的保證確定的。製訂這種指示檢查和擔保條件之權，則授予了國家銀行彼得堡業務

①莫斯科蘇維埃消息報二〇三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

局的總監察官」①。

蘇維埃政權曾廣泛的吸收了工廠作坊委員會，參加對從國家銀行提款監督的實施。根據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爲對銀行現金支出的監督，創設了有工廠作坊委員會代表參加的特別財政委員會。雖說資產階級和門什維克的報紙在中傷、咆哮的說，「布爾什維克攫取國家銀行，是爲了金錢掠劫的目的」，然而縱使反革命會企圖用官吏罷工的方法對銀行工作進行完全的破壞，而蘇維埃政權卻從第一天起，對貯存在銀行裏的人民的財產的支出，即制定了嚴格的監督。對現鈔支付的監督已是國家銀行工作組織的中心問題。當十二月四日，亦即銀行掌握後過了兩個星期，彼得堡蘇維埃消息報報導說：「需要注意，貨幣支付的監督要在正常的規定上完成，假如注意到還要用自身的監督，以加強普通正規的監督的檢查員和會計員的加倍警戒，便是這種支付正確性的保證了。」

官吏罷工和差不多在國家銀行，熟悉銀行業務的職員完全缺乏的結果，在第一個時期，除貨幣收付外，任何業務都未作。檢查證明文件的檢查員曾是在逮捕的威脅下被迫到銀行辦公的。同時，已以最簡單的銀行業務訓練了會計員和識字的工人。列寧本人也曾經促成銀行中各地區工作人員的徵集。

在十二月初，當真理報公佈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之後^②，一部份中級的職員便回到了國家銀行。而

① 引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十一月十九日）人民委員會「關於國家銀行彼得堡業務局證件支付暫行法規」的佈告，當日在消息報公佈。
②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二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根據門紐斯基報告所通過的議決案中指出，中央執行委員會接收根據人民委員會指令貨幣數目支出的監督，中央執行委員會並根據這一目的特創設一個九人財政委員會（第二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記錄一九一八年，四四頁）。

高級官員和大部份中級職員則仍在繼續罷工^①。

在掌握了國家銀行後的第一個月中間，祇接受了國家機關，私人銀行和工人代表的貨幣支付申請書。政府要求銀行嚴格的緊縮貨幣的付出，並祇對最迫切的需要付款，因為現鈔差不多在國家銀行中已沒有收進，一切付出都是靠了發行。當時會規定紙幣付出的次序如下：首先是供應軍隊、醫院的需要和工人工資的開支；第二則供應國家機關和社團的糧食和燃料貯備及國家機關職工薪資的開支；最後再供應其他。對企業和機關活期帳戶存款餘額的檢查，是最大的技術困難。登記活期帳戶帳目和予以核對，沒有銀行職員的技能，實是一種艱鉅的任務。假如企業帳戶餘款的精確數目拖延幾天才結出，則國家銀行對發放工資的付款，工廠作委員會對所提款數與企業帳戶存額不相符合的情形下，應負保證將款退還的責任^②。

從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初，銀行即很少開展放款業務。對於從事防禦工作和急需信用支持的國營企業，卻

①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月二十)日在真理報和彼得堡蘇維埃消息報公佈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在命令中指出，財政部，主要是國家銀行和國庫官吏們的罪惡的怠工，將祇靠由他們獲得一點卹金過活的孤兒、寡婦和高齡的領養老金者置於死地，因為怠工的官吏們拒絕他們卹金的獲得。類似罪惡的怠工的繼續，在以無數的厄運威脅着共和國最貧苦的人民，革命的民眾無論如何不能容許如此的，而後，爲了禁止官吏們的怠工，革命軍事委員會要求，國家銀行和所有國庫的官吏們趕快到公，如不實際的執行命令，即以嚴重的後果來威脅怠工者。②的確，在十一月末，國家銀行約有一千人的職員會議上，作了一個關於自己與蘇維埃政權一致和希望與他協同工作的決議(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四)真理報一八九號)。然而，祇有中級職員的一部份參與了國家銀行的工作，因為銀行的高級官員和以蘇維埃國家最兇惡的敵人爲首的——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職工會，「銀行勞動社」完全阻止了中級職員回國家銀行工作。③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月，國家銀行，照例延緩了根據他們活期帳戶的存款對企業付款。造成這種結果的是，第一、因為國家銀行過去官吏們的繼續公然怠工，熱練的銀行幹部的極端缺乏，第二、一部份回來工作的中級熟練職員的暗中怠工。工廠作坊委員會曾紛紛以對「銀行的官僚」的怨言質問人民委員會。

須予以放款。此外，在已建立工人監督的企業工廠作坊委員會，曾向代表蘇維埃請求從國家銀行獲得貸款，因為私人銀行拒絕給他們信用。人民委員會十二月七日會命令莫斯科蘇維埃，對於保衛革命有功的布洛穆里、古如恩等工廠，貸與總數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短期貸款。過了幾天，國家銀行又開放了對奧布霍夫斯基及其他彼得堡工廠的信用。因此，從十二月中旬，銀行不僅辦了活期帳戶的收付款，並且還作了貸款業務。資產階級及其官吏們破壞銀行活動的期望，未得實現。

斯大林指出道：

「我們曾受了國家機關和官員們罷工的驚擾。我們自己很曉得，新的社會主義的政府，並不是簡單的將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取來就算告成，而是要由自己去製造。但是我們要爭取舊機關的改造，將其反社會的因素肅清，軟化罷工」^①。

雖說資產階級及其官員們作了垂死的反抗，蘇維埃政權終於掌握了國家銀行。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第三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列寧說道：「銀行官吏們的反抗，並未留滯住蘇維埃政權。我們已經完成了國家銀行組織上的基礎，這種基礎即握在農工的手中……」^②。

在無產階級專政確立後的幾天中，國家銀行的掌握，對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勝利的鞏固，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蘇維埃政權已獲得了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之政治的和經濟的任務所必需的貨幣資源的管理。

資產階級和地主已被剝奪了資助反革命的主要的國內的源泉：紙幣的發行。假如當時蘇維埃政權不將發

①斯大林全集四卷二頁。 ②列寧全集二十二卷二一四頁。

行銀行掌握，他便會資助十月革命的敵人了。

國家銀行的掌握，給了蘇維埃政權攫取國家發行機關，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督下建立紙幣發行及其利用的可能。

發行銀行的掌握是向新的社會主義的貨幣流通法則的出現前進了一步。

經過國家銀行——國家的發行中心和「銀行之銀行」——蘇維埃政權獲得了對私人商業銀行活動建立監督的可能，因為私人銀行對國家銀行處於財政的依屬地位，而從國家銀行獲得很大的信用和現金。

國家銀行的掌握，是國家整個信用制度的掌握的第一階段。

第二節 工人對私人銀行的監督

股份商業銀行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後，都即刻宣佈罷工。從十一月七日起，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股份銀行便將一切業務，連工業為發放工資的付款都停止了。直到十一月十二日人民委員會公佈了由列寧和門紐斯基所簽署的法令之後，銀行才開業。法令中規定，假如不照支票付款，所有行長和管理員將均遭逮捕，並且將委派政府的代表到各銀行^①。十一月十三日晨，商業銀行的代表召集了一個會議，會議上作了如下的決議：

「一、從次日起每日十二——一時銀行開業；二、辦理最簡單的活期帳戶的收付款和特別活期帳戶的貨幣支付；三、辦理對每個顧主三千盧布以內的私人現鈔支付，而較大的數目則付與國家銀行或其他銀行的支票」^②。十一月十四日，銀行便開業了，但是並未正常的工作，而且每天也不過兩個鐘頭。要費很多的耽擱才將款付給人民和為發放工資的企業。因此在帳戶中間便造成了極端的恐慌。每天在銀行的門口都站滿了廣大的人羣。而對於大資產階級資本向國外移轉和反革命的陰謀與罷工的資助，股份銀行卻完全沒有間斷和無限制的辦理了，為此且同樣利用了由國家銀行所獲得的現鈔。從十一月二十八日起，所有私人銀行「以反對蘇維埃政權掌握國家銀行為由」，又重新停業三天。關於罷工的決議，是由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銀行職員聯盟「銀行勞動社」影響下的私人銀行的職員所通過的，「銀行勞動社」曾是私人銀行職員罷工的首腦^③。罷工三天之後，從十二月一日起，商業銀行又重新於每天十一——二時開業了。現鈔付出則被縮減到私人為一

^①見「蘇聯二十年來的貨幣流通與信用制度」，國家財政出版局版，一九三九年，一頁。^②莫斯科州文獻，股份商業銀行代表大會委員會資料。^③關於這次會議及其決議的通報曾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六）門什維克報紙新生活發表。

千盧布，法團爲一萬盧布。

在莫斯科，銀行工作比在彼得堡曾有更多的停頓。除行員罷工之外，因國家證券儲備發送部官員們不運送紙幣的罷工之結果，彼得堡銀行業務局支援的停頓，亦曾阻滯了莫斯科商業銀行的工作。在十一月十九日莫斯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會議上，對於商業銀行的業務問題，曾作了如下的決議：「因爲銀行還未開業，所以國家銀行中究有多少數目的貨幣供給私人銀行，是不確定的。要選定一個代表協議會，這個協議會傳達關於銀行、國庫及其他信用機關開業問題的決定，紙幣資產的規定，一般資金的檢查」^④。據檢查公佈，國家銀行中紙幣殆已十分缺乏。即如所已指出的，彼得堡的支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晚才送達。從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莫斯科的商業銀行才辦理業務，但亦不是每天。

從十一月末，蘇維埃政權根據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便在工業、銀行、商業、交通、農業的企業中設立了工人監督。即如在列寧簽署的關於工人監督法規中的指示，他是在國民經濟有計劃的調節的利益上設置的^⑤。爲了保證工人監督的實際效果，廢除了資本之「神聖的神聖」——商業的祕密，確定了對一切企業的營業清單，帳冊和決算等的監察權。某一企業的工人應經過自己選舉的機關：工廠作坊委員會，管理人員委員會，來實行監督。監督會擴展到生產、採購、發賣、生產品和原料的保管，以及企業的財政活動。特別是，沒有工人監督機關的檢查證，銀行便無權付款給企業。工人監督是實行工業和銀行國有化的過渡措施。他爲工人進而對國家國民經濟的管理作了準備。

④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⑤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四）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的「關於工人監督的立場」，參看

「蘇聯的經濟政策」，一九四七年國家政治出版局版，二〇——二二頁。

無產階級勝利後，工人監督的必需性和意義，列寧曾作了如下的界說：「我們並不在所有我們的工業中遽爾宣佈實行社會主義，因為祇有在工人階級學習了管理的時候，當工人羣衆的權威鞏固了的時候，社會主義才能降生和鞏固。不這樣，社會主義便祇是一種期望。所以我們設置了工人監督，曉得這是矛盾的行動，不充實的行動，但是對於工人自身爭取沒有剝削者和反對剝削者的鉅大國家工業建設的偉大事業，卻是必需的。我們認爲最重要和最有意義的，是工人自己已經爭取到了這種管理，因有一切工業的主要部門中混亂的、瑣碎的、手工業的、不完備的情況所應被保留的工人監督，我們已經接近了一般國家範圍的工業的工人管理」①。

在銀行方面，列寧曾強調的說，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用整個世紀發長起來的銀行事業的精緻細密的機關，是不能在幾天之內就能摧毀掉或改作過的。工人對銀行的監督，是實行銀行事業國營的過渡形式，爲使工人學習管理銀行，學習組織蘇維埃俄國的銀行事業，是必要的。同時工人監督的任務，在於剝奪資產階級再利用其經濟潛力，以加害革命的可能。工人監督是爲鎮壓資本家而設的。一九一七年末，在芬蘭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大會上斯大林說道：在俄國，「資本家被擊潰了，因爲迅速的建立了對工廠、作坊、銀行的工人監督」②。特別是，對股份銀行監督的直接任務，在於制止私人銀行的罷工，制止其對革命的資助，保證國民經濟之正常的信用。工人對私人銀行的監督，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與工商業中工人監督的不可割裂的聯繫中相併而行的。對銀行——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中心的監督，應是促進工人對企業監督的實現。對私人銀行的監督要靠蘇維埃政權對發行的國家銀行的掌握。對私人銀行監督的辦法是由十二月十四日與私人銀行

① 斯大林全集四卷一頁。 ② 列寧全集二三卷二五一頁。

締結的協定所決定的。股份銀行因為感受了現鈔的嚴重缺乏便實行了協定。國家銀行——發行的中心和「銀行之銀行」——已在蘇維埃政權的掌握，且在與私人銀行締結關於工人監督的協定之前，即以鈔票供給了商業銀行。蘇維埃政權曾對股份銀行委員會和「銀行勞動社」作了讓步，即如協定原文中所示，並未派遣駐各銀行的政府代表。根據所締結的協定，規定監督辦法如下：一、私人銀行負責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將關於自己庫存狀況的情報陳報國家銀行。此後一切銀行應將他們的庫存狀況表逐日陳報國家銀行；二、私人銀行得每天付予帳戶不超過一千盧布，超過一千盧布祇有對為生產目的者准予支付；三、私人銀行應每天將庫存結單陳報國家銀行（將副本呈送國民經濟蘇維埃），在庫存結單中要標明：付予何人，根據何種清算，為何種目的；四、各銀行應每日將所有超過一萬盧布的放款報知國家銀行；關於一萬盧布以內的信用，各銀行要負責編製逐月計算書；五、國家銀行負責每天以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現鈔付予各私人銀行，這些現鈔要根據股份銀行委員會的評定，分配於各私人銀行；六、私人銀行無權付出兩千盧布以內數目的支票到國家銀行；七、國家銀行負責兌付所有私人銀行的支票，每天總數不超過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並且私人銀行應每天將在國家銀行兌付的支票結單陳報國家銀行，並附註，支票係付予何人和為何目的；八、為對解款易於監督，祇准郵匯，而對其他城市的電匯款則被禁止；九、人民委員會有權派遣自己的代表，在國家銀行代表參加下，到任何私人銀行審查他所需要調閱的一切帳冊和文卷；十、銀行應申報，他們在何種股份公司的管理中有自己的代表（主管、管理員、檢察員等職務）；十一、私人銀行應將其所支配的有價證券的結

⑤ 股份銀行委員會代主席愛波士頓後來論這個協定寫道：「我們已經受無錢之困，因為自己的錢都凍結在戰時國庫所發行的債券上了，所以不得不接受國家銀行代表的要求」(Dybskain: Les Banques de Commerce Russes, Paris 1925, p. 79)

單每月向國家銀行陳報一次。

協定所規定的監督政策，從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起實行了。根據會議上的約定，第一次貨幣的支援，是在補充條件上由國家銀行撥付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各銀行得在下列情形下動用這筆款：對國家支付命令的支付，根據有條件的活期帳戶的要求的支付，及在特殊情形下對普通活期帳戶款的支付。所有以後的貨幣支援即照所締協定，每天照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付予私人銀行。

監督限制了從私人銀行方面利用資金資助反革命的可能，因為國家銀行現鈔的資助使私人銀行受了限制。此外，蘇維埃政權有國家銀行掌握在自己手中，便能剝奪對私人銀行貨幣的支援，制止對這種措施的反動。譬如莫斯科蘇維埃的主席團向里鑑斯基製造場徵發，製造場的管理處則對工人的監督怠工並破壞了企業的工作，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團便建議工商銀行和莫斯科商業銀行不得付款給當時的里鑑斯基製造場。不然的話，國家銀行的莫斯科業務局便要停止再付貨幣支持這些銀行，並凍結他們在國家銀行的活期帳戶的存款^①。因此，對私人銀行的監督在這一點上是實在的，即他完全憑藉了蘇維埃政權對國家發行中心的掌握，而私人銀行是要依賴這個發行中心的貨幣支持的。關於私人銀行的業務和他們從國家銀行所獲得的貨幣的支出，則對他們的監督有如下形式的規定：第一、對付出不事前監督，第二、監督的進行主要是不事原始證件的逐日檢查，而是根據銀行的結單和調查表。私人銀行會對這種監督怠工，並企圖取消他。編制任何調查表，以便「保持清白和獲得資本」，對於像私人銀行中的「專家們」的「複式簿記」的專門人材，並不是特別的困難。是的，在銀行國有化後，在莫斯科工人對私人銀行監督的實施總結報告中曾指出，財政蘇維埃企

①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團命令。

圖建立對他們活動的監督是徒勞的^①。銀行向財政蘇維埃所陳報的，不是根據財政蘇維埃代理人的考察和監督所供給的各種計算書，而僅祇是一種簡單的形式，過去私人銀行的活動仍在原先的基礎上進行，而並未受到現鈔缺乏的限制。在過去私人銀行中代表的任命，不僅遇到銀行家方面的阻撓，並且還遇到原有的職員方面，因代表在銀行中的出現即宣誓罷工的阻撓。

對銀行監督的實施的參加者，在強調他們在從國家銀行所獲得的現鈔的支出範圍方面的實在性，而在實質上對於銀行業務之任何實際的監督都沒有。商業銀行的領導者在國家銀行陳報的調查表和結單，確與實際不合，而繼續將從國家銀行所獲得的現鈔作了資助反革命的陰謀和罷工等的支出。即如真理報所說：「銀行家用整袋的黃金組織了罷工和卞列金，都寶夫和烏克蘭·拉德的反革命陰謀，企圖用從人民掠奪來的財物加予人民以饑餓和破產的絞死刑」^②。特別是，在工人對銀行監督的時期，股份銀行委員會即供給了幾萬盧布給領導亞爾罕格爾斯克反革命叛亂的卡伊考夫斯基。

在十二月初，股份銀行委員會曾在彼得堡亞漢夫·道恩銀行下，創設了一個各銀行間的交換所，這個交換所的任务就是要抑低不足的現鈔的要求。事實上，這個交換所是被銀行用以圍攻國家銀行的監督，使自己的業務更加混亂，而逃避蘇維埃政權方面對銀行工作詳細檢查的耳目的。

但是股份銀行之反革命的委員會亦並未以此自限。在對銀行監督的實施以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股份銀行委員會曾作了一個創立俄國銀行聯合的決定。這個聯合的使命是以貨幣的代用品充滿全國，發

①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②真理報，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行無記名票據支票的總數，據銀行家們的計劃，應該是由銀行於支付中收受與國家的貨幣相等^①。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亦即已經是工人對銀行的監督時期，曾印行了一種金券——一百萬盧布的支票。這種金券的發行爲銀行的據有者及其忠僕們揭開了燦爛的遠景——完全從蘇維埃的國家銀行的從屬（從那裏取得現鈔）解放出來，完成了對反蘇維埃政權的鬭爭的無阻礙的資助。但銀行家這些進攻的計劃並未得實現。當時蘇維埃國家即制止了私人銀行的反革命活動。

除了對反革命直接的資助之外，商業銀行還採用過其他方法與蘇維埃政權鬭爭，特別是，拒絕對選舉工人指揮的糧食機關放款，停止對那已經建立了工人監督的工廠付款。工業資本家沒有可能關閉已實施工人監督的企業（實行他們原來的計劃），便拍賣原料和器材，俾便引起企業停頓和失業；拖延發放工人的工資；並與銀行締結協定，來破壞工人監督，取消這些企業的貸款和停止對他們自己活期帳戶的付款。

在十二月下半月所舉行的烏拉爾礦產工業家大會，曾提議對已建立工人監督的企業用完全停止付款的方法，以破壞工人監督。大會的議決案中說：工人監督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從管理方面來說，等於是適合於工廠倒閉的一種反作用。但是因爲生產之事實的停止，保處於管理權之外，所以爲了保留後者，唯一的方法是付款的停止了」^②。

因此，雖有監督，而商業銀行還曾提議在加害無產階級的國家上利用人民的錢。

對銀行監督實行的不充分，對蘇維埃政權的影響很快的顯示出來了。銀行的怠工不僅以繼續資助反革命

^①參看里夫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準備和進行時期的財政和信用，一九三九年，六二——六三頁。
^②根據真理報引證（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五號）。

來威脅，並以破壞工業中的工人監督來威脅。經過了十天，對這種措施的結果會有如下的估價：

爲了監督的實行，我們要號召他們，號召銀行的小職員，並和他們共同完成措施，使他們同意這種措施，以便在完全的監督和負責下獲得貸款。而在銀行職員接近人民利益的這些人中間，更要說明，「他們在欺騙你們，你們要趕快與他們罪惡的直接加害你們的活動絕緣」。

列寧說：「我們希望根據同銀行協議的途徑進行，我們放與他們資助企業的貸款，但是他們卻實行前所未聞的大規模的罷工，事實迫使我們要以另外的措施實行監督了」^①。

這種另外的措施便是銀行國有化。

第四章 關於蘇聯銀行國有化的法令及其意義

資產階級對於工人監督的實施，曾以罷工、組織反革命的陰謀和反無產階級專政的武裝進襲作回答。其結果，蘇維埃政權勢不得不縮短工人監督的期間，於短促的時間內實行布爾什維克經濟綱領中所預示的銀行和工業的國有化了。列寧說明加速使銀行和工業向國有化過渡之反原提議的原因，說道：「我們曾經向資本家提議：『你們要服從國家的調節，要服從國家的政權……』——」處置關於我們自身存在問題的就是我們。政策要使資本家所接受，他便須是推動我們去作殊死的和殘酷的，迫使我們實行對舊的關係，比我們所預想的更無量大的破壞的鬭爭」①。

談到銀行，在銀行家和高級職員們在銀行中對工人監督的怠工，用列寧的話來說，已是「從未曾有的規模」。因此便縮短了對銀行監督的期間，加速了實行銀行國有化的過渡。

因私人銀行方面對工人監督之頑強的反抗，已經進於對黨的政綱要求——銀行國有化，要強力執行的必然性。首先提出銀行國有化問題的真理報曾指出，「全俄怠工廠主的參謀部，如同安處在鞏固的基礎上一樣，依然安處在掠奪人民財富的銀行之無監督的支配上。政權向工農手中的過渡，已建立了對工業和銀行的工人監督。但是這種監督還是不夠的，因為被無數的私人銀行和銀行家事務所，資本家和銀行家，乘機利用

① 列寧全集二十七卷，六三頁。

以迴避責任，尤有甚者，他們更曾用盡一切方法破壞國家銀行的工作」^①。

商業銀行被工人、士兵和海員們的武裝部隊的佔領，已先銀行國有化的法令而行了。其所以要如此作的原因，是使資本家沒有從銀行將現款和有價證券提去的可能。列寧說：

「我們所作的，多半不是像調和派所推崇的：開始先期待立憲會議，然後可能再作成法案和將其提到立憲會議，藉此向有產者先生們宣佈我們的意向，俾使他們，如同由他們逃避一種不愉快的事物一樣，能够逃亡……我們的行動很簡單，……我們說：——我們有武裝的工農。他們應於今天清晨，佔領一切私人銀行；……並且當他們如此作了之後，政權既已握在我們手中，我們再來考慮，我們要採取何種措施」^②。

後來在攫取銀行時被揭穿了的德日法西斯主義間諜比雅達考夫，曾以教唆的言論表示，在將國家銀行掌握了之後，不需要再去攫取私人銀行，蘇維埃政權可以用停止付現鈔的方法使他們完全屈服。從而，比雅達考夫是想要使銀行仍保留在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的手中。

黨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很快的即將這類「理論」的敵意性質揭穿了。首先即組織了對銀行的武裝佔領，此後，布爾什維克黨才實現了銀行國有化，亦即將銀行轉渡到蘇維埃國家的手中」^③。

歷史判定了布爾什維克黨在銀行方面這一政策之最大的智慧，並且證明，政治的真理是屬於列寧和斯大林方面的，而不是屬於比雅達考夫及其他企圖破壞銀行國有化的人民的敵人方面。

彼得堡（最大的銀行壟斷者都集中於此）的私人銀行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早晨被佔領的。武裝部隊早晨七點鐘即將銀行包圍了。為使銀行不能彼此發生聯繫，他們之間的電話線都被截斷了。到正午十二

時所有彼得堡的私人銀行便都落在蘇維埃政權的掌握中了。

蘇維埃政府的代表首先要管理員即刻將金庫和倉庫的鎖匙交出。當時管理員或銀行行長表示反抗。他們便在這種場合遭受逮捕。在莫斯科十二月二十八日私人銀行亦落在蘇維埃政權的掌握中了。在各省，根據國家銀行各分行的電訊消息判斷，私人銀行的估領是在稍後一個時期——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二十日之間實現的。

銀行的高級和中級職員曾以宣佈罷工回答私人銀行的估領。第二天銀行職員（除低級的外）們便未到行辦公。在彼得堡，私人銀行祇爲工廠作坊委員會的支票的支付，於十二月三十日開了業。但未作任何其他業務。除低級職員外，銀行中過去的事務員，根據股份銀行委員會的決議，應該是保管布吉勞維伊和里雅布諾斯基的財產的。支票曾依照銀行代表的決定支付了，但在技術上業務是要由過去事務員自己所完成的。當然，後者之如此作，絕不是爲了表示爲蘇維埃政權服務。

莫斯科蘇維埃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曾召集了一個過去私人銀行職員大會，在大會上號召職員停止罷工，開始到國有化了的銀行去辦公。低級的和大部份的中級職員對蘇維埃政權的號召表示擁護；高級的和壓倒多數的中級職員則繼續怠工。過去的莫斯科私人銀行，亦如彼得堡一樣，每日祇爲工廠作坊委員會支票的支付開業二——三小時。

對於實行私人銀行國有化的準備的實際措施，不僅表現在發行的國家銀行的掌握和工人對銀行監督的建立上，並且還表現在關於銀行國有化法令之精密的考究上。列寧在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亦即於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祇不過幾天所寫的「告人民書」中，已經指出，關於銀行國有化的法令在準備中。

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人民委員會的會議上，在列寧的領導下審議了關於銀行國有化與歸併的法令，並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予以通過。在會議上列寧指出，銀行巨頭們欺騙了蘇維埃政權，撕毀了與他們所締結的關於對私人銀行工作監督法規的協定，逼使蘇維埃政府即速握取銀行，尤其是要根除他們指導者的罪惡的活動。資產階級的奴僕——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曾企圖破壞關於銀行國有化法令的通過。門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的代表亞維洛夫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曾以煽惑性的抗議出來反對法令。他提議：「先要作出具體的方案，製成計劃，指示出方法，罷致有學識有經驗的專家，然後再來實行銀行國有化」^①。

列寧曾經揭穿了這種敵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企劃的煽惑。他說道：

「我們知道，這（銀行國有化——著者註）是一種複雜的措施。我們中間的任何人，即使是有經濟教養的人，也並無把握去予以執行。我們歡迎作這些事的專家，但是祇有在將鎖匙握在我們手中的時候才行。那時我們甚至懂得從過去的百萬富翁去記取勸告。誰想工作就請留在這裏，祇要不將一切革命的動機曲解為死的字眼，我們是不會上當的」^②。列寧強調的指出，現在不將法令批准，會使銀行將經濟雙重改造的一切措施破壞。

法令的實行是迫切的，換言之，對我們的反抗和罷工正在毀滅我們^③。法令曾以壓倒多數的投票通過了。門什維克國際主義者集團則投了棄權票。

① 列寧全集二卷，五五頁。② 工農政府報三四號，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③ 列寧全集二卷，一四三頁。④ 列寧全集二卷，一四三——一四四頁。

列寧所完成的關於銀行國有化之歷史性的法令，曾如此決定了國有化的任務和與其相關的措施：

「爲了國民經濟合理組織的利益，爲了銀行投機澈底的根除和工農及一切勞動人民，從銀行資本剝削下全面解放的利益，爲了真正爲人民和貧苦階級服務的統一的俄國共和國人民銀行職員培養的目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規定：一、銀行事業宣佈由國家壟斷。二、所有現存的私人股份銀行和銀行家營業所都與國家銀行相合併。三、清理企業的借方與貸方統由國家銀行代辦。四、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合併細則，另以法令訂定之。五、將私人銀行事務移交國家銀行委員會暫行管理。六、小存戶利益全部予以保障」^①。

法令規定了國有化，即是將銀行從資產階級的手中取來轉渡到蘇維埃國家。即如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日人民委員會的決定，國有化會擴展到國內一切私人的信用機關：股份商業銀行，銀行家營業所，相互信用社和股份土地銀行。同時法令更規定了銀行事業之國家的壟斷，亦即對銀行事業的實施，對銀行的改組或肅清，對新的銀行的創立之國家的特權。國家對銀行事業的壟斷即表示，在資本主義社會懷抱內以銀行面目所創立的清算與監察機關，貨幣財富的動員和再分配機關，完全集中在蘇維埃國家的手中。銀行事業的壟斷，使蘇維埃國家解脫了資產階級用新的私人資本主義銀行代替國有化了的銀行，以破壞銀行國有化和國家信用機關的活動之可能的一切企圖。

銀行事業在國家手中的壟斷，與銀行的國有化具有不可割裂的聯繫。在對銀行之私人資本主義所有的保存下，國家便無法實現銀行事業的壟斷。另一方面，銀行國有化，沒有銀行事業之國家的壟斷，亦祇是一半措施。假如國家不宣佈其對銀行事業的特權，資本家及其走狗便會使銀行國有化歸於無有。因此，法令的兩個

① 二十年的蘇聯的貨幣流通與信用制度，三頁，一九三九年版。

基本立場——銀行國有化和銀行事業國家壟斷的宣佈——是有不可割裂的聯繫的。

法令曾經規定銀行國有化的實現，要經由過去的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的合併。同時，法令更實現了列寧關於許多獨立的私人銀行歸併為統一的人民銀行的必然性這一指示。

銀行的歸併及其從屬於統一的中心，亦即銀行的集中化，乃是在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狂暴的反抗情況下，實行國有化的必然條件，便利了銀行事業國家壟斷的實行和就地對銀行工作的領導，奠定了實現列寧計劃的基礎，而以銀行面目創立蘇維埃國家對生產和生產物分配之集中化的機關。

與過去的私人銀行相聯合的國家銀行，即如法令中所指示，即是所謂共和國的人民銀行。

關於指示反對財閥們的銀行法令，曾經強調，在任何措施下都不會觸犯到勞動者的利益，並且他們也不會從銀行中得到自己的積蓄。列寧在擬訂關於銀行國有化的國家法令時即已寫道：「任何一個勞動者和工人，不會失掉一個銅板；反之，還會對他們有幫助」^①。

與銀行國有化法令的同時，還通過了一個檢查銀行保險箱的法令^②。根據這一法令，保險箱中所儲藏的一切貨幣，都要存入國家銀行中顧客的活期帳戶上，而金幣和金塊則予以沒收和撥充國家的黃金準備。銀行的保險箱曾是資產階級資本的禁地。在保險箱中可能匿藏着，從課稅，從貸款，從債權者的遠見所獲得的收益。在資本主義社會成爲「祕密的」那種收入和收獲的源泉，也都存在保險箱中。大量的有價證券已照資產階級的指示運往國外。然而，在保險箱中還存留了不少的財物和貨幣。是的，祇是在莫斯科一個地方，在檢

① 列寧全集二卷，五五頁。② 「關於檢查銀行保險箱的法令」係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通過的。（參看「蘇聯的經濟政策」，國家政治出版局版，一九四七年，五〇頁。）

查保險箱時即發現有：黃金三〇〇、〇〇〇盧布，白銀一五〇、〇〇〇盧布，許多的外幣及信用券有四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國家和私人有價證券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將款從保險箱轉到銀行的活期帳戶，便給了一種可能，使從銀行支付資本家在保險箱中所匿存的現鈔，須服從一般監督的法規。保險箱的揭露，使能更正確的決定課徵資本家賦稅的標準。最後，金幣和金塊轉渡為國家的金準備，便增加了蘇維埃國家的準備金，而剷除了資產階級用以反對革命的一種財源。彼得堡銀行保險箱的檢查是一九一八年一月四日開始的。事前曾宣佈了人民財政委員長門紐斯基的命令，以沒收全部保險箱內容的威脅，要保險箱據有者於三日期內呈出檢查。過去的銀行董事會遵照股份銀行委員會的訓令，「協助」蘇維埃政權進行保險箱的檢查。他們的義務，正如銀行委員坦率的表示，在於對保險箱所有者利益的維護，希望從布爾什維克一切可能中拯救出來」。

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銀行保險箱的檢查，於一九一八年四月初便結束了。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銀行國有化的法令，將銀行轉渡到了國家手中，而並未沒收銀行的股份資本，亦即實現了私人銀行國有化的第一個階段。而資產階級則喪失了享受銀行股票收入的可能，因為根據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列寧所簽署的人民委員會的法令，一切私人企業的股票和股份的紅利均被停止發付，此外，並禁止有價證券的買賣。私人銀行股份資本的沒收，便是私人銀行國有化的第二個和完成的階段。

①新道路雜誌一期，一九一八年，五六頁。

②在檢查保險箱法令公佈後，很快的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即繼續公佈了人民委員會關於各種黃金買賣，除飾金製成品外，概由國家壟斷的法令。

③命令是在彼得堡蘇維埃消息報二五八號發表的，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

④「股份商業銀行代表大會及其機關報活動概觀」，一九一八年，一一四頁。

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開始掌握了銀行，社會化了銀行事業，宣佈了銀行的國家壟斷，而後則割斷了銀行與資本相聯繫的最後聯鎖。

根據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人民委員會的法令，過去私人銀行的一切股份資本，根據全部沒收的原則，均移交於國家銀行，亦即實行了銀行資本私有的沒收。所有銀行股票，完全無限制的宣告無效。股票持有者在財產沒收的威脅下，應即刻將股票交給國家銀行的分行。因此過去股份銀行與資產階級相聯繫的最後的一條線，便被斬斷了。關於銀行國有化及其股份資本沒收的法令之執行的結果，銀行已成了人民的財產——全民的國家的財產。銀行股份資本的沒收和銀行股票的宣佈無效，蘇維埃政權一下子和永遠的完全消滅了資本家依銀行事業和有價證券獲取收入的權利。銀行股票的宣佈無效，即表示銀行家對銀行資本和利潤所有這一名稱的廢棄，實現了國家信用制度對外國依屬的解放。握有俄國商業銀行大部份股權證書的西歐的財閥們，已喪失了以銀行股票的紅利形式汲取蘇維埃俄國的人民收入的可能。

銀行股票的廢棄，使銀行業務的收入轉渡到蘇維埃國家的手中，這筆收入現在便可以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上和防禦國內外敵人的國家防衛上了。

在銀行股票宣佈無效之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即刻公佈了關於包括沙皇政府和臨時政府時代所有國家公債宣佈無效的法令（一九一八年二月三日由斯沃爾特洛夫簽署）。

到偉大的十月革命時期，國家的債務已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內債為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外債為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外債的取消對於從外國財政資本壓迫下國家的解放，具有極大的意義，俄國的工農每年曾以奴役式的信用利息形式，付予外國的財政資本達一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內債的取消已從人民的肩上卸去了償付握有大部份內國公債券的「民族」資產階級利息的重荷。因為國家公債的取消，蘇維埃政權便獲得了一種可能，能將巨額的金錢（過去存在外國的和俄國的資本家口袋中的金錢）用在偉大的歷史使命的執行上——社會主義建設和國家防衛上了。蘇維埃政權不僅對作為銀行存款者保護了勞動者的利益，並且還作為有價證券的持有者保護了勞動者的利益。關於國家公債宣佈無效的法令，曾經規定，凡握有內國公債券為數不超過一〇、〇〇〇盧布的小有產國民，一律償還^⑥。

銀行國有化的法令已擴張到國內的一切私人銀行。然而股份商業銀行的國有化卻具有決定的意義，因為這種銀行會是俄國信用制度的中心環，俄國的和外國的財政資本的支點。

股份商業銀行的國有化，第一、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力量的粉碎；第二、對於蘇維埃國家的創建工作，亦即對於社會主義的建設，都有極大的意義。

列寧會將銀行國有化，列為「不僅實行從土地形式上消滅俄國的地主，並且為了根絕資產階級統制和資本對成千萬的勞動者壓迫的可能的第一步措施之一」^⑦。在資本家的手中還保留了很多的生產手段，但在銀行的面目下，他們卻喪失了自己經濟生活的中樞神經，貨幣資本的聚散中心，投機和利得的槓杆，財政供應的源泉和流動信用的支持。銀行國有化粉碎了俄國資本的經濟勢力。斯大林總結無產階級專政三週年報告說道：

「在國家管理的經濟範圍內，最典型的是將資產階級的經濟生活的中樞神經——銀行，從資產階級手中

^⑥一九一八年二月三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法令——見「蘇聯的經濟政策」，六九頁。
^⑦列寧全集二卷，二一四頁。

剝去了。銀行被從資產階級的手中剝去，即是說，資產階級已是無靈魂的殘骸了」。

、銀行的國有化切斷了經過私人銀行對反革命的資助。從此，發行的國家銀行的掌握和私人銀行的國有化，摧毀了反革命國內的財政基礎。（我們要注意國內的這個字，因為資產階級爲了反革命財政的供應曾從外國帝國主義取得了金錢，要使蘇聯的人民受帝國主義的約束而降服爲殖民地的奴隸。）

私人銀行的國有化給予了監督、調節和限制私人資本的可能，在蘇維埃國家當前的階段上，私人資本的完全消滅還是不可能的。他經過信用和現鈔支付等調節的方法對資本主義企業的影響，爲國家創立了必需的條件。銀行國有化經過資產階級銀行中活期存款之照規定的支付，將保險箱中的存款移存於活期帳戶，根據銀行的材料爲對其課徵賦稅，資本公司收入實際數量的揭露，便容易了對資本公司收入的監督，而得以限制這種收入的支配。

股份銀行的國有化與一切外國公債宣佈無效相併行，給了國際資本以嚴重的打擊，股份銀行曾是對於國際資本在俄國的最重要的支柱。工業國有化的結果，外國資本在俄國的壓迫，便被完全的和不可復活的肅清了。

蘇維埃政權，宣佈銀行事業歸國家壟斷，沒收銀行資本，宣告銀行股票無效，便一次和永遠的切斷了外國資本經過「參加」俄國銀行，而獲得取償於俄國工農剝削的鉅大利潤的可能。因此，股份商業銀行的國有化，不僅對於摧毀俄國資本家的統治具有本質的意義，並且對於消滅外國財政資本的壓迫亦具有本質的意義。

銀行國有化顯著的擴大了蘇維埃國家對國家的國民經濟發生影響的可能，特別是，促進了工人監督的加強和工業的國有化。他曾將工業控制數的股權證書和屬於商業銀行的聯合轉渡到國家手中，加強了工人監督的意義，保證了那已經建立了工人監督的工業的信用，而對於國有化了的企業得許與優先的財政的支持。

銀行的國有化便利了由蘇維埃國家對國家貨幣流通調節的可能。第一、經濟的貨幣源泉已集中在唯一的國家銀行；第二、資本家不能不受監督的處理自己在銀行活期帳戶所存的貨幣資金；第三、對於企業信用放款的監督已是可能的，從而對於貨幣流通的調節同樣具有本質的意義。掌握了國家的發行銀行，國有化了私人的商業銀行，工人階級便將貨幣——資產階級社會的利器，握在自己手中，而將其用於革命的職務上了。商業銀行的國有化，已從根本上根絕了破壞蘇維埃政府與飢荒和崩潰作鬪爭的措施之銀行商品買賣的非法投機。此外，因為全國銀行的國有化，獲得了重要必需品（糧食、糖、棉花等）的補充準備，資本家曾將這些必需品儲藏在銀行的倉庫裏，俾便增大市場上商品的缺乏和以此來維持價格之無限度的增漲。

銀行國有化，與工人對生產的監督和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創設相併行，乃是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最重要的前提。

銀行國有化使蘇維埃國家得從銀行取去其在資本主義下勞動剝削工具和企業投機工具的一切性質，而開始使銀行轉變為對生產和分配，對國家經濟生活之一般國家的監督機關。

銀行國有化即表示，蘇維埃政權已掌握了一個國家經濟的決定性的司令臺。

銀行國有化並非孤立的執行的，而是在與這種最主要的經濟措施的聯繫中執行的，如：土地國有化，工

人對企業監督的建立，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創設，以及後來的，大工業、商船和對外貿易的國有化。銀行、土地和工業的國有化創立了對國家主要生產手段之國家的社會主義所有制。

第八次黨的大會所通過的俄國共產黨（布）政綱，對於股份商業銀行國有化的意義有如下的界說：

「避免巴黎公社的錯誤，俄國的蘇維埃政權即刻握取了國家銀行，然後實行私人商業銀行的國有化，進而使國有化了的銀行、儲金局和國庫與國家銀行相合併，如此便創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唯一的人民銀行的雛形，將銀行從財政資本經濟統治的中心和剝削者政治統治的武器，變為工人政權的武器和經濟改造的槓杆」^⑩。

⑩「代表大會，代表會和中央擴大會議議決案和決議中的聯共黨（布）」五版，一冊三〇二頁。

第五章 關於銀行國有化法令的實際執行

第一節 商業銀行國有化實行的第一個時期：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月

當掌握經濟司令臺和鎮壓剝削者反抗成爲主要任務時期，蘇維埃政權即開始實際執行銀行國有化及其與國家銀行合併的法令。這個時期，列寧稱爲「赤衛隊對資本的突擊時期」，是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迄一九一八年二月止。

銀行的國有化與合併曾經通過非常艱鉅的條件。在這種初次實行的複雜措施的執行上沒有任何的經驗，而忠於蘇維埃政權的銀行專家又少到極點。資產階級及其走狗之狂暴的反抗曾經予以克服。最後，因軍事行動的結果，銀行國有化的工作曾被中央與地方間之壞的聯繫所困擾。所以在這個時期，關於商業銀行國有化法令的實行，在重要的程度上是允許地方自主的。照例，在地方上處理這種工作的，並不是人民銀行的分行（亦即過去國家銀行的業務局和分行），而是代表蘇維埃、財政機關和國民經濟蘇維埃的領導者。過去的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的業務和帳戶合併的細則，還不曾擬定。過去私人銀行的利用，其與國家銀行的歸併和清理工作，曾同樣採用了各種不同的方式。在某一個城市，過去的私人銀行執行了業務，而在另一個城市，則很快的即開始了過去的私人銀行業務和帳戶與國家銀行業務的合併；祇有國家銀行的分行辦理活期帳戶款項

的支付和信用，而過去的私人銀行則進行清理工作；在第三個城市，過去的私人銀行祇辦理活期帳戶款項的支付，而信用則祇能在國家銀行中獲得等等。

在彼得堡，最初的兩個半月中間，過去的私人銀行曾辦理了活期帳戶款項的收付業務，但貸款的付出則祇由人民銀行的業務局（即過去的國家銀行）辦理。一九一八年一月末，在彼得堡成立了四個人民銀行的分行，這四個分行應將過去私人銀行的一切帳戶和業務，都集中在自己手中。這些分行是屬於人民銀行彼得堡業務局的。首先決定將活期帳戶統一起來，因為對於企業和小存款者活期帳戶款項的支付，應該是無間斷的辦理的。此外，活期存款帳戶的集中化，便保證了對款項付出更精密監督的可能。但是，因有職員的怠工，致活期存款帳戶的合併被延緩了。過去私人銀行活期帳戶的帳簿，於二三月間即分配於四個人民銀行的分行。過去私人銀行活期帳戶的付款業務便停止了。這時他們的責任祇是準備將業務進一步的歸併和清理工作了。其初活期帳戶祇是機械的合併到人民銀行的四個分行，因為企業和個人在各個銀行中的帳戶，並不會歸併為一個某一企業或個人的帳戶。其結果，支付任何機關的款項，就須先查看幾個銀行的帳簿和作出一個共同帳戶的結數。祇是到四月末，活期帳戶之有機的合併纔實現：最後被矯正過來，某一企業在幾個私人銀行中的活期存款帳戶，便被合併於人民銀行某一分行的一個活期帳戶之中。人民銀行的分行數目也已增加了。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在彼得堡已經有七個人民銀行的分行。除了對活期帳戶的收付款外，從五月起即開始貸放款，——最初祇對糧食機關，而後則對工業放款。於怠工停止後參加工作的行員即被分配到人民銀行的各分行。在過去的各私人銀行中祇留下了對清理工作所需要的職員。

在莫斯科，過去的私人銀行差不多就沒有辦理活期帳戶的付款業務。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過去私人銀

行的代表會議上，曾經決定於最短期間內要將所有活期帳戶合併於一個銀行之中^①。到一月十七日所有莫斯科私人銀行活期帳戶的帳冊和卷宗，便被集中到一個銀行，這個銀行即名為人民銀行的莫斯科分行。這個分行曾設有自己的臨時管理處，而並不屬於人民銀行的莫斯科業務局（亦即過去的國家銀行）。人民銀行莫斯科分行是一九一八年二月初根據莫斯科蘇維埃的財政部的決定成立的。臨時管理處曾受命將過去私人銀行的業務和帳戶，實行更進一步的合併，並將業務歸併於人民銀行的分行之中。

在一二月間，莫斯科分行祇是由一個活期帳戶的總處所組成，這個總處即辦理了活期帳戶的收付款^②。和在彼得堡一樣，貸款是由人民銀行的業務局辦理的。同一個顧客的活期帳戶便被合併記入於一個統一的帳戶。這一工作直到一九一八年的五六月間始告完成。人民銀行莫斯科分行從三月間開始，不僅將活期帳戶集中在自己手中，並將過去私人銀行的其他業務亦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結果，莫斯科分行在一九一八年四月，除了活期存款部外，還有下列各主要部門：倉庫和貨物部，交換貸款部，債券部，匯兌部，信託部，會計和經濟技術部。

①代表會議通過了下列的議決案：「一、我們的目的是要盡可能的用多數部門統一的方法使一切銀行完全集中化。二、雖人員數量十分缺乏，這一措施尚適合使活期帳戶業務集中化的工作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六（三）日完成。所有帳冊、文卷和通信部移交於一個銀行（見蘇聯財政部總文獻過去私人銀行代表會議記錄）。②過去私人銀行其餘的業務，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銀行代表的會議上曾通過如下的決議：「一、除活期帳戶業務外，一般新的業務概不經營。二、在特殊情形下，准許商品提取和匯兌支付個別的業務。三、在辦理此種業務時，一切形式須嚴格執行。四、在商品提取時須取得糧食機關或州議會的證明，這些商品是供給消費，而非供給轉賣商。五、匯款數萬圓以內者支付」。〔見蘇聯財政部總文獻，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過去私人銀行代表會議記錄〕。

莫斯科過去私人銀行的一切業務帳戶的合併，是由臨時管理處到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纔完成的。但是，這種業務的合併，因由銀行專家中叛逆者的活動，曾是鉅大程度的帶有形式的和機械的性質：過去私人銀行的文卷和帳冊都被移到一個地方，並按照附有這些文卷屬於那個銀行的標誌分列於各個不同的櫥櫃中。資產階級的專家們在期望，銀行國有化將是『暫時的』，他們所關心的是，過去私人銀行的事業可能永遠不會泯滅。

與過去私人銀行歸併的同時，人民銀行莫斯科分行的臨時管理處曾辦理他們的資產的清結。這一工作的進度，據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狀況，由下列數字足以說明：

據上表很顯然的，在貸放方面負債的追還進行得非常緩慢。在商品抵押貸款方面的負債的清結之較高的百分比，乃是將抵押在銀行裏的許多商品徵用和轉讓於糧食委員會和國民經濟蘇維埃之結果。而後者即根據他們對照表的估價，將被徵用的商品的價值撥還給人民銀行了。

臨時管理處爲了顧及與顧客聯繫的業務，曾於一九一八年四五兩月中成立了九個市區支行。除了活期帳戶的收付款和匯兌業務外，這些銀行支行還同樣辦理了企業的信用貸款。是的，據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狀況，經由人民銀行莫斯科分行臨時管理處貸款總數計九、二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用商品擔保的活期貸款佔六、九〇〇、〇〇〇盧布，商品

業務種類	191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莫斯科私人銀行信用借債 (單位百萬盧布)	1918年五月一日 狀況追還的信用 (單位百萬盧布)	追還數對1917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借債的百分比。
票據交換	948.9	18.3	2
商品抵押貸款	273.4	26.9	10
活期貸款	789.0	0.7	—
總計	2011.3	45.9	2

抵押短期貸款佔九〇〇、〇〇〇盧布），而經由莫斯科業務局貸款的總數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上。

從而，在幾個月中間，在莫斯科曾存在着兩個差不多彼此無關的銀行：人民銀行的業務局，即過去的國家銀行及由過去私人銀行聯合而成的人民銀行分行臨時管理處。這兩個銀行都有各自的市區支行。臨時管理處係經過莫斯科業務局獲得貨幣的支援。所有其他的問題，莫斯科分行的臨時管理處則直接與人民銀行的總管理處發生聯繫，而並不從屬於莫斯科業務局。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間，人民銀行莫斯科分行的各支行纔成爲莫斯科銀行業務局的支行，而特殊的臨時管理處纔被取消。

因此，縱使在兩個首都城市，在關於銀行國有化的法令宣佈之後的最初幾個月中，對於過去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的合併就有不同的作法。在彼得堡，將過去私人銀行業務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人民銀行分行，一開始就成立了人民銀行（過去的國家銀行）彼得堡業務局的支行。在莫斯科，開始是聯合過去的私人銀行，將他們變爲獨立的和差不多與莫斯科業務局完全沒有聯繫的信用機關，而後，差不多經過了一年纔將他們歸併了。在各地方過去私人銀行的歸併實行得尤不一致。我們現在將一九一八年上半年過去的七個省中關於銀行歸併

①人民銀行分行臨時管理處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的消息報上發表了一個聲明，在聲明中通告一切機關和銀行的顧主：在莫斯科的過去的私人銀行已被清算，一切任務均已移交蘇俄人民銀行莫斯科分行的集中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日後，一切由各該行過去代表簽署的票據文件，即喪失效力並將認爲無效。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人民銀行莫斯科分行臨時管理處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書中說道：「過去私人銀行的清理現在已告結束，一切事務已均移交到蘇俄人民銀行莫斯科分行。臨時管理處已圓滿的結束了」（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②見國民經濟雜誌八——九期，一九一八年，二一頁，人民銀行莫斯科分行臨時管理處總結報告。

的工作組織的報道來加以申述。

一、在卡薩恩、別爾莫和雅洛斯拉佛，在銀行國有化後，差不多很快的就實行了過去私人銀行分行業務與國家銀行業務的合併。在別爾莫，過去私人銀行的活期帳戶、存款和匯兌，都合併到國家銀行地方支行的活期存款部了。後來，同樣將貸放業務歸併到國家銀行的交換貸款部了。從二月起一切業務便祇在國家銀行辦理了。過去私人銀行的分行則祇辦清理工作了。在卡薩恩，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以前，過去私人銀行因銀行職員的罷工會一度關門。從二月一日起職員們復工，便即刻遵照代表蘇維埃財政部的決議，開始將過去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實行合併。代替過去私人銀行七個分行被保留了三個為人民銀行分行。其餘的四個分行即將活期帳戶的帳冊和文卷移交於此三個分行，他們便作為國家銀行的分行而開始工作了。在雅洛斯拉佛，曾由三個過去私人銀行的分行，組織了一個國家銀行雅洛斯拉佛支行的「分部」，從而，貸放業務都被集中在國家銀行的分行，「分部」則祇辦理了活期帳戶的收付款。

二、在下諾夫高羅和沃倫涅日，最初過去私人銀行的分行一如「過去的私人銀行」一樣，還在舊的地方和遵照舊的領導繼續工作。對他們祇規定了由代表蘇維埃的專門代表實行監督。直到地方蘇維埃曉得了這種監督還不够，和銀行官吏們在欺騙蘇維埃政權的代表之後，纔開始實行過去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分行的合

⑤見別爾穆關於銀行國有化的報告書，——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⑥人民銀行卡薩恩業務局代表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六日致

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報告書中寫道：「縮減卡薩恩銀行分行數目的決議曾經指出了他們的狂妄，因為有兩個分行——莫斯科銀行和彼得堡國際銀行的分行——是在戰爭期間開業的，他們曾以最大的熱望在大量貨幣的巨流上投機取利」（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⑦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併。

三、在維捷布斯克和奧林堡，蘇維埃的財政部將過去私人銀行分行的一切業務都停止了，對於與顧客聯繫的業務，祇保留了國家銀行的地方支行，而銀行歸併及其業務的清理任何工作都不會進行。在維捷布斯克最足以解釋這種情形的是，在那裏私人銀行職員的罷工會繼續到一九一八年的七月。

在第一個時期——剝削者的剝削時期，在各地地方對實行銀行國有化與合併的工作，所採取的各種不同形式之極不完全的概況即是如此。這些新的信用制度組織的各種不同形式，在證明關於銀行國有化與合併之正確途徑的探索。蘇維埃政權第一個在歷史上實現了銀行國有化。自然，在這種複雜的事業上，還沒有過任何

③在國家銀行下諾夫高羅業務局的報告書中率直的話說，實行銀行合併並非一蹴而成，因為還沒有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指示：「因爲在法令（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頒發）中指示，關於其實際執行的詳細訓令容後補充，茲決定在訓令未到以前，祇設立銀行代表的監督，這種監督亦是受各個信用機關的地方政權的指揮的。各地方銀行的工作，在代表監督之下，曾維持到本年的三月」。但是監督並未達到目的。代表不懂銀行事務的技術，銀行的高級職員欺騙了他們。因爲這樣，下諾夫高羅的執行委員會未等接得訓令即決定進行銀行的合併。自三月四日至四月四日這個期間，過去的私人銀行都停業了。國家銀行的業務局則經營了一切業務。過去私人銀行中的職員們，在代表的領導下曾準備了銀行業務和帳戶的合併。到一九一八年四月四日合併完成，從而便實現其下列的形式：「所有各行的活期帳戶和存款業務都由我們歸併於一個分行和集中在過去俄羅斯工商銀行的舊址；交換委託業務和臨時貸款（票據抵押和有價證券抵押）業務集中於沃爾日，卡羅斯基商業銀行的舊址；所有商品業務都集中於過去俄羅斯對外貿易銀行的舊址；最後，在庫別克銀行原址則成立了匯兌委託部和清算課。因此，構成一個具有責任分行的普通銀行機關的其他業務，則保留在中央業務局（過去的國家銀行）……規定新的分行要以獨立的對照表保存銀行之獨立的而對人民銀行下諾夫高羅中央業務局負責的分行形式……交換委託和商品業務的集中，使我們得以無阻礙的進行已國有化的銀行資產的清理」。（見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報告書，「論下諾夫高羅銀行國有化的進度」——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的經驗。在關於政府銀行國有化法令實際運用之正確途徑的探索上，曾經賦予了地方的勞動代表蘇維埃和財政機關以革命的自發。探求正確的途徑具有很大的困難，不祇是因為這是銀行國有化的第一次經驗，並且是因為銀行的職員仍在聽從他們過去的銀行主人的命令，在用種種方法阻撓國有化。

蘇維埃政權實際執行銀行國有化的法令，勢不得不逐步的克服資產階級及所有他們的忠實信徒們的頑強的反抗。

資產階級及其忠僕們反對銀行國有化之殘酷的鬭爭，即顯然的證明蘇維埃政權給與資本以如何沈重的打擊，同時商業銀行——財政寡頭的要塞——的國有化，給與這個國家經濟最重要的司令台以如何致命的創傷。此所以資產階級對銀行國有化的反抗要採取那樣激烈的形式了。

敵人在反銀行國有化的鬭爭中曾採用過各種的方法。在資產階級及門什維克的出版物中對蘇維埃政權之措施的誹謗，銀行職員的怠工，蘇維埃政權延攬執行銀行國有化複雜工作的資產階級的專家之加害政府的行為，企圖經過對行員收買而從銀行提款等等，所有這一切活動都採用過了。

資產階級及少數派的作家們曾經預言，銀行國有化會引致「貨幣流通，信用和一般經濟的瓦解」，並曾號召「要熟慮」和信賴資產階級的銀行。他們企圖恫嚇人民，曾經咆哮的說，銀行國有化的結果，「一切工商業生活將要麻痺，一切物價將會高漲」^①。這是在幾年戰爭之後所發出來的醜惡嘲笑的呼聲，但在戰爭期間，銀行卻正是對飢餓設機和對必需品高擡物價的首席搶劫犯。

國家銀行和私人銀行職員的怠工，曾是由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所把持的信用機關職員職工會的組織

① 門什維克機關報今日，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銀行勞動社」領導的。在他們的背後掩護了怠工之真正的鼓勵者——資助怠工者的俄國和外國銀行主。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全俄鐵路臨時代表大會上，列寧說道：「同志們，我要談到關於怠工者，我們曉得怠工官吏們所住的地方，並於事前就領得了三個月的給養，里雅布諾斯基付過五、〇〇〇、〇〇〇，而英法帝國主義者和羅馬尼亞帝國主義者亦各付過此數。怠工就是這麼回事：這種被收買的人，高級職員所追求的祇有一個目的：破壞蘇維埃政權，雖說其中很多人還不曉得這點。怠工，乃是企圖恢復剝削者舊的樂園和勞動者舊的地獄的一種趨向」①。

在第三章中已經談到，垮了台的臨時政府的殘餘，曾最積極的參加了國家銀行職員怠工的組織，而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市議會亦會同樣參與了，在這兩個市議會中多數是屬於蘇維埃政權的兇惡的敵人——民主立憲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和門什維克。談到私人銀行職員的怠工，那直到一九一九年初還在彼得堡非法繼續存在的股份銀行大會委員會，即是其組織的中心②。

然而，怠工者中間見解的「一致」也祇是在初期。分裂很快的開始了，很多怠工者即動搖了。問題在於低級的和部份中級的職員是在高級職員和門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的信用聯合的威脅下，參加怠工的，或者簡單的是因為對職業倫理之虛偽的了解。他們明白了自己所作的錯誤，便復工了。最後來，又從怠工者中分裂出了一部份中級職員，他們曉得了，布爾什維克並不準備讓步，怠工的職員會孤立無援，即是說，怠工的繼續毫無益的。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大部份怠工者，在彼得堡向人民銀行，在莫斯科則向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團，提

① 列寧全集二卷，二四〇頁。② 一九一九年年底，股份銀行委員會在巴黎「復活」，組成份子是從蘇聯逃去的過去的銀行家和銀行高級職員，曾以各種形式從事讓惡的反蘇維埃的活動。

出了關於自己希望恢復工作的申請書^⑥。在一月末銀行職員的代表爲了交涉會去進見列寧。列寧在鐵路工人代表大會上談到這件事說：「昨天有這樣一件事：有位職業作家芬·艾腦台耶夫斯基向我表示，並代表五萬人聲明，銀行準備在完全服從蘇維埃政權下工作。我回答銀行職員的代表說：「早該如此。」我們同組織談判，銀行職員的這種組織或任何其他組織，我們都不拒絕，假如事實上這種對蘇維埃政權的承認，是大多數勞動者所承認的，不是在字面上，而是在事實上的話」^⑦。

雖說怠工的銀行職員中間發生了分裂，而怠工還繼續了兩個月——二月和三月。是的，大部份的職員（當然，主要的是中級職員）已於一月的下半月恢復了工作，但是資產階級所資助的許多中級的和所有高級的職員並不會停止怠工。祇是到三月中旬起，梁布諾斯基，布吉洛夫及其外國的同僚們明白了，怠工並沒有力量使他們的銀行恢復，纔對這種毒辣的措施停止資助了。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有蘇維埃政權代表參加的信用機關的職員大會，曾作了這樣的決議：A. 所有職員一律到銀行工作，B. 將現存的兩個信用機關職工聯合會「銀行勞動社」和「銀行聯合會」合併爲一，爲此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召集信用機關的職工代表大會^⑧。四月六日所有彼得堡銀行的職員都復工了。到四月二十日莫斯科銀行職員的罷工亦被撲滅了。有幾個城市（下諾

⑥莫斯科蘇維埃根據罷工者集團的請願書，作了如下的決定：「一、保證國有化銀行的職員的權利，盡可能的將過去去私人銀行的職員予以收容和使他們參加保證規程的擬訂……三、在過去私人銀行職員方面所提關於復職的建議，不與職工會進行商談，而與職員集團商談，因爲目前有兩個職工會（「銀行勞動社」和信用機關職員聯盟或「銀行聯盟」——亞特拉斯註）。……五、祇錄用過去私人銀行職員中在財政蘇維埃認爲在工作進行上所需要的一部份。其餘職員的要求俟與彼等進行商談後，提交主席團考慮……七、與過去私人銀行職員的商談祇根據他們關於期望復職的正式請願書，而並不答復私人所提出的這類請願書」（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六日莫斯科蘇維埃會議記錄，見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⑦列寧全集二二卷二四一頁。

夫高樂，沃羅涅日，雅洛斯拉夫里）過去私人銀行的職員罷了幾天工；其他的城市（卡薩恩，別爾莫）則於二月初即復工了。因此，資產階級及其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中忠實的武裝衛士們，以組織罷工，破壞銀行國有化的企圖，便遭受了完全的失敗。蘇維埃政權在最激烈的罷工，經驗的缺乏和幹部的極端不足的條件下，已經理解了爲國家經濟生活所必需的機關的訓練工作。

①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開始，大會延期召開。他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初召集的。大會通過了關於全俄銀行信用業職工聯合會組成的議決案。大會在他的通告中號召信用機關的工作者「參加與自己同等的無產階級對進攻國家的帝國主義去作猛烈的鬭爭」，並指出，必需「放棄狹隘的小團體政策和堅定的站在統一的革命勞動陣線的創立的觀點上」全俄銀行信用業工作者非常大會的議決案和決議，一九一九年，一頁。

第二節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九一八年春）銀行國有化

與歸併的實行

蘇維埃政權解決了社會主義革命第一個歷史任務——無產階級攫取國家政權和經濟司令台的任務，便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了。列寧認為，爲了已經獲得的勝利之組織上的鞏固，最大限度的利用由勃來斯特和約的簽訂所得到的暫時的喘息是必要的。列寧指出，對於社會主義的勝利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計算和監督的組織方面的工作，比剝削剝削者的進度極爲落後。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列寧寫道：「我們已經國有化的，沒收的和破壞的，比我們所能計算的多」^①。「須要鞏固我們已經掌握了的，我們佈告過的，規定了的，考慮過的，注重過的，——以堅定的形式鞏固日常的勞動紀律」^②。計算和監督的奠定必須是在這些目標上，因爲「祇有經過這種方法，纔能鞏固那從十月革命我們所達到的一切反對資本的經濟掌握和國民經濟各部門國有化的一切措施」^③。列寧會要求實行獨裁和嚴格集中化的原則，俾便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經濟領域的掌握。他曾堅持，在實行商業銀行國有化及其與國家銀行合併時，嚴格的集中化和獨裁，日常的計算和監督組織的實施。列寧賦予了銀行國有化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以鉅大的意義，而特別重視了銀行國有化法令的實際執行。

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初，因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從彼得堡向莫斯科遷移遲緩的原因，列寧曾致電人民財政委員長古考夫斯基說：

① 列寧全集二二卷五一二頁。

② 同書，四六四頁。

③ 同書，五〇〇頁。

「對你們到來的遷延極端憤慨。財政事務，銀行政策蒙受難以置信的損失。應歸你們負責。我堅持你們迅速的到來，對財政和銀行從速的整理」④。

列寧會堅決的要求達到銀行國有化和合併的徹底執行，自己甚至將這方面各個細小的問題都研究到了。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寧會有幾個通曉與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的工作者共同的研究了銀行政策和關於銀行國有化進一步實行的問題。列寧會對銀行合併的措施指出了下列具體的和戰鬪的計劃：

「一、編製在私人銀行中所得到的決算報告，在決算報告中應包括各私人銀行一切事務的清理。A.向各私人銀行先前的全體職員（根據國家銀行代表的權利得罷免若干人）提出最後通牒式的訓令，限於最短期間將銀行事務辦妥和編製總結形式的對照表，第一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第二是到營業的最後一天的。B.私人銀行履行決算編製和一切銀行事務的清理這種任務，其作業如同俄羅斯共和國唯一的人民銀行的分行一樣，而特別祇限於清理的目的，不再經營任何新的業務。

二、國家銀行的代表指導決算編製的一切活動。

盡可能的引進更多有經驗的助手，連國家銀行和私人銀行過去的職員亦包括在內」⑤。

因此，列寧要求在銀行合併工作和各地對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指示之無條件的執行上有最大限度的瞭解。列寧會對清算對照表和決算的編製，賦予了鉅大的意義，他認為，爲此從銀行過去的職員中吸受有經驗的專家是必要的。

根據列寧的動議，爲研討與銀行合併，他們資產的清理，信用和清算組織等有關的複雜問題，曾經引用

④ 列寧選集二卷一六二頁。 ⑤ 列寧全集三十卷，三七九頁。

了資產階級的專門人材。一九一八年四月初，在彼得堡人民銀行總管理處之下，便設立了一個「銀行國有化銀行事業理論家和實際家的專家會議」。這個會議的任務是實行關於銀行國有化法令的實際措施之細目的研討。在會議中吸收了約一百個專家，其中包括銀行過去的董事和行長，舊內閣的官吏等等。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該會議的擴大會議上，出席了九十七個人，其中：有三十三個是過去國家銀行各商業銀行和相互信用社的董事和行長；十八個是過去去財政部，信用事務司和其他部的職員；其餘的則是科學工作者，人民銀行和人民委員會的代表。在兩次擴大會議以後，「銀行事業理論家和實際家的專家會議」便劃分為下列幾部：組織部；工業和交通資金供應部；國內外貿易資金供應部；貨幣流通和國外業務部；「過渡時期」部；這個過渡時期部係處理合併前銀行工作臨時組織的問題。

這個會議及其各部曾工作到一九一八年的四月末。一九一八年四月三十日遵照人民銀行的命令，在彼得堡銀行業務局之下（因為這時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已遷往莫斯科）設立了一個以人民銀行總代表為主席的專家委員會。這一專家委員會係由十個人組成：彼得堡業務局和銀行分行的代表五人，過去商業銀行的領導工作者五人。專家委員會的責任是：第一、與蘇維埃俄羅斯人民銀行工作組織有關的問題的研討，第二、「過去私人銀行清理方面訓令的擬定和一切與清理有關的問題的研討」^①。專家委員會曾存在到一九一八年八月月中旬^②。在委員會的會議上，除了過去私人銀行領導工作者中的五個固定的委員外，還吸收了其他的銀行專家。

^①引自人民銀行總代表斯益德的命令——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②專家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被財政部正式命令解散（一九一八年開財政法令和命令選集，一九一九年版，四〇頁），事實上，專家委員會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下半月即已停止存在了。

一九一八年七月中旬，曾以專家委員會補助機關的性質，設立了一個研討特殊儲蓄帳戶性質問題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有個很長的名稱：『由過去私人銀行所組成的人民銀行分行之業務調節和關於加速其與人民銀行完全合併之措施的協議會』。這個協議會工作到八月中旬，曾審查了這些問題：關於清理中的銀行的簿記法規問題，關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理對照表的性質問題，關於資產清結問題等。此外，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初，委員會更根據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指示，組織了一個會計檢察團，這個檢察團曾被派遣到各地方，以便對十二月二十七日對照表編製的審查和協助。

銀行國有化和歸併方面工作的指導，歸人民銀行的總管理處負責。財政部在這方面則實行對人民銀行總管理處業務的監督。在人民銀行總管理處之下，設立了一個地方機關部，以指導各地方銀行國有化與合併的工作。一九一八年五月末，在過去商業銀行各支行下，設立了一個以人民銀行支行代表為主席的清理技術協議會。在過去股份商業銀行的管理處下亦同樣組織了清理技術協議會。過去商業銀行的專家們都曾參加了協議會的組成。清理技術協議會是在實行銀行合併和與國有化有關的清理工作。

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八月這一期間，指導各地方銀行國有化和合併工作的機關即是如此。對國有化工作實行主要領導的，在莫斯科是人民銀行總管理處，而在彼得堡則是專家委員會，實質上形成了執行這工

◎專家會議曾擬定過下列的訓令：關於國家銀行與過去私人銀行清算的簿記形式；關於從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這一期間利息的結算；關於在過去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完全合併以前，由過去私人銀行所組成的人民銀行分行簿記實施法規；在最後對照表的編製時，根據何種方法重估過去私人銀行對照表上的已被宣佈無效的有價證券等（專家會議會議記錄——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作的兩個中心。地域的隔離性和人民銀行總管理處方面對專家委員會工作之不充分的事務上的指導，致使這兩個指導機關，常常在同一个問題上對各地方發出不同的指示^①。這樣即阻滯了銀行國有化與合併方面的工作，招致了地方上有害的混亂，而與列寧在實行銀行國有化法令問題上關於嚴格集中化必需性之斷然的要求適相矛盾。黨、政府和列寧個人都曾十分注意到國有化工作的進行，曾不祇一次的矯正了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工作，因人民的敵人——「左派共產黨」曾經潛入了總管理處工作的領導中。他們曾經阻滯了政府關於銀行國有化決議的實行。

在一九一八年五月第一次全俄財政工作人員代表大會上，檢討了關於在各地方實際執行銀行國有化法令工作整頓的必要問題。大會選出了一個研討財政改革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特別應與人民銀行共同研擬關於各地方銀行國有化和合併法規的訓令^②。

人民委員會在列寧主持下，於一九一八年間曾兩度——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和十一月二十日——檢討了關於銀行國有化與合併的進度問題。人民委員會曾將列寧簽署的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的決定，送交指導信用制度的人民財政委員會和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建議對實際的合併採取有力的措施和於最短期間完成這一工作。在這個決定之後，過了幾天，人民委員會又拍發了一個由列寧簽署的致人民財政委員長古考夫斯基的電報。在電報中人民委員會曾強調銀行國有化的鉅大意義，要求在銀行工作上，特別其對財政部的隸屬上要遵

^① 專家委員會在其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向各地方清理技術協議會提議要受專家委員會訓令的指導，而人民銀行的總管理處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二日的電報中則要這些清理技術協議會受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訓令的指導。——十月革命總文獻。

^② 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守嚴格的集中化。在電報中曾指出：「人民委員會認定，一切銀行，國家銀行（俄羅斯共和國人民銀行）以及過去的私人銀行，都受財政部長的指揮和隸屬於財政部。一切任何銀行的代表，不管他們是誰任命的，連蓄金局的代表亦是同樣的，都應負責執行人民財政委員長的指示。人民委員會提醒一切銀行機關，一切銀行事業絕對不可避免的嚴格國有化，係從蘇維埃政權的一切政策，從他所發佈的一切法令出發的」①。

財政部在展開了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人民委員會的決議之後，便設立了一個專門研究地方實際情況的委員會。委員會特別進行了人民銀行莫斯科分行臨時管理處的檢查，並曾宣佈，雖說莫斯科過去私人銀行的業務和帳戶，於很短的期間就統一了，但是這一工作的質量則很壞。委員會曾指出：「未曾同時將各種業務資料從國有化了的銀行移交到所組成的總管理處去；至少不曾從過去私人銀行中將業務資料，照完全的對照表數目，移交過去，——而當時祇部份的移交去」②。這樣便造成很大的混亂：雖說在形式上，業務的合併算是結束了，而在檢查時，各個顧主的貸款帳戶，還並不會統一（檢查會繼續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是的，在臨時和有保證的有價證券的借債總數七四三、二〇〇、〇〇〇盧布中，貸款帳戶統一了的祇有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或百分之一九。五。委員會根據對莫斯科過去私人銀行合併工作的檢查，作出了如下的結論：「過去私人銀行業務集中化的情形，特別是他們清理的情形，都處於混亂的狀態。雖說事實上清理和集中化的過程是在進行，而卻沒有建立工作計劃性的指導方針」③。

從一九一八年春到內戰擴大的這一期間，在中央和地方執行銀行國有化與合併的機關中，資產階級專家們之反政府的行動會是這一工作的主要阻力。在對於商業銀行國有化第一個時期（一九一八年一月——三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同上。

月)成爲典型的，銀行中上級職員中間公開的怠工瓦解之後，資產階級及其奴僕們便改變了政策。現在他們企圖盡可能的用加害政府的方法，保全過去商業銀行的全部機關，直到在國內資本主義統治和資產階級政府的復興。在怠工瓦解後，敵人對蘇維埃政權所採用的反抗銀行國有化的新的政策即是如此。

如前所述，蘇維埃政權曾吸收資產階級的專家，參加銀行國有化與合併的複雜事務，俾便利用他們的技術知識和在銀行中的豐富經驗。資產階級的專家們則遵照原先主人的命令，以加害政府爲目的，開始積極的參加了執行銀行國有化與合併的國家機關的工作。在國際武裝干涉者和白黨所佔領的區域中股份商業銀行的代表大會上，曾公開的談到關於這種命令。大會是一九一八年八月末在撒瑪爾舉行的，當時撒瑪爾即在白黨的手中^①。沃爾惹，卡穆斯基銀行撒瑪爾分行的總管向大會宣稱，六月間他在彼得堡，在股份商業銀行代表大會的祕密委員會中，在那裏曾告訴他們，「銀行董事會希望整個範圍的保存銀行機關，俾便於需要時，有參加工作的可能……爲了這一目的，我們的職員現在在蘇維埃政權下工作」^②。從彼得堡來出席大會的過去俄羅斯亞細亞銀行的董事布特里亦曾這樣認定。他宣稱，清理委員會在一定的時期要到各個私人銀行去工作；銀行先前的職員在參加這些委員會的工作……這對於銀行是重要的，俾便自己處理事務，而不讓外人來

①撒瑪爾的，奧林堡的，西伯利亞的，勃梁賓的商業銀行分行的代表都曾出席大會。大會曾特別討論了關於對白黨匪幫財政支持問題。從奧林堡方面接獲了匪首督道夫的急電，請參加於掠劫的匪幫有益的獎券發行(總數爲三百萬盧布)。大會曾在自己的「救星」之一的面前起立歡迎，並向匪首宣誓參加獎券發行。爲對反革命資助有必要的金錢，大會曾決定：「在同盟國舉行外國短期公債」和「印刷原來模型的鈔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四日期間撒瑪爾私人銀行代表大會記錄，十月革命總文獻)。

②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處理，爲什麼銀行董事會還要質問自己的職員，包括副理在內，不解除銀行中的職務」^①。

銀行的高級職員之無恥的聲明，表示在維護銀行——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中心——上，資本人及其奴僕是串通的。公開的怠工遭受了失敗，他們便轉而實行反對蘇維埃政權實行銀行國有化的「祕密鬭爭」了。

國有化了的銀行之俄國的和外國的原所有者，對於在所謂「銀行國有化銀行事業的理論家和實際家的專家會議」，以及後來將他改爲專家委員會中自己的代表之加害政府的行爲，特別寄以很大的期望。資產階級的專家們執行自己主人的命令，企圖利用專家會議和專家委員會，以破壞蘇維埃政權在銀行範圍的措施。資產階級的專家們在專家會議和專家委員會中的叛逆行爲，曾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第一，企圖用種種方法阻撓銀行的合併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銀行信用清算工作的組織，第二，企圖脅迫蘇維埃政權採取那取消銀行國有化的措施。

過去的銀行董事們在期待蘇維埃政權的倒台，曾決定用種種方法反對銀行的合併，俾便保存銀行到他們「真正的主人」——布基洛夫、梁布謨斯基、斯塔海耶夫及其同僚們的捲土重來。

股份銀行祕密委員會曾直接授命自己的間諜，阻撓銀行國有化的實際執行。資產階級的專家們執行這種命令，企圖脅迫蘇維埃政權「對銀行的合併採取某種過渡時期的措施」。他們甚至在專家會議中設立了一個「過渡時期」的專部。資產階級的專家們在這一部的決議中，建議將一切過去的商业銀行都遷回他們舊的行址，保存他們原來的名稱，恢復過去的董事，「應該使他們獲得其原有全權代表限度以內的行動自由」，允

^①即如大會記錄所示，出席大會的，企圖將國家出賣爲外國財政資本的奴隸的銀行主及其官吏們，用嗚呼哀呼，面向着布特里先生歡迎同盟英雄的法蘭西（法蘭西的財政寡頭）。

許過去私人銀行經營與人民銀行同等的一切業務，而從人民銀行獲得貨幣的支持。甚至，資產階級的奴僕們企圖在「實行銀行合併的過渡措施」和「使人民逐漸歸服新的銀行」的招牌下，完全恢復資本主義的銀行。反革命的資助，所有經濟部門中私人資本之全面的 support，國有化的企業和已設置了工人監督的企業的怠工，在這種種方面，過去銀行管理之「行動的自由」都要保持的。有預見的委員會委員同樣不會忘記提出從人民銀行得到貨幣的支持，而保證舊的銀行的行政管理，而利用蘇維埃國家貨幣財源作反革命鬭爭的可能。

恢復私人銀行及其舊董事會，當然，並未使資產階級的專家們得到成功。而用種種方法遲延和攪混銀行之複雜的清理工作與合併，他們卻有所成就。

資產階級專家們在專家會議和專家委員會中，對銀行信用和清算工作問題的方案，即帶有這種敵意的性質。譬如：

一、在審議資助對外貿易問題時，他們曾反對對外貿易的壟斷，並企圖用各種方法破壞他。俄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的奴僕們期望，拒絕糧食對外貿易的壟斷，以破壞國家對糧食價格的調節和成爲與飢餓作鬭爭之必需條件的糧食儲備，而使糧食貿易落在外國銀行代表人的手中。

二、在工業的財政資助和信用範圍內，資產階級的專家們曾企圖在蘇維埃國家推行資本主義復活的廣泛綱領，恢復其對外國資本之奴隸的依屬性，以便進而建立爲蘇維埃政權的毀滅和工農對俄國和外國資本從屬的一切條件。

三、在國內貿易信用範圍內，根據資產階級專家們的方案，銀行應該供給商業資本家以廉價的信用。

四、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會遵照他們主人——布基洛夫，梁布謚斯基和外國的銀行家——的命令，企圖推行各種貨幣改良的方案，以便進而恢復和鞏固資產階級的財政權和經濟權。

當叛逆者非法的參謀部——股份銀行委員會——明白了阻撓銀行國有化和前所引述的反革命措施已告失敗，叛逆者便集中一切力量來破壞銀行的合併，阻撓人民銀行的整頓工作了。專家會議中已成立的小組，對於他所應負責的過去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合併的具體計劃的擬訂，曾予以怠工，而卻從事於這種所謂「科學的」討論：「在國有化的概念中應包含何種內容」，及關於國有化的法令應擴展到那種信用機關。已成立的小組並不會從事研究過去的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合併的程序問題，清結對照表和決算的編製。曾受命編擬關於銀行合併程序訓令的專家委員會，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存在到八月中旬，但是仍「未能」完成這個訓令。請求從速頒發訓令的信和電報從各地方雪片飛來，但是專家委員會對於這種請求卻置若罔聞，而繼續「原始的」研究「國有化的問題」。自然，專家委員會的怠工曾有力的延緩了銀行國有化與合併法令的實行。專家委員會曾以清理工作很多困難之惡意煽惑的公告掩蔽怠工。當人民銀行的領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規定後，即曾指示專家委員會從速進行銀行合併，而叛逆者們便對這一指示應戰了。他們聲稱，要實行這種合併，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間或許可能，當時過去私人銀行的帳冊還不會散失和混亂，而現在為實行合併卻必需長時間的和重要的預備工作^①。

銀行家的間諜經過專家委員會給了各地方以混亂的或直接與蘇維埃政策相矛盾的指示，甚至曾企圖依照不正確的路徑，指導資產清理方面的工作和過去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業務的合併。是的，專家委員會會命

①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令各地方——不向由已宣告無效的有價證券作保證的銀行催還負債。這與蘇維埃政府關於有價證券宣告無效的法令是相衝突的，根據這一法令，祇有小持有者始獲得有價證券的補償。專家委員會企圖，對用有價證券作保證的銀行負債表示「寬恕」的方法，補償資產階級因有價證券宣告無效所蒙受的損失^⑥。

在各地方參加清理技術協議會組織的資產階級專家們，曾拖延了清理對照表和決算的編製。當專家委員會被解散之後，股份銀行的祕密委員會便將全部的期望寄託在清理技術協議會中的自己的奴僕的叛逆行為之上了。他們應保全私人銀行，「直到主人的捲土重來」，實行資產的清理，同樣是爲了銀行家所期待的蘇維埃政權的「毀滅」之後，還能利用他的結果。爲此，資產階級的專家們曾希望達到，過去私人銀行的清理要在各個銀行的舊行址辦理，用種種方法阻撓過去私人銀行的業務和帳戶與國家銀行的業務合併，而不讓銀行事業集體化。

資產階級反銀行國有化的無情的鬭爭，用忠心於資本的銀行專家的叛逆行為，困難了和拖延了關於銀行國有化法令的實際執行。但是布爾什維克之不屈不撓的精神，在這條戰線上終於摧毀了敵人的反抗。雖說工作複雜，經驗缺乏，資產階級專家的叛逆行為和組織上的缺陷，而蘇維埃政權卻從一九一八年春到內戰擴大這一期間，在銀行國有化法令的實際執行上，獲得了重要的成就。因爲銀行國有化與合併程序是由列寧擬定的，並且人民委員會在列寧親自領導下，曾幾次的檢討了關於銀行國有化的步驟問題，矯正了財政部和人民

⑥ 這個專家委員會指導清理技術協議會的有害的訓示，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已被人民銀行的總管理處廢除了。在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發給所有自己的分行的電報中指出，「以被宣佈無效的有價證券作保證的負債，應無條件的追還，根據現存的條件，如債務者的存款補還他們活期帳戶全不可能，即須強制追還」——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銀行總管理處工作中的缺點，使黨和政府得以克服工人階級敵人——從股份銀行祕密委員會到人民銀行中所潛伏的「左派共產黨」——對銀行國有化所佈置的障礙。到一九一八年中，大部份過去商業銀行便與過去的國家銀行支行合併了。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日狀況，人民銀行的總管理處係由人民銀行六十個支行所構成（彼得堡和莫斯科不計算在內）。六十個支行中有四十六個曾報導，他們已將過去的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統一一了，並已完成清理對照表和決算的編製^①。假如估計到任務的極為複雜和從中解決特定任務的環境的特殊困難，這實是一個鉅大的成就。

①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第三節 銀行國有化與合併的完成

一九一八年中，短時期的和平的喘息結束了，而開始了內戰——俄國的工人和勞動農民反對國內外蘇維埃政權敵人的戰爭。在內戰時期，銀行的合併工作曾經歷了極爲困難的條件。國家重要的地區曾被外國的武裝干涉者和白黨匪幫所佔領，或與中央相隔離。

在被佔領的區域，資產階級恢復了私人銀行，爲了反革命的資助，經過銀行進行了商品和證券的投機，及從銀行中刮取了貨幣和有價證券。

在外國武裝干涉者和白黨在烏克蘭，在包沃爾惹，在克勒穆，在遠東的政權的短時期中，銀行的投機會達到毫無約束的階段，甚至股份商業銀行祕密委員會即感覺不安了。是的，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底，在撒瑪爾私人銀行代表大會上（當時撒瑪爾被武裝干涉者所佔領）委員會的代表聲稱，「有些銀行過分受商品業務所迷惑了，這可能對他們的聲譽引起不良的反響」^①。

莫斯科合作銀行海參衛分行的總管在其關於遠東佔領時期的總結報告中指出，「俄羅斯亞細亞銀行的分行以及其他銀行的分行用俄國盧布和其他有價證券的投機，曾達到難以置信的程度」^②。

在克勒穆，在福朗赫爾的黑暗時期，「銀行已成了茶葉、石碱、火柴、羊毛、製成品、化粧品、紙張、農業用具，一般各種商品和日常必需品的保藏所。被投機所激動的羣衆已確切的明白了銀行在物價昂貴和一般投機買賣契約的完成中的作用」^③。

① 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② 莫斯科文獻。 ③ 國民經濟雜誌，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期一八二頁。

在紅軍部隊向被佔領區進攻以前，白黨和武裝干涉者即聯合銀行的高級職員劫掠了銀行，不僅將貨幣和有價證券搬運一空，甚至將帳冊和文卷都運走了。許多銀行已完全成了廢墟。屬於此列的銀行如：撒瑪爾國家銀行業務局，工商銀行雅洛斯拉夫分行，及在烏克蘭的許多銀行等。

根據一九一八年十月人民銀行總管理處所發出的七十件通報中，十四個人民銀行的支行，對銀行國有化與合併的進度的查詢，報道說，銀行的合併和決算編製的工作，因為在城市被白黨佔領時期，許多文卷的喪失而被延緩了④。

雖說在隨着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擴大的程度而增長的特別艱鉅的條件和鉅大的困難下，人民委員會仍要求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從速完成銀行合併，將清理工作澈底完成。人民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公佈了「關於銀行事業壟斷化法令迅速實際實行」的決定，在這個決定中曾向財政部提議限期完成銀行的國有化⑤。在這個決定之後，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指導便接受了這個曾在專家委員會被叛逆者拖延幾個月研究的訓令。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底，亦即關於銀行國有化法令公佈後經過了一年的工夫，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纔將期待已久的「關於私人銀行國有化規程」的訓令分發到各地方。同時並會創立了一個指導各地方一切銀行國有化與合併工作的統一的中心，——人民銀行總管理處下商業信用銀行國有化清理部。這樣便賦予了各地方銀行合併工作以更多的組織性。

根據訓令，即將地方工作的指導責任授予人民銀行支行的總管，支行的總管曾是過去私人銀行下清理技術協議會的主席。關於以人民銀行分行性質對過去私人銀行的取消或保留問題，允許各地方根據在某一城

④ 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⑤ 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財政法令集，一九二〇年版一四四頁。

市銀行網的擴展上有無需要來決定。在某一城市，那裏除了國家銀行的支行外，祇有一個任何過去私人銀行的支行，他便在取消之列。那在蘇維埃政權條件下而需要保留的銀行業務（票據交換形式的信用，商品抵押貸款，活期帳戶等），即按照適當的手續轉渡到人民銀行的分行。其餘的業務（被宣佈無效的有價證券的抵押短期和臨時貸款，委託清算，有價證券保證的貸款等）則予取消了。私人 and 企業負債的償還，假如爲償還負債活期帳戶款有不足，便以活期帳戶和存入各款移作補償和強制追還的方法辦理。國有化了的企業的負債則從對他們的財政供應上的支出預算中補償。在貸款負債的清理時，以及在存款之現鈔支付時，都會維護了小債務者的利益。他們不超過一萬盧布以有價證券作保證的負債，則並未予以索還。當然，勞動者很少以資本主義銀行的債務者身份而出現的。但是在戰爭期間，根據銀行貸款的一種範疇，發現了人民之小有產者部份中的債務者——軍事性質的國家有價證券的抵押貸款的債務者。

對於清結對照表的編製曾給了一個月的期限，在某些區域與事實上的銀行國有化的期限無關，清結對照表須編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而清結的決算則要編製從一九一七年一月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一期間的。

訓令給了各地方以指示，使其瞭解到，在過去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合併時，這種合併將如何進行，並決定了清理工作和清理資料的性質。許多過去商業銀行下的清理技術協議會在獲得訓令以前，即已結束了清結對照表的編製，並由於過去私人銀行一切資產清理的完結，而結束了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的合併。千方百計的阻撓銀行合併的專家委員會的一些指示即是所以要作這種解釋的原因。訓令曾解釋到，凡過去商業銀行未清結的部份，即歸併於國家銀行，第一，祇將人民銀行完全不存在的業務予以清結（譬如，宣佈無效的有價

證券抵押貸款)第二，至於未清結的貸款債務的追還，不應延緩銀行的合併和清結對照表的編製，因為人民銀行的分行於合併之後可以辦理這種追還。這種解釋給與了在短期間得以結束銀行合併工作的可能，尤其是很多地方已經作過了。在一九一九年的第一個月中間，許多省已經辦完了銀行的合併和清結對照表的編製。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清理工作的狀況，由下列的統計足以說明④：

因此，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所有大的商業銀行都集中在這裏，清理工作差不多是已經結束了。在大多數其他的城市，銀行合併和清結對照表的編製亦已完結了。

概括過去股份商業銀行對照表的混合清結對照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計達一二、六六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計估各該銀行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混合對照表總數一五、四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百分之八二⑤。

各銀行合併為唯一的人民銀行，根本上已經完成了。清結對照表的編製和業務向人民銀行分行的移轉，在蘇維埃區域所存在的許多過去的私人銀行中，因必需的文卷的缺乏而被延緩了（這些文卷曾被隨白黨逃亡的官吏所盜去，或者是

④數字係在財政部消息報一九二〇年一〇——一一期發表，一九——二三頁。⑤過去商業銀行的其餘的支行都在白黨和外國武裝干涉者佔領區，或者在已退出的波蘭和布利巴爾基克地區。⑥在波蘭和布利巴爾基克區域的過去俄國的股份商業銀行沒有對照表。

銀行	蘇維埃地區過去商業銀行分行總數	已將清結對照表陳報於銀行總管者(分行數)	混合清結對照表總數	
			單位百萬盧布	百分比
彼得堡的	56	50	6.961	55
莫斯科的	46	44	4.959	39
各省的	238	128	749	6
總數	340⑦	222	12.669	100

因白黨和外國武裝干涉者佔領城市在清理工作間斷時期所喪失)。特別是在烏克蘭，因為這種情形，過去私人銀行清結對照表的編製被大大的拖延了。根據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烏克蘭人民委員會的命令，烏克蘭銀行國有化日期曾被決定爲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在一九一八年差不多在所有烏克蘭區域，都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議會和德國帝國主義者所支配。烏克蘭過去私人銀行的分行的清結對照表，不是根據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編製，而是根據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編製，清結決算則是從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這一期間編造。在其餘的方面，烏克蘭的清理技術協議會亦接受了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所通過的訓令的指導。

過去商業銀行資產的清理與清結曾通過下列的程序：

一、被國有化了的企業對人民銀行的負債，根據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人民委員會的法令，因這些企業已完全過渡到收入預算的財政供應，便被宣佈無效了(參看第六章)。從而，國有化了的企業的負債，人民銀行便以損失註銷了。

二、私人企業對人民銀行的負債，則曾予以追還。根據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三日人民委員會的法令，一切在戰爭期間由沙皇和臨時政府所特許的票據和其他債務的緩期概予廢止。這一法令便給與了人民銀行一種權利，沒有司法機關參加而得以獨立的用註銷活期帳戶、存款、保險箱的存款的方法，以補償私人企業的負債。

三、爲了商品抵押和貨單抵押貸款的清結，曾規定了一種特殊的規程。在銀行中抵押的商品的大部份，在一九一八年的上半年即已被徵用了。是的，根據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二日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命令，所

有在銀行中抵押的棉花均被徵用，並移交中央棉花局處理。在一九一八年期間，所有銀行的貨倉（自有的和租用的）連同其中所存的抵押貨物，都被移交給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交通器材部了。企業對過去商業銀行商品抵押和貨單抵押貸款的負債的償還程序會規定如下：人民銀行根據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或其他將抵押的商品移交到的國家機關的計算，照定價將徵用的商品價值數額的貨幣移入自己債務者的帳戶上。被移入的款項便註銷了債務者償還他們對銀行負債的帳。因此，負債的餘數便變為無保證的（無記名的）貸款，而照普通的規定追還了。

信用負債的追還會有很大的困難，因為私人 and 私人企業的負債，在大多數的場合都超過了他們在銀行帳戶上存款的餘額。這種情形即說明了，第一，從一九一七年最後的幾個月，當時臨時政府的動搖已很明顯，資產階級即開始提取存款和將其匯往國外了，第二，活期帳戶存款的大部份曾於一九一八年以繳付稅金而勾銷了。未償還的貸款餘額之強制的追還，是永遠無法辦清的：資本家們都已逃亡國外和白黨及外國武裝干涉者佔領的區域；隱藏了自己的貴重物品（如伊爾福和別特洛夫「十二把椅子」中有名的「鑲金剛石的安樂椅」）等等。所以資產的清結會繼續延長到一九二〇年全年和一九二一年的上半年。到這時，因內戰不得不繼續發行的結果，貨幣已相當的貶值了，繼續追還負債的工作已不再比放棄繼續追還的貴重了。債務者集團也已經非常之小了（因為根據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法令，凡具有機器動力在五個工人以上和沒有機器動力在十個工人以上的企業概予國有化）。談到過去私人銀行的負債，小有產者存戶的基本羣衆，在一九一九年年底以前即已獲得了自己在銀行中活期帳戶和存入款，而資產階級的存款則被劃歸

①即如已經講過的，屬於銀行的商品，於銀行國有化後即很快的移交到適當的國家機關了。

繳付稅金和對人民銀行的負債了。保險箱中所保存的貴重物品（據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檢查保險箱的法令，保險箱中的現鈔已被移存於活期帳戶，而金幣和金塊則予沒收），根據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七日人民委員會的法令，已被移轉為國家所有。繼續清理的工作已沒有任何的意義。一九二一年八月初，過去私人銀行資產的清結即由財政部命令停止了，混合清結對照表亦已編製了。

在最後的混合清結對照表中包含了過去股份商業銀行二四〇個機關的對照表，總數為一二、七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或根據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狀況，過去股份商業銀行對照表總數的百分之八三^①。這一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各種銀行的有價證券，便被劃入蘇維埃共和國唯一的人民銀行的對照表之中了。

因此，雖說有鉅大的困難——經驗和幹部的缺乏，資產階級專家們的怠工和叛逆行為，最後更有激烈的內戰和外國的武裝干涉，而過去商業銀行與過去國家銀行的合併，在一九一八年中間，在大部份蘇維埃區域即已經實現了。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則祇是進行了與國有化有關的清理工作的完成。但是，在淪陷區域外國武裝干涉者和白黨廢除過去商業銀行國有化的結果，致有時三番兩次的實行銀行的合併。

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在實行銀行國有化與合併的同時，便創立了新的蘇維埃的信用制度。

^①計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股份商業銀行混合對照表中總數為一五、四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尚包括到一九二〇年從蘇維埃共和國退出的地區的銀行對照表。所以在事實上，清結對照表並不少於過去股份商業銀行對照表總數的百分之九十。

第六章 蘇維埃共和國人民銀行的創立、信用與清算組織

第一節 社會主義銀行的構成及其實行的列寧計劃

掌握了國家的中央發行銀行，實現了商業銀行的國有化，蘇維埃政權便着手進行整個信用制度的重建了。集中化的蘇維埃信用制度組織之巨大的創造工作，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開始了，這一新的信用制度應是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強有力的槓杆。銀行國有化克服了資產階級各種形式的無情反抗，蘇維埃政權根本的改造了舊的信用機關。在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之特別困難的條件下，在與資產階級銀行專家的意圖和叛逆作堅強鬪爭的環境中，蘇維埃政權已以自身的威力摧毀了舊的，對於新經濟制度不需要的銀行工作形式，而創立了新的，擔當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任務的蘇維埃銀行。

社會主義銀行的構成計劃，係由列寧於一九一八年三四月間所擬定，而成爲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列寧計劃之不可割裂的組成部份。

一九一八年春，列寧曾給予我們着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綱領，他認爲，爲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平的喘息是必要的。

這一綱領曾被列寧在其名著「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及其他的著

作中予以發揮。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列寧計劃，是從蘇維埃俄國具體經濟之實際的精確計算出發的。

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列寧計劃的意義，遠已越出研究時期的限度。列寧自己亦曾指出，由他所提出的任務的完全實現，須要很多的時間。列寧計劃對這一期間的作用是非常偉大的。他向人民指示出了蘇維埃共和國的真正目標，爲了經濟之根本的改造，一切物質資源的動員，亦即爲了和平建設，以及爲了強大紅軍的創立，他要求在內戰中縱使是短時期的喘息亦予以利用。

在爭取實現列寧計劃的鬪爭中，堅忍不撓的戰鬪堅定了黨。勞動人民之險惡的敵人——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社會革命黨，門什維克——對列寧的一切提案都曾予以盡情的破壞。他們曾經企圖用盡一切方法推翻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用盡一切力量反抗清算和監督，反抗紀律的樹立。最初他們曾企圖不容和平，嗣後則希望破壞締結和平協定，而遭受失敗之後，便踏上了企圖直接顛覆蘇維埃政權，準備刺殺人民領袖——列寧、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的行徑。但是這些敵人已被撲滅了。列寧斯大林政策獲勝了，因爲祇有他反映出了勞動者真正的利益和期望。

列寧在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之天才的計劃中，對於具有廣大分行網的統一的集中化的一般國民銀行的創立，佔了重要地位。列寧認爲，這種銀行的建立是對生產和分配之全民的計算和監督組織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列寧在其歷史性的著作『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在『布爾什維克黨綱草案』中，在『銀行政策提綱』和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月的其他最重要的文件中，到曾指示出國有化的銀行逐漸轉變爲對生產和分配的國家監督機關的途徑，轉變爲『統一的，社會主義的組織全國經濟生活的簿記和調節機關』的途徑^①。

一、在銀行工作嚴格集中化的目的上，列寧指出：『所有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範圍以內的人民銀行的分行，在行動上要確切的受總管理處的法令和命令的指導，沒有規定任何地方的法規和限制之權』^②。

二、必須增加人民銀行分行的數量，俾便爲了經濟和人民的最大便利，使統一的國家銀行網普及全國。

三、爲了貨幣在人民銀行中集結，非現登清算的樹立和從銀行中貨幣付出的監督等目的，列寧曾指出：A. 要漸次的過渡到銀行中活期帳戶之義務的管理——開始是大的經濟機關，而後則普及所有的經濟機關，俾便經過銀行滲透整個國家的貨幣商業週轉；B. 票據周轉的發展；C. 銀行貨幣付出之工人的監督；D. 『使人民將不是對消費目的絕對必需的一切貨幣都保存在銀行中的方法的採用』^③，爲此，特別宣佈存款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和對人民從銀行提付款最大限度的容易和簡便。列寧曾率直的提出，首先要除去『尾巴』，亦即在銀行排隊。

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籌畫前任務』一文中寫道：

『爲要進一步貫徹銀行國有化和直接的使銀行轉變爲社會主義下社會簿記的樞紐，要首先在人民銀行分行數量的增加上，在存款的吸收上，在貨幣存入和付出業務對大衆的簡便上，在『尾巴』的剷除上，在受賄和舞弊者的逮捕和槍斃上，獲得真正的成就。最初要實際進行最簡單的，創辦十分現實的，——而後再準備比較複雜的』^④。

集中化的一般國民銀行之創立的列寧計劃，在國家經濟進一步社會化的過程中，已經有所成就並開始實現了。一九一八年春，在土地和銀行的國有化，與夫實行對外貿易的壟斷之後，蘇維埃政權即準

① 列寧全集三十卷三七九頁。

② 列寧全集三十卷三八〇頁。

③ 列寧全集三十卷三八〇頁。

④ 列寧全集二二卷四四九頁。

備了大工業的國有化。大多數股份的和私人的資本主義工業，已於革命後的第一個月，以對資本家拒絕服從政府實行工人監督的法令，以及對生產怠工的鎮壓法規而被沒收了。但是許多大工業仍保留在私人資本家的手中。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政府頒佈了關於一切大工業和交通企業國有化的法令。尤其是國家經濟司台臺的掌握已被完成了。生產和銀行一切重要資產，已成了國家的、全體人民的、社會主義的財產了。爲了鞏固大工業的國有化，保證對國有化的企業信用支持的集中化的銀行制度的創立，已獲得非常重要的意義。

成爲社會主義的計算和監督機關，而具有廣大分行網的唯一的集中化的銀行之創立工作，是在同各種企圖用意工和叛逆破壞蘇維埃政權在銀行範圍的措施的工人階級敵人之劇烈的關爭中進行的。

一、銀行工作之集中化的原則

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銀行是以俄國信用制度兩個最重要的環：過去的國家銀行和國有化的商業銀行的合併組成的。

在一九一八年期間，蘇維埃政權實施了鞏固人民銀行工作集中化的許多重要措施。

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人民委員會的會議上，在列寧的領導下特別討論到這些問題：有些地方蘇維埃及其財政部，以及國民經濟蘇維埃，違犯蘇維埃政權的銀行政策，企圖將人民銀行的支行變爲地方機關；命令支行發放信用不依照總行決定，不遵守已制定的發放信用規程；提議注銷任何對國民經濟蘇維埃所需要企業的帳款等等。據此，人民委員會曾在他的決議中強調指出，「具有絕對必需性的一切銀行事務之嚴格的集

中化，是根據蘇維埃政權的整個政策，根據所有由他頒佈的法令出發的^⑤。爲了堅決的糾正地方組織將人民銀行支行變爲地方機關的企圖，人民委員會特作了如下的決議：『由全體工農兵代表會議拍發列寧和古考夫斯基簽署的下列內容的覆電：人民委員會確定，所有銀行，國家銀行（俄羅斯共和國人民銀行），以及過去的私人銀行，都受財政部長指揮和隸屬於財政部。任何銀行的代表，即使他們還未被正式任命，保管庫的代表亦復相同，都必須執行人民委員會的命令』^⑥。

在第五章中曾經談到，這個電報曾拍發到各地方。

爲了保證非此便不能使銀行變爲全國經濟計算和監督的武器的人民銀行工作的嚴格集中化，人民委員會即根據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六日的法令，決定銀行支行祇准在人民銀行總管理處下的清算貸款委員會認爲是必要的範圍以內貸放信用。銀行分行於貸款和活期帳戶現金支付時，必須受人民銀行總管理處所頒發的規程和限制的指導，對無後者的決定，沒有加以改變之權。

因此，從人民銀行工作的第一天起，蘇維埃政權即在爲爭取銀行事務的集中化而鬪爭。

二、人民銀行網的擴大

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人民委員會的會議上，曾向人民銀行提議：『對分行數量的增加和行員的吸收，要採取最強有力的措施，要將關於這種措施之實際的實行，亦即關於開設了幾個分行，吸收了幾個新的行員，要作每週的總結報告』^⑦。人民銀行的銀行網，到一九一八年底即被擴大了，當時許多過去商業銀行的

⑤ 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人民委員會會議記錄——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⑥ 同上。

支行，即已開始作爲人民銀行的分行而工作了。

是的，一九一八年十月，在蘇維埃共和國的區域，已有一八七個人民銀行支行在執行職務^⑤，當革命前，在所有過去俄國的地區，國家銀行的銀行網，係由一個業務局和一三八個分行所構成。蘇維埃共和國人民銀行的銀行網則已擴大了，第一、在過去有過國家銀行支行的城市，新的人民銀行分行開了業；第二、在過去完全沒有原國家銀行支行的城市中（照規矩，州或市），便在過去私人銀行的基礎上成立了人民銀行的分行。例如：在彼得堡除了蘇維埃共和國人民銀行業務局（過去的俄國國家銀行業務局）外，還由過去的私人銀行創立了十五個人民銀行的分行，在莫斯科同樣成立了四個人民銀行分行，在卡薩恩成立了三個，在下諾夫高羅成立了四個等等。此外，在過去沒有國家銀行支行的地點：在丘叟佛（由過去的西伯利亞銀行支行改組），在考茲莫丹揚斯克·卡薩恩州（由過去沃爾日·卡穆銀行支行改組），在劫丘煞·卡薩恩州，在亞拉得辛比爾州及在許多其他小城市中，都成立了銀行的分行。

三、企業活期帳戶貨幣支付的監督與消費需要貨幣支付的限制

對生產企業和商業需要之活期帳戶付款的工人監督和對消費需要付款的限制，蘇維埃政權在對私人銀行的監督時期即開始實行了。但是這些措施，祇有在銀行國有化之後纔成爲實際的措施，因爲那時資產階級從銀行提款的可能性已被剝奪了。工人監督係表現在這裏：企業和商業機關在銀行中活期帳戶一切貨幣的支付，祇依照經濟機關工廠作坊委員會的決定辦理，從而工廠作坊委員會的申請，應由該職工會工廠作坊委員

會的城市總蘇維埃作保證。工廠作坊委員會不僅應檢查銀行提款支配聲明書，還須注意到款項的實際開支，即將款項事實上是開支在生產的目的上；發付工資，購買必需的原料等。

在不調和的貨幣流通條件下，現金對企業的缺乏是非常巨大的，工廠作坊委員會常時為活期帳戶款的獲得去向人民銀行設法①。

對於個人，最初規定從銀行取款標準為每月總數為五〇〇盧布，一九一八年四月曾將標準提高到每月七五〇盧布。此外，對於家庭中每個沒有工作能力的人會決定還可獲得一五〇盧布，但在總的概算上每月一家不得多於一、五〇〇盧布。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因為盧布續行貶值，此所謂「最低生活費」，便從每月七五〇盧布提高到一、〇〇〇盧布。一個家庭現金獲得的限度，曾決定為每月為二、〇〇〇盧布。銀行支付活期帳戶和存款的貨幣，係根據由區代表蘇維埃作擔保的住戶委員會的證明書。在證明書中註明了家庭的收入和沒有工作能力的人數。

私人款項付出的限制，有下列兩個目的：第一、剝奪資產階級從銀行提去其貨幣積蓄的可能，第二、緊縮貨幣從銀行的外流，俾便相當的減弱發行的需要，減弱貨幣之極端缺乏，即所謂貨幣饑荒。後者一方面是由盧布的迅速貶值，致使貨幣的需要銳利增大所激起；另一方面是由國家銀行職員和留滯對各地貨幣運送的有

①茲試舉兩個申請書，俾作例證：一、「工廠作坊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證明，在留比莫夫商號招牌下克魯買考夫商號的工廠已成立工廠委員會，他所請求的款子六萬盧布，是對於發放職工工資，購買原料實際需要的，並將在工廠委員會的監督下開支」。二、「工廠作坊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希望照所開支票從國際銀行支付三萬七千盧布現鈔不會遇到障礙，這些錢是為交付俄羅斯製造場組合的鈔款所需要的」——引自人民銀行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月份，工廠作坊委員會的證明書和申請書彙刊，見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價證券貯備發送課的怠工，以及交通工作的紊亂和許多區域與中央的隔離所引起。由於發行的考慮，說明了這種情形，銀行付款的限制曾被普及到小的存戶，蘇維埃政權完全保護了小存戶的利益。實行對銀行付款工人監督和對私人消費需要付款限制之結果，過去私人銀行從國家銀行所得貨幣支持的數量，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比對過去私人銀行工人監督時期（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已經縮減了。彼得堡國家銀行業務局對過去私人銀行和相互信用社現鈔支持的變動，由下列的資料即足以說明：

現鈔支持總數（單位千盧布）

銀行國有化以前（從1917年十二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八日）	29,637
銀行國有化以後：	
a. 從191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1918年一月十三日	11,278
b. 從1918年一月十五日到二月二日	22,508

因此，假如在國有化以前，彼得堡的私人銀行每天從國家銀行平均獲得現鈔三、二九三、〇〇〇盧布，則在國有化以後，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上半月，過去私人銀行每天從國家銀行獲得七〇五、〇〇〇盧布，在一下半月的下半年每天獲得一、一七五、〇〇〇盧布。

①係根據彼得堡資料的指數，因為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在彼得堡從過去私人銀行中活期帳戶和存款的付出款並未停止。斯科沒有指數，因為在莫斯科於過去私人銀行國有化後差不多即未辦理付款。一切活期帳戶和存款的付出業務，在初期即都集中在國家銀行的莫斯科業務局了，後來支持已沒有必要（從彼得堡業務局取得支持的統計字係取自國民經濟雜誌三期一九一八年三六一—三七頁）。

在烏克蘭，在一九一九年蘇維埃政權實現時期，人民銀行活期帳戶的支付，亦同樣是以所謂最低生活費的標準辦理的。根據烏克蘭人民委員會的命令，最低生活費標準規定為每人每月一千盧布^①。在企業（私人的以及國營的）活期帳戶提款請求貨幣支付時，應附陳詳細確切的計算書；須要付出的企業開支計算，或須附帶提出製成預算開支證件的本次開支的細目預算，關於企業出納現狀證書和從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起出納數目變動的簡報^②。這些證件應由企業的工廠作坊委員會和該業的職工會作保證。

哈爾考夫省執行委員會並曾設立了一個專門的監督委員會，而由財政部的代表，人民銀行的代表，職工聯合會代表一人，哈爾考夫工人代表蘇維埃的代表一人至三人，國民經濟蘇維埃的代表一人所組成。監督委員會處理企業和機關在人民銀行活期帳戶支票一五〇盧布以上的貨幣支付的決定。委員會負責正確的規定對企業和機關日常需要之滿足所必需的貨幣（職工給養的支付，原料物資購買之日常開支）。

所有這些對人民銀行現鈔付出的監督和限制的措施，便給與以國家所掌握的貨幣資源實行顯著的機動的可能，其在國家所體驗的嚴重的貨幣饑荒的條件下，實具有深長的意義。

四、人民銀行私人存款的吸收

對私人現鈔支付的限制，亦有其相反的方面：資產階級會即停止再存款銀行，俾便逃避限制。為要保存資產階級在銀行中積存的貨幣儲蓄支付限制的善果，必須創立一個引致私人貨幣存入銀行的條件。所以在一九一八年初，將私人活期帳戶貨幣支付的一切限制概予廢除，假如該款是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以後存入

^①烏克蘭工農政府法規命令第五卷，一九一九年。
^②烏克蘭工人代表蘇維埃消息報，一五期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

者。在銀行中貨幣的存入便開始有些增加。一九一八年從一月到五月，在彼得堡業務局，私人款項的存入可由下列的統計說明：

在五月前，由人民銀行彼得堡業務局對私人的付出，超出私人的存入很多，而在五月間存入銀行的款，比付出的就多了。在莫斯科，下諾夫高羅，哀卡捷林堡，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六月，人民銀行私人存款貨幣存入和提出對照表，亦同樣比在銀行國有化後的第一個月中的情形較為良好。但是私人存入款的數目仍完全是貧乏的。爲了增加貨幣向銀行存入，人民委員會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的會議上，曾向財政部和人民銀行提議，第一、『對於一切形式的規定，如對於銀行存入以及對於一切銀行業務的完成，要採取最強有力的措施』，第二、『要將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後所實行的關於存款的神聖不可侵犯性，關於存款取付限度的措施，更廣泛的通告人民』。地方政權機關關於請將活期帳戶和存戶款轉移到地方蘇維埃或其財政部帳戶的任何要求，沒有中央的命令，概不予以執行，這一典型的指示曾通令了各地方的分行。然而，即如列寧在『銀行政策提綱』中所強調的，私人在銀行存款之神聖不可侵犯性，絕不應與蘇維埃政府從資產階級課稅相混淆。相反，銀行應負責根據蘇維埃和

	私人款項的存入 (單位千盧布)	私人活期帳戶和 存款貨幣付出 (單位千)	結數(存入高十， 付出高一) (單位千)
一月.....	246	2.688	-2.442
二月.....	296	2.059	-1.563
三月.....	422	4.370	-3.948
四月.....	2.048	3.080	-1.032
五月.....	2.682	2.645	+ 37
五個月總數	5.894	14.842	-8.948

①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六日，人民銀行關於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後私人存入銀行之款支付限制取消的第二號訓令中曾說道：『祇要總數不超過新年後所存入的可無限制的付款，一月一日前的餘額則仍依照過去規定辦法支付。』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②工商日報四六期，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③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④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公報，七一期，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財政機關爲了所得稅和特別稅根據正確決定的需要，要陳報關於資產階級帳戶上貨幣的數目和私人企業業務的規模，並協助賦稅的催徵^①。

例如，爲了鼓勵所得稅的繳納，人民銀行支行應要求資本家，在其於銀行帳戶取款時出示關於納稅的收據。在非常的十億盧布革命稅的徵收（一九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全俄中央委員會法令）時，假如不能保證以現金納付取得，便命令人民銀行的支行從資產階級的帳戶上註銷其應繳款。

五、人民銀行中清算業務的組織及企業和機關的貨幣於銀行中的集結

人民銀行所負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經過銀行非現金清算的組織。非現金清算的推廣縮減了現金的需要，促進了銀行對國家經濟生活監督的加強。列寧曾首先提議經過銀行組織自由的票據的週轉^②。這種票據的週轉，在莫斯科從一九一八年四月初實行，而在人民銀行彼得堡各支行，則是從四月的下半月實行的。

對於人民銀行支行的建議是：「爲了絕對的縮減現金需要的清算業務的適當發展，要採用這一措施」^③。人民銀行彼得堡和莫斯科支行爲了非現金的清算，曾經成立了一個清算部（交換所），這個交換所曾接受關於企業或機關從活期帳戶款移撥的票據和支付委託。在經過銀行繳納國家稅款時和在清償貸款債務時，均接受票據。在人民銀行莫斯科分行下交換所的週轉，到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計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

①曾向銀行的支行建議，爲「實行對一切資本業務最普遍的公開和監督，無阻礙的和不耽擱的將關於顧客存款和業務報告書送交地方財政部」——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②列寧全集三十卷三七九頁。③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公報，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六期，——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布，而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則已增加到六五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下諾夫高羅，別爾穆，卡薩恩及若干其他城市的人民銀行的支行都成立了交換所。據銀行支行的證明，這樣已稍微的減弱了地方上嚴重的貨幣饑荒。是的，一九一八年四月底人民銀行卡薩恩的業務局報道說：「爲了貨幣饑荒的調節已成立了交換所，交換所用帳戶對帳戶之簡單的銷帳方法，幫助縮減貨幣的需要」。

逐漸過渡到全國企業在銀行中活期帳戶的負責管理，這一系列計劃的實行，已從人民銀行支行與企業的工廠作坊委員會間，關於在銀行活期帳戶上一切貨幣現金之保管的協定的締結而開始了。下諾夫高羅和烏克蘭的國民經濟蘇維埃，在一九一八年四月曾經頒佈過關於國營企業和國家機關在銀行帳戶上，貨幣現金強制保管的法令。這一法令頒佈的結果，企業和機關在下諾夫高羅銀行業務局帳戶上的餘款，從一九一八年四月一日的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加到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的一五四、四〇〇、〇〇〇盧布。

曾經同樣企圖強迫私人企業將自己的貨幣現金保存在銀行中。是的，國家銀行哀卡捷林堡業務局曾經建議所有的商人將每天的進款都交存銀行。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存入銀行的有三、五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從銀行付出的則有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在銀行存進的已達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從銀行付出的則爲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托洛伊克城，每個商號的所有人能由自己支配的每日開支，不得超過一千盧布，而所有其餘的進款須繳存銀行。所有在地方上實施的這些措施，其目的都是在縮減從中央領取現鈔的需要和減弱地方上貨幣的饑荒。

●人民銀行莫斯科分行臨時管理處總結報告，國民經濟雜誌，八一九期，一九一八年，一四頁。●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同上。●國民經濟雜誌第一次全俄代表大會論著集，一九一八年二二七頁。

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奉行金庫統一」的法令，強迫國家機關將所有的貨幣收入都存在人民銀行的金庫或國庫，祇經過銀行或國庫辦理自己的償付。這一法令給了這種可能：第一、緊縮人民銀行或國庫的貨幣現金，第二、成立由國家對某一機關支出之款的開支，首先是爲了現金開支的節約的監督。促進非貨幣清算的發展的措施，其目的，主要的是貨幣發行的緊縮。到一九一八年八月，所有自己的貨幣都保存在銀行中的誓約已普及於國營的企業。

關於國營企業間非現金清算組織的決議，是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擴大會議通過的。由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擴大會議所同意的，關於國營企業間的財政供應和清算的程序法案中，曾指出國營企業在他們彼此間的清算時，須接受以他們帳戶的支票撥付，而無權要求彼此用現鈔清算^①。一切企業的收入同樣應存在他們在蘇俄人民銀行的活期帳戶上。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這一決議，最初祇是在莫洛托夫領導的北方區國民經濟蘇維埃實行了。他僅祇在彼得堡的國營工業中普及了，因爲祇經過銀行在支票的幫助下彼此辦理清算，即是由彼得堡建議的。

將自己的貨幣保存在銀行的活期帳戶上的誓約，曾於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以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命令，普及於蘇俄全部國營的企業。到這時，因內戰的擴大便開始過渡到原料、物資和工業製成品的集中分配時期了。爲了此種或彼種工業部門的管理，曾創設了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各部所領導的中樞部或中央部——例如：橡膠中樞部、煤炭中樞部、金屬中樞部、食糖中央部、脂肪油中央部等等。中樞部和中央部曾經決定每個屬於他的企業的生產計劃，實現了對原料、燃料、物資的集中供應，分配了所有由企業所生產的產品。

①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這種工業組織制度，一方面便利了，另一方面更引起了國營企業及他們的中樞部之間非現金清算制度的必需性。在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的命令中指出，所有國營的企業必須將製成品繳付給其所屬的，照例以原料、物資等供給企業的中樞部和中央部。製成品和原料的清算，應該是以無貨幣參加的簿記的登記來實現的。國營企業必須將所有自己的現鈔都存於銀行，而於需要時則以人民銀行的支票去辦理清算。企業在自己的金櫃裏可以存留「祇是對流動需要所必需的極小數量」的現鈔。

關於非現金清算的法令乃是與病態的反映在企業財政狀況上的貨幣饑荒和盧布貶值作鬭爭的必需的措施。在人民銀行體系中清算業務之普遍的發展，即是這一法令的結果，國營工業的各種企業，糧食部的各企業間的清算，都是經過銀行辦理的。

在烏克蘭，一九一九年春，在人民銀行的創設時期，在清算業務的發展方面，亦曾實行過許多的措施。在一九一九年二月，烏克蘭國民經濟蘇維埃頒佈了關於公庫對供應者付款規程的法令，根據這一法令，「公庫對於抵押和一切向供應者和承包商的支付，均用命令支付書依照他們的指定撥到人民銀行某一個分行中他們的活期帳戶上」^①。後來又頒佈關於遵行金庫統一的命令，並建議「一切對蘇維埃機關或債務者的債權人的支付，均依照命令支付書和支票交人民銀行或國庫的出納辦理」^②。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烏克蘭人民銀行責成各分行發付匯兌、信用委託和其他支付委託，不用現鈔，而用活期帳戶上的轉帳^③。最後，在一九

①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決議——見「二十年來蘇聯的貨幣流通與信用制度」，國家財政出版局，一九三九年版一三頁。

② 烏克蘭政府和烏克蘭工人代表蘇維埃消息報，四五期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③ 共產主義者雜誌二六期，一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日。④ 烏克蘭財政部公報，二卷，一九一九年七五頁。

一九年五月，烏克蘭國民經濟蘇維埃強制實行非現金清算，規定：「蘇維埃機關間的相互償付，不應現鈔辦理，而要用從某一機關的帳戶轉撥另一機關帳戶的方法。如管理人對現行法令不予履行，便以信用貸款方式劃歸其個人負責」^②。

因此，在蘇俄區域，於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在烏克蘭區域，於一九一九年，經濟機關間的一切支付，都用支票方法，或用簿記的轉帳，在人民銀行從某一機關帳戶轉到另一機關帳戶的方法，亦即無現鈔參與的完成了。

所有這些在實行社會主義銀行創立的列寧計劃中的措施——票據的流通組織，居民貨幣於銀行中的吸收，逐漸的過渡到一切企業在銀行中活期帳戶的負責管理等等，都具有一個終極目標：鞏固國家的貨幣流通和為人民銀行創立監督經濟工作的可能性。

在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公文中指出，「……目前人民銀行的基本任務，是正確的貨幣流通的創立……」，而同樣……「協助國營企業工作的監視和檢查」^③。但是這些措施之巨大的重要性，因內戰繼續擴大的關係，未能獲致很大的結果。戰爭需要國家經濟之特殊的組織，這樣便改變了共和國人民銀行的工作和使命。

②財政部通報六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③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第二節 共和國人民銀行經濟信用貸款的組織

蘇維埃政權在經濟信用貸款和財政供應的組織下，克服了社會主義建設敵人的狂暴的反抗。人民銀行附設的專家委員會中之資產階級的專家們，曾企圖挽回那曾經保證過資本主義企業的財政支援，破壞那已爲國營企業工作的信用貸款制度（見第五章）。同時銀行家的走狗們曾用盡各種方法阻撓收歸國營的企業無間斷的和合理的信用貸款的組織。

蘇維埃共和國人民銀行，在一九一八年已經實行了對收歸國營的，以及私人的企業的信用貸款。以鞏固已收歸國營的工業和準備繼續工業國有化爲目的的國營企業之全面的支援，已是人民銀行信用工作的基本任務。因軍事的破壞和將企業在銀行活期帳戶的存款匯往國外，隱藏起製成品而不發放工人工資的資本家之奸猾的怠工的結果，致收歸國營的企業的財政狀況已完全被損毀了。他們都迫切的需要銀行的有力協助。人民銀行曾以信用貸款，接濟了收歸國營企業和那些已建立工人監督，比其他私人企業有優先權的企業。銀行分會將信用貸款的主要視線轉移到收歸國營的企業上，保證對他們有力的支持，在私人資本主義的虧損中促進了國營企業的鞏固。在人民銀行總管理處信用貸款上，對於各地支行在經濟信用範圍，銀行的主要任務會有下列的決定：「堅定的和不动摇的執行對國營工業在其與私人工業的鬭爭中的維護政策，……全面的促進仍繼續其利己主義目的的私人企業，向工農國家手中的過渡……」①。「爲了實現銀行支行這一任務，曾提議，對於已經或正在轉渡於國家手中的企業，予以最大的重視和對於他們提供特別有力的支持……」②。人

① 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公報，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四日。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② 同上。

民銀行曾放與那財政狀況特別拮据的收歸國營的企業以無利息的貸款。祇莫斯科人民銀行業務局一家，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月所放出的無利息貸款總數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①。人民銀行對收歸國營的企業常時不根據其信用能力而予以貸款。

在私人企業信用貸款時，以及同樣在活期帳戶款的支付時，蘇維埃政權曾普遍的容納了工廠作坊委員會的意見。國民經濟蘇維埃爲了這一決定，曾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命工廠作坊委員會的聯合會和對生產的工人監督機關的代表，參加了人民銀行支行附設的清算貸款委員會。在企業請貸的審查時，要附有工廠作坊委員會市或區聯合會的按語。在按語中須指明，第一、該企業事實上需要週轉金和無銀行貸款便不能渡過難關，第二、該企業是在爲一般國家的利益而工作。在銀行付與貸款時，要取得工廠作坊委員會的保證書，在保證書中寫明，委員會與管理處共同負責抵押品的保管並於信用到期時歸還帳款。抵押品的性質，凡屬於企業的商品原料的貴重物品——從原料和製成品到企業的設備都包括在內，一律通用。工廠作坊委員會的保證書，是在對銀行有債務的企業的所有主和管理人逃亡或簡單的怠工的幾次事件之後，到一九一八年三月中旬銀行纔提出的。

如果信用到期，企業不會歸還，銀行便將對該企業的工廠作坊委員會的申訴轉遞到工廠作坊委員會區或市聯合會。工廠作坊委員會並應負責考察照指定開支了的由企業從銀行所獲之款。人民銀行莫斯科業務局甚至曾經過莫斯科國民經濟蘇維埃，實行了關於對企業特別監督的，由各該企業的工人委員會組成而有地方國民經濟蘇維埃代表參加的委員會組織的法令。監督委員會應對由工商企業從人民銀行貸付之數的正當開支予

① 人民銀行莫斯科業務局管理處會議記錄——莫斯科州總文獻。

以考察^④。更要注意的是，銀行很少作過檢查，工廠作坊委員會是否在監督貸款照指定運用。因此，對銀行的保證書，在某些工廠作坊委員會已變成空洞的形式了。但是在許多場合，工廠作坊委員會曾強制達成了從銀行所獲之款的正當運用，或曾警報銀行管理處不照指定運用貸款的事。譬如：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銀行莫斯科業務局管理處的會議上，審查了大考斯特洛穆亞麻製造廠工廠委員會的通訊報告，在報告中曾指出，由帆布儲藏抵押放予工廠的一、二〇〇、〇〇〇盧布指定購買亞麻的貸款，已消耗在其他的上了，而工廠中原料的儲備枯竭，再經過幾天即將中斷。大考斯特洛穆製造廠的工廠作坊委員會請求銀行告誡該企業的管理處。而證明在銀行所受貸款正確開支的工廠作坊委員會之相反的報告亦曾有過。譬如，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人民銀行莫斯科業務局管理處的會議上，曾審查了愛伊涅穆工廠中工廠作坊委員會的報告，在報告中指出，以財政票據交換形式所放予的五〇〇、〇〇〇盧布貸款，已用在發放工資和購買原料之上了。工廠委員會曾檢查了信用帳戶中的一切開支，並協助了工廠管理處關於新貸款撥付的申請^⑤。

到一九一八年二月中旬，除人民銀行外，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下的財政供應特別審議會和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生產部，都曾研究了對收歸國營的企業和私人企業信用貸款的問題。貸款申請書係呈遞到此三個機關的任何一個，而當時是向三個機關一齊呈遞。財政供應特別審議會獨立的自屬於該審議會管理的特別軍事基金中發放過從一個月到五年期間的貸款。

對貸予款開支的監督，已委託給工廠作坊委員會及其聯合會^⑥。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各部除收歸國營企業的財政供應外，亦曾從政府所設立的工業財政供應基金中，放放了短期貸款。這與唯一的人民銀

④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⑤蘇俄人民銀行莫斯科業務局管理處會議記錄——莫斯科區文獻。

⑥莫斯科區文獻。

行一切信用業務集中化的政策是相矛盾的。所以，人民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六日曾頒布命令，除人民銀行外，禁止任何機關對企業貸款^①。財政供應審議會曾被撤消，所有由它所決定的貸款，都被移轉到人民銀行的對照表上，人民銀行則償補了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在對企業貸款上所已支出之款。信用貸款已集中於唯一的人民銀行，在人民銀行之下則設立了一個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

最初，人民銀行總管理處會打算將所有遞到人民銀行的各地方支行貸款申請書，都集中到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但是這種集中化的本身，並未避免且適證明於事有害。彼得堡的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會完全阻塞了地方上一萬至二萬盧布貸款的申請。這是因貸款極度遲緩的必然結果；銀行分行很少在申請書送到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後經過一個半月至兩個月得到企業貸款的決定的。

結果，急需信用的企業，需要無間斷的信用支持的收歸國營的企業亦包括在內，便延遲了工資的發放或其他迫切的生產上的開支。爲了調整地方上貸款的過程，人民銀行總管理處於一九一八年六月曾爲支行規定以票據交換和貨物抵押形式獨立貸款的一定限度。超過此限度以上的貸款，支行即須將貸款申請書，連同其按語和必要資料送交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而取得其同意。以票據交換形式獨立貸款的限度，彼得堡和莫斯科業務局均爲三〇〇、〇〇〇盧布以內，其餘的業務局則爲二〇〇、〇〇〇盧布以內，分行則爲一〇〇、〇〇〇盧布以內。

① 試舉特別會議指示對付出貸款監督法規的決議案爲例：決定放于亞拉巴耶夫礦山工廠組和管理處貸款六百萬盧布，年息1%，五年爲期，款由軍事基金撥付，將來自工商部企業財政供應基金中補償；該款經過彼得堡工作會議撥付，俾便在其監視和工廠委員會的監督之下開支；此外，指派工廠會議的代表到政府監察官組合管理處和工廠管理處，囑託彼得堡工廠會議對財政供應特別會議代表批准的特定任務上推舉候選人，並應有工人代表參加管理處機構。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② 二十年來蘇聯的貨幣流通和信用制度，國家財政出版局，一九三九，八頁。

〇、〇〇〇盧布以內。貨物抵押信用獨自決定貸放限度，莫斯科和彼得堡業務局爲五〇〇、〇〇〇盧布以內，其餘業務局爲三〇〇、〇〇〇盧布以內，分行則爲二〇〇、〇〇〇盧布以內。

蘇維埃政權鞏固了銀行事業的集中化，並企圖樹立信用紀律，使銀行習慣於實行對享受信用的經濟機關工作的監督。地方清算貸款委員會，不取得企業的本年對照表，預備開支的預算書，預備抵押的貨物財產目錄，或註明對抵押品保管的保管方法和負責人的其他保證，以及地方國民經濟蘇維埃對該申請書的按語，便無權審查企業的申請書^④。當時給予支行的命令，是在審查貸款申請書時要檢查：A.企業對貸款的實際需要，B.企業的信用能力。爲此，在必要的場合，銀行有權「指定對呈遞貸款申請書的企業進行技術和財政的檢查」。當貸款放予之後，銀行支行即須保證「對擔保以及貸款正當使用的監督和檢查」^⑤。銀行支行有權對其貸款的企業實行檢查，乃至委派自己的代表參加其管理機構之權。

在這種場合，即當人民委員會決定關於貸與任何企業貸款問題時，人民銀行便注意到對其工作的監督了。

例如，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委員會的會議上，曾經審查了關於紡織業中央部各企業爲發放人工工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製成品抵押貸款問題。從而發現，收歸國營的企業中的叛逆者（工程師，工廠的老管理人）在遲滯商品的實現。人民委員會曾提議規定對商品向糧食部商品交換部和向貸款企業的人民銀行運送的嚴格監督^⑥。

④ 人民銀行通報，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七日——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⑤ 同上。
⑥ 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⑦ 人民銀行通報，九十月期，一九一八年九月十日——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在一九一八年困難的條件下，銀行紀律的破壞已是部份的現象：第一，企業的信用能力，已不能成爲對收歸國營企業貸款的必需條件，這些企業須待支持，尤其資產階級曾用盡方法企圖破壞收歸國營企業的工作；第二，許多收歸國營的以及私人的企業的財政狀況，因軍事破壞，通貨膨脹和資本家怠工的結果，已是非常困難的。在許多場合，拒絕貸款就是表示，將不會再有工資發給工人。最後，在銀行中資產階級的專家們則用盡全力破壞黨和政府所引導的爭取信用紀律鞏固的鬥爭。

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每天總要接到十個由代表蘇維埃，國民經濟蘇維埃，職業團體，以及由各企業工人大會打來的電報，都談到，拒絕貸款即表示工資停發和生產停頓等等。發付貸款即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進行的，當時貸款的償還是沒有保障的，而地方的清算貸款委員會又曾反對放予貸款。是的，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初，代表蘇維埃之下的莫斯科區經濟委員會向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申請，對幾個屬於收歸國營的莫斯科的工廠總數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信用貸款，因爲這些工廠處於極危險的財政狀況，甚至連發工資的錢都沒有了。銀行的莫斯科業務局曾派員到彼得堡反對這種貸款，曾指出，「因企業之薄弱的信用能力及其財力的不充裕，貸款是沒有充分保證的」^①。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則建議莫斯科業務局放予貸款，因爲企業以資金缺乏，已處於工作停頓的威脅之下了。

甚至在人民委員會的會議上亦時常研究到，其財政狀況不能保證貸款償還的工廠的信用貸款問題^②。是

①同上。②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中間，人民委員會幾乎每日都接到由地方蘇維埃，國民經濟蘇維埃和職工會等機關對銀行的控訴。在控訴中指出，銀行官僚主義的遲滯發付貸款，及有關的瑣事等。遲滯貸款發付，第一是因爲銀行總管理處，如前所述，未即遵規定支行自主發付貸款的極限和爲對所有貸款的決定，其中大部都轉呈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第二是在銀行機關中怠工和叛逆行爲的結果。但是這許多對銀行的控訴都是無根據的，因爲工廠作坊委員會和地方蘇維埃常常祇是根據這樣的申請：「破產的狀況——沒有錢」，就要求銀行放與貸款，在銀行的要求，則是審判獲得某種物資和規定信用保障等等。

的，人民委員會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七日的會議上，對於銀行曾拒絕賦予貸款的威克萊工廠的信用問題，作了如下的決議：注視了威克萊工廠之非常困難的狀況，特命令國家銀行的莫斯科業務局，即速放予威克萊工廠以製成品和全部工廠財產作保證，並在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採礦冶金部對該貸款開支監督的條件下，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貸款^①。在由叛逆者所阻塞的和不够熟練的銀行機關的自身方面，爭取銀行紀律加強的鬭爭則作得很壞。甚至像保證檢驗這種信用工作的基本規則都不曾執行。譬如，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彼得堡業務局第十五分行的抽查，發現商品抵押貸款計一五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擔保品的總數則祇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一九一八年銀行信用形式如下：一、以票據交換形式和商品抵押的短期貸款；二、以票據和商品作保證的特別活期帳戶；三、無記名票據信用。商品抵押信用是最流行的形式。是的，從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迄二月二十四日這一期間送到莫斯科業務局去的貸款申請書，計總數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中，聲明商品抵押信用的即佔了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②。反之，以票據交換形式的信用，如果不將遵照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委員會命令決定的，以三個月為期的票據轉讓計算在內，則祇佔了極小的百分數。商品抵押信用的優勢，差不多是因戰爭和經濟瓦解的結果商業票據的完全消失所引起的。

許多收歸國營的和私人的企業的財政狀況，因過去資本家怠工的結果，已是如此嚴重；最迫切需要的信用要求，常常已非照銀行章程可以用作抵押的企業中所有的商品儲備足以彌補。所以企業當時在貸款的聲請書中申明，在清算上所能提供的祇有財政的票據。

①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委員會會議記錄——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②莫斯科州文獻。

人民銀行莫斯科業務局管理處的會議錄證明，關於財政票據交換的申請書已是普通的現象。各企業在申請書中都是以管理處無款收入，為與工人結帳無錢等為口實。

是的，沃爾日·得涅卜洛夫木材工業公司『沃爾豪列斯』曾經申請放予他商品抵押貸款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財政票據交換形式的貸款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後者的理由是，『公司係在週轉困難中工作，深感週轉金的不足，這種狀況逼得公司逐漸緊縮工作，假如這種狀況不予改善，工作完全停頓的問題即將面臨』。斯巴西克銅礦股份公司曾請求以財政票據交換形式放予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貸款。在申請書中指出，『金櫃中現鈔的缺乏，不僅威脅着公司企業自身的破壞，並且還威脅着二千五百個工人的生活，這種情形已為斯巴西克工廠的工廠作坊總委員會的電報所確認』^⑥。

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曾決定這一貸款的條件是：地方代表蘇維埃承認該企業緊迫的財政狀況。在地方代表蘇維埃或國民經濟蘇維埃特別按語的證實下，銀行便同樣以企業署名票據交換的形式放與貸款。以財政的和署名票據的交換形式的貸款，祇有根據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的決定發放。因而對這種貸款開支的監督，便被委託給地方國民經濟蘇維埃或代表蘇維埃的經濟部。是的，根據莫斯科區經濟委員會的申請書，貸與莫斯科的幾個工廠的署名票據交換形式的貸款，銀行即規定了這樣的條件：此貸款帳戶款的支付，將祇根據由該委員會檢查過的支票辦理，該委員會應負責對貸款照指定利用實行實際的監督^⑦。

除收歸國營的和私人的工業外，蘇俄人民銀行並曾貸款與國家的糧食機關，私人的商業機關，以及各種

⑥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和二月二十四日人民銀行莫斯科業務局管理處會議記錄——莫斯科州文獻。
⑦ 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的合作社。並曾貸與消費合作社以採購糧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貸款。惟須這種採購是由糧食機關決定的。銀行對於根據同承包人所締結的合同不超過合約總數百分之二十手續費的給與，亦同樣可予貸款。發放信用是以商品抵押貸款，票據交換和特別活期帳戶形式貸款。生產合作社除商品抵押信用外，並曾獲得以未來的生產品作抵押的銀行貸款。信用合作社不僅享受了週轉金的短期貸款，並曾享受了長期貸款。

最後，在一九一八年，銀行曾對有價證券的小持有者貸放了已宣佈無效的有價證券抵押貸款。貸款的授與係根據考察有價證券持有者需要委員會的適當證明書辦理。名義上貸款是以百分之五十的比率發放，但每人以不超過五千盧布為限。在持有有價證券為數五百盧布以內的小持有者，銀行便將已宣佈無效的證券予以收買。

在一九一八年上半月，人民銀行在經濟中信用投資的數目已相當巨大。從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到七月一日，收歸國營的和私人的工業，向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請求貸款總數約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申請經允准的計七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這個數目中的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曾是貸與北方區的收歸國營的和私人的工業的^④。

無間斷的經濟信用加重了貨幣的饑荒。在各省特別感到現鈔的缺乏。人民銀行的許多支行差不多不曾獲得中央的貨幣支持：一個原因是因為交通聯繫的破壞，而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中央現鈔不夠。現鈔的缺乏有力的限制了對經濟的貸款。銀行的分行常常報道，因為銀行中沒有現鈔，對貸款支付的決定，無法執行。是的，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間，在斯塔夫洛包爾分行的信中曾指出，「從去年九月起即不曾獲得中央的支持，銀

④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⑤統計字取自國民經濟蘇維埃第一次全俄代表大會連記的總結報告，二二頁，一九一八年。

行裏確乎沒有現鈔。其所發行的本票（地方性鈔票），並不能滿足全部的需要……。銀行接受放付貸款的決定，但沒有現鈔足以使這種決定實現」^①。其結果，貸款之實際付出的數目，要低於經由地方的或中央的清算貸款委員會所開放的信用很多。莫洛托夫在國民經濟蘇維埃第一次全俄代表大會上說道：「在彼得堡成立有貸款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僅在辦理彼得堡的工廠的核算，並辦理全俄的工廠的核算。由貸款委員會允許從銀行支付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貸款，我們祇得到半數」^②。烏拉爾國民經濟蘇維埃的代表在同一次大會上指出，烏拉爾工業信用的需要，還遠未完全由銀行所滿足。「在一月間，工廠的需要，就一般的概算，為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貸出的則祇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二月間，需要為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貸出的則祇五二、八七〇、〇〇〇盧布。在三月間需要數為一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在這個月的準備貸出數則祇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四月間，需要一六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因為又有收歸國營的工廠加入，而貸出數則為八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儲備的不足中即說明了財政供應的缺乏」^③。

因此，貨幣的饑荒致使人民銀行不得不極端收縮經濟的信用。這種情形，對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企業的影響較小，而對於處於距中央遙遠地方的企業影響則較大，因為在各省所感受的貨幣饑荒較為嚴重。

①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②國民經濟蘇維埃第一次全俄代表大會言論集——速記的報告，一九一八年二三七頁。

③同上，二

第三節 一九一八年國營企業的財政供應與蘇維埃共和國人民銀行的作用

關於一九一八年收歸國營的工業部門的財政供應問題，是一個具有極大興趣的問題。收歸國營的企業的財政供應，是蘇維埃政府在與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的猛烈鬭爭中，第一次在世界上創立社會主義工業的措施連鎖中最重要的一環。我們並不預備研究國營工業的一切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並不是我們研究的對象^①。我們將祇在他與蘇維埃共和國的相互關係的角度下，研究關於國營工業的財政供應問題。

從蘇俄人民銀行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遇到了關於對國營企業必需的貨幣資金的供給問題。

從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時期到一九一八年六月，政府曾國有化了五一三個企業，其中有二一八個企業，或百分之四二係屬於冶金和金屬製造工業^②。上面曾經談到，在這個期間，國有化會促成企業家的怠工。許多非常重要的企業已完全被資本家破壞了。黨和政府克服了巨大的困難，整補了被資本家破壞了的生產。政府在考察了收歸國營的企業之艱窘的財政狀況和對其予以廣泛的財政支持的必需之後，除了銀行的信用之外，並爲了當前的工作還從國家預算中提取了一筆款給這些企業。收歸國營的或已被代管的企業的財政狀況經常是如此艱難的，人民銀行明顯的預覺到，這種企業絕對無法償還信用。是的，在代表蘇維埃莫斯科區經濟委員會會爲其申請信用的莫斯科收歸國營的企業方面，人民銀行總管理處會乾脆的指出，這些企業的經濟狀況不夠「銀行對於以任何形式的信用所規定的要求，這些企業應獲得補助金形式的財政支持。」^③

^①關於收歸國營工業財政供應細目，參看里字鑑著：「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和進行時期的財政和信用」，德雅琴教授著：「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第一階段的蘇維埃財政」，一九四七年，國家財政出版局。^②國民經濟雜誌四期，四五頁，一九一八年。^③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在一九一八年的第一個月，收歸國營的企業爲了當前的作業首先獲得了對他們不充足的人民銀行信用形式的貨幣資金。但是這些信用，實質上亦即不歸還的資助，因爲貸款到期並未歸還，而又延期了。除人民銀行的信用外，收歸國營的企業並曾從國家預算中獲得了撥款，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國家預算上曾列有國營企業開支彌補和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業務開支總數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特別基金。這筆基金係列在預算中的『特別預備費』項內，這筆款即根據人民委員會的特別決定在各個個別事件中開支了。

因爲收歸國營企業之艱窘的財政狀況，在國營工業目前開支彌補的資源上國家預算中資金供應的比重，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底已有銳利的增大。

卽如一九一八年五月在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向人民委員會的報告書中所報道的^④，預算中這筆款，用於彌補國營企業目前開支上的，要佔到百分之八〇。據收歸國營企業之不完整的估計，一九一八年由預算中資助各工業部門的數字有如下表^⑤：

上表證明，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當時還沒有實行所有大工業的國有化，在收歸國營企業財政供應上預算中的支出，卽已達到可驚的數字——七五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個數字的內容很瞭然的說明這樣的比較：一

④同上。

⑤無產階級專政兩週年，六一頁，一九一九年，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出版。

	1918年上半年預算中的支出數	1918年下半年預算中的支出數	1918年預算中的全部支出
	單位百萬盧布		
對工業需要支出及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各部費用總數.....	758.95	4,528.71	5,287.66
1. 冶金工業	249.40	396.50	645.90
2. 紡織工業	177.60	2,316.70	2,494.40
3. 化學工業	46.10	667.90	714.09
4. 石油工業	100.00	—	100.00
5. 木材工業	99.50	483.60	583.10

九一八年上半年，在所有國家機關，各種行政，裁判，監督機關費用開支上預算的支出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換言之，要比在少數收歸國營企業現時活動的財政供應上的支出少一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在一九一八年下半年，當六月二十八日人民委員會命令實行所有大工業國有化之後，在收歸國營企業財政供應上，從預算中支出的數字即增加到四、五二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個財政供應量之巨大的增長，不僅是由收歸國營企業範圍之顯著的擴大（到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為數已達一、〇四七單位）所引起的，並且，主要的是因為內戰的擴大由於國營工業工作條件的改變所引起的。

關於以何種形式保證對國營工業支持所需要的資金問題，——以償還的銀行信用形式抑用不償還的資助形式——當一九一八年的上半年，即已在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財政部和人民銀行中不祇一次的檢討過了，從而，因收歸國營企業之艱難的財政狀況，致對其當前的需要不得不是不償還的資助，已由若干的經濟學家將供給企業資金制度，作為社會主義企業特有性質而評價過了。這樣便給了人民的敵人——「左派共產主義者」——一種便利，他們反對國家的清算和監督，反對為了監督的實行對唯一的人民銀行的利用。

在收歸國營企業財政供應正確途徑的尋索中，出現了各式的關於收歸國營企業財政供應的方案。可以將他們分為兩派。第一派（主要是從人民銀行作出發）提議實行收歸國營企業財政的供應祇須經過人民銀行，將企業財政供應問題中的決定作用授予人民銀行。是的，在蘇俄人民銀行莫斯科業務局的方案中曾說道：「人民銀行應成為國家生產財政供應的總的國家機關……對收歸國營的企業週轉金的供給，應經過中央的和地方的清算貸款委員會而授權予人民銀行。企業的考察及對其在技術財政方面活動的監視，由地方的國民經

濟蘇維埃和人民銀行分行負責」^①。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間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會議上所通過的「關於收歸國營企業財政供應的原則」中，亦有同樣的論調^②。第二派（係特別從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和財政部出發）曾提議收歸國營的企業的財政供應歸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負責，而人民銀行則祇根據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命令保留出納的履行。

是的，財政部長古夫斯基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會議上，對於收歸國營的企業財政供應制度曾有如下的提議：「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決定補助金的數額，從而，銀行便祇是執行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命令，亦即是他的出納員」^③。經濟政策委員會的主席拉林於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擴大會議上，在其關於收歸國營工業財政供應的報告中亦曾提出同樣意見。他說，「工業的財政供應完全由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決定，而銀行祇能保存履行記帳的金庫的作用」^④。

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擴大會議認為，過渡到一切收歸國營企業完全有預算的財政供應是必要的，曾決定將此有預算的財政供應制度，以試行的形式先在幾個大工業城市中採行，如彼得堡、莫斯科、哀卡捷林堡、奧穆斯克、羅斯托夫。

被通過的有預算的財政供應制度如下：

- ①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②在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會議所通過的「立場」中說：「所有在蘇俄境內而具有工商業性質的企業，農村經濟的國營企業，以及需要週轉金的各種企業，都專由人民銀行供應財政，除人民銀行外，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開放信用，賦予貸款和一般的經營類似的業務」。「在人民銀行此種或彼種的信用和貸款的決定時，應首先注意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及其地方機關（國民經濟蘇維埃）關於請求信用的企業和機關之經濟和財政狀況的評語，因為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是管理國家生產和農村經濟的機關」——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③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④同上。 ⑤同上。

一、收歸國營的企業須按季一次提出自己收支細目預算於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其所隸屬的中樞部，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以預許的性質批准預算，並指令企業以預算的帳戶從國庫款中撥給預付金。

二、企業和經濟部門的預算，由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預算委員會作最後批准，爲了包容在國家預算中，預算委員會即將其列入由國庫授予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對收歸國營企業需要上支配的基金類。

三、准許企業變更預算內部信用的用途，以及支付新的未被預算所預列的開支，惟爲數不得超過他支付款的百分之十。關於一切預算內部信用的移置，企業須以定期的決算報告向中樞部陳報關於本季預算的執行情形。

四、准許人民銀行業務局在預算帳戶上付與企業以原料和物資儲備及其他定期開支的預付金。預付金數目以該企業預算第一個月開支爲限。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各該中樞部或地方國民經濟蘇維埃財政供應部關於批准的企業預算證明書，即作爲支付預付金的根據。銀行業務局的清算貸款委員會在接獲此證明書後，負責作出關於從銀行款中支付預付金的通知單。銀行業務局將此通知單的副本送交國庫局，國庫局則自對企業批准的預算中扣除付出的預付金，而將款記入人民銀行的庫裏，以償還預付金。爲了支付預付金業務，人民銀行業務局應開立「對收歸國營的和被代管的企業預算預付金支付的特別帳戶。」

五、在國民經濟蘇維埃和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各中樞部之下，設立對企業活動和爲審查企業預算執行決算報告的監督部。必要時監督部得指令企業檢查，根據檢查結果採取措施，直至停閉企業爲止。

六、私人企業在蘇俄人民銀行請求貸款，則根據普通程序，最適當的形式是以物資貴重品作保證放與企業以貸款。根據清算放款委員會的決定貸款與私人企業，但是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各中樞部和地方國民經

濟蘇維埃則負有對獲得貸款的私人企業的監督之責。

因此，一九一八年四月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對收歸國營工業完全有預算的資助的過渡的決議，最初以試驗的形式規定了一種財政供應的制度，根據這種制度，人民銀行僅祇保存了聽從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命令的出納執行人的消極作用。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所採行的廢除收歸國營企業在人民銀行貸款，實行國營工業預算的財政供應制度，對於這一片刻的時間——布萊斯特和平協定締結後短暫的喘息期間——是有些過早的。收歸國營的企業在製成品實現和原料、燃料、物資的採購方面，還保持着獨立的經濟業務，從而，便需要短期的借貸資金，並曾具有獲得這種資金的基礎。所以人民銀行對收歸國營企業的貸款便被繼續下去了。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所提議的財政供應制度，祇在彼得堡收歸國營的企業中普及了。北方區國民經濟蘇維埃所批准的工業財政供應的訓令，差不多與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擴大會議所通過的關於工業財政供應的立場完全相吻合，祇是在彼得堡工業財政供應的訓令中，將國民經濟蘇維埃在私人企業的信用上的作用被提高了。在該訓令中說道：「私人企業應將經工廠作坊委員所承認的申請書，連同一切必要的資料，不是向銀行提出，而是向北方區國民經濟蘇維埃的財政供應部提出。」在將申請書的內容先行了解之後，如有必要，供應部即命對提出申請書的私人企業實行技術和財政的審查……」。凡是所收到的根據供應部決定獲准的私人企業的申請書，都送交人民銀行的清算貸款委員會，貸款委員會即予該企業開立一定數目的活期帳戶，並即刻通知供應部，俾便對於向該企業所放信用的開支建立直接的監督和照規定按時歸還貸款的監視」。從而，在私人企業貸款關係上，人民銀行的作用，根據這一訓令即是要執行國民經濟蘇維

①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埃的命令。

在彼得堡，在收歸國營工業預算的財政供應制度之實際的實行時，人民銀行的作用，較之北方區國民經濟蘇維埃事前批准的這一訓令，曾顯示了更多的積極性。人民銀行彼得堡業務局事前亦曾審查了企業的預算，北方區國民經濟蘇維埃批准預算，是取得銀行的同意的。銀行以商品抵押貸款形式對收歸國營企業的信用（除財政供應外），已是從所採行的供應制度的第二次退卻，因此，假如在企業方面，已經有了足夠的商品數量，能以向銀行抵押，預算的財政供應便為商品抵押信用所代替了。最後，以預算帳戶對企業預付信用制度，實際上曾有很久的耽擱，因為預算經遲延很久才被批准。

在莫斯科，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關於收歸國營企業財政供應制度的「原則」，並未實現。收歸國營企業仍然是在人民銀行中獲得信用，特別是商品抵押信用。人民銀行莫斯科業務局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法令公佈之後，曾一度停止了收歸國營企業的貸款，經過一些時候，——遵照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命令——便又重新予以貸款了。

關於給與收歸國營企業以財政援助問題，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五月十七日人民委員會的會議上，都曾予以研討。

估計了收歸國營企業之艱鉅的財政狀況和蘇維埃國家予以財政援助的必需性之後，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委員會即作了一個決議，由國家預算的節餘項下彌補從預算中所規定的在當年收入上企業的虧損。同時，將收歸國營企業向人民銀行的貸款則仍予保留。

根據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委員會關於收歸國營的和代管的企業發放預付金的決議^①，曾經決定發付各該企業的預付金，以不超過預算案兩個月需要為度。並曾決定，預付金不是從人民銀行的款中支付，即在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原則」中指示，而是根據中樞部和地方國民經濟蘇維埃同意和批准的企業預算的保證書，從國庫款中支付。

爲了預付金的獲得敏捷簡便，於一九一八年五月末，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曾以命令撥付了專「爲補充國民經濟當前迫切需要」的週轉基金^②。

在預算批准以前，已從基金中付款給企業了，如此，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生產部即須檢算各地方款的需要。從週轉基金付出的款，根據預算的批准，則由適當的支出項內予以扣還。根據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所擬定的關於週轉基金的規定，處於「過渡狀態」中的（即暫時仍處於舊工廠管理處指揮下的或借予私人資本家的企業）收歸國營企業曾從人民銀行中獲得了信用，如此，清算貸款委員會在對這些企業關係上的機能，便移轉到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及其有銀行代表參加解決貸款問題的機關了。信用的給予，係以有商品物資實物保證抵押和「根據合約由企業和機關負責償還」的定期利息貸款形式。「負責償還作抵」的貸款，係根據由企業以出售生產品清結銀行帳戶的擔保發放。生產品出售的貸款即用以償還在人民銀行所獲得的信用，如果貸款是由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週轉基金中所發放，即用以歸還此基金。處理一切企業基金和週轉金之權，專屬於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地方性質的收歸國營的企業的財政供應，由地方國民經濟蘇維埃辦理，而遇有

^①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九九期，一九一八年。
^②家總文獻。

^③關於爲工業需要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週轉基金的法規——十月革命國

特別使命的一定數目的決算書，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則免于地方國民經濟蘇維埃處理。

因此，在一九一八年中，收歸國營企業已有了下列財政供應的資源：（一）以適合批准的預算或以經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機構同意的預算作抵的預付金形式的國庫款；（二）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週轉基金，在這個週轉基金的帳戶上『對迫切需要』撥付預付金；（三）蘇俄人民銀行的貸款。除普通的商品抵押貸款外，人民銀行曾在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預付金帳戶上，或者在他們持有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適當的執照的情形下從國家預算支出項內，給與了收歸國營企業以短期貸款。從而，收歸國營的企業便有了幾個財政供應的中心：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及其各中樞部（對於糧食機關是糧食部），國庫和蘇俄人民銀行。企業會利用這幾個財政供應中心的存在，祇要有可能便竭力的到處去張羅錢（但錢仍不夠，因為貨幣在迅速的貶值）。不久以前曾是這些企業的主人的資產階級的專家和走狗，仍在收歸國營的企業中繼續工作，便使情形愈行複雜了。資產階級的專家們以叛逆為目的，會竭力的從一切可能的資源中竊取大量的貨幣，俾便加強國家的貨幣流通和財政的混亂。另一方面，更注意到一個相反的現象，當時財政供應機關的衆多和他們中間缺乏機能的顯明界限，致使企業資金的獲得有很大的延擱。由叛逆者充塞的國庫機關，當時阻滯了急需資金的收歸國營企業之財政的供應，而期望破壞他的工作，對於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及其地方機構關於付款給收歸國營企業的命令的執行則實行怠工。國庫機關中的叛逆者所提出的口實是，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所同意的收歸國營企業預算的保證書，他們還不充分，又重新開始企業預算的審查，而將收歸國營企業預付金的支付，拖延非常長的時間。

是的，一九一八年七月，毛織工業事務委員會的工人集團曾向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報道關於毛織工廠的

瓦解狀況，國庫違背紡織業中央部關於撥付預付金的決議，對於毛織工廠已將為採購羊毛所必需的預付金的撥付，延緩了兩個多月了^①。炭酸工廠方面亦有同樣的情形，雖說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三番幾次的命令，而且第二次的命令是由人民委員會所批准的，而國庫和人民銀行的官僚們卻始終不曾付款。這個工廠的工人拖延很久的時間不曾得到工資。在國庫和人民銀行中叛逆者方面，對收歸國營企業財政供應怠工的類似事件已非常之多^②。資產階級的專家們除了直接的叛逆行為外，曾經利用供應機關的衆多，以阻撓對收歸國營企業資金的供給。在工業財政供應的進行上，亦同樣非常相反的反映出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人民銀行和國庫間機能的顯明界限的缺乏。是的，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各機構，就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的地位來說，他具有在人民委員會中對貸款委員會的決議提出異議之權，而常常簡單的即廢止了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的決議，甚至連廢棄的原因也不說明。這樣便造成人民銀行與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之間的無限的磨擦，而有力的延緩了對企業資金的撥付，因而，在大多數的場合，在對企業資金供給事務上，人民銀行與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之間機能的顯著界限的缺乏，正是在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方面將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決議廢止的原因^③。

①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②國民經濟蘇維埃第一次全俄代表大會言論集——速記報告，一九一八年。③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間在關於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對幾個紡織工廠放商品抵押信用的決議的取消問題上，人民銀行與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之間的磨擦，即是典型的例子。紡織業中央部的主席團決定取消關於由人民銀行放信用的決議，係依據下列的考慮：a. 麻和絲的抵押貸款並非由人民銀行能以滿足，因為在亞麻的獲得上是由紡織業中央部的金庫裏放予各個企業貸款的；b. 紗、羅、防雨布及一般的製造品的抵押貸款並不能予以滿足，因為在一般基礎上根據成本計算的提供，用商品抵押預付金的撥付就可代替。人民銀行的總管理處曾對紡織業中央部主席團的決議提出抗議，認為這類信用的放法是人民銀行的特權。人民銀行與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間的衝突，曾由財政部予以排解，財政部曾站在銀行方面，然而紡織業中央部卻通知財政部，工廠已經獲得了必需的資金，銀行則不贊貸款。——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在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收歸國營企業的工作條件改變了。日益擴大的內戰和對戰爭及工業需要的物資來源的極端缺乏，在生產資金的補給制度和在收歸國營企業製成品的分配制度上，已經顯示了嚴格的集中化。向收歸國營工業集中化的管理和由國家儲備的或由收歸國營工業製造的物資之集中化的分配的過渡，即以此來說明。祇是對收歸國營的企業和被資本家破壞得最厲害的企業，蘇維埃國家方面之廣泛的財政援助，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供應和分配的集中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企業已喪失了經濟的獨立性，便正適合企業之預算的供應了。反之，銀行的信用已經不祇是經中樞部即足以負責建立供應和分配的制度。估計了因戰爭條件而發生變化的國家經濟生活，以及以消滅財政供應中心之有害的——對於企業的工作和對於國家的預算——衆多起見，人民委員會曾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以命令建議人民銀行，停止對屬於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完全管理的企業再繼續貸款，並照預算的財政供應的規定特別供給他們資金。因此，人民委員會曾准許人民銀行在先前的基礎上，對那曾被收歸國有，而又租借給私人所有者的企業貸款。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亦即人民委員會決定之後經過了兩個月，人民銀行的總管理處才責成自己的支行『停止開放信用和給與收歸國營企業貸款』，曾指明，『原先放與所謂企業的貸款，要以其轉列於預算項帳戶上的方法扣還』。事實上，直到一九一八年年底，人民銀行還曾對收歸國營企業繼續貸款。

這主要的是因為到一九一八年年底，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初，製成品的供應和分配的集中化制度，還遠不會被所有收歸國營企業所奉行。收歸國營企業為獲得原料、物資和燃料，向人民銀行請予貸款，而附有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月日期的申請書，證明企業不祇是經過中樞部獲得供給，並且還在獨立的進行。中樞部

的本身祇分配到非常少的基金，曾祇是多少補助的供給了對保衛國家最重要的企業。其餘收歸國營企業補給得非常之壞，爲使生產不致停頓，勢不得不向關係方面實行購買了。所以根據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命令，爲獲得原料應經過人民銀行用簿記登記和在非常情形下用銀行支票結算的收歸國營的企業，還繼續向銀行要求現鈔和爲儲備的貸款。是的，一九一九年初在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對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一個報告書中說道：「生產原料和工具的獲得，在最大程度上是由企業從小生產者那裏，用現鈔買來的」^①。在報告書中更指出，收歸國營企業方面現鈔的需要非常之大，特別是在各省^②。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北方區國民經濟蘇維埃的決議中指出，不僅各個工廠和作坊，在許多場合，甚至北方區國民經濟蘇維埃的各部各課，假如對方不是很快的以現鈔結算，也不撥付物資給其他蘇維埃的企業和機關。北方國民經濟蘇維埃曾斷然的向一切機關和企業建議，要用劃帳的方法撥付物資，不用現鈔清算^③。

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在其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對分行的訓示中，責成對私人的和合作的企業仍照原先的法規貸款，而須遵守關於貸款「須注意該企業信用能力和根據一般國家利益的觀點他具有的意義」這一問題的決議^④。

從一九一九年起，人民銀行已不對收歸國營企業貸款^⑤，而參加了預算供應，適應酷熱的內戰和強制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的實施。

①同上。 ②同上。 ③北方區國民經濟蘇維埃及經濟委員會週刊三期，一九一九年，七頁。 ④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⑤除具有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批准特許的個別情形外，直到一九一九年底短期的抵押貸款選佔有地位。

第四節 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人民銀行的組織結構

創立唯一的集中化的國家銀行之列寧計劃的實現，要求銀行機構之根本組織的改造。首先要改組的是中央和地方清算貸款委員會。在清算貸款委員會的機能中列入了關於對企業貸款問題的決定，而後首先須使他脫離私人資本的影響。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曾經頒佈過由列寧和斯大林簽署的，關於國家銀行業務局和分行屬下的清算貸款委員會改組的法令。這個法令規定了從代表蘇維埃中選舉清算貸款委員會委員的任務。代表蘇維埃在清算貸款委員會中的代表應該佔全體委員的三分之二，而私人工業資本家，商人和鄉村經濟主的代表則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人民銀行總管理處並會指示各業務局和分行，同樣要吸收信用合作社的代表參加清算貸款委員會的會議，特別是在討論關於對信用組合和儲蓄貸款組合及其聯合社的貸款問題時。一九一八年二月頒佈了關於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屬下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機構組織成份的法令：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代表一人，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三人，私人工業家和商人代表數目不得超過委員會組成的三分之一。國家機關的代表已在委員會中獲得了完全的優勢，關於不祇對收歸國營企業，乃至對私人企業信用給與問題的解決，都已由蘇維埃國家的政策決定了。

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即是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底照所指示的成份組織的。關於地方清算貸款委員會，則直到一九一八年中季，在許多業務局和分行中他們還未開始工作。是的，在下諾夫高羅，直到一九一八年四月底清算貸款委員會才在銀行業務局之下組織起來。在別爾莫則是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成立的等等。

雖然人民委員會爲了信用集中化的目的，曾建議祇經過清算貸款委員會實行對各企業一切資金的供給，而收歸國營企業，即如所已說過的，則仍繼續從幾種來源獲得了資金。在信用集中化方面，人民委員會的決議，實質上，祇是在私人企業方面實現了，私人企業唯有經過清算貸款委員會，在銀行中獲得了信用。此外，中央和地方清算貸款委員會，即如在本章第三節中所述，常常給資產階級專家中的叛逆者以機會，而阻撓了對極端需要款的收歸國營企業付與資金。因此，人民委員會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的會議上又重新決定關於清算貸款委員會的問題。清算貸款委員會的組織和活動曾被認爲是不滿意的。人民委員會會命令有財政部和人民銀行代表參加的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經濟政策委員會，限期擬定關於清算貸款委員會改組的法令草案。五月中旬委員會即向人民委員會提出了關於清算貸款委員會工作的法令草案，在草案中有如下的建議：

一、清算貸款委員會具有發放貸款、補助金和預付金的特權，但須根據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或其附屬機構的按語和具有該企業工廠作坊委員會的負責保證。

二、中央和地方清算貸款委員會得根據下列原則發放貸款：

A. 商品和貨單（副本，存貨目錄等）抵押；

B. 具有政府機關的擔保；

C. 在票據商品性質的條件下，商品票據抵押；

D. 收歸國營企業的預算抵押。

④同上。

三、在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的構成上包括：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的代表三人，人民銀行代表六人，最大工廠的工人代表十五人，總工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國家監察局，消費合作社中央部，信用合作社全俄中央部各派代表一人至二人。

委員會的草案，第一，在對收歸國營企業資金的供應上加強了清算貸款委員會的作用；第二，私人資本的代表已完全從清算貸款委員會的組成中排斥出去了。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間，人民委員會曾將法令草案交到更擴大的會議上（有國家監察局和對外貿易蘇維埃等代表參加）予以研討。但是，關於清算貸款委員會法令草案終未被人民委員會所通過。因為從一九一八年年底，隨着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數量的縮小和收歸國營企業向國家預算中預算的財政供應的過渡，清算貸款委員會的作用已經極度的降低。到一九一九年初便完全被解散了。

在一九一八年，隨着蘇俄人民銀行工作性質的改變及其機能的擴大，銀行的總管理處和業務局的結構亦便改組了。到一九一八年中季，人民銀行總管理處係由下列各部所組成：（一）地方機關部，管理過去私人銀行與國家銀行各支行合併，指導人民銀行各支行的一切工作。對相互信用社，莫斯科人民合作銀行和信用合作社的現金貸款，都是經過此部。與人民委員會的指示相反；這一部會與中央清算貸款委員會相併行，同樣審查了業務局關於對企業貸款的申請書。（二）清算貸款部。（三）活期帳戶和存款部。（四）經管抵押業務的商品部。（五）經管鈔票分配的信用券部。（六）有價證券部。（七）總會計處。（八）司法部。（九）經濟技術部。根據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日人民委員會命令，莫斯科合作銀行收歸國營併於蘇俄人民銀行總管理處機構之內，便設立了一個合作部，以指導信用合作社的工作和各種合作社的信用。

到一九一九年初，因經過人民銀行而實現的清算業務的擴大，及收歸國營工業向預算的財政供應的過渡，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結構已需要新的改變。根據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對人民銀行的命令，人民銀行總機關的結構特規定如下：

(一) 國家信用和銀行政策的一般問題部，這一部的機能包括：貨幣流通，經濟的財政供應和信用一般問題的研究；對國庫信用及其活期帳戶的指導；國家公債償還委員會事務的清理；對各支行及其檢查工作的指導。(二) 掌管私人企業的信用及其債務追還的資產部。(三) 掌管活期帳戶、存款、匯兌及經過銀行的交換組織的貸放部。(四) 國際清算部。(五) 收歸國營企業財政供應和國家機關國民經濟業務部。這一部應依據收歸國營工業及他們中間相互清算組織的預算法規，管理取償於國庫的財政供應，國家機關的採購、儲備及其他經濟業務上的財政供應（特別是糧食部和土地部）。(六) 掌管鐵道運輸機關清算出納業務及其預算的財政供應的鐵道部。(七) 服務於合作社的合作部。(八) 負責供應各地地方信用券和其紙幣的信用券部。(九) 總事務處。(十) 總會計處。(十一) 司法部。(十二) 經濟技術部。(十三) 商業銀行國有化和清理部。(十四) 抵押信用機關清理部。(十五) 鈔票製備部。

蘇俄人民銀行這個中央機關的結構，已大大的適應了他新的機能：收歸國營企業和機關間非現金清算的實施和銀行參加企業之預算的財政供應的實行。

一九一八年底，在蘇俄人民銀行的制度上，還實行了一個關係到大部業務局和分行的組織上的措施：即統轄銀行分行的區管理處制度。這一措施的任务是：人民銀行工作上之進一步的集中化和對分支行活動監督

◎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的加強，因為壞的郵政和交通聯繫，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對遙遠地區分支行工作的監督深感困難。區業務局首先應該作到的是，使他所管轄的支行在信用和貨幣流通範圍不違背一般國家的政策^⑤。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初，人民銀行莫斯科業務局即改組為區業務局。在莫斯科業務局的構成中包括：莫斯科、特沃爾斯基、雅洛斯拉夫斯基、考斯特洛穆、土耳其克、富拉基米爾，伊萬·沃茲涅辛斯克、雅贊斯克、卡魯日斯克、下諾夫高羅等省。

在這些省境內的一切信用機關，一切問題均須與蘇俄人民銀行莫斯科區業務局去交涉。在莫斯科區業務局這個例子上便很瞭然，區是由人民銀行許多數量的業務局和分行組成的。過後不久人民銀行北方業務局亦被改組為區業務局（從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即名為人民銀行彼得堡業務局）。一九一九年三月間，哈爾考夫，基耶輔和奧德薩的業務局便都改為區業務局了。人民銀行之組織上的改造即如此展延了一九一八年一整年，內戰和外國的武裝干涉已達頂點，致使蘇維埃政權不得不改變經濟政策，而同時改變人民銀行的使命。

蘇維埃政權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九一八年春和以後內戰初期，曾經克服了工人階級敵人的怠工

⑤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由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和財政部所批准的關於區業務局的規程中說道：（一）為使在各個區域範圍內人民銀行各分行活動的一致，中央政府一般的財政和銀行政策的措施在全區範圍內實行起見，特實行管理這些分行的區行制度。（二）凡區區聯合範圍的人民銀行的一切分行，在管理和報告書的規程上，都從屬於所在區的業務局，而構成這個業務局的外圍。（三）對於他區域內的各分行銀行業務的經營，以及同樣對於各分行活動之行政和經濟方面的正確步驟的指導和監督，都歸區業務局負責。——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和叛逆行爲，奠定了社會主義信用制度的基礎。在適合創立一般國家的銀行——對國家經濟的計算和監督機關——之天才的列寧計劃上，實施了使人民銀行工作集中化加強，銀行分行網擴大，交換業務發展，信用紀律加強的措施。熾烈的內戰和武裝干涉，暫時的中斷了黨和政府對社會主義信用機關的創造工作。從一九一九年開始，人民銀行便由信用機關逐漸變爲清算和出納機關了。在一九一九年，蘇維埃政權實行了一切預算的、清算的和金庫的業務在銀行中的集中化，在這個時期以前這些業務曾被分散在三個機關中：人民銀行，國庫，儲金局。這個各種各樣的財政業務（國家預算的執行，財政的供應，機關和企業間的清算）於銀行中的集中過程和純粹銀行業務之極度的收縮，到一九一九年底，人民銀行已變爲蘇維埃共和國唯一的預算清算的和出納的中心了。到一九二〇年，因物資貴重品分配之極端的集中化和貨幣的貶值，經濟關係的原始化，致使財政制度的機能顯著的縮小和簡化。所以財政機關和人民銀行之獨立的和平行的存在已不適宜。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人民銀行便被與財政部合併了。

在內戰結束和過渡到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之後，黨和政府便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之下，創立了在世界最大的而具有廣大的分行網的國家銀行——對國家經濟以蘇維埃國家的盧布實行監督的機關。

在銀行國有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蘇聯集中化的銀行制度，已是社會主義社會構成的重要樞杆。

第七章 抵押信用銀行的取消

抵押信用銀行的取消，是繼國家銀行的擷取和商業銀行的國有化之後，國家信用制度的掌握和重建的階段。

如在第一章中所述，在農業佔優勢的國家，資本主義俄國的信用制度中，抵押銀行佔有重要的地位。抵押銀行的活動會與土地的私有和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滲入有不可割裂的聯繫。蘇維埃政權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以命令實行的地主土地的沒收和土地私有的廢除，即已摧毀了抵押銀行本身存在的基礎。

經營耕地抵押和出賣的抵押銀行的業務，是與土地私有的完全廢除勢不兩立的。宣佈土地為全民的財產，而不能再成為買賣和抵押的對象，蘇維埃政權自然就要取消抵押銀行了。在與抵押信用相對立，農村經濟的生產信用（對農業工具、牲畜、肥料的購買，對土地改良工作等），於社會主義革命後已獲得最廣大的發展。但是他卻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性質。如果說在資本主義下，農業信用幾乎是專為貸與農村資產階級和富農的，則在社會主義革命後，在無產階級國家的手中他便成了一個小商品農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具。

斯大林在其關於聯共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強調的說，農業信用的發展和高利貸者被從農村中的放逐，『這是所有我們的經濟的最重要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無產階級和農民間便不能有任何堅

強的團結」^①。黨和政府用盡一切方法促進了各種形式的農業信用的發展，而已於蘇維埃經濟的條件下獲得了普遍的傳播。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八日頒佈了關於俄國主要的抵押銀行——階級性的貴族的國家土地銀行和農民的土地銀行——取消的法令。人民委員會在法令中強調的指出，「爲執行關於土地和關於階級性機關的廢除的法令」，貴族銀行和農民銀行均予解散。即如在第一章中所述，貴族的國家土地銀行和農民的國家土地銀行的特質，即是促成在由大地主土地佔有——農奴制的大土地所有盤據了的農村中資本主義的滲透。

特別是，沙皇政府經過貴族銀行會廣泛的資助了地主，俾便保持他們手中的土地。所以俄國國家抵押銀行的取消，係屬於無產階級專政這些措施之列的：首先是對於俄國農村中農奴制度殘餘的撲滅，亦即使資產階級革命貫徹到底。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掃除了中世紀污濁的殘跡，除地主土地的沒收，地主領有地和一切貴族特權的廢除外，取消了貴族銀行和農民銀行，這些銀行曾在保存地主大土地佔有下，在「農村中保存農奴制度最畸形的和最難忍受的殘餘」下，在俄國農村中促進了資本政權的鞏固^②。在像俄國這樣的國家中，抵押信用銀行取消的特質即在於此。

蘇維埃政權關於宣佈土地爲全民財產和廢除土地買賣和抵押的土地法令，不僅已決定了抵押銀行的命運，並且還命定了抵押銀行取消的程序。由於土地已被非購買的規定爲全民的財產和不得買賣及抵押，而所有債務者對與土地抵押有關的抵押銀行的定期債務，亦便被宣佈無效了。另一方面，所有抵押銀行和國家對抵押銀行抵押券和債券證書的持有者的負債亦被宣佈無效。祇就與土地抵押無直接關係的（如，貴族和農民銀

① 斯大林全集六卷二四六頁。

②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三八頁。

行對國家銀行的負債）抵押銀行的負債辦理清算。對抵押銀行債務的追還，亦同樣祇是在該項債務與土地抵押無關的情形下始行辦理（如，農業財產目錄和建築物抵押貸款負債）。

貴族銀行和農民銀行的清理會委託給後來成爲共和國人民銀行的國家銀行。在人民銀行的機構中曾設立了一個掌管抵押銀行清理的專部（即所謂第十四部）。抵押銀行的業務很快的即被停止了。屬於抵押銀行的土地基金、建築物、和農業財產，都轉交到農兵代表蘇維埃的土地委員會管理。人民銀行的銀行官吏們的怠工和叛逆的結果，直到一九一八年四月中旬，對政府關於國家土地銀行取消的決議的執行還完全沒有策劃。沒有任何中央的指示，地方蘇維埃和土地委員會即自主的實行了這種銀行的取消。

在大多數的場合，地方代表蘇維埃都是在幾天之內即將抵押銀行的分行封閉了，解散了職員，將屬於銀行的土地移交到土地委員會。清結對照表，決算書，關於土地轉讓的文書等都未編造。在有些城市甚至連被清結的銀行的文獻都未保存④。

各地方蘇維埃都曾要求過去抵押銀行的機關編製轉讓文書等的清結對照表。但是中央指示的缺乏，不僅招致了在抵押銀行清理工作上很大的不調和，並且還招致了清理工作上各種政治的混亂，而這些混亂即是在土地委員會中所潛伏的人民敵人——社會革命黨——叛逆的結果。是的，有些土地委員會曾責成清理委員會對過去抵押銀行的債務者的定期償付款實行非法的追還。在土地銀行事務臨時委員會所接到的一個報告書中

④ 甚至還有這種情形：薩拉托夫縣執行委員會的財政部，在薩拉托夫的和撤退到薩拉托夫的五爾沙夫的國家土地銀行分行實行清理時，便將職員遣散，將行址退還給縣執委會，「而將包含有很多簿記和統計性質的極貴重的文獻。則『整批』的賣給那些投機商人了」（見一九一八年十月八日土地代表的信——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指出，一九一八年一月間，「常有的事，當債務者，特別是農民銀行的債務者將定期償付由郵局匯去或親自送去時，還要向他們要錢，……有些地方機關——代表蘇維埃，土地委員會等不僅收受國家銀行債務者之定期的償付金，甚至還要求他們以最急迫的形式交納」^④。被社會革命黨所把持的土地委員會即是這種追償的發動人，土地委員會將償還銀行貸款和租佃定期償付的責任寄託在農民的銀行債戶和佃戶，差別祇在於這種償付並不是交到銀行的金庫，而落在這些機關的手中了。土地委員會中的社會革命黨人曾要求對土地負債的償還，第一，俾便有錢供給他們反蘇維埃共和國的反革命活動，第二，以挑撥為目的藉此引起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地方蘇維埃財政部，沒有人民銀行總管理處關於抵押銀行清理規程的命令，有時上了人民敵人的圈套，而鼓勵了定期償付款之非法的追還。

如在第五章中所述，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寧曾召集了一個有財政部和人民銀行指導工作者參加的對銀行國有化問題的專門會議，並宣佈了對人民銀行管理處在實行掌握國家信用制度措施下關於嚴格集中化保證之斷然的要求。列寧的這一要求，強制的規定了人民銀行總管理處應取得抵押銀行清理的指導。在一九一八年四月間，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給了他各分行關於抵押銀行清理規程的第一個指示。在訓示中指出，土地銀行的清理不能將各分行所有的事務用簡單的取消來完成，相反的，而應吸收較有經驗的工作者，依照全俄國同一種辦法有計劃的實行。……要保全根據他負債對照表總數估價約二十五億盧布以上的全民的財產，和在他管理中的三百餘俄頃的土地，其中大部份還不曾移交土地委員會管理，土地銀行應……以最大的細心和慎重將他三十年來的活動予以清理」^⑤。實質上所提出的具體措施是：（一）恢復過去抵押銀行的機關和照常進

④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⑤同上。

行他的一切事務；（二）依照特別明細表將抵押銀行的一切有價證券，證明書和抵押券，都移交人民銀行的地方分行；（三）即速編造一九一七年的年決算。

一九一八年四月八日，莫斯科蘇維埃通過了一個關於成立清理莫斯科區域國家抵押銀行的專門委員會的決議，並請人民委員會決定對貴族和農民銀行的中央機關迅速清理的措施。同時並曾通過關於在農業的需要上由人民銀行分行對農民貸款的決議^①。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三日頒佈了人民銀行關於國家土地銀行事務臨時管理處組織的命令。在人民銀行支行下設立有過去抵押銀行委員會委員參加的抵押銀行清理臨時委員會。

人民銀行總管理處中的叛逆者，在被取消的抵押銀行的機關之完全的恢復上是最感興趣的，為的是在他們所期望的資本家和地主捲土重來的機會上將他保留下來。

地方蘇維埃堅持反對爲了進行清理工作，將過去抵押銀行機關，不需要的和浪費的完全恢復。許多代表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曾乾脆的拒絕恢復機關，認爲這是不必要的金錢的浪費。是的，撒拉托甫縣執行委員會在他們開始清理工作之後不幾天，就將抵押銀行分行封閉了。該執行委員會的不滿是正義的，因爲爲了清理工作完全不需要如人民銀行總管理處所要求的那樣，將所有銀行分行的機關一齊恢復，而成立一個簡單的清理委員會就够了。有些執行委員會則與銀行管理處的指令相背而行，將抵押銀行的清理委託給土地部了，他們認爲，這種事務對他們比人民銀行分行更較接近。地方土地部並未執行人民銀行總管理處對清理工作所提示的要求，從而便開始了人民銀行與地方執行委員會間繼續的爭執，其結果清理工作便被延緩了^②。土地銀

^①同上。

行事務臨時管理處中的叛逆者，執行了資本家和地主的命令，用各種方法阻撓了清理工作。特別是，他們並沒有給與關於結束清算程序的指示，不希望加重地主和富農——抵押銀行的主要債務者——身上「多餘的開支」。結果，清理工作開展得非常緩慢。就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的狀況來說，在五十二個貴族銀行和農民銀行的分行中，祇有十八個分行進行了清理工作；十七個分行曾被地方蘇維埃封閉而還未恢復，另有十七個分行則在武裝干涉者和白黨佔領區^⑥。

在這種情況下，毫無意義的，在中央保持着土地銀行事務臨時管理處約計上千的人，期待各地方的決算以便混合對照表和決算書的編造已是唯一的「作業」。一九一八年八月初，由過去沙皇官吏中的叛逆者所把持的土地銀行事務臨時管理處便被取消了，代替他的是在人民銀行下由十個貴族銀行和農民銀行的職員所組織的土地銀行清理臨時委員會。過去抵押銀行分行的機關亦曾被大加緊縮。但是這一措施僅祇減低了清理的開支，而清理工作則並未加速。中央和地方銀行。職員中的叛逆者仍繼續用各種方法阻撓清理工作，並曾延緩將那已歸過去抵押銀行管理的田地移交土地機關。

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日人民委員會決議，建議財政部限期完成一切信用機關的國有化或清理之後，抵押銀行的清理機關便又重新被改組了。土地銀行總清理委員會是根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財政部的命令創立的。係由財政部，人民銀行和過去抵押銀行職員的代表所組成。在各地方則成立了類似的清理委員會。

⑥是的，人民銀行總管理處與塔木包夫執委員會的磨擦，直繼續到一九一八年底（塔木包夫執委員會曾將貴族和農民抵押銀塔木包夫分行及撤退到塔木包夫的魏林斯分行的清理，委交給土地部了）。同時塔木包夫執委會的土地部則因人民銀行的要求，於一九一八年七月清理工作即停止了，但直到十一月間繼續被人民銀行分行恢復起來。——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⑦引自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土地銀行臨時管理處代表報告書——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後者應該：（一）迅將屬於抵押銀行管理的一切土地移交當地土地部，並將過去轉讓的土地編製報告；（二）將土地計劃和其他資料移交當地土地部；（三）擇錄出未予宣佈無效的銀行資產和編製過去國家土地銀行債務者和債權者一覽表；（四）結束一九一七年決算書的編造和編製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八日的清結對照表；（五）將清算後存在土地銀行清理委員會的款撥歸國家的收入之中。

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間，在蘇維埃共和國地區的所有過去貴族銀行和農民銀行各分行之下的土地銀行清理委員會，都開始了工作。包沃爾日，烏克蘭，北卡孚喀茲被白黨和武裝干涉者佔領，國家土地銀行分行的最大多數都集中在那裏，從而便大大的遲滯了清理工作的結束。

直到一九一九年上半年，清理工作始已推進，土地銀行總清理委員會與執掌抵押銀行清理的蘇俄人民銀行行的專門部的歸併纔成爲可能。在過去貴族和農民銀行的十九個分行中，於一九一九年十月清理工作已完全結束，清理委員會亦便被解散了^①。混合的清結對照表和決算書之進一步的編造，主要因爲處於武裝干涉者的佔領區或與中央相隔絕的區域中的各分行的決算書無法獲得便被延擱了。此外，清理工作的結束因與負債者清算而被延緩。依照財政部的指示，清理委員會應將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後所收到的，其償付期是在土地國有化命令頒佈之後的貸款償還款，以及依照契約——土地國有化的結果而無法結束的契約，從土地購買者（從銀行或經過銀行）所收到的款，都歸還給原負債者。而負債者以與土地抵押無關的貸款對銀行的負債（如負債者所私有的建築物的抵押貸款負債）則應予以追還，而在土地國有化法令頒佈前所有的滯付金亦應予以追還。但是從過去的地主和富農方面償付款的追索，則進行得不十分滿意。他們中間有一部份已逃亡

①引自經濟生活日報的報道，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到國外和白黨及武裝干涉者的佔領區；有一部份則與被資產階級和地主收買而留在清理委員會工作的過去抵押銀行的職員進行了談判，後者已將其負債劃入「無法追還」的損失之中了。

除貴族銀行和農民銀行外，股份土地銀行，市縣信用組合和城市社會銀行，亦曾經營了不動產抵押信用。這些信用機關中，祇有股份土地銀行貸放了土地抵押信用，還貸放了城市不動產抵押信用。其餘的銀行則是以城市不動產抵押信用為限。雖說這些信用機關比國家抵押銀行被取消得較晚，而他們與地產有關的業務，則已因蘇維埃政權關於土地國有化的法令和土地買賣與抵押的禁止而停止了。所有關係城市不動產的契約（買賣和抵押）已經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令停止。同時股份土地銀行和其他抵押信用機關的城市不動產抵押業務已均被停止了。股份土地銀行連同其他私人銀行已據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法令而被收歸國有化。曾由蘇維埃政權委派了代表到這些銀行中。這些代表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國有化了的股份土地銀行的職員，使不再經營抵押信用和脫售抵押證券等非法業務。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頒佈了關於成為他們所有者利得源泉的城市建築物的收歸市有。關於貸放城市不動產抵押信用的抵押銀行的存在問題，便以此得到解決。他們的城市不動產抵押，城市房地產投機的活動，已是與蘇維埃政權所規定的住宅經營的組織原則，與抵押城市建築物的禁止和土地私有權的廢除，勢不兩立的了。股份土地銀行，以及國家抵押信用銀行已是不需要的而予以取消了。

股份土地銀行是根據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人民委員會的法令取消的。俄國抵押銀行之最後範疇——市縣信用組合——則是根據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人民委員會的法令取消的^①。人民委員會的法令曾將

^①曾經經營短期信用業務並經營城市不動產抵押貸款的城市社會銀行，係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日財政部命令取消的。

土地銀行的股票，抵押證券，債券和信用組合的債券，一律宣佈無效。這些抵押銀行的清理曾委託給蘇俄人民銀行辦理。清理規程是由財政部的特別訓令規定的。在股份土地銀行和信用組合之下，設立了一個以人民銀行分行和國家監察局的代表，總會計處的代表和被清理銀行的代表組成的清理委員會。清理委員會應完全追索曾在銀行中抵押未被收歸市有的建築物的債務者的負債。清理時委員會所收入的款，應是首先用以發付職員薪俸，償還被清理銀行對蘇俄人民銀行和其他國家機關和企業的負債。其餘的款則歸入國家預算的收入之中。

在一九一九年期間，股份土地銀行的清理，已經結束的有：彼得堡土耳其西，莫斯科，下諾夫高羅，雅洛斯拉夫·考斯特洛穆等地各行。這些銀行的對照表和決算書，已呈報到總清理委員會。但是信用負債者的一覽表的編造和與債務者清算方面的工作，情形很壞。即如在關於抵押銀行清理進度的總結報告中所指出的，有些清理委員會甚至在清結對照表中並未能「就宣佈無效的和仍然有效的將所有帳戶和數目作出正確的劃分……在有些場合，因為地方代表蘇維埃對關於根據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法令被收歸市有的和仍歸私人擁有的房屋和建築物的調查的回答延緩了」^①。市縣信用組合的清理，情形亦復如此：對照表和決算書編製了，而與債務者的清算則未辦。

一九二〇年四月，當財政部和國家監察局檢查清理委員會對過去土地銀行資產清理方面的工作時，已經確定：從債務者追還款共計四、五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對這些委員支出上的開支則為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因此，索債工作不健全的结果，致使清理委員會的工作蒙受損失。所以政府便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四

^①財政部消息報，三——四期，一九一九年一七頁。

日用法令將一切抵押債務的清算宣佈無效。到一九二〇年中，混合清結對照表才被編成了，而抵押銀行的清理工作便宣告結束。

根據混合清結對照表的材料，抵押銀行到他們取消時期業務的範圍，由下列抵押借債和由銀行在流通中所發行的有價證券的數目便可顯示出來（單位百萬盧布）^⑩：

成爲俄國最反動階級——地主農奴主，以及「骯髒的英國式地主」階級——富農階級的財政支柱的抵押銀行的取消，在趨向地主和資本家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壓迫澈底消滅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許多措施中，實具有重要意義。

抵押信用銀行的取消及與此相併行的使廣大農民羣衆易於獲得的農業生產信用的發展，便摧毀了農村中奴役式高利貸信用的基礎，因爲抵押銀行，曾加速農民的分化過程，從能力微弱的農民經濟中吸取了農民的精液，而將他們推到高利貸者的腳下了。

抵押銀行的取消，蘇維埃政權將在抵押銀行抵押的約六千萬俄頃的土地，爲了農民利用，爲了大的機械化的蘇維埃經濟的建立，無代價的移交給人民管理了，此外，更將屬於貴族和農民銀行的二、八五〇、〇〇〇俄頃以上的土地，以及成爲這些銀行

	據1918年一月一日 狀況在貸款方面對 抵押銀行的負債	據1918年一月一日 狀況在流通發行的 債券和抵押證券
1. 國家土地銀行	2,384.3	2,415.3
其中：國家貴族銀行	1,048.6	942.7
國家農民銀行	1,335.7	1,472.6
2. 股份土地銀行	1,491.1	1,495.2
3. 市縣信用組合	約1,000.0	1,000.0
4. 城市社會銀行	約1,000.0	—
總計	4,975.4	4,910.5

⑩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私產的農業的建築和設備，亦都移交給農民和國營農場管理了。

抵押銀行有價證券的宣佈無效與蘇維埃政權的其他措施相併行，促成了俄國的資本家和地主財政威力的瓦解，使國家從外國資本之奴役的依屬得到解放。抵押銀行在流通中所發行的有價證券，曾主要的落在資本家，地主和富農的手中。貴族銀行的質押證券的大部份是在外國市場上推銷的。抵押銀行有價證券的宣佈無效即表示，蘇維埃政權拒絕向地主和資本家償還這些銀行的負債，而在貴族銀行的質押證券方面，亦同樣拒絕向國外的資本家償還這筆債務。

第八章 國家對信用合作社的輔助，莫斯科合作銀行的國有化

蘇維埃政權堅強的和澈底的執行了銀行事業在國家手中壟斷化的原則，對於信用合作社和對於貸放各種合作社信用的莫斯科人民合作銀行則作了一個例外。

在俄國革命前主要對鄉村富農和富裕階層服務的信用合作社，在蘇維埃政權下已成爲中小農散漫經濟的羣衆聯合形式之一。除其種合作社外，需要將他予以廣泛的利用。

如果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信用合作社是在加速農村階級分化的過程，在促成大部份農民的無產階級化和小部份富裕農民向富農的轉變，則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後，信用合作社在原則上便獲得了另外的意義。首先，接近勞動農民廣大羣衆的信用合作社會將農民從懇求富農奴役的高利貸信用的必然性中解放出來。信用合作社幫助農民發展自己的經濟，以所得到的信用獲得農業設備，肥料、種子，而進行生產建設，土質改良和排水工作。斯大林曾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販賣系的合作社，供給系的合作社，最後，信用和生產系的合作社（農業組合），是鄉村豐實官裕增高的唯一途徑，是使廣大的農民羣衆從貧困和破產中得到拯救的唯一方法」^①。所有這些合作社的形式，包括信用合作社在內，對於社會主義的構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列寧在一九一八年曾寫道：「從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起，從無產階級的政權進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一四九頁。

入社會主義制度有系統的創造時期起，合作社的地位在原則上根本的改變了。這時數量要轉變到質量。合作社在資本主義社會如同一個孤立的小島，是個小店鋪。如果他籠罩了全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土地被社會化了，工廠和作坊被收歸國有了，合作社便是社會主義^④。如此，關於合作社對於社會主義構成之意義的觀念，便在天才的列寧斯大林合作社計劃中獲得他完全的發展。

列寧斯大林認為，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利用從資本主義俄國得來的合作社當作對小資產階級的生產之計算和監督的武器是必要的。特別是，關於合作社形式之一——消費合作社，列寧寫道：「資本主義爲我們留下了羣衆組織的遺產，得以輕便過渡到生產物分配之羣衆的計算和監督，——消費公社。在俄國他們發展得比在先進國家要比較微弱，但是也已擁有了上千萬的人」^⑤。

爲要作爲監督武器來利用合作社，便須使他從屬蘇維埃政權和民主化。就合作社方面來說這種任務，於革命之後即馬上擺在蘇維埃政權的面前。因社會主義體制在蘇聯經濟中的增長，已進一步根本改變了合作社的性質，爲了小商品農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改造而廣泛的予以利用已是可能的。

蘇維埃政權會對資產階級的合作社作了顯著的和一切可能的讓步，俾便保存，鞏固和擴大這個農民羣衆聯合的有價值的機關。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列寧即曾寫道：「我們應與資產階級合作社，如同與無產階級的合作社一樣，進行協議。我們不能有所疑懼，從我們方面對與資產階級合作社妥協發生疑懼便是滑稽，因爲我們現在有了統治權」^⑥。與合作社妥協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由人民委員會關於消費合作的法令制定的。

與資產階級合作社締結了協定，列寧即強調的指出，在合作社的上層中間有許多非無產階級的份子；我們引導反對這些巧妙的投降到資產階級方面的人們的鬥爭，——反對革命的份子和他們的偏袒，同時要保護機關，合作社的機關亦是從資本主義得來的遺產，是千百萬人中間的分配機關，沒有這種機關任何成就的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⑤。

雖說蘇維埃政權作了讓步，而由資產階級，門什維克，社會革命黨所把持的舊合作社的領導機關，則對協定怠工，而繼續保持其對國家完全「獨立性」的路線，並為爭取這種「獨立性」，公開的進行反蘇維埃政權的積極鬭爭。蘇維埃政權勢不得不對合作社工作實行國家的監督，甚至因他們狡猾的阻撓人民的供給和以商品及貨幣金錢支持白黨匪幫，封閉了幾個合作社。各種協定嘗試的失敗，並未改變了黨對合作社利用，對與舊的資產階級合作社妥協的一般路線，假如他放棄了對蘇維埃政權關係之敵對的立場。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月間，當舊的合作社的工作人員表示與蘇維埃政權協同工作的願望時，列寧又重新提出關於協定的問題，而祇是要求合作社停止在「獨立性」的盾牌下反蘇維埃國家的鬭爭^⑥。

蘇維埃政權會將合作社運動在城市和鄉村的普遍發展，以消費合作社團結起每個居民，以信用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作為農民經濟之羣衆的聯合，定為自己的重要任務。合作社的富農階級和門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的領導者，曾用種種方法阻撓了蘇維埃政權所提示的措施的實行，然而國家對合作社運動協助的結果，在革命的第一年即已表現出來了。就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狀況來說，消費公社的數量已從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的三萬五千所，增加到四萬七千所。加入合作社的居民的数量已迅速的增大了。在農業合作社的體系

⑤ 列寧全集二卷四六一頁。⑥ 同書四一六頁。

中，還成立許多新的聯合。信用合作社的網被擴大了，逐去了俄國農民之永世的敵人——兇惡的高利貸者。蘇維埃政權國有化了商業銀行（大財政資本的堡壘），取消了抵押銀行（地主和農業資產階級的支柱），而並未將信用合作社國有化，並未將銀行事業國家壟斷的原則運用於信用合作社。蘇維埃政權採用一切方法，以保存這一農民聯合的形式，而使信用合作社事實上成爲羣衆的和民主的。如在第一章中所述，信用合作社在俄國已有了十分發展的網。據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狀況，計有信用組合和儲蓄貸款組合一六、三二六所和團結了約一千一百萬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信用合作社加入了信用合作社的聯合社。到一九一七年底，在俄國已有了九十二個這樣的聯合社。在一九一八年一年中成立了七百多個新的信用合作社和三個新的信用合作社聯合社。蘇維埃政權給予信用合作社以普通財政的和組織上的支持。根據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五日人民委員會的命令，在國家銀行下所成立的小本信用事務管理處被解散了，這個管理處在革命前執行了對信用合作社的領導，用盡方法鼓勵了對富農之信用的支持。管理處的事務和財產被移交到蘇俄人民銀行的地方機關部。信用合作社工作的指導，對他的協助和貸款的放與，即歸這一部負責。一九一八年間，地方機關部對信用合作社所放貸款，數計四一、四八八、〇〇〇盧布。這些貸款的分配如下：

在一九一八年，信用合作社同樣經過五月間在人民銀行彼得堡業務局所成立的合作社（亦名人民銀行第十五部）獲得了對銷售供應業務的信用。合作社曾以票據交換，商品抵押貸款，

	1918年間貸放數 (單位千盧布)
	信用組合聯合社
信用組合	4.474
總計	41.488
其中：短期貸款	37.360
長期貸款	4.128

由債務者署名票據保證的特種活期帳戶，以與承包商締結合約抵押預付金信用等形式，對消費合作社和其他種合作社貸放了商品採購的信用。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月這個期間，人民銀行的第十五部貸放採購業務的貸款數計三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貸予信用合作社的為數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蘇維埃政權經過莫斯科人民合作銀行，給與信用合作社以基本的財政的支持。①合作銀行到一九一八年底還未被國有化。在對私人銀行的工人監督時期（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以前），對合作銀行並未制定任何的監督，他還在先前的條件下繼續他的業務。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銀行股東的非常會議上，甚至還決定了增加銀行股份資本從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到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並在銀行下設立長期信用的專部②。

在私人商業銀行國有化的法令頒布之後，莫斯科蘇維埃祇是在合作銀行中爲了建立對銀行活動的監督派去了一個代表。銀行的職員（低級職員除外）爲回答代表的指派曾宣佈怠工，銀行的一切業務便停頓了。莫斯科蘇維埃很快的與合作銀行的管理處開始關於復工的談判，並指出，因爲糧食的缺乏，銀行應以貸款保障合作社必需的準備。因而，莫斯科蘇維埃曾向該銀行提出這樣的條件：「與對一切信用機關所採取的措施不同，在一般的法規上銀行自行監督，俾使已指派的代表名義的這種監督，將來祇注意在銀行作業中政治傾向參入的預防」③。銀行管理處曾拒絕任何名義的監督，而祇同意了銀行文卷的繼續監督。莫斯科蘇維埃作了讓步，並同意了祇限於銀行文卷的定期檢查④。合作銀行管理處本身在對銀行股東的總結報告中，亦曾

①莫斯科人民合作銀行後來被我們改名爲合作銀行。 ②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股東大會記錄——莫斯科州文獻。 ③莫斯科蘇維埃會議記錄——莫斯科州文獻。

指明這種關於合作銀行貨幣付出計算書向蘇俄人民銀行定期陳報的監督極為寬鬆。蘇維埃政權方面之大量的財政援助給了合作銀行以保障：他每週從蘇俄人民銀行獲得的支援為數一、五〇〇、〇〇〇盧布。結果，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合作銀行的活動顯著的發展了。一九一八年銀行業務的增大即證明這點（下表單位百萬盧布）。

祇是在一九一八年的七個月中間，對照表就增加了四倍，這時適當一九一七年全年對照表的三、八倍。在一九一八年這一期間，合作銀行放新的信用為數五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以前在合作銀行存在的全部期間（從一九一二年迄一九一七年），所放貸款總數為五九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縱使根據一九一八年貨幣劇烈的貶值計算，合作銀行的業務，在一九一八年七個月中間，即比一九一七年全年差不多增加了兩倍。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合作銀行在俄國已有十四個分行，而在一九一八年則又開設了十八個分行，九個在莫斯科，九個在各省。蘇維埃政府會為合作銀行的工作建立了一切的條件，不會改變這個為合作社所習慣的信用機關，而還對該銀行作了讓步。

●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團，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的會議上，就對莫斯科人民合作銀行的監督問題作了如下的決議：（一）認為不希望將合作銀行國有化，而對於合作銀行的作業之繼續的監督則認為是必要的。（二）監督既為莫斯科合作銀行的代表原則的承認，關於對銀行作業的監督形式即交與財政蘇維埃和人民銀行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研究。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及一九一八年六月一日對照表係取自莫斯科人民合作銀行會報，一九一八年三期。八月一日不完全的對照表材料係取自合作銀行管理處對銀行委員會的報告書。當時沒有公佈的對照表。

銀行作業指數	1917年 一月一日	1918年 一月一日	1918年 六月一日	1918年 八月一日
銀行的對照表	83.4	321.1	864.3	1250.0
交換貸款業務	33.3	174.2	414.2	—
存款和活期帳戶	33.0	153.0	495.0	677.0
商業信託業務	3.9	12.2	23.6	—

然而，合作銀行對於蘇維埃政權方面的信任和財政幫助的回答，則採取了對蘇維埃國家敵對的立場，因為在該銀行的指導上都是蘇維埃政權之兇惡的敵人——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該銀行曾在其活期帳戶上隱匿了資產階級的款子，實行了與蘇俄人民銀行合作的怠工，使合作社反抗後者；給予了反革命以財政的援助。那後來成爲在蘇聯準備外國武裝干涉和資本主義復興的反革命的所謂「勞動農民黨」的積極參加者，宣傳銀行脫離蘇維埃政權之「獨立性」的查雅諾夫，曾是合作銀行的觀念上的領導者，不是無因的。

在商業銀行被國有化了之後，而蘇俄人民銀行對私人之現鈔的支付則規定了嚴格的標準，合作銀行曾盡力的在自己的帳戶上集結了資產階級的資金和沒有一切限制的支付現鈔。合作銀行彼得堡分行的總管甚至還在言論報上作了一個公告說，合作銀行與國家銀行不同，自由的對私人打開自己的大門，並無阻礙的兌付活期帳戶款。合作銀行的其他分行對於活期帳戶款的支取，亦同樣「毫無阻礙」。其結果，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月這個期間，合作銀行的活期帳戶就增加了四倍，從而在活期帳戶和存款總數中，私人的存款佔了百分之五五，而合作社和機關的存款則佔百分之四五。

款子向合作銀行流注的加強，不僅係借重於新的資產階級存款，並且還是借重了過去的私人銀行中資產階級帳戶款之非法的轉帳。合作銀行與莫斯科分行的總管即曾坦率的狂言道：「希望擺脫蘇維埃政權的侵害而保存自己的儲蓄，私人銀行的存戶都用其他的方法逃避了和將自己在那裏的帳戶款，轉到某個被收歸國有的商業銀行在莫斯科人民合作銀行的活期帳戶上了，因此，在莫斯科人民合作銀行的各分行中的活期帳戶，便開始迅速的膨脹了」^①。由於潛隱在合作銀行中的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幫助，資產階級得從收歸國有的商業銀行中提取了一部份自己的儲蓄。

在合作銀行活期帳戶上的存款，爲了反革命之財政的供應會被廣大的利用。合作銀行薩瑪爾分行會協同若干信用合作社作了有益於薩瑪爾白黨政府的大筆的捐獻。潛伏在合作銀行中的敵人們甚至還策劃了從莫斯科和彼得堡匯款到白黨和武裝干涉者所佔領的區域去。

合作銀行會利用其與私人的國外商號的商業聯系，作了廣泛的商品投機。銀行管理處與外商集團的代理人的談判證明，合作銀行會企圖破壞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而形成一個中心，經過這個中心，經營全部由合作社儲備的生產品向國外推銷，和一切機器、工具及其他對信用和農業合作社所必需的商品向國外採購。銀行管理處企圖將毛皮和牛油從西伯利亞向美國輸出的機構都集中在自己掌握，而後再在美國採購西伯利亞信用合作社和農村經濟公社所需要的收穫機等^⑤。合作銀行中的叛逆者們企圖破壞對外貿易的壟斷，會想竭力的說服蘇維埃政權，對私人商行信譽卓著的合作銀行辦理對外貿易，要比國家內行些^⑥。

因帳戶中存款的繼續流入，合作銀行會無限制的擴大了自己的貸款業務。他希望成爲合作社全權的主宰，而使合作社從仰給於蘇俄人民銀行的必然性中「解脫」出來。舊的合作社和合作銀行的領導者，門什維

^⑤ 取自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莫斯科合作銀行西伯利亞和烏拉爾各分行在奧穆斯克城的會議上，奧穆斯克分行總管的總結報告，當時西伯利亞已爲白黨所佔領。——莫斯科州文獻。
^⑥ 因爲，合作銀行中的反革命期望着蘇維埃的西伯利亞將被佔領而脫離蘇俄，便在信用合作社隸屬外國資本上經營了。是的，在一九一八年四月間，爲了組織與美國的商業聯繫，派到西伯利亞去的合作銀行的專家寫信給合作銀行的管理處說：「西伯利亞對俄國工商業中心的依屬性，從來是微弱的，大的政治混亂可能完全變形。同時，與遠東，與日本和美國的密切聯繫已在產生……必須很快的考慮到一般的局勢，要考察某些較遠地區的西伯利亞的合作聯合社，然後再爲他們準備合理的和有計劃的商品交換的可能」。——莫斯科州文獻。
^⑦ 莫斯科合作銀行致財政部函——莫斯科州文獻。

克和社會革命黨懼怕合作社與蘇維埃人民銀行的聯繫加強，因為這足以攪亂了他們使合作社脫離蘇維埃政權之「獨立性」的保全計劃，而這個醜惡的「獨立性」曾給予支持富農，外國的武裝干涉者和白黨以可能。

在合作社方面合作銀行之不正確的政策，在他的財政狀況上已有非常壞的反映。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合作銀行管理處在致銀行委員會的報告書中指出，各種合作社對銀行的負債已有非常巨大的數目，但是都不照自己的責任償還，而照例要申請「展期」。據此，管理處向銀行委員會建議「信用之過份廣大的規模要稍予緊縮」^①。然而，對銀行的負債則繼續增大了。

浩大的支出引起了從蘇俄人民銀行方面對合作銀行有系統的支持的必然性。據合作銀行管理處的材料，合作銀行對蘇俄人民銀行的負債，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狀況已達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假如更計算到，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以前在合作銀行的活期帳戶上，還存着約計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被收歸國有的企業和機關的款子，便足以瞭然，適與該銀行領導者關於他完全「獨立性」的信念相反，他從蘇維埃政府已獲得了鉅大的財政支持。沒有這種支持，合作銀行便確實不能有所作為，尤其不能滿足合作社因週轉增大，以及因盧布貶值和物價高漲，而向他提出的信用的鉅大要求。

因此，合作社對合作銀行大力增長的負債的大部份，便借重國家來彌補了。但是蘇維埃政府方面之有系統的協助，並未能完全解除了合作銀行因貸放信用數目之無限制的增大所感受的財政緊張。另一方面，任憑合作銀行會努力要成爲合作社之唯一的財政中心，而要使他從利用蘇俄人民銀行信用的必然性「解放」出來，他卻完全不能在信用上滿足合作社日益增大的需要。甚至衛護合作銀行的合作社聯合社的代表們即曾指出，

① 莫斯科州文獻。

「我們合作社的財政中心——莫斯科人民合作銀行，還不是足以全部供應合作社需要和支持合作社的人民的需要的強大力量」^⑤。在革命後由蘇維埃政權廣泛支持的，合作社運動已經獲得的廣大範圍，使脫離國家信用系統而孤處的和受了資源限制的合作銀行，陷於沒有能力來獨立的供給合作社的需要了。

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三日人民委員會頒佈法令，宣佈所有政府機關和收歸國營各企業祇准將自己的現金存於蘇俄人民銀行帳戶之後，合作銀行之財政的拮据便銳利的加強了。在法令頒佈之前，在合作銀行之活期帳戶上的存款為數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國家機關和收歸國營企業存款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將這個數目移交到蘇俄人民銀行，合作銀行便被剝奪了自己資源的重要部份。這對於合作銀行便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因為，合作銀行完全不貸放國營工業的信用，而同時卻爲了合作社貸款和自己的商品業務，則利用了國營企業和國家機關的存款。蘇維埃政權又重新向合作銀行提出，不希望威脅到合作社的財政狀況。在對合作銀行普通的現鈔支持之外，又曾由蘇俄人民銀行放予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貸款。當將國營企業和機關的存款從自己的活期帳戶移交之後，合作銀行便差不多完全停止了對合作社的新的貸款。

因此，在一九一八年九月，當對合作社的貸款已顯然停頓之後，在蘇維埃政權看來已是十分明顯，合作銀行之繼續獨立的存在，除了加害蘇維埃政權和合作社外，將毫無所獲。受人民公敵——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領導的合作銀行本不希望與蘇維埃政權協同工作。銀行的領導者們曾用合作社和合作銀行「獨立性」之煽惑性的要求作掩護，幫助了反革命，背着國家隱匿了資產階級的資產。利用私人銀行的缺如，合作

^⑤ 信用合作社北方聯合社代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合作銀行股東大會上的發言。——莫斯科州文獻。

銀行會普遍的發展了高利的商業信託業務。他曾企圖破壞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而將農產品輸出和以輸入的生產工具對合作機關的供應，都集中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最後，合作銀行在商業信託業務上的鉅大投資，造成了該銀行之無限制的支付，對反革命的財政供應，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貸與合作社的信用之鉅大數目。便造成了該銀行之艱鉅的財政狀況，而陷於貸款停頓，雖說有國家方面之有系統的財政支持。據此，一九一八年九月底在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並有財政部的代表參加的會議上，便作了一個關於莫斯科合作銀行與蘇俄人民銀行歸併的決議。蘇維埃政權繼續執行與合作社合作的政策，曾希望邀得合作機關——合作銀行的股東和顧客——的同意，實行合作銀行與人民銀行的歸併。合作銀行的管理處曾建議擬訂歸併的方案並提出銀行股東大會加以研討。在合作銀行股東大會以前的期間曾允許他在原先的基礎上工作的完全可能。政府並曾繼續以現鈔和信用支持了合作銀行。

在合作銀行的股東大會之前，該銀行管理處和合作社的領導者們曾在合作機關中間作了維護合作銀行獨立性的敵對宣傳。剝奪了銀行之「脫離蘇維埃政權的獨立」，合作社中的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便失去了為對蘇維埃政權的協定怠工和為對反革命支援所必需的主要的物質基礎。所以他們用盡一切方法，去動員合作社的機關反對合作銀行與蘇俄人民銀行歸併。合作銀行的管理處曾發信給所有下級的合作團體和組合，在信中演劇式的描述了「銀行為爭取獨立而鬪爭」，號召積極參加「自己財政中心之命運的研討和決定」，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銀行的股東大會，俾便「拯救一切還能拯救的」^①。

一九一八年十月中旬，財政部曾以下列的協定草案提交合作銀行委員會的擴大會議研究：合作銀行停止

① 合作銀行管理處致銀行股東函。——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自己獨立的存在；合作銀行委員會改組爲蘇俄人民銀行總管理處的合作部，合作部將來即經過自己的分行經理合作社信用，邀得合作社代表同意和參加決定貸款問題。合作銀行委員會則以銀行合併問題祇能由其股東大會來決定爲口實，不曾接受這一草案。大會曾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由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領導的大會曾宣言反對合作銀行與蘇俄人民銀行合併。卡雅諾夫及其伙伴們的反革命宣傳會受到下級的合作機關的領導份子佔優勢，亦即富農佔最大多數的大會的普遍支持。

大會曾經選派了代表團帶着反對銀行合併的決議草案去見列寧，列寧告訴代表說，蘇維埃政權贊成與合作社妥協，希望保存合作社的機關，但是合作銀行則應被收歸國有。顯然的，蘇維埃政府堅決的決定了要廢除合作銀行虛偽的「獨立性」，銀行的領導者們會將「協定」草案這樣加以整理，即將這個草案祇是在其他的名稱下留下了獨立的對合作社的信用機關。根據這個草案，銀行應即改組爲全俄中央合作信用聯合社，所有信用銀行的資本和業務都移交給這個聯合社。中央信用聯合社有獨立經營信用業務之權，並同樣具有指導合作機關某些銷售和供應業務之權。列寧曾給予合作工作者這種說教的行逕以如下的評價：

「近日來信用合作工作者全權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曾來看我。他們曾將他們反對信用合作銀行與共和國人民銀行合併的大會議決案指給我。我告訴他們說，我贊成同中農妥協，就合作工作者對布爾什維克的態度

在經濟生活報上，記述列寧對合作銀行股東大會代表團的回語寫道：「蘇維埃政權已經八個月，而卻走上與合作社妥協之途。在這個期間，蘇維埃政權從未向任何人講過妥協，而對於合作社他卻作了個例外，因爲他承認他的價值。與合作社的妥協，其所對蘇維埃政權是必需的，不祇是因爲他擁有完美的訓練有素的機關，並且是因爲合作社代表着大多數的，蘇維埃政權應該仰仗的中農。但是蘇維埃政權不能放棄國有化。假如合作社不正視協同工作的可能性，則在蘇維埃政權看來，這種情形便是難以容忍的了。」——經濟生活十一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莫斯科州文獻。

說，縱使在原則上從敵對轉變到中立亦將有深遠的評價，但是唯有先同意特別是該銀行與共和國唯一的銀行之完全的合併，纔給以妥協的基礎。當時大會的代表們曾另換了一個議決案，經過大會又另外提出的議決案，在這個議決案中將過去說反對合併的一切都刪去了，但是……但是卻提出了事實上，與「特殊的」銀行沒有絲毫差異的合作工作者「特殊的」「信用聯合社」的計劃！這是一種滑稽。顯然的，用詞句的粉飾祇能誘惑或欺騙傻瓜。但是這些……「企圖」中的一個「失敗」一點也動搖不了我們的政策；我們過去曾經實行，將來還要實行與合作社工作者，與中農的妥協政策，要剷除改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一切企圖」。

因此，合作銀行和合作社的領導者們對於將他們的銀行與蘇俄人民銀行之自願的合併，並未予以同意。在這一問題上與合作社達成妥協的一切可能性業已涸竭，蘇維埃政權勢不得不採行合作銀行與國家信用機關強制合併的途徑了。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日便頒佈了關於合作銀行國有化的法令。

合作銀行的國有化本質上與商業銀行的國有化不同。合作銀行被改組為蘇俄人民銀行的合作部了。銀行的股份資本未被沒收，而被記入在蘇俄人民銀行合作機關的活期帳戶上了。在法令中曾經指出，蘇俄人民銀行合作部的管理和合作社的信用貸款應在他們的代表參加下進行。從而，在合作系統的信用範圍內，合作社工作者便被吸收參加國家信用機關的工作了。關於合作銀行國有化的法令規定了自己的任務：要為從國家方面對合作社廣泛的財政支持，創立一切必需的條件，須根絕用以加害合作社的門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的合作銀行領導者之反革命的活動。

●列寧全集二卷，二九五頁。

根據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日的法令，被國有化的祇是莫斯科合作銀行。信用合作社（即信用組合和儲蓄貸款組合及其聯合社）仍神聖不可侵犯的被保留了，並還能利用蘇俄人民銀行之廣泛的財政的支持。但是他應該誠意的服從他的監督，爲了同那企圖利用信用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反對中農和貧農羣衆利益，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富農作鬥爭，這是非常重要的。

財政部在合作銀行國有化法令的發展上，完成了蘇俄人民銀行合作部的法規。這個法規證明，蘇維埃政權採用了一切方法，吸收合作社的機關參加蘇俄人民銀行合作部的工作，後者應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合作機關的全權代表大會，大會的任務包括：一般工作計劃的檢討；合作部預算草案和年決算的批准；與合作社信用和合作部作業有關的原則問題的決定。

爲了對於合作社信用的進行之經常的考察，特設立了一個二十四人的合作部委員會。合作社在委員會中佔去十六個代表；其餘八名由財政部，糧食部，土地部及最高國民經濟蘇維埃指派。最後，在蘇俄人民銀行清算貸款委員會中亦有了合作社的代表，因此，便參加了關於對合作機關貸放信用問題的審查。適與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關於管理上，關於「合作社動議的壓迫」等惡毒的中傷相反，蘇維埃政權則組織了具有廣泛合作的民主監視的合作社信用。

隨着內戰和外國的武裝干涉的加強，蘇維埃政權勢必將一切糧食的資源及其分配，都集中在國家的掌握之中。將集中化普及到農業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亦同樣需要，因爲被農村資產階級和富裕農民所把持的信用組合和農業信用聯合社會促進了生產品的投機，隱匿了糧食的儲備，阻撓了農產物徵集的措施。所以根據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日的法令，消費合作社即變成爲糧食部的分配機關了，而根據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的

法令，各種合作社都被聯合在一起了。根據使一切合作社工作都從屬於對軍隊和人民供應任務爲目的，信用組合和儲蓄貸款組合及其聯合社便都被歸併到消費公社了。

內戰的結束使蘇維埃政權在合作制度發展領域內，得將無產階級革命第一年和戰事中斷時期所已提出的措施予以實施。依照黨的第十次大會決議所實施的新經濟政策，本質上已改變了合作社的使命和抬高了他的作用。信用合作社與其他各種合作社相同，又重新從總聯合社中劃分出來，而變爲獨立的信用系統了。蘇維埃政權曾爲創立，信用合作社普遍發展的一切條件，給了他有系統的財政的幫助和組織上的協助。在革命前主要爲鄉村富裕階層服務而曾被富農份子所把持的聯合社中間，信用合作社已成了貧農和中農經濟之強大的羣衆的聯合，促進了小商品農民經濟之社會主義改造，偉大的列寧斯大林計劃的實現。信用合作社的發展即是便利勞動農民羣衆過渡到集體化途徑的前提之一。

第九章 蘇維埃國家銀行事業壟斷化的完成

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短期信用，除了股份商業銀行外，相互信用社、城市社會銀行和銀行家營業所亦都曾經營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委員會的法令，曾將銀行事業的國家壟斷普及於所有這些信用機關。成爲私人銀行的銀行家營業所和相互信用社均在國有化之列。但是事實上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直至一九一八年底還保留在資產階級的手中。這一事實要以該銀行等主要是服務中小工商業資產階級來解釋。

蘇維埃政權最初實現了大資本的剝奪，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司令臺——土地，成爲資本主義信用制度主要環的商業銀行、交通、對外貿易和大工業。中小工業和大部份的國內商業都保留在資產階級的手中。服務中小工商業資本的信用機關，在他的管理上仍暫時的被保留了。這尤其是必要的，即須先鞏固了大銀行（商業銀行）的國有化，然後再繼續進行。

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法令頒佈之後，對於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工作的監督亦即建立起來。在大多數這些信用機關中都指派了政府的代表，以監督他們所有的業務。蘇俄人民銀行曾以嚴格限定數目的現鈔付與他們。

爲了實行對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現金支出的監督，他們應每天將現金出納報告表陳報人民銀行的

支行。在城市社會銀行中城市不動產抵押信用業務已被禁止。存款業務和商品抵押的短期貸款的貸放則經准許。

被剝奪了商業銀行的資產階級，曾想盡方法企圖擴大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的業務，以保全他們資本主義信用機關的面目，破壞銀行事業之國家的壟斷。所以專家委員會中的叛逆者曾為爭取相互信用社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作了頑強的鬭爭。若干大的相互信用社在一九一八年已與外國的銀行發生了關係。

是的，莫斯科相互信用社的代表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在其致莫斯科蘇維埃財政部的報告書中報道：這個相互信用社與最大的法國銀行「里昂信用」的彼得堡分行有聯繫^①。資本家為了商品投機則利用了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

例如，莫斯科和薩瑪爾的相互信用社，在一九一八年即普遍的貸放了商業資本家和經營投機的小商人的現金信用。此外，相互信用社本身亦曾買賣了大批的商品。這種情形便成爲那在業務範圍上不亞於某些商業銀行的大莫斯科相互信用社，被提前國有化的一個主要原因^②。

資產階級利用相互信用社，同樣是爲了存款的隱匿和經過相互信用社，將自己在國有化的商業銀行中活期帳戶和存款上的資本之非法的提取。由於在蘇俄人民銀行中和在過去私人銀行下清理技術協議會中工作的資產階級專家中叛逆者的幫助，資本家會將自己的存款移入到相互信用社，然後再行提取，或者甚至經過法

①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②莫斯科相互信用社是一九一八年三月根據莫斯科蘇維埃財政部的決議被國有化的。最初人民委員會曾取消了這個決議，因爲相互信用社的系統是暫時的落在資產階級的手中。後來（一九一八年九月四日）人民委員會考慮到相互信用社業務的廣大範圍和資產階級利用他以投機爲目的，便命令將莫斯科相互信用社國有化了。

國銀行「里昂信用」的俄國分行和美國國民城市銀行匯往國外。最後，許多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都會參加了反蘇維埃政權戰爭的財政供應，而將款匯到了由外國武裝干涉者和白黨所佔領的區域。相互信用社和其他未被國有化的信用機關這種反革命的活動，財政部勢不得不根據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四日的法令，以犯法者嚴懲不貸的威脅，禁止相互信用社和其他未被國有化的信用機關，再匯款被佔領地區，和與被佔領區域內的信用機關經營任何業務^④。

一九一八年下半年相互信用社在資產階級手中暫時保留的必要性已經終結了。因為內戰的擴大，私人商業已被禁止而由國家的分配所代替。在這種條件下，當時祇是鼓勵投機的相互信用社活動的地盤已經消失了。從資產階級手中剝去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尤其是完成銀行事業在蘇維埃國家手中的壟斷化是必要的。

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作為蘇俄人民銀行支行予以保存，在這個期間已無需要：第一、因為這些信用機關的大部份主要的是在這種城市中，那裏已經有了過去國家銀行的分行或過去的商業銀行，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與過去的商業銀行相比是不重要的；第二、因為內戰的擴大已沒有繼續擴大人民銀行網的需要。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便被取消了。

如在第五章中所述，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日，人民委員會曾向財政部建議限期完成關於銀行事業國家壟斷法令的實際措施^⑤。

為此，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公佈了財政部關於相互信用社取消的命令。相互信用社取消辦法規定如下：

④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日財政部命令——「蘇聯的經濟政策」，一九四七年，二四二頁。

(一) 相互信用社除顧客債務款的收受和各地方縣執委會所規定的最低生活費之活期帳戶的支付外，應即停止一切業務；(二) 各地方清理工作的指導指令財政機關辦理；(三) 在相互信用社之下設立清理委員會，清理委員會負責辦理相互信用社事務的全部檢查，編製一九一八年的決算和向顧客追還負債^⑤。

在這個命令的發展上，財政部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間頒佈了決定相互信用社資產與負債清理辦法的訓令。根據這個訓令，凡屬於相互信用社的有價證券均作損失註銷。國營企業各種形式的貸款的負債，亦以損失註銷。所有私人企業和個人的負債則予追還，從而，債務者活期帳戶和存款上的餘款，以及他們的社員股份便移作了債務的償還。閑散資金：債務款，相互信用社的股份資本，就其從顧客收回的債務而於前述各項負債償還，相互信用社職員工資發放和與清理工作有關的消耗開支之後所餘之款，應依下列順序開支：

(一) 繳納賦稅；(二) 小有產存戶的補償；(三) 其餘存戶和社員的補償；清理委員會負責於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前將工作結束^⑥。

關於相互信用社取消的命令會受到資產階級及其忠僕方面的激烈反抗。相互信用社中的高級職員甚至拒絕參加清理委員會，並聲言，財政部的訓令「與人民委員會的決議不合」。相互信用社的總行會向人民委員會呈遞了反對財政部訓令的抗議書，在抗議書中曾企圖證明相互信用社對於國民經濟之巨大的重要性，甚至

^⑤ 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日人民委員會「關於迅速實現銀行事業壟斷化法令」的命令中指出：(一) 認定，俄國銀行事業經過所有當時存在的私人的和社會的信用機關的國有化(或取消)而實行壟斷化的原則，是根據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法令規定的。(二) 委令財政部限期實現所有現在的信用機關國有化(或取消)的處理——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財政法令概要，二六三頁。^⑥ 「蘇聯的經濟政策」，國家政治出版局，一九四七年，二六三頁。^⑦ 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和他的……無產階級性質，而同時還建議在對外國的聯繫上自己願為蘇維埃政府服務^②。

人民委員會在對這封信的答復中，向相互信用社的總行指示說，他們的申請書不值得任何的注意，因為「相互信用社」是一個與資產階級相勾結而在經濟生活中不需要的機關。不會因他們的取消有任何經濟的和政治的損失^③。

相互信用社的管理處和清理委員會用種種方法拖延了相互信用社的清理。一九一九年一月初由人民銀行彼得堡區業務局所進行的相互信用社清理工作的檢查，宣稱，相互信用社故意阻撓工作，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前清理將不會結束。爲了加速相互信用社的清理，北方區財政部曾將這一工作委託給人民銀行的支行。到一九一九年夏季，北方區的經驗已傳遍到全蘇俄：曾向人民銀行支行建議，將清理工作的直接領導握在自己手裏，由活期帳戶和存款中的餘款償還相互信用社這些存款者的負債，將收歸國營企業的負債以損失註銷，將相互信用社資產的其餘部份收交人民銀行，俾便予以清結^④。

城市社會銀行曾根據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日的命令被取消了。爲了清理工作的執行，曾於城市社會銀行下成立了一個清理委員會，其構成爲：縣執行委員會所指派的代表，蘇俄人民銀行支行，國家監察局和被清理銀行管理處的代表各一人。根據財政部所擬定的調令，私人企業和個人的負債應予追還。城市社會銀行的債權者和存款者的補償辦法，特規定如下：第一先清償（由存款的開散餘額，庫存現金，由資產清理收入款）對人民銀行和政府機關的負債；第二再清償一般有益的和民主的社團的存款；然後，第三再清償小有產

②相互信用社總行函——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③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④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銀行管理處週報

存戶的存款。清理之後的餘款則交代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處理^①。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前結束清理工作。

銀行家營業所是根據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法令被國有化的。除了在派到銀行家營業所的代表監督之下活期帳戶的收付之外，所有他們的業務均被停止。銀行家營業所的利用及其與人民銀行的合併均不適宜，因為銀行家營業所在俄國是一種小的私人企業，這種企業曾專門在交易所和商業契約締結時經營經紀人的業務，而在戰爭期間則經營了盧布市場上的投機。銀行家營業所同樣被取消了。在莫斯科，各銀行家營業所於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即已歇業，並曾吩咐了他們編製清結對照表。因為銀行家營業所在革命後還經營了黃金、外幣和俄幣各種非法的業務；外國紙幣的買賣，各種盧布差額的投機等。一九一九年中人民銀行總管理處曾通令自己的各分行於最短期間取消一切銀行家營業所。在銀行家營業所資產與負債的清理時，是由財政部的命令依照相互信用社和城市社會銀行的清理辦法辦理的^②。

外國銀行的取消是完成銀行事業在蘇維埃國家手中壟斷的最後行動。在形式上，祇有兩個外國銀行在俄國有自己的分行：法國的——「里昂信用」和美國的——國民城市銀行。外國的財政資本曾預先選定了要經過有俄國招牌的商業銀行剝削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在波蘭和立陶宛劃分出去之後，在蘇俄地區的華沙商業銀行和里日銀行的分行，亦便作了外國銀行的支行。此外，照說，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開業的較小的尼德蘭對俄貿易銀行也是外國銀行。外國銀行在蘇維埃共和國的保留，即表示是無產階級國家對銀行事業之壟斷的破壞，而給與俄國和外國資產階級，爲了將資本移轉國外，對反革命的財政供應和投機等，利用這些銀行的可

①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日財政部訓令——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財政法令輯要，一二八——一二九頁。
②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日
四日人民銀行總管理處通報——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依照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日列寧所簽署的人民委員會的命令，所有在蘇俄境內活動的外國銀行概予取消。銀行的一切業務概予停止，而金庫中的現金則移交人民銀行分行。外國銀行分行的職員，反映了法國和美國財政資本的意志，曾竭力反抗蘇維埃政府關於取消外國銀行之決議的執行。「里昂信用」分行的領導人特別反對取消，他從一八七九年即住在俄國，法國的資產階級極不願放棄他對俄國信用制度已經喪失而無可挽回其統治的這個最後的孤島。「里昂信用」分行的領導者們無視蘇維埃政府的決議，根據各種理由要求「特別法定的行動」。最困難的是，從「里昂信用」彼得堡代辦所的管理處提取在代辦所保存的貴重物品，有價證券和外幣，寄存人民銀行一事。代辦所的管理處曾用冗長的信，對人民銀行彼得堡業務局強提貴重物品的提議回答說：「貴重物品存在人民銀行的倉庫裏將不及存在他們自己的倉庫裏安全」，他們還必須與巴黎交涉，最後，他們完全反對取消之權。

當經過兩個月這類無結果的爭執之後，人民銀行的代表即想自行打開代辦所的倉庫，代辦所的管理處便作了「從布爾什維克拯救貴重物品」的最後企圖，在倉庫門口封上了……丹麥大使館和丹麥紅十字會的封條！外交部即決定要人民銀行取去這些封條，而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即關於取消外國銀行法令頒佈以後的四個月，代辦所的倉庫便被打開了，將貴重物品交到人民銀行，而關於代辦所反對的事則提交法庭辦理。同時，在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管理處中的叛逆者則將取消外國銀行辦法之訓令的擬訂拖延了。直到一九一九年四月底，人民委員會的命令頒佈後五個月，財政部才批准了取消外國銀行的條例。清理工作即在蘇俄人民銀行派

●引自人民銀行彼得堡業務局管理處與「里昂信用」彼得堡代辦所管理處的往來公文——十月革命國家總文獻。

到外國銀行的特別代表的監視之下，委託給的外國銀行自己的管理處了。銀行的資產應予清理。銀行債權者和存戶的補償照下列程序辦理：首先是銀行對蘇維埃政府和人民銀行的負債；其次是對俄國的存戶和債權者的負債；第三是對外國的債權者的負債，先從最窮的開始。

清理和償還了銀行的存戶和其他債權人之後的餘款，即解交其分行已被清理了的外國銀行暫時保管。這筆閑散的餘款便收入在蘇俄人民銀行的外國銀行的帳戶上了。外國銀行的清理會給了一個月的限期。

被清理的信用機關之資產的清結，在內戰的條件下，進行得非常緩慢，致延緩了清理工作的結束。

許多區域的淪陷，資產階級向國外和白黨區域的逃亡，城市一部份居民之盲目的遷移，在內戰期間這些特有的現象，極端的困難了債務者的尋獲和向他們追還貸款。此外，資產階級的專家們會有的拖延了資產的清結，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破滅，對被取消的信用機關仍返還他們原先的所有主一事，還完全沒有喪失期望。

直到一九二〇年初，所有在蘇俄地域的相互信用社才被清理了百分之三六。從這些信用社資產的清結所收入之款為二八、三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存款和活期帳戶款則為五七、一〇〇、〇〇〇盧布。城市社會銀行已經清理了四十七所，亦即在蘇俄區域的這種銀行總數的百分之二三。追還的貸款為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在被清理的城市銀行中的存款和活期帳戶的餘額則為二三、九〇〇、〇〇〇盧布。從追還負債所收入的款，甚至連全部償還小有產的存戶還不够。

在一九二〇年期間，差不多所有清理委員會都完成了決算和清結對照表的編造，祇是因為被清理的信用

機關資產清結得還不完全，而沒有停止工作。財政部認為繼續資產的清理是不合算的，於一九二一年初即知照地方的財政機關即刻停止清理工作並解散清理委員會。

所有銀行的文卷都交到了文獻館，而由清理所收入的現鈔則撥作國庫的收入^⑥。與蘇維埃政權掌握資本主義俄國信用制度有聯繫的，在技術上極為複雜的清理工作，於此便宣告結束。

因此，到一九一八年底，關於銀行國有化和銀行事業在蘇維埃國家手中的壟斷，是在巨大的困難克服之後，在同工人階級敵人的激烈鬭爭中實現的。

信用制度的主要環——成爲國家經濟最重要的司令臺之一的過去的股份銀行，已被國有化和與國家銀行合併，形成了蘇維埃共和國唯一的人民銀行。

抵押銀行——農業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柱石——已被取消了，因爲土地轉渡爲全民所有，已摧毀其存在的基礎。

經營農民經濟生產信用的信用合作社，曾獲得蘇維埃國家方面廣泛的財政上和組織上的支持。

其他信用機關，他們活動的範圍和性質，在這個期間，爲了蘇維埃國家信用清算機關的創立，不容許將他們予以利用，便被取消了。直到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才進一步完成了技術上的清理工作，才將外國武裝干涉者和白黨匪幫佔領區所保存的或再度出現的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孤洲予以澈底的毀滅。

⑥一九二一年八月三日蘇俄財政部通報——一九二一年財政法令輯要，二九頁。

第十章 結論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實行的銀行國有化，實現了布爾什維克黨基本的經濟綱領要求之一。

列寧——斯大林的黨，國有化了銀行，使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和昂格斯關於用無產階級專政實現銀行國有化的必然性的指示，見諸實現。這些指示已被列寧和斯大林適用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天才的發展了和豐富了。

銀行國有化是由列寧——斯大林的黨，在與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其他大規模的經濟改造（土地國有化，大工業國有化，對外貿易壟斷的實施等）的不可割裂的聯繫中實現的。

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所實行的銀行國有化，即是解決社會主義革命一個首要的經濟任務的典型。蘇維埃銀行國有化的方法——完全的和無代價的將他移交給所有社會財富之真正的創造者和主人（人民），事實上證明了他無可爭辯的卓越。蘇維埃政權國有化了銀行，便掌握了國家經濟之非常重要的司令臺，剝奪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中心。蘇維埃政權從資產階級的手裏奪取了銀行機關，將他置於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服務上，利用銀行在對資本主義經濟的侵蝕上，便利了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

蘇聯銀行國有化之典型的經驗，實具有全世界歷史的意義。這種經驗之歷史的偉大，在於銀行的國有化曾為蘇聯社會主義信用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成為走上社會主義建設途徑的其他國家的模範。

偉大的革命領袖——列寧和斯大林曾親自完成了決定和指導掌握國家信用制度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政府的法令和指示。

布爾什維克黨實現了銀行國有化，克服了很多的困難。銀行國有化在世界史上第一次實行。實行經驗和忠於蘇維埃政權的熟練的銀行幹部的缺乏，致關於銀行國有化與合併之政府的指示，執行得非常混亂。爭取銀行國有化，爭取信用制度的掌握的鬭爭，乃是殘酷無情的階級鬭爭。銀行國有化剝奪了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中樞神經，自然，資產階級對此亦曾以無情的反抗作了回答。最初，他採取了組織和資助銀行職員公開怠工的戰略。這一戰略崩潰之後，資產階級便轉移到「祕密作戰」，以破壞銀行國有化與合併為目的，組織銀行中資產階級專家們的叛逆行爲了。

在蘇維埃共和國銀行國有化與合併，曾經通過非常艱鉅的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的環境。

克服了一切困難，布爾什維克黨便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用自己的力量不僅實現了銀行的國有化，同時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的信用制度。

蘇俄人民銀行在社會主義之天才的列寧計劃的基礎上，在與資產階級之殘酷鬭爭中被建立起來了。一九二〇年初，因為內戰和軍事共產主義的強制政策，特別是爲了這種政策，經濟關係之特有的原始化，蘇維埃政權曾暫時的取消了人民銀行。但到一九二一年十月，隨着內戰的結束和由於向新的經濟政策的過渡，黨和政府便又成立了國家銀行，因此，這個國家銀行即是蘇俄人民銀行的繼承。

蘇聯銀行國有化的意義，顯然絕不盡於實行了銀行國有化和奠定了蘇維埃信用制度基礎的這個時期。

銀行國有化和銀行事業在國家手中的壟斷，還作了建立蘇維埃信用制度一切進一步過程，而在他每個

階段上，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基礎。

隨着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時期的結束，信用制度曾幫助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在資本主義損毀，社會主義獲益上，他曾被國家予以廣泛的利用；在多種傾向的經濟條件下，信用曾作了毀滅資本主義階級的鬭爭武器。布爾什維克黨在偉大的斯大林的領導下，在與法西斯主義間諜——企圖利用信用和銀行在我們國家恢復資本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布哈林派——的鬭爭中，創立了和鞏固了蘇維埃的信用制度。

銀行國有化在社會主義社會構成的最重要任務——國家工業化任務的解決上，起了非常鉅大的作用。斯大林分析了蘇維埃工業化的方法與資本主義方法的根本差別，曾強調的指出銀行國有化對於在短期內創立社會主義的重工業的意義。斯大林說：「工業和銀行的國有化在這件事上給了很大的幫助，他使資金有迅速向重工業集聚和移轉的可能」^①。

銀行國有化，與國家公債的宣佈無效，工業的國有化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相並行，給與蘇維埃國家得以動員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大規模綱領所必需的強大的財政資源的可能。蘇維埃的信用制度積蓄了大量的經濟資金以及人民的資金，而將他們支配在工業化的需要上。一九二六年計劃了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綱領，斯大林在其歷史性的報告論「蘇聯的經濟狀況」中指出：「必須不要浪費了國家積累的節餘，而要蒐集在我們的信用機關、合作機關和國家機關中，以及用內國公債的辦法，蒐集在首先為了工業的需要而利用他們的對象上」^②。

① 斯大林：斯大林選區預選會議上演說，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莫斯科，十七頁。
② 斯大林：「論蘇聯經濟狀況」，一九三七年，九——十頁。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行上，蘇維埃信用制度的作用，自非以經濟之貨幣積累和人民資金的動員所足以概括。蘇維埃的銀行制度促進了社會主義經濟積累之更進一步的增長，此種增長乃因國家工業化稀有的速度所引起的財政供應的最重要的資源。一九三一年斯大林向蘇聯經濟機關的領導者提出的要求是：提高工業內部的積累^①。在這個任務的解決上，信用制度會起了本質的作用，促成了企業中獨立會計的樹立和加強。其次，信用制度的本身亦從創立重工業的銀行業務中提供了一定的利潤。斯大林分析保證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財政供應的積累源泉，特別指示出「像提供一定利潤和就能力範圍扶植我們的工業的我們的銀行制度這樣的積累槓杆」^②。銀行國有化以前，資本主義銀行業務中的收入都已落到他們私有者的錢袋中了。

蘇維埃的信用制度，實現了用盧布對多數建設機關工作的監督，促進了根據預算對社會主義工業化財政供應上支付的鉅額資金之合理的和經濟的運用。這種情形，在偉大的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對於大規模的工業建設計劃之順利的執行，同樣具有本質的意義。

銀行國有化對於農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改造——散漫的小商品農民經濟的集體化，具有重要的意義。關於由蘇維埃國家對合作社廣泛的財政支持的必要性的指示，是天才的列寧斯大林合作社計劃（社會主義的農村改造計劃）的基本環之一。斯大林說明道：「在俄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應該遵循千百萬中小農民的合作社途徑進行，應該遵循在鄉村中以特惠的信用制度由國家援助羣衆的合作的發展途徑進行」^③。由國家方面經過國有化的銀行對各種村合作社，特別是信用合作社之廣泛的財政支援，是進而建立集體農場制度的重要過渡措施之一。在列寧斯大林合作社計劃實行的第一個階段——銀行事業在蘇維埃國家手中的壟斷，不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三四八頁。

② 斯大林：論蘇聯經濟狀況，九頁。

③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四三頁。

僅是各種農村合作社發展的重要條件，並且是城市與鄉村間商業聯繫加強的重要條件，後來蘇聯工人階級與農民之強固的生產聯合就是在這種聯繫的基礎上發展的。一九二四年，斯大林談到城市與鄉村間商業聯繫盡力加強的必要時，曾指出，握有政權的無產階級具有足以實現這種聯繫的一切基本手段，特別是，無產階級……「支配着信用，而信用即是國家手中的最偉大的力量」^①。後來，蘇維埃的銀行制度，在城市與鄉村間生產聯繫的發展中，特別是經過普遍的契約信用，亦即經過原始的以合作社形式聯合的農民，以及未加入合作社的農民和國家的儲備機關及工業間的契約關係，起了鉅大的作用。

在實行集體化時，蘇維埃的信用制度與國家預算相併行，在集體農場和服務於集體農場的曳引機站的財政供應上，貸放了鉅額的貨幣資金。信用的槓杆促成了集體農場之有組織的經濟的鞏固。生產的農業信用，在集體農場制度勝利的條件下，促進了蘇聯農村經濟之急劇的發展，集體農場經濟強度的提高和集體農場工作者物質文化生活水準的增長。

銀行國有化促進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的集體化，在經濟獨立性的創立和蘇聯軍事力量的加強下會起了本質的作用。

銀行國有化和銀行事業在國家手中的壟斷，奠定了社會主義信用制度的基礎。具有稠密支行網的堅強的集中化的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執行總結中已被根本完成了。

一九三〇年，在聯共黨（布）的第十六次大會上，斯大林曾這樣決定了負有促進社會主義經濟急劇發展任務的蘇聯信用制度工作改進的途徑。信用事業之合理的組織和貨幣儲備之正確的調整，對於國民經濟的發

① 斯大林全集六卷二四一頁。

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在這些問題的解決上黨的措施是循着兩條道路進行的：「即一切短期信用業務都集中於國家銀行的道路和在社會化的部門成立非現金清算的道路。同時，第一、國家銀行要變為生產計算和生產品分配的整個國家機關，第二、大量的貨幣要從流通中解放出來」^①。斯大林這些明顯的指示，即作了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日由政府命令所實行的信用改革的基礎。信用的改革廢除了相互的商業信用，而用直接的銀行信用予以代替。禁止國家機關和合作機關彼此間商品的轉讓和在信用上的協助。

國民經濟的短期信用和經濟機關之間的一切清算，都被集中於國家銀行。一切經濟開散的貨幣資金亦都集中於國家銀行。因此，後者已變成爲短期信用的唯一銀行，變成爲社會主義經濟唯一的清算和金庫中心。這種信用事務和清算的合理化，適合了蘇聯國民經濟所有部門中計劃性的增長。向直接的銀行信用的過渡，已爲經濟機關的信用和流動資金計劃化的鞏固創立了必需的條件。一切清算都集中於國家銀行體系中，使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得以擴展非現金清算的計劃機關，而使大量的貨幣從流通中解放出來。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的信用改革，是銀行制度社會主義的再建過程的完成，在他的這種意義上，亦可以視爲蘇聯銀行國有化的繼續和完成。蘇維埃政府在這個爲爭取銀行制度社會主義的再建而鬭爭的最後階段上，亦如在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同階級敵人的無情的反抗作了戰鬭。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派的叛徒和潛伏在國家銀行機關中的經濟學家惡棍們，曾企圖破壞信用改革的實施，並在實際上粗蠻的曲解了他的原則。這種曲解會反映在信用的機動主義上（計劃抵押的籠統貸款），反映在經濟機關之原有的和借貸的流動資金及其積累的混淆上，反映在致使經濟機關契約的相互關係破壞的清算的機

動主義上。聯共黨（布）中央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揭穿了這種加害政府的策略。一九三一年依照斯大林親目的指示，粉碎了對信用改革的曲解，制定了信用和清算之新的制度。

在帳款償還上的機動主義，曾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四日以政府的命令被根絕了。票據收受，即購買者須照所購商品付款，已被認為是卓越的清算形式。票據收受的清算形式鞏固了契約關係，提高了承包者的責任心，加強了對購買者監督。計劃抵押的機動主義的籠統信用和經濟機關自有的與借貸的資金的混同，曾於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及七月二十三日，分別以政府的命令肅清了。對於自有的和借貸的經濟資金之嚴格的劃分，曾予以規定，並實行了以限期償還的特種目的和用物資貴重品作保證的國家銀行貸款形式之新的信用制度。一九三一年所規定的信用和清算法規，在對盧布執行國民經濟的生產和流通計劃之經常監督的實行上，無限的提高了蘇聯銀行制度的作用。國家銀行取得了普遍的利用信用和清算的槓杆，以加強對企業之經濟核算，鼓勵企業為爭取成本降低和積累增高的鬭爭之可能。此外，國家銀行並獲得了進而以金庫計劃的形式使貨幣流通計劃化的可能。到後來，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所採行的正適合了社會主義經濟要求的信用和清算制度，便被保留了。他祇是從國民經濟各部門之特性的計算被完成了。

因此，具有遍及我們廣大國家所有地區的稠密的分行網的國家銀行，乃是社會主義信用制度的基本環。蘇聯的國家銀行已成爲國民經濟短期信用的唯一中心。他根據國民經濟計劃在實行着社會主義企業之直接的銀行信用。蘇維埃信用的主要原則是貸款的歸還、定期和特種目的性質。國家銀行是國家的清算、發行和金庫的中心。他經營蘇聯與其他國家的清算和對外貿易的信用。

國家銀行之集中化的和稠密的分枝機關，曾爲蘇維埃國家爲了對於掌握國家經濟的盧布的監督予以廣泛

的利用。國家銀行在執行其重要的國民經濟的機能的過程中，在鼓勵着物資貴重品週轉性的加速，促進着對企業的經濟清算，國內富源動員的加強，儉省的資金開支和社會主義積累的增加。

蘇維埃信用制度的第二個環——實行監督在國家基金中投資的運用的各部門的專門銀行，即成爲資本建設的財政供應和長期信用的中心。

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具有超越資本主義社會信用制度的巨大優點。

被國有化了的銀行即是蘇聯國家的財產，亦即全民的財產。這便特別給予國家以可能：第一、在適合國家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來指導和監督銀行的工作；第二、利用銀行制度以實現對掌握生產和流通的虛布的監督。顯然的，在資本主義國家，銀行係屬於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國家的中央發行銀行，事實上亦落於財政寡頭的掌握。銀行的所有者在將他利用於自己貪利的目的上——以便作損害社會利益的投機，濫設企業和欺詐的陰謀。對於資本主義銀行活動之各種國家監督的企圖，絕不會以任何方法指示在社會利益上對銀行真正監督。資本主義政府既不會侵犯到銀行家從銀行業務中所得的收入，復不會干涉銀行活動之任何本質的改變，縱使他在明顯的加害國家的經濟。此外，對銀行的國家監督機關的本身即落在大財政資本的手中，大財政資本則利用這種機關以加強其對國家經濟，特別對信用制度的統治。

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是有計劃的。蘇聯的國家銀行在根據國民經濟計劃實行國家信用和貨幣流通的計劃化。如此便在嚴格的適應國家經濟計劃中保證全國國民經濟各部和各環的信用和貨幣準備的方向。

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是無計劃的、無政府的。資本主義銀行的信用是離開國家經濟利益，而祇是趨向於那保證銀行家更多收益的部門和工業。

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在不斷的發展，他並不知有貨幣信用的危機。在國民經濟中的信用投資的規模在一年一年的增長；普及全國的銀行網爲了經濟和人民最大限度的便利亦在擴大。社會主義銀行的性質剷除了他們破產的可能性。

資本主義國家的信用制度在周期的體驗着深刻的貨幣信用的危機，這種危機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已愈益尖銳了和頻繁了。隨着貨幣信用危機而俱來的，是銀行信用投資和其他銀行業務最小限度的收縮，是拖累廣大存戶跟着自己破產的銀行的破產和倒閉。銀行的破產常常轉變爲整個銀行制度的麻痺，如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危機時期在美國即曾如此。貨幣信用危機會進展爲幣制危機——貨幣貶值，通貨膨漲，如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危機的步驟即是如此，從美國英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幣制的破產，即攜來了他們國家的破產。

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是集中化的信用制度。一切短期的經濟信用，一切經濟機關的清算，閑散的貨幣的經濟資源，都被集中在唯一的國家銀行之中。蘇聯信用制度的集中化，完全剷除經濟機關在幾個銀行平行信用的可能，保證在經濟內部清算上的明瞭性，而給與經濟的合理的使用國家貨幣和信用資源的可能。這種信用制度的集中化，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縱使在銀行集中最高階段的時期亦是不可能的，因爲特別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永遠存在着大銀行之間的無情的競爭的鬭爭，這種鬭爭即妨礙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集中化。

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隨時都在動員經濟的和民間的閑散資金，而將其引導到國家國民經濟的需要上去，引導到全社會的利益上去。蘇聯的信用制度幫助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在促進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準的

提高。

資本主義國家的銀行集聚閑散資本和民間的財資，而將其引導於資本主義的經濟之中，擴大着資本家對無產階級的剝削限度，加速着在財閥集團手中財富繼續積累的過程，加強着無產階級之絕對的和相對的窮困。大部份被銀行積蓄的錢財，都浪費在交易所的投機業務之上，財政的寡頭即在這種業務上非法的獲得了對全社會所課的賦稅。

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蘇聯的銀行不僅對國營企業貸款，並對在集體農場中所聯合的千百萬的農民羣衆貸款。資本主義的銀行則祇是無限制的對與銀行有聯繫的大資本主義的壟斷貸放信用。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則剝奪了小資產階級乃至中等的城市資產階級，而主要的是勞動農民，利用信用的可能，農民勢不得不去懇求高利貸者而支付使農民破產的掠奪式的利息。

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由銀行業務上的收入，保利用到國民經濟的需要上和爲了廣大的勞動羣衆福利的提
高而利用。資本主義銀行的利潤都爲資本家——銀行的股東所據有。財政的寡頭多半經過銀行將國民收入的大部份在自己的利益上予以再分配。

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在與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進行偉大的保衛祖國的戰爭——最艱困的戰爭期間，已經證明其比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無疑義的優越，這種優越在當時已爲人們所認識了。

在保衛祖國的戰爭期間，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燦爛的保持了嚴肅的教訓，協助了蘇聯的人民脫離其依賴性和粉碎德國的佔領者。在對彌補鉅額的軍事支出之財政資源的動員事務上，蘇聯的國家銀行會起了巨大的作用，保證了國民經濟之無間斷的信用，曾在困難的軍事條件下，爲爭取企業信用紀律和償付紀律的鞏

因而作了鬪爭。

除財政資機的動員外，蘇聯的信用制度會根據前線的需要，實現了國家國民經濟物資準備和儲藏的動員和再分配。沃茲涅辛斯基指出，在偉大的保衛祖國的戰爭期間，「在生產過程各個階段上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中商品儲備的動員，是由蘇維埃銀行的信用制度實現的，蘇維埃的銀行會檢定了這些商品，在戰時經濟的利益上執行了儲備再分配中工具的作用。因此，將戰前在蘇聯國民經濟中所積累的商品儲備，使用於當前的戰時經濟的需要之上了」。

信用制度在協助着國民經濟之恢復與發展的戰後五年計劃的鉅大任務的實現，在動員貨幣的準備和促進執行計劃之經濟槓杆的加強。蘇維埃的信用制度促成了一九四七年貨幣改革的實施。貨幣改革的結果，蘇維埃國家肅清了貨幣流通範圍內戰爭的後果，創立了真實價值的鞏固的盧布，並再度提高了貨幣和信用在全國國民經濟中的作用。

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將被蘇維埃國家利用於逐漸的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

列寧和斯大林天才的將信用與銀行由蘇維埃國家的利用普及於實際，發展了和創造的豐富了馬克思關於為了共產主義建設利用信用制度的指示。列寧和斯大林已將馬克思關於信用制度乃是資家政權和剝削者剝削毀滅之後，社會改造之有力的槓杆這一科學的預言，實際的實現了。

斯大林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之典型的經驗，證明了不僅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貨幣和信用的必需性，並且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條件下——在整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期間，貨幣和信用的必需性。

● 沃茲涅辛斯基，保衛祖國戰爭期間蘇聯的戰時經濟，一九四八年，一三五頁。

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的實現，無限的輕便了在其他國爭取社會主義的鬭爭。蘇聯在執行最重要的社會經濟措施中的經驗，即是對於目前人民民主國家所實行的進步的經濟措施的一個模範。特別是，蘇聯在銀行國有化和集中化的社會主義信用制度的創立的領域中的經驗，便為這些國家作了例證。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兩種制度——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間的勢力關係已有劇烈的改變。法西斯主義的毀滅，世界資本主義地位的削減和反法西斯主義地位的加強，致使歐洲的許多國家：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捷克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脫離了帝國主義的系統。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想再因襲的生活下去，已制定了民主主義的秩序，在引導着反黑暗的反動勢力和新的世界戰爭推動者的鬭爭（譯者註——本書係一九四八年出版，出版後甫及半年，南斯拉夫即在其反人民利益的鐵托政府的領導下，脫離了新民主主義的陣壘，厚顏無恥的投到美國帝國主義的懷抱之中。革命的叛徒鐵托已公開的暴露出他的狎狹面孔，在大規模的殺戮、逮捕革命的忠實信徒和新民主主義的戰士，進行着反蘇聯，反國際主義，背棄新民主主義陣壘和加害人民利益的陰謀與活動。本書所述南斯拉夫情形是一九四八年鐵托叛變以前的情形，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前由人民血汗結晶而成的初步成就，雖被鐵托及其伙伴們所沾污所毀棄，但南斯拉夫革命的戰士和革命的民衆在不久的將來仍會續寫他們被鐵托一度中斷了的光榮歷史。所以譯者對書中所述南國情形，仍照原文譯出未加刪除，且可使讀者以過去南國的情形與目前鐵托的行徑作一鮮明的對照）。

在這些國家，工人、農民和進步的知識份子的代表，已掌握了政權。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不是對反動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而是為全體人民，千百萬善良的人們的利益服務。這些國家是根本上與腐朽的

和賄賂的資產階級民主不同的新人民民主國家。

在新民主國家，工人階級的權威及其在人民中間的影響已無限的增大，因為工人階級在反法西斯的鬭爭中曾表現了最大的英雄主義和不妥協性。

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政府曾經實行了並且還在實行着大規模的經濟改造：土地改革，銀行國有化，交通和大工業國有化，漢奸財產沒收，合作社的廣大發展。這些措施，首先是要剷除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基礎——大地主土地佔有和大壟斷資本，這對於全體人民是有益的。銀行、交通、大工業的國有化，使新民主國家的政府得有可能實行引導國民經濟繁榮的國家經濟生活的調節，國民收入公平分配的規定和城市與鄉村勞動者狀況的改善。

在經濟領域果敢的民主主義的改造，根本上摧毀了壟斷資本在這些國家的地位，從帝國主義的奴役中解放了勞動羣衆。同時，進步的經濟改造使人民得以掌握經濟關鍵，奠定國家的全民財產的基礎和走向社會主義發展途徑之過渡的基礎。莫洛托夫在其「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的報告中，即曾這樣評述了在上述的這些國家中新人民民主主義制度的成就：「這些國家本着自己特別獨立的途徑，在向社會主義邁步了，他們在爲勞動者創造了脫離帝國主義奴役的自由的生活條件，並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將這些國家掌握在自己手中和使他們結合自己意志的企圖，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獨立性」①。

在實行進步的和真正的國民經濟改造中，在新民主國家成爲人民中間最有權威和最普及化的政黨的共產黨，曾起了鉅大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人民作反法西斯主義鬭爭的共產黨，即是這一社會經濟

① 莫洛托夫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一九四七年版，一七頁。

改革的首腦，他已將新民主國家引上自由發展的道路，將他們從外國資本的從屬下解放出來。

在本書第二章中，我們曾經引證過列寧的這一指示：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時銀行已成爲資本主義的主要中心，而與工業的壟斷相結合，銀行國有化，不僅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可以而且應該實行，並且所有真正民主主義的政府，假如他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走的是人民利益的道路，都可以而且應該實行。與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相類似，仍保持先前爲財政資本服務的舊的資產階級民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進步的經濟措施上表現是無能的。各種毛色的機會主義者懼怕觸犯到財政寡頭的利潤。他們懼怕，經濟上民主主義的改造，會是再不能後退到不可割裂的資本統治的向社會主義的邁步。

在新民主國家所實行的鉅大的經濟改造，在肯定列寧關於下列這一天才的論斷之歷史的公正：在帝國主義時代，沒有銀行和工業壟斷的國有化，反財政資本壓迫的真實的鬭爭是不可能的，在人民利益上國家經濟的調節是不可能的。

列寧和斯大林關於銀行國有化理論的指示之深厚的國際意義，在目前由於這些指示已成爲新民主國家實行銀行國有化時行動的指導，我們得有更完全的評價。關於爲了資本對廣大勞動者壓迫之根本的，摧毀全國經濟有計劃的調節的建立，國民經濟發展需要上財政資源的開發，銀行國有化的意義問題經由列寧和斯大林之理論的成就，已爲新民主國家在信用和銀行範圍的妥善措施開擴了和敷設了道路。

信用制度民主改造的規模和範圍，在中歐和東南歐各國是不一樣的。

在大多數的人民民主國家——南斯拉夫、捷克、波蘭、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一切銀行都被國有化了。在羅馬尼亞，中央發行銀行被國有化，而對私人銀行則建立了國家的監督。在某一些人民民主國家，如

在南斯拉夫，在捷克，於民主制度建立之後即刻就實行了銀行國有化。在其他的國家於人民的代表掌握了政權之後，經過了兩三年纔實行銀行國有化（匈牙利、羅馬尼亞）。

實行的範圍和時間的差別，不僅其對於銀行的國有化是如此，其對於各人民民主國家之整個的經濟改造亦復如此。在所有這些國家，經濟的改造，特別是銀行的國有化，都曾通過殘酷的階級鬭爭的條件，但是在各國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是不同的。民主主義制度建立的第一個時期，在各國民主的力量是不相同的。在某些國家，反革命者和潛入參加人民陣線的各政黨領導的叛徒們，曾用盡方法阻撓了經濟上民主的改造。譬如，在匈牙利很長的時期還未能實行對私人銀行的國家監督，因為後來揭穿了的小農業主政黨之反動的領導，如同叛黨和國外帝國主義的間諜的咆哮一樣，曾堅決的反對接受政府關於對銀行監督的決議。

在所有新民主國家，銀行的國有化給與了本國的財政資本，以及銀行與其有關的外國的財政資本以重大打擊。銀行國有化和信用制度的改造，是這些國家經濟有計劃的調節的必需條件，而促進他們國民經濟的恢復和更繼續有力的發展。

在南斯拉夫，大銀行曾與法國和英國的財政資本有着密切的聯繫。在南斯拉夫創設自己的法蘭西·謝爾伯女兒銀行的法國資本，在南斯拉夫的信用制度中曾起有主要的作用。外國資本在南斯拉夫經濟中投資總數的百分之五二·一，係投入礦山和鑄造工業、電氣工業、石油工業和銀行^①。從而，銀行便處於一個最重要的地位，外國的財政資本便從這個重要地位得以監督南斯拉夫的整個經濟。外國的財政資本由於銀行的幫助，便從南斯拉夫刮去了國民收入的大部份。在淪陷期間，南斯拉夫的銀行曾積極的支持了德義侵略者。領

^①「一九四七年九月末在波蘭黨代表情報會議」集中卡爾德爾的報道，一九四八年國家政治出版局版，七七頁。

導傀儡政府的首領，斯道雅金腦維祺，茨沃特考維祺和克勞色茲等本人即是銀行的大股東。意大利半島的和其他的法西斯主義匪幫即在銀行的貨幣上創立起來了。是的，哈爾瓦特州最大的銀行，『第一哈爾瓦特儲金局』即曾撥付給賣國賊巴沃里祺一百萬的借款。

屬於人民公敵的財產，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會議主席團的命令，被沒收了。

這一法令會普及到銀行。南斯拉夫銀行的一大半——是屬於德意佔領者和通敵者的——被移作國家的財產。對於有聯合國和立國的外國資本的銀行則予以代管。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南斯拉夫臨時人民大會通過了關於除具有外國資本而業經代管者外，所有私人商業銀行一律國有化的法案。此後不久就又通過了關於由國家購買具有全國意義和全民意義的人民銀行和其他股份銀行的股權證書的命令。最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會議通過了關於一切私人經濟企業，包括具有外國資本而有全民意義的企業，概予國有化的法案。這一法案普及到銀行，普及到一切工業部門、交通和批發商業。他完成了南斯拉夫的銀行國有化。

因此，目前在南斯拉夫，所有大中小私人資本主義銀行已百分之百的國有化了。銀行國有化在南斯拉夫祇是國家經濟之果敢的民主主義的改造連鎖中重要的一環。土地改革實行了，這一改革便將大地主經濟完全消滅，並將土地移交給勞動農民了。土地改革不僅消滅了國內封建的殘餘，並給與鄉村中一切資本主義的份子以嚴重的打擊，限制了農業的佔有。除小的地方性的之外，一切工業，一切鐵路，外海和內河交通，一切批發商業，都被國有化了。

銀行、交通、電訊、聯合的和全民意義的工業和批發商業的國有化，便為民主政府實行對國家經濟的調

節，創造了一切必需的條件。

南斯拉夫人民會議根據憲法，於一九四六年五月通過了關於全國經濟計劃的法案，從一九四七年起國家便開始實行工業化和電氣化的五年計劃了。

由南斯拉夫民主政府所實行的銀行國有化，與加強貨幣流通的任務是密切的相聯繫的，在淪陷期間貨幣流通已達完全混亂的狀態。國家發行銀行和貨幣機關的掌握，用以加強貨幣混亂的有價證券及銀行一切可能的投機業務的根絕，銀行國有化的結果已成爲可能的信用的調節，促進了貨幣改革和尼那（南幣——譯者）穩定的實施。鐵托當時曾指出：「我們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即是尼那的穩定，目前尼那即是歐洲最穩固的幣制之一。」

根據國家貨幣流通和在國民經濟中的信用投資之國家調節的目的，在南斯拉夫便實現了被國有化的銀行合併爲唯一的國家銀行——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他是短期信用的中心和國家唯一的發行銀行。除人民銀行外，在南斯拉夫還成立了國家的投資銀行，投資銀行適應國家工業化和電氣化的五年計劃，對國民經濟貸放資本建設上的長期信用。國家投資銀行是在過去抵押銀行的基礎上成立的。一部份過去的中小商業銀行和抵押銀行，於國有化之後即被取消了，一部份則以國家的人民銀行和投資銀行支行的名義予以利用。

南斯拉夫集中化的國營的信用制度，根據國家的計劃，對企業貸放短期和長期的貸款，便獲得了監督企業工作及執行計劃經濟任務之進度的可能。

南斯拉夫的民主政府給與已有重大發展的各種合作社以普遍的支持。到一九四七年底，各種形式的農村

經濟合作社，即包括了所有南斯拉夫農民經濟的四分之三^①。

信用合作社在南斯拉夫過去發展本甚微弱，而在淪陷期間則完全荒廢了。民主政府恢復了舊的信用合作社，並協助創立了新的。一九四七年初，在南斯拉夫已約有一、五〇〇個信用合作社。他們以合作銀行爲首，經過南斯拉夫唯一的人民銀行，享受着政府之廣泛的財政的支持。

在分析到南斯拉夫民主政府的經濟政策時，在幾國共產黨的代表會議上，卡爾德爾在他的報告中強調說：「成爲以工人階級爲首的勞動人民聯合之反映的政府，不能祇限於各種封建制度殘餘和資本主義壟斷的撲滅，且應該掌握住走向南斯拉夫一般的資本主義消滅的一定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②。

在保加利亞的信用制度中，亦正如南斯拉夫一樣，外國的，特別是德國的財政資本，曾起有顯著的作。保加利亞最大的銀行——德保信用銀行——即是柏林杰伊奇銀行的「女兒」公司，並公開的執行了掠奪的德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保加利亞銀行資本的大部份係屬於國家。保加利亞信用制度的這一特質，使新民主主義政府得以一次即掌握了國家的大銀行，而經過他們來實現對私人銀行之國家的監督。

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期間，保加利亞的銀行制度差不多已完全集中在國家的手中。到一九四七年初小銀行和少數中級銀行還保留了私人資本。就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情形講，私人銀行的份數佔保加利亞銀行存款總數的百分之六弱，佔信用投資總數的百分之六。這便給與保加利亞的代表丘爾溫考夫一種根據，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幾國共產黨情報會議上宣稱，保加利亞的銀行均握在國家的手中^③。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

^①統計字取自在一九四七年九月末在波蘭幾國共產黨情報會議集所公佈的卡爾德爾的報道，八一頁。^②見同書七二頁。

四日，保加利亞的民主政府通過了關於一切私人銀行，連小銀行亦包括在內，一律國有化的法案。

保加利亞國家信用機關的體系是：保加利亞國民銀行、保加利亞農業與合作銀行、「保加利亞信用」銀行、抵押銀行、郵政儲金局。保加利亞國民銀行是發行銀行和辦理直接的經濟信用。一九四七年五月所實行的貨幣改革的準備和總結，許多工作都是經過這個銀行執行的。

保加利亞農業與合作銀行——在全國次於國民銀行的最大銀行——對合作社聯合社貸放信用和對農民和手工業者貸放低利貸款。保加利亞的信用合作社體系，係由約計二千五百個合作社的農業信用合作社和城市信用合作社——二百四十三個所謂「大眾」銀行所組成。信用合作社經過農業與合作銀行享受着國家廣泛的支持。

目前保加利亞信用制度的特點，是合作信用機關從中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一九四七年初，「大眾」的合作銀行佔了存款總數的百分之二一和信用投資總數的百分之二七。這便證明合作社在保加利亞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意義。是的，若干工業部門——製糖、木材、製乳——差不多全部在合作社掌握。在一九四七年，全國國內商品週轉總量中，合作社的部份佔了百分之六十。合作社在農村經濟中，特別以勞動合作的農業經濟形式，獲得普遍的發展。

在保加利亞，亦正和在南斯拉夫一樣，信用制度的掌握，是與全國經濟中其他最重要的民主主義的改造：土地改革，農業合作社之普遍的發展，交通和電訊的國有化，對外貿易之國家的監督的建立等不可割裂的聯繫中實行的。

①見同書二一五頁。

到一九四七年底，主要工業屬於國家的約百分之一六·六，然而再詳細的計算，保加利亞在國家影響下的農業和工業生產，要佔國民生產總數的百分之二六^①。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保加利亞政府通過了關於一切私人工業，包括對全國國民經濟具有意義的工業部門的小企業，一律國有化的法案。

全部國有化了二、六〇〇個大中工業和一、五二七個小工業。爲便於對國有化的工業的指導，特成立了各部門的聯合。被國有化的企業都過渡到經濟的核算。

一九四六年，保加利亞民主政府通過了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兩年計劃，這個計劃同樣規定了全國信用貨幣制度的發展和鞏固。

保加利亞政府的首長吉米特洛夫（今年七月間逝世——譯者註）指出，國民大會所通過的國民經濟國家兩年計劃之實行，是保加利亞人民的中心任務，這一計劃的目的在指出走向國家經濟繁榮和人民康樂的途徑^②。

捷克斯洛伐克是個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在捷克斯洛伐克，信用制度的作用非常偉大。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捷克斯洛伐克銀行工業資本集中和壟斷的水準，以及銀行與工業結合的程度，都已非常之高。整個商業銀行的體系，是由十一個大股份銀行所構成，而其中九個即握有捷克股份公司資本總數的百分之八十，曾控制了全國的經濟生活^③。捷克的財政資本曾與英國、德國、法國和瑞典的財政資本有着密切的聯繫。外國資本掌握了捷克工業的四分之一。在淪陷期間，有三個捷克的大銀行和很重要的重工業企業（特別是，著名的

^①統計字取自同書中所發表的丘爾溫考夫報告，二一五——二一六頁。^②見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真理報吉米特洛夫答通訊記

者問。^③統計字取自昂爾德曼著捷克斯拉夫國有化概論，外文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六頁。

施高德工廠（已直接的轉讓於德國人之手。自然，在像捷克這種國家，銀行的國有化，其對於壟斷資本對廣大勞動羣衆之壓迫的毀滅，對於國家從外國資本依屬性的解放，對於整個國民經濟之國家的調節，自己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銀行國有化，遠在一九四五年四月軍事行動尚未結束以前，即在捷克人民陣線政府的政綱中作爲首要措施之一被規定了。根據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法令，所有捷克的私人銀行都被國有化，並確定爲國家的財產。銀行的股東，除德國人和賣國賊外都獲得了部份的補償。中央發行國民銀行會保存了股份公司的形式，但其大部份的股票則爲國家所掌握。銀行國有化在捷克會遇到資產階級之有力的反抗，並通過了激烈的階級和黨派鬭爭的環境。特別是，過去捷克國家社會黨即曾反對銀行國有化。克服了資產階級及同情他們的黨，捷克的民主政府到一九四七年初纔完成了全國信用制度的國家化和基本點的改造。十一個過去的股份銀行中有三個於國有化後即被取消了，而他們的資產與負債於清算後則移交其他被國有化的銀行。這種措施的结果，捷克的信用制度這時便由下列各環所構成：發行的國民銀行，八大收歸國營的信託銀行和所謂人民銀行大體系，其中包括國家儲金局和向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公務員和農民貸款的貸款局。爲了對於銀行工作及其合作社活動的指導，特設立了一個直屬財政人民蘇維埃的銀行總管理處。一九四七年間，在捷克實行了銀行改革。祇經營長期信用和資本建設財政供應的投資銀行，便從收歸國營的銀行中劃分出來。其餘的銀行則根據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短期信用而予以專門化（工業銀行、商業銀行、農業信用銀行）。捷克國民立憲會議所通過的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共和國恢復和建設兩年計劃，即規定了全國信用事業再建的

●斯堪斯基報道——一九四七年九月末在波蘭國共產黨情報會議集，一八四頁。

巨大綱領。

特別注意到，經過銀行收歸國營企業間非現金清算之普遍的樹立，收歸國營的企業間相互的商業信用的消滅，祇由某一銀行對收歸國營企業之信用的貸放等等，捷克政府的首長豪特瓦爾德在其於立憲會議上——對兩年計劃的動機的演說中聲稱：「收歸國營的銀行的活動將集中在企業生產之財政的供應上。收歸國營的企業則將永遠受這樣一個財政機關的財政支持。收歸國營的企業在其與社會機關的往來上將予以調整，除小數目的以外，祇用活期帳戶的撥兌……爲使各個收歸國營的企業財政狀況完全公開，特取消他們彼此貸放信用之權。政府將用司法和行政的措施和宣傳支持一切非現金償付的形式」^⑤。民主政府經過收歸國營的銀行貸款給已有自己的捷克斯拉夫合作銀行的信用合作社^⑥。

與銀行國有化同時，依照工業部門的次序，所有工人數量在三〇〇——五〇〇以上的工業和所有保險公司，亦即根據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法令，實行國有化了。

礦山、冶金和電氣各工業部門，都完全被國有化了。到一九四七年底，在國營企業任職的職工佔捷克工業職工總數的百分之六六。收歸國營企業產品的比重，在一九四七年佔全部工業產品量的百分之七五以上。

因此，在捷克，全國經濟司令臺——銀行和大工業——的掌握，民主政府並未分階段實行，而是在一九四五年的第一次行動。這馬上便給與了捷克政府以可能，得以調節全國的經濟和在一九四六年初即從事所有國

⑤ 豪特瓦爾德政府的建設綱領——捷克情報部出版，三二——三三頁。⑥ 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豪特瓦爾德在其綱領的講演中

說：「政府將用自己已有組織的經濟互助支持那減少各個工人，孤立的農民、小企業家和勞動的知識份子對資本剝削之依屬性的合作運動」——豪特瓦爾德政府的建設綱領，二九頁。

民經濟重要部門發展兩年計劃的草擬。在幾國共產黨會議上，捷克代表斯坦思基敘述銀行和工業國有化的意義，曾強調的指出，國有化在廣大的羣衆中極孚衆望，並已創立了「新民主主義之真實的經濟基礎，作爲一個新型的國家，在這裏主要的生產手段已從大資產階級取來而轉到國家的手中了」^②。

在民主主義的波蘭，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人民國是會議第九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交通、大中級銀行和大中級工業轉渡於國家掌握的法令。這一法令，即如政府的機關報一般的話所指出的，是表明「波蘭的國民經濟從曾被集中在少數的工業和財政壟斷集團手中的大資本統治中的解放」^③。

銀行和工業壟斷的國有化，在波蘭同樣表示全國國民經濟從外國的依屬中得到解放，因爲據一九三九年狀況，銀行中參加的外國資本會達百分之五七，石油工業中的外國資本爲百分之八九，化學工業中爲百分之七六，礦山和冶金工業中爲百分之六三。根據關於國有化的法令，凡屬於德國、德國人和漢奸的企業和銀行，對其所有者不償付代價的移轉爲國有財產。所有其餘被國有化的企業與銀行，則根據對其所有者部份的補償代價，而移轉爲國有財產。被國有化的波蘭各銀行曾被合併爲幾個國家銀行：經營工業信用的國民經濟國家銀行，貸放農業信用的國家農業銀行，合作社、商業和市區的信用銀行，即所謂貸放地方性經濟信用的「地區銀行」。

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重要經濟改造實施的結果，波蘭國民經濟的司令臺便歸於人民民主國家的掌握了。到一九四七年底，銀行制度，除信用合作社外，已完全國家化了；在全部工業生產品中，私人工業和

②一九四七年九月末在波蘭幾國共產黨情報會議集，一八五頁。③引自奧乎卡洛夫論文：「波蘭工業、交通和銀行的國有化——民主主義的大勝利」。——斯塔溫雜誌一期。

手工業所佔的部份不超過百分之十五；在批發商業的週轉中國家和合作社的比重已達百分之七六。波蘭的副總理古穆爾克在幾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上指出：「國民經濟的關鍵都已集中在支配着大中工業、銀行制度和批發商業的國家的手中」^②。對於像波蘭這種國家，農民佔着極大的百分數，人民政府於一九四五年所實行的土地改革，自起有巨大的作用。土地改革肅清了農奴制度——大地主經濟的殘餘，將地主的土地移交農民，消滅了波蘭農民——缺乏土地者之長期的鞭策。

國家對經濟司令臺的掌握，是有計劃的恢復被德國人所強力破壞了的國民經濟的基礎。波蘭的民主政府曾經通過並在順利的實行着全國經濟恢復的三年計劃。

在匈牙利，一九四七年五月曾依照部長會議的決議，建立了對大銀行的監督，大銀行計有十三個：英商銀行、一般信用銀行、商業銀行、交換銀行等。在這些銀行中都派有政府的代表，這些代表有對與匈牙利民主政府財政政策相矛盾的一切銀行業務提出駁斥之權。在監督之下的銀行股票的出賣，祇有得到財政部的同意始得決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國會通過了關於大銀行國有化的法案。這一措施的實行，對於在匈牙利人民利益上國家經濟的調節，對於資本家政權的摧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因為大銀行即是匈牙利工業約百分之六十的據有者。大銀行的國有化係在與其他經濟上重要的民主的改造之有機的聯繫中進行的。這些改造的一部份在一九四六年即已經實行了：在全國消滅封建殘餘的根本的土地改革；煤炭、冶金和電氣工業及其他工業部門許多最大的企業的國有化；爲了對全國經濟和財政生活之國家監督、最高經濟蘇維埃的創立。經濟範圍內一部份民主主義的措施已在一九四七年與大銀行國有化同時實現了，例如，鐵鑄和鋁礦工業

②一九四七年九月末在波蘭幾國共產黨情報會議集，一〇九頁。

的國有化，其結果便完成國家對全國一切重工業的掌握。匈牙利經濟日益增大的國營部門即為國家採行國民經濟恢復三年計劃的基礎。大銀行的國有化促進在一九四六年八月所實行的貨幣改革基礎上幣制穩定的鞏固。

與前述人民民主國家不同，那些國家銀行國有化已在與其他最重要的經濟措施的結合中根本的完成了，羅馬尼亞的民主政府纔祇進入了信用制度的掌握。

羅馬尼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德國的財政資本，在羅馬尼亞的信用制度中，以及在他的重工業中，首先是在石油工業中，曾起有支配的作用。最大的羅馬尼亞商業銀行是：羅馬尼亞銀行、「羅馬尼亞信用」銀行、瑪爾莫婁士·布蘭克銀行和公司，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羅馬尼亞的商業銀行和羅馬尼亞的銀行公會實質上是德國銀行公會的女兒。給羅馬尼亞新民主主義政府留下來的遺產，約有四百個獨立的銀行，其中有二百五十多家是商業銀行，其中十五家是支配其餘中小銀行的大銀行。在銀行中間，非常的發展了濫設企業和各種使銀行獲取高利的投機業務。信用根本上並非貸予經濟的發展上，而是放在投機性的支持和擴展之上了。羅馬尼亞的發行機關——中央國民銀行，曾是個股份公司，其中國家股份祇佔股票總數的百分之十。國民銀行曾被握在反革命的資本主義集團布拉金的手中，曾爲了他們的投機業務廣泛的資助了商業銀行，從而更加强了國內的通貨膨脹和貨幣混亂。根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法案，羅馬尼亞民主政府宣佈了國民銀行爲國家財產。股票持有人曾獲得照股票平均市價計算之現鈔的補償。發行銀行的國有化，亦如其他民主主義的措施是在同受外國反動集團所支持的國內反動派勢力之劇烈的鬭爭中實行的。民主政府實行發行的國民銀行的國有化，有下列兩個主要目標：（一）爲了完全失調的貨幣流通恢復健康和爲了貨幣流

通之國家的調節而掌握國家的發行機關。(二)爲將全國的信用資源引向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上和根絕私人銀行之有害的投機活動，而建立對私人銀行的監督。國民銀行的國家化，曾是實行在羅馬尼亞根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法案所實施的貨幣改革的最重要的準備條件。在貨幣改革實行時，商業銀行在國民銀行的存款，以及金庫裏他們的現金，都被凍結了。這樣便決定了商業銀行對國民銀行的依賴性，而給與後者影響商業銀行活動的可能。然而實際上，最初對於私人銀行的監督還是不夠的，因爲國民銀行祇是限於對私人銀行現金支付限定數目的規定，而並未就本質上監督銀行的活動。在一九四七年四月，羅馬尼亞共產黨公佈了自己關於國家之經濟財政狀況的改善問題的建議。這個被羅馬尼亞民主政府所採納的建議，包含了在信用的調節和對私人銀行監督的加強問題上許多有價值的指示。政府曾建議國民銀行建立對企業利用信用的監察，祇許他用在生產的目的上，而不是用在投機和自肥上；廢止企業在幾個銀行的平行信用；祇依照在資金上實際的需要對企業貸款；對超過生產計劃的企業給以優先信用等等。

中央發行銀行的國有化和由於共產黨的建議他的工作改造，便爲對私人銀行工作監督的建立創造了必需的條件，並擴大國家信用調節的可能。

一九四七年間，在羅馬尼亞並曾實行獨立的商業銀行數目之大量的縮減（差不多三分之一），因爲小銀行這樣大量的存在，對於全國國民經濟並沒有任何的需要。小銀行的衆多祇對國民銀行實行對私人銀行活動的監督增加了困難。

因此，在新民主國家，銀行的國有化和信用制度的改建，可由下列要點加以說明：

第一、銀行國有化是在與其他最重要的社會經濟改造，首先是與大工業的國有化之有機的聯繫中實行

的。

第二、銀行和大工業的國有化，將壟斷資本在這些國家的地位予以根本的摧毀，將勞動者從壟斷的壓迫下解救出來。

第三、銀行和大工業的國有化，剷除了這些比較小的國家的國民經濟對外國財政資本的依屬性。

第四、銀行的國有化和其他國民經濟關鍵的掌握，創立了新民主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途徑之堅強的經濟基礎。

第五、銀行的國有化給與適合基本的國民經濟任務，調節貨幣流通和國家信用資源的可能。

第六、銀行的國有化和其他最重要的國民經濟司令臺的掌握，使新民主國家的政府有編製和實際執行國民經濟計劃的可能。

第七、隨着在新民主國家之信用制度的改建，密切的與國民經濟計劃化和在許多國家對企業計劃執行進度監督之實行的任務相聯繫，銀行的國有化並隨行了信用制度的集中化，以及將銀行在貸放資本費用的長期和短期上予以劃分。

第八、銀行的國有化在鞏固於戰爭和淪陷期間失調的貨幣流通上，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促進了貨幣改革在大多數這些國家中的順利推行。

第九、銀行的國有化和信用制度再建，照例隨行着信用合作社的發展，信用合作社與其他各種合作社相並列，經過國有化的銀行獲得國家巨大的財政支持。

在人民民主國家這些果敢的經濟改造的背後，便窺視到在法國，特別是在英國，那證明資產階級民主在

進步的措施上已無能為力的戰後的銀行改革。

在民主勢力的壓迫下，在法國，興煤礦、瓦斯、電氣、保險公司和某些屬於叛徒的企業（如著名的萊諾動力工廠）的國有化相併行，實行了大商業銀行之部份的國有化。然而在法國所實行的銀行部份的國有化，根本上與新民主國家的銀行國有化不同。

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法國立憲會議通過了關於國家對信用監督的法案和關於發行的法蘭西銀行和四個最大的信託銀行（里昂信用、格涅拉爾公司、國民交換業務局、國民工商信用銀行）國有化的法案。後來有兩個所謂資助工業的「事務」銀行被國有化了。從而，除了這兩個銀行外，法國大財政資本的主要柱石仍毫無損傷的將「事務銀行」保留了。同時，特別經過「事務銀行」在法國經營工業股票的發行，工業的長期投資，以及使其從屬於法國財閥為目的在落後國家和殖民地國家的資本輸出。

法國銀行國有化的法案，預計對於法蘭西銀行股東們的補償，是許與他們國家的二釐債券代替股票，信託銀行股東們的補償，則許以每年所獲收入不低於一九四四年最高紅利的債券。被國有化的銀行的股票將於五十年內照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至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這一期間，在巴黎交易所的平均市價收購。因此，這個法案完全維護了法國財政寡頭代表們——被國有化的信託銀行控制額的股權證書持有人的利益。

大股東將來以國家出錢，亦即法國人民出錢「補償」的性質獲得不少於他們於銀行國有化以前所獲得的收入。

在移交給國家的信託銀行中曾集結了存款總數的百分之六五，但是法案卻保留了這些存款處理的自由。財政資本可以無干涉的將資本主義企業的存款轉存到私人銀行。最後，雖說法案也曾規定被收歸國營的銀行

領導的完全掉換，但事實上，他們先前的股東中的銀行家和大企業家則仍留在銀行的主腦部。

因此，反動勢力影響的結果，部份銀行的國有化，在法國祇是形式上實行了，絲毫不會削弱財政資本之顯著的統治。同時，財政的寡頭，聲名狼籍的『二百家族』，在一九四〇年曾組織了國家的失敗，並曾積極的與佔領者合作。法國最大的銀行曾是與德國侵略者經濟合作的總參謀部。他們成立了『法國和殖民地工業發展的財政協會』，這個協會的目標是『法德工業方案的實現』，特別是，曾經資助了反對反抗運動的鬪爭和法國工人之強制的遣送德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財閥們已改變了方向，現在由民主的叛徒勃倫姆的協助，在進行關於將法國出賣給美國銀行家的談判了。法國的財政大王在以極端惡化工人階級生活水準的代價增殖着自己的財富。是的，法國資本家的利潤，在一九四五年為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朗，而在一九四六年則增到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朗。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所實行的，以對私有者完全補償和將許多有勢力的銀行仍保留在財政資本手中的部份銀行的國有化，絕不會妨礙法國銀行家和企業家這種鉅額利益的增長。若干大銀行的國有化騙過了法國民主集團的期望。

領導法國民主勢力與反動勢力鬪爭的共產黨和勞動總同盟，曾要求大壟斷和銀行國有化，而對股東無補償的將他們全部移作國家的財產（除小股東外）。政府中的反動份子則如此的實行了部份的銀行國有化，他絲毫不曾限制財政資本對全國經濟生活的支配。

在一九四六年由工黨政府所實行的英國銀行的國有化，完全不曾侵犯到財政資本的支配。銀行的領導者

●統計字取自鳩克裏的報告——一九四七年末在波蘭國共產黨情報會議集，一六七頁。

卡透爵士和開因斯爵士本人曾經支持關於國有化的法令草案不是無代價的。英國銀行國有化的要求，曾是工黨於一九四五年選舉前競選政綱的要點之一。十五年以前工黨即提出了商業銀行國有化的要求。當時工黨的理論家考爾曾認定，英吉利銀行正是『銀行之銀行』，他的國家化將祇是英國信用制度社會化的第一個階段，當時考爾曾將『銀行的社會化』與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相混同。到後來，工黨便從自己的競選政綱中刪去了整個信用制度的『社會化』，祇限於他的『第一階段』——英吉利銀行的國有化了。

目前工黨政府以華爾街的奴僕，艾德禮和貝文爲首，卑躬屈膝的執行了美國銀行家的命令，完全停止了一切關於資本主義企業和銀行任何繼續國有化的議論。

依照英吉利銀行國有化法案，國家要從他們的所有者收買股票。股票所有者代替股票而獲得根據銀行國有化以前二十年内每年平均紅利計算三釐息的政府債券，即是說，股票所有者每一張票面價值一百鎊的股票，要得到四百鎊的債券。因而，爲過去的股東保存了他們原先的收入，所不同的祇是他們將不是從銀行的財源中獲得，而是從國家的預算中獲得。

英吉利銀行的董事會於國有化之後，曾有非常微小的革新：十六個董事祇調換了三個。英吉利銀行本身的狀況很少改變。國有化祇是完成了和鞏固了銀行與國家間的密切關係，而這種關係則是英吉利銀行以股份公司性質存在差不多二百五十年來所一直保存下來的。因此，工黨所廣爲標榜的英吉利銀行的國有化，並不是別的，乃是國家中央發行銀行之資產階級的改革。的確，現在企圖利用國有化的英吉利銀行，不是爲了任何『社會主義的』改造，而是爲了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保存下與經濟危機之無結果的鬭爭。破產的經濟『投資的調節』老早即以醫治危機的性質被提出了。在英吉利銀行中所設立的國民投資委員會和資本證券委

員會即會號召實行這種調節。

法國和英國的銀行改革已足以確認列寧這一指示之深刻的公正而有餘：即帝國主義國家企圖這樣來「調節經濟生活」，將工人拖到饑餓的邊沿，為他們創造苦役，而為銀行家和資本家則創造樂園。這種銀行的改革並未觸犯到壟斷資本的統治，並不妨礙國民財富和國民收入照財政寡頭利益的再分配，即是說，絕不會削弱帝國主義對勞動羣衆的壓迫。反之，這正和與他類似的工黨及其伙伴們的經濟改革，是在指向帝國主義奴役的加強。

在法國之部份的和形式的銀行國有化和在英國祇限於一個發行銀行國有化的工黨的資產階級的改革，可以充分而有餘的確定，銀行——財政資本的支柱——的國有化，祇有真正民主的國家纔有能力實行。祇有真正的民主政府，不是字面上而是實際上與掠奪人民，煽動新的世界戰爭的財政寡頭作鬭爭的民主政府，纔有能力將銀行從資本家手中取來，而將他置於為人民服務上。進入社會主義發展之途的新民主國家政府，即是這種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實際上與攫取其他經濟司令臺的同時，來掌握銀行的真正民主主義的政府。在列寧和斯大林之天才的領導下，在蘇聯所實行的偉大的社會經濟的改造，對於人民民主國家，作了在人民利益上根本的革命的經濟改造的模範。